

DIGUO DE
QIMENG

帝国的 启蒙

阮景东 著

明朝的历史裂变



被人痛骂的皇帝，表里不一的大臣，
富可敌国的商贾，舍生取义的凡夫俗子！

**视角独特、观点震撼，
揭开一个被历史扭曲的大明盛世。**

找寻华夏原生文明，
重现中华文明崛起与复兴的真实路线。

线装书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思想：明代的启蒙运动](#)

[第一节 理性而思辨的理学](#)

[第二节 伟大的心学](#)

[第三节 启蒙思想家王艮](#)

[第四节 异端思想家李贽](#)

[第五节 明朝的基督教](#)

[第六节 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推动](#)

[第七节 茶陵诗派与后吴中诗派](#)

[第八节 繁荣的小说市场与明代的文艺复兴运动](#)

[第九节 性灵之风与明代的智者学派](#)

[第十节 成化新风](#)

[第十一节 明朝的达尔文与明代的市场经济学家](#)

[第十二节 明代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

第十三节 明末民主思想家

第二章 制度：大明王朝的非君主主义

第一节 成化皇帝的垂拱而治

第二节 儒家礼法压抑下的弘治皇帝

第三节 被禁止出宫的正德皇帝

第四节 儒家体制下绝望而荒诞的君主

第五节 无助君王下的大礼仪之争

第六节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

第七节 无奈的官僚严嵩

第八节 可怜的皇帝万历

第九节 皇权衰弱下的国本之争

第十节 明宫三案中被当猴耍的皇帝

第十一节 南渡三案中被诬陷的皇帝

第十二节 那些骂皇帝的大臣们

第十三节 充满理想的太监

第三章 经济：汹涌的明代资本主义浪潮

第一节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东林党

第二节 矿税斗争与资产阶级的柔性革命

第三节 工业革命与明朝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第四节 开读之变

第五节 应社与复社

第六节 温室里的资本主义陷阱

前言

启蒙思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旧是个时髦名词。何为启蒙思想，简单的说它就是从过去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从欧洲来看它主要是反对神学，从中国来看它产生于明代的异端思想。

在欧洲经过一千年的神学统治后，人们终于发现理性可以代替神学，到了此时，教会的统治开始摇摇欲坠，这是18世纪的事情；而在东方的中国，经历2000年的孔孟统治后，在明代的中国，人们发现底层民众也可以有认识权力，真理就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儒家等级秩序也开始摇摇欲坠，这是16世纪的事情。

无论是欧洲的启蒙思想，还是中国的启蒙思想，这都是思想界的大事，它表明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和那个时代我们一切值得骄傲的理由。而无论从西方来看，还是从东方来看，启蒙思想的产生都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增多，除此之外，它还跟市民运动息息相关。

时至今日我们还可以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中捕捉到那时代跳动的脉搏。而明代代表中国农耕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指标都在这个时代达到临界点，当整个王朝完成文官化、商业化、城市化、白银化、私有化的时候，启蒙思想破土而出已是必然，我们这个封建等级大厦开始摇晃，伦理纲常受到冲击，波澜壮阔的时代开始到来。整个社会开始舆论民间化，参政、议政群体扩大化，士人结社普遍化，男女开始平等化，人人开始积极追求自己的权利，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从16世纪开始，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开始了一场裂变。也就是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近代全面裂变，这种裂变皆是从思想、制度、经济三个方面进行。

思想方面，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反对教会的说教，反对天主教对人性的压制，开始关注人本身的需求，崇尚理性与科学，由此发动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制度方面，君权神授被否定，天赋人权开始被宣扬。英国和法国相继通过《权利法案》和《人权宣言》，限制君主的权力；经济方面，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外市场被开拓，传统的手工技术无法满足生产需要，通过技术革新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而这所有一切都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同样的是，这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同的频率与规模在明王朝进行。它在中国的明王朝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非君浪潮和资本主义萌芽。

它思想自由、文化昌盛，启蒙思想裂土而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多，人们更注重人本身的需求，儒家等级秩序和纲常名教摇摇欲坠，人们发现真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人皆可为圣贤。从明代中期开始，以唐伯虎为代表，到徐渭和公安三袁，中国的文人、诗人、画家刮起了一股“性灵”之风，他们更注重周围的现实世界，关心人本身的发展。它还诞生了两场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大明王朝那远离尘嚣的小山村，两位思想家正在进行乡村试验和群体主义，他们发起了一场旨在以公有制为目标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到了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更是提出“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等具备民主的观点。

它具备君主立宪的雏形。当一切制度都完备后，皇帝开始垂衣拱手，整个国家依靠制度运行。在这里，君主的权力被大大约束，国家大事由内阁票拟，然后报司礼监批红，再由六科签发。皇帝跟他的军

队脱离了关系，军队由兵部调配，文官统领。皇帝终身被限制在宫中，不准随意出宫，每次皇帝出宫都要跟文官集团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皇帝被迫严格的遵循儒家礼法，早朝、郊祀、庙祀、经筵都要有条不紊的进行，稍有疏忽，就会换来文官肆无忌惮的詈骂。皇位继承规则严格按嫡长子制进行，皇帝无任何改变权力。内阁大臣由吏部会推，财政开支由户部提出预算方案，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在这里，皇帝没有任何干预的权力。洪武宪法、儒家礼统、文官制度使得对君主的约束达到了极致。

它还具备工业革命发生的基础。当海外市场持续扩大，传统手工生产无法满足需要的时候，明王朝便产生了很多技术革新的设备。人口向城市集中，商品经济在发展，财富在积累，这些都促使以雇佣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进而诞生了具备资本主义性质的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东林和复社具备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他们以上层缙绅为主，具备普遍结社的性质，他们操纵舆论，干预朝政，反对增税，主张君臣共治。在苏州那两次市民暴动中，标志着这种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到了顶峰。除此之外，在那场苏州民变中，无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之后登上历史舞台，从而引发了明代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它终于使明王朝达到了农耕文明的临界点。

所有，所有，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伟大、繁荣、昌盛、民主、自由的时代。

第一章 思想：明代的启蒙运动

第一节 理性而思辨的理学

历史上总有那么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朱棣进入南京后对儒生大开杀戒，随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大明王朝最大的卫道士。历史上也总有那么些玄而又玄的事情，虽然不为任何人所懂，但它一直能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节我们就来介绍在整个明王朝占据官方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

东周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崛起，每一个诸侯都想一统天下，但保守而虚伪的儒家思想显然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作用。法家思想能够使一个国家高效率运转起来，调动几倍于他国的资源来进行战争，但法家思想是治吏，而且会影响到中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向来是受抵制对象。儒家思想是限制君主的权力和治民，它维护的是士大夫的利益，这些理由成了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推崇儒家思想的最本质原因。秦国地处中国的西部蛮荒之地，它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张白纸，这才是法家学说能够在秦国得以实践的原因，秦一统天下后，法家思想的边际发展效率却越来越低下，最后却不容于这个古老的农耕帝国。法家思想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根子在商鞅和韩非时代就已经种下了，两人在设计法家理论时赋予了一些僵化的因素，反而没有关注更加本质性的东西，最终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大汉开国后面对民生凋敝的局面，几代君主皆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到了武帝时代为了打击匈奴，宣帝时代为了抑制豪强才重拾法家思想，此时的法家思想已经比先秦的法家思想要圆润的多。

东汉时期道教兴起，到了魏晋又兴起了以清谈为主的玄学，隋唐兴起了佛学，一直到宋代，儒学才以理学的面目正式登入政治舞台，儒家思想历经1500年最终还是以一种变异的形态才取得官方的正统地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哲学体系里有一个叫本源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吃饭？因为我要活着。我为什么要读书，因为我要明是非。儒家思想主张行仁政、礼治，但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却没有做出解释。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反映了儒学对终极问题的回避。这一方面是因为儒家思想理论上的缺失，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乃是儒家思想的肤浅性，更多的只是一些经验上的总结，由知识分子将这些经验上的总结以极其霸道和不厌其烦的方式推销给统治者。

思想领域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你不能解释的东西，别人就要来解释。

道家思想、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都对这些本源性的问题做出了解释。道家思想将人类的一切终极问题都归于道，玄学归结于无，佛教将这些问题归于空，但无论是“道”、“无”，还是“空”，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也许理论的最初创立者也解释不清楚，只好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来遮掩。到了宋代，理学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理学开始用“天理”来解释一切本源的问题，理跟道与空比起来似乎更是玄幻，但无论如何儒学终于对本源有了解释，也正是因为对终极问题有了回答，所以到了宋代儒学才第一次占据正统学说的地位，儒学新的表现形式理学被定义为官方的指导思想。

儒家思想是扩张性的，同时也是韧性的，它不似道家思想那么独善其身，也不似法家思想那般脆弱，千百年来中国的儒生们挖空心思的重塑儒学体系，这才有了以理学为代表的体系。到了明代理学仍旧

是官方指导思想，这一举措在永乐时代被大大强化了，官方对于儒家经典严格的按照朱熹的注释进行解释。

虽然儒家思想夺取了正统学术地位，但发端于东周时期的孔孟思想已经不适宜于本朝的思想环境，孔孟生活的时代已经远去，礼乐早已崩坏，井田制、分封制也早已瓦解；西汉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求，儒生们在儒学中加入了天人感应；到了东汉年间，同样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儒生们在儒学中加入了算命的内容；再加上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儒家原样的书稿早已消失，后代的儒学书籍全部靠汉代儒生凭记忆默写，可以预见的是在这种默写过程中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漏与错误。由此我们可知中国的儒学体系早已散乱化，不成章法，失去了它的原旨主义，到了本朝已是重塑儒学体系的时候了。

朱熹对于儒家经典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了重新解读，无论他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抑或是断句和自身学识上的局限，这种解读对于我们的文化典籍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可以明显的看见他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意向三纲五常、封建礼教方面引导，从此一个开放、博大、情爱、血性、舍生取义、大争的儒学思想被阉割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裹着小脚、步履蹒跚、封闭萎缩的理学思想。

或许这种理学思想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更适合宋明这样保守政权对于思想文化的钳制，更有利于结束五代和元末的散乱局面，来重塑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虽然理学思想登台了，但中国思想文化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无法看见先秦百家争鸣的哲学思想、秦代自信的法家思想、两汉精深的道家思想、魏晋诡辩而清谈的玄学思想，我们所见的只是狭隘、封闭、敏感、扯皮的理学思想。中国的士大夫们奋斗了1500年才换的儒学以这种变异的模式荣登宝座，不知道远古的这些大儒们作何感想？

在理学的倡导下，明初一些士大夫死后竟让妻妾殉葬，这股殉葬之风竟然刮到宫廷。但历史上总有那么些个有识之士，能够在沉闷的气氛中发出令人振奋的声音，这样的人国末有一个——李贽，国初也有一个——朱季友。

朱季友是江西饶州府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儒生。朱棣要修书，需要天下的士子们将藏书或者个人著作交出来，这位叫朱季友的亲自赶到南京将所著之书交了上去。朱棣看后勃然大怒，原来朱季友所著之书对理学提出异议，这的确是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非常大的事。在那个程朱理学统领一切的时代，在那个所有读书人都要按照朱熹的解释来对儒学进行朗读的时代，在那个科举考试不能超出《四书》范围的时代，朱季友的言论无疑于属于异端学说，无异于在思想文化沉闷的大明王朝响起一炸惊雷。

朱季友究竟写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他所著的书皆被焚毁，本人也被杖一百。通过这件事情朱棣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所有的行为规模、伦理道德都必须在理学的指引下，这个事件也使得理学正式成为显学，跟理学所对立的学说成了隐学，只能在地下发展。

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作的书竟以《焚书》、《潜书》来标榜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时代，甚至这个王朝很多东西都离真理很远，无论它如何一直努力前行，实际上只是在原地打滚，甚至倒退。

但无论如何理学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解决了儒家思想关于世界本体论的问题，使得儒家思想更加完善，续接了儒家的道统。它注重道德，讲究仁、义、礼、智、信，这些都体现了理性的原则，它注重对世界本源性的解释，这又体现了一种思辨性。

第二节 伟大的心学

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应该是出身于一个中等士绅家庭，祖父、父皆是读书人，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便已去世，23岁的母亲终身守节将其带大。陈献章自幼聪颖，19岁中举人，但由于作品“离经叛道”，故而两次会试都不中，既然仕途走不通，那就走学问这条道路。

当时南方最有名望的大儒是吴与弼，吴与弼在理学上有些成就，开创了“崇仁学派”，吴与弼的学说强调身心的体验，无论是吴与弼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历史走到了这一步，中国的学术界已经集体滑向陆九渊提倡的心学思想，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陈献章对吴与弼仰慕已久，他跋山涉水来到吴与弼居住的江西省崇仁县，在那里两人确立了师徒关系，跟陈献章在一起学习的有很多人，都是南方数省的儒生。虽然吴与弼与陈献章都是心学的流派，但献章的思想更加奔放，所以竟跟吴与弼有些格格不入，两人的师生缘分只持续了一年便草草收场。

陈献章回到家乡新会县白沙村，在小庐山脚下特地建了一间书舍，从此潜下心来读书。献章读书的环境非常好，背靠小庐山，前面就是白沙河，如此春去秋来、寒暑易节，竟然过了十个春秋。

陈献章闭关既出，俨然已成一家，他随即宣布将在白沙村开馆讲学，消息传出整个广东轰动，各处学子纷沓而至，把个小小的白沙挤得是水泄不通。一来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弟子，二来岭南之地大儒本就少，三来陈献章闭关十年，人人皆知，一朝出关，必是学有所成，悟有所成。

陈献章虽然被划定为思想家，但他有所成就的还是他的教育家身份以及教学方法，陈献章的教学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曰静、二曰疑、三曰独。“静”是指读书之前先静坐，让身心平静下来；“疑”是在读书过程中要存疑，要有怀疑权威的精神；“独”是指在读书过程中要坚持独立思考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获得真知。陈献章的这三种读书方法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迷信经典，敢于破除前人的权威，从而获得自己的方法论，以及对世界观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这三点看出，陈献章所提倡的做学问方法明显带有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的特点，从而具备了心学理论的雏形。虽是如此，但吴与弼、陈献章的理论远没有达到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的高度，吴、陈思想充其量只是对心学的一次初探，但也是在学术界沉闷的大明朝响起一记惊雷。陈献章和他所创立的“江门学派”不仅轰动了广东，更是轰动了帝国，远在京城的朱见深和朝堂上的那些士大夫们也听说了他的名头，在这一刻，命运之神似乎在向他招手。

成化二年，陈献章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于朝堂上当场考试，献章现场作《此日不再得》一诗，献章泼墨挥毫、一蹴而就，众人皆惊，以为真儒复出。接下来，陈献章被推荐入吏部当一司吏，虽说入了吏部，但献章担任的只是一个抄写文书的低级小吏，虽然名声赫赫，但陈献章的学说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格格不入，所以遭到保守儒生的排斥，四年后献章参加会试仍没能中，便辞去官职回到家乡仍旧进行他的学问研究。

数年后，陈献章受宪宗皇帝诏见再次入京，但京城依然没有他的舞台，他依然不为同僚们接纳，献章写下一份《乞修养疏》给皇帝，要求回家奉养老母，事到如今，皇帝只好给予献章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允其回乡侍奉老母，按月领取禄米。

无论陈献章如何知名，也无论他如何努力，再无论上至帝王下至各级官员如何支持他，他还是不容于大明官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历史到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改观，学术界的思想开始松动，但我们的明王朝正处在新旧交替之际，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一切所需要的仍是时间。帝国虽然失去了一名进士，但得到了一名思想家，这对于帝国来说却是福分。

虽然陈献章一直未能真正踏入官场，但他所教的成千上百的学生中有很多日后跻身官场，并成为大明帝国的中枢人才，而这些学生无疑带来了他的思想与读书方法的传播。

后吴中诗派的诗作风格只是从一个细枝微叶的地方反映出明代中期士风的变化，除此之外，心学的风靡乃至发展到与理学相庭抗礼的地位才真正反映出思想领域解放的开始。

我们这个庞大而悠久的国家难以用技术治理，只能依靠一种行为规则来维持秩序的稳定，此种治理方法最简单、省事，就好比建房子的时候你做好一个模子，然后直接往里面灌水泥。这种规则就是儒家所规定的伦理道德，当一个人守孝道的时候，他自然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一个简单的“孝”字就能令我们这个国家井井有条，当一切都规则化的时候，每个人只需按部就班的生活。几千年的华夏就是在这种传承中度过的。

虽然儒家思想被奉为华夏最有效的治国思想，但是其对本源解释的缺失使得儒学1000年来难登庙堂。虽然后来的儒家思想将一切本

源解释成“理”，“天理”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格物而知理”，只有实践才能探知天理；“存天理、灭人欲”，“天理”跟人的欲望是相对的，要想遵循天理，只有灭掉人欲，状元舒芬就在给朱厚照的上书中指出皇帝的出游是人欲的表现，为了保存天理，必须废除巡幸，老老实实呆在宫中。

天理是什么东西，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即使是它的创始人也解释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那么儒学关于本源问题的这个任务还是没能完成，正因为解释出现了纰漏，也才给其他哲学思想的发展留下空间。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江西省铅山县这个地方热闹异常，誉满天下的两名大儒会聚在铅山县的鹅湖寺举行千年大辩论。一方是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另一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朱熹认为对于真理是通过“格物”而得来的，穷尽事物之理，多读书、多思考，才能获得真理。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宇宙既是吾心，吾心既是宇宙”，所谓的格物就是认知本心，只要搞清楚了自己的内在，真理自然就明白了，不需要读过多的书。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论了三天，最后是不欢而散。

虽是如此，心学在南宋并无大的影响力，它一直未能取得跟理学分庭抗礼的地步，这些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到了明代，商业的兴起、思想的活跃、理学的桎梏，这些都使得心学开始成熟，完善起来。

跟明代的其他心学大师一样，王阳明也是一位不循规蹈矩的人，在他小的时候就流露出对读书取仕不感兴趣的态度，长大后王阳明并非像一般的读书人那样埋首屋中，而是喜欢游历，并对兵法感兴趣，他曾经游历塞外，查看边防。

王阳明曾在父亲的官署中对着竹子格物，王阳明连续格了七天，最终不但没格出“理”来，反而病倒了，从此王阳明对程朱的理学产生了怀疑，此后他的内心便宽泛起来，我们这位阳明先生开始对道学、禅学感起兴趣来，他对天地的疑惑更试图从内心寻找答案。

正德元年，王阳明被牵扯到“逆党案”中，刘瑾拟定的59人逆党名单中，兵部主事王阳明赫然列其中，王阳明跟其他官员一样受了廷杖之刑，后被贬到贵州龙场任驿丞。

大西南这片远离喧嚣的土壤给王阳明的悟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他开始思索本源性的东西，力图解开自己少年时代就存在于心中的疑惑。类似于王阳明这样有思索精神的儒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不像大多数文人那样只是被动的接受权威著作，并不断其烦的将这种理论进行复制。

在贵州，王阳明开始收弟子，从这一刻起，在帝国这个静悄悄的角落开始进行思想领域的一场变革，在那么一天夜里，阳明先生突然睁开久闭的双眼，他顿悟了，他明白了不必再纠结于理学的是是非非，真理就在于自己的心中。

学生们对于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见解不理解，他们疑惑道：“南山里的花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

阳明解释道：“你不去看花时，花便不存在，你去看花时，花便在你的心中。”

与理学一样，心学也同样陷入一种桎梏当中去了，过于注重细微末叶的东西，实际上处于一种诡辩的泥潭中，理学与心学的转换，只是中国的儒学思想从一个桎梏进入另一个桎梏而已。事间万事万物皆有规律，竹子的规律就在于它是竹子，它只是自然的生长，自然的枯

萎，对于花来说，无论花凋谢与否，它都存在于世间，于人的内心无关。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竹子在春天的时候青色、挺拔，到了秋天就会脆弱、枯黄，这就是它的生长规律，万事万物都改变不了它的生长规律；花的开谢也是如此，这个月花儿盛开，下个月就会凋谢，即使你不去看它，它也是这样，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就是客观事实的存在。

程朱理学认为格物而知理，人们需要通过对外界的持续认识来获得真理，而这种认识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心，所以对于真理的掌握不能够将内心完全抛开，理学在论道过程中将外界与内心完全割裂开这是偏颇的。

阳明子的心学论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心外无理、格物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外无理”是指道理存在于内心之中，撇开内心则对真理无处寻找；“格物致良知”中的格物是指格内心，而不是格外界，通过内心的反省能够获得优良的品质。阳明子在《传习录》中指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说的格物主要是指求善去恶；通过格物的方法，然后再通过格物所应坚持的原则最终达到的目的乃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反对将“知”和“行”割裂开来，他认为“知”和“行”是统一的，“知”是为了“行”，而“行”反馈回来更好的让人们获取“知”。但王阳明认为先知后行却是有失偏颇，实际上我们的认知都是通过实践而来，没经历实践，我们的认识也是残缺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我们的认识都是来源于实践，最终还是要返回到实践中去，这才是完整的知行观念。

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王阳明都认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在于天理，意识决定物质，不同的是程朱认为对于天理应该通过探究外部世界而

获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而陆王认为对于天理的获得应该通过内心，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至于什么是天理，通俗的讲它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在认识规律上都是偏颇的，他们将实践与内心完全隔离开来，采取了完全对立的二分法。书本上的知识，圣人的学问都是来源于实践，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也必须通过实践，但实践又必须反省自身，通过自身的思考来加强我们对实践的理解，两者是统一的关系，反复的实践，反复的思考才能使我们对规律的认识更加强化。

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了争夺儒学正统地位而进行的一种争斗，学术派别之间的那种隔阂阻隔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阻隔了他们理论、观点的融通，更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以致于中国的儒学思想一直是原地打滚，跟公羊春秋学比起来甚至是严重的倒退。

无论如何，心学在明代的壮大是思想领域界的一场大事，我们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心学的祖师爷正是孟子，他曾提出过“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心学顺应了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独立、个性张扬的潮流，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理学面对君主不同的是心学更多的是面向市民阶层，更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发展，它推动了明代末年更伟大思想家的诞生，它也推动了明代后期市民运动、东林清议、党社运动的产生，在这里，天理与人欲不再是对立的，它们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万历朝的那种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与心学发展也不无关系。但当明朝灭亡的时候，当知识分子无能无力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自己所信奉的思想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无力，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儒家的桎梏对于国家的深深危害，那种清谈的毫无意义性，也就是在这一刻，他们彻底解放了，彻底冲破了儒家的桎梏，也还是在这一刻，中国的哲学思想转向了“经世致用”。

3 启蒙思想家王艮

虽然在王阳明之前都有学者提出通过内心自省的方法获得世间真理，但这只是对“理”的不同格物方法而已，而王阳明首次提出心学概念，第一次将心学理论化、系统化，这无疑带来心学的风靡，他的弟子越来越多，遍布朝野，而这众多的弟子也使得心学开始分化，虽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心学分为七派，但我们进行一下归纳的话，实际上为两派。

一为左派，二为右派，右派继承了王学的原教旨主义，而左派却在王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它开始反对一切正统，一切权威，到了后期甚至打倒一切儒家经典，它已经背离了王阳明的心学道路，甚至进入离经叛道的行列。在这里要特别指明的是，心学左派严格的说与心学并无关系，因为它最终进入到反对儒家伦理纲常的境地，但是为了讲述的系统性，我们暂且按照《明儒学案》的分类来进行。

王学右派以聂豹、徐阶、赵贞吉为代表，后期的东林党也属于右派行列，而王学左派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心学推广的短短时间内，心学这门新兴的哲学思想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王门右学则被官府吸纳成为帝国的正统思想，而心学左派则成为理学与心学右派共同打击的对象。鉴于此，本书对于心学的论述则从它的正统转向左派，因为左派相对于右派会产生更多的精彩篇章，而对于何心隐、李贽等人本书后面还会以很大篇幅来论述，在这里先讲讲王艮和他的泰州学派。

王艮是江苏泰州人，世代以煮盐为生。虽然对于心学来讲，王阳明是集大成者，但真正将它推向民间，推向底层，成为大众津津落道话题的还是这位王艮。

王艮家贫辍学，全靠自学，所以他身上少了那些经院派的习气。对于不懂的东西，他不耻下问，在读书过程中他不拘泥于朱熹的注解，而更强调自己的理解。王艮对儒家经典也是批判的继承，他在给学生的讲课中也全是自己的主观论断，而不是对经典著作的翻译。

王艮开宗讲义颇有宗师风范，前来听讲的人问道：“为何汝的观点与王守仁很类似啊？”王艮是知道王阳明的，他的主张在某些方面也的确跟王阳明类似，他非常敬佩这位大儒，他觉得是时候向这位大儒请教了。

正德十五年（1520年）九月，南昌城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奇装怪服，行为疯癫。王艮与王阳明不同，王艮行为乖张，好标新立异，以至于王艮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特立独行的时候显得有些矫情和做作。

王阳明对于王艮的举动并不感兴趣，虽然王艮下定决心要拜在王阳明的门下，但王艮的学术思想与王阳明差异很大，我们很难说王艮是否有拜在王阳明门下的必要，也很难说王艮在王阳明这里获得了什么。

王艮赞同王阳明心外无理的主张，他也认为天理只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但在一些方面，王艮与王阳明仍旧有着很大差别。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

“即事是学，即事是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即道。”

这两段话是王艮的核心思想，也是他有别于王阳明的地方。前一句是指天理就存在于人们心中，不用去穷、不用去格，它自然就会出

来；后一段话是指世间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天理，天理就存在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天理。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是不赞同的，天理即使只存在于人们心中，还是要靠我们去格、去穷尽，否则今天你占了点小便宜，不去反省，明天你就会得出占小便宜是正确的论调；对于第二种观点我是赞同的，万事万物都存有天理，柴米油盐、邻里争吵，都存在有天理。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两种看法都是王阳明反对的，王阳明主张人的内心经过不断的格物从而获得良知，岂是王艮所说那般简单；对于第二点，王阳明更是不能容忍。王艮认为日常生活中都是“理”，再加上这种“理”很好理解，所以将王艮的两种观点综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指心学这种东西对于凡夫俗子也可以掌握，并不是圣人所独享的东西。

王艮的这种观点无疑是爆炸性的。虽然二千年以前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但也并不是意味凡夫俗子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坐而论道。王艮无疑要将这种圣人之学推向所有的人，这是儒家等级秩序所不能容忍的，社会每个阶层的分工不同，有的人注定要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更多的人只有从事体力劳动。

王艮出身本来贫苦，煮过盐，小时候上过私塾，后因家贫而辍学，19岁那年他跟父亲一起贩盐来到山东孔庙，当他拜谒孔庙的时候他感慨的说道：“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王艮在毫无知识学问的时候，他便有了人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想法。从此他便将儒家经典写在纸片藏于袖中，在工作之余拿出来翻看，王艮渐渐的从煮盐转变为贩盐，他也渐渐的成了富户，这给他从事脑力劳动提供了条件。

王艮是社会底层的人，他行过医、贩过盐，最终找准了做学问这条道路。王艮是从社会最底层奋斗起来的，没有父兄提供资助，没有有名望的先生提供教育，他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从书本中寻找知识，正是他的出身，他的经历，使得他对底层社会有了了解，他对底层人民有了了解，这也坚定了他认为人人皆可为圣贤的真理。

王艮觉得他跟王阳明之间再无可谈，于是在嘉靖二年（1523年）模仿孔子周游列国，王艮自制了一辆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打着传播圣学、拯民愚昧的招牌开始向京城行去。王艮在他的车子上挂着两张条幅，一个写着“天下一个”，另一个写着“万物一体”，王艮一路上奇装怪服、大声吆喝，史载“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

王艮每到一处便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王艮面对的全是凡夫俗子，田间农夫、走街贩履、卖盐打渔的都成了王艮说教的对象，王艮的此次北行无疑引起了轰动，并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注意，而王艮的此次说教是对中华二千年来的等级秩序、伦理秩序的首次冲击，具有异端的色彩。

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万物都是一体的。王艮从注重内心开始转向注重自身，“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在王艮这里，心学似乎已经向着“安身立命”的“身学”转变，而这种“身学”更是强调个人的能动性，相比心学多了一份实在性，少了一份玄幻。王艮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民本思想，而此种民本思想跟孟子的民本思想仍是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是在强调等级秩序的基础上行仁政，而王艮的民本思想却是带着启蒙思想的意味，他也成了中国启蒙思想的第一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中国似乎一下子进入了现代，而此时的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之中，他们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仍然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

王艮所引起的轰动与议论很快传到王阳明的耳朵里，他大发雷霆，命人赶快把王艮唤回来。王艮回来后，王阳明三日不见，王艮长跪不起。每个人心中都有开放与保守一面，对于别人的开放与保守同样都是嗤之以鼻，王阳明对朱子学说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陈旧的东西，对于王艮学说他同样是嗤之以鼻，认为那是异端。

无论王阳明恼怒与否，王艮已经超越王阳明成为帝国的新星，很多地方的大员将王艮邀请到当地书院讲学，而一旦开讲，各地凡夫俗子纷踏而至。嘉靖七年，王阳明逝世后，王艮开始自立门户，由于他是江苏泰州人，后世人便将他这一门派命名为泰州学派，虽是如此，但它仍被认定为王学左派，它跟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有无关系，我们已经很难评价，既然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列为王学分支，那么我们也这么认为。

泰州学派共传五世，共计487人，其中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官僚、有农夫、有工匠、有商人，士农工商样样皆有，很多人因此载入史册，或入祀典，或入贤祠，光是《明儒学案》记载的就达三十几人，在王艮的影响下，底层民众终于有了读书取道的机会，他们的名字也能跟那些大贤一样堂而皇之的彪炳史册。跟王艮一样，他的大部分弟子也是终身不入仕途，以讲学为己任。

王阳明曾经奉命镇压南方农民起义，杀掠甚重，后来为了劝导人们从善，王阳明提出了“格物致良知”的观点，但这种脱离底层群众的“致”法却难以带来实际效果，其结果只能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自成一套理论体系。

王艮反对君子之道，提倡百姓之道，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君子。他更是提出了“安身立命”之道，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王艮的安身立命充满了人本思想、关怀思想，他指出每个人吃饱、穿暖、有房住，是为安身，只

有安身后才能谈及安家、安国、安天下，这跟圣人所说的修身截然相反。一个“修”字，一个“安”字就蕴含着不同的意味，“修”字强调人的义务，而“安”字强调人的权力。无独有偶700年前的诗人杜甫就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而安身也成了一个人获取良知的先决条件，如果一个人连安身条件都不具备，他是无论如何也格不出良知的。所以泰州学派才具备真正的民本思想。

王艮的学说不仅具备民本思想，更是对封建礼教、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但在那种封建礼教森严的文化传统下，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王艮的学说无疑是一种虚幻，不可能实现。王艮死后，他的弟子们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更加无以复加的地步，并最终跟整个封建势力对立起来，他的弟子们也为此献出了自己不屈的生命。

在王艮之后，我们可以从他的弟子颜钧、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看到更多的精彩人生，但王艮作为启蒙思想的创始人，他无疑是整个明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自身文采不高，王艮鲜有著作留传于世，他的弟子将他的讲义整理成了《王心斋先生遗集》。

4 异端思想家李贽

无论如何粉饰，我们都无法否认王艮的泰州学派跟王阳明的心学没有任何关系，阳明心学主张天理通过内心的省悟来获得，王艮学说主张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中，无需去省悟，芸芸众生也能够体验到天理的存在，由于王艮学说宣扬天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就具备了启蒙思想，这跟孟子的“以民为本”有着本质区别，孟子的“以民为本”只是让君王爱惜百姓，并没有认为百姓能够获得认知的权力。

我们至今无法对王艮学说取一个专有名词，由于它打碎了儒家的等级秩序，所以，他不仅跟心学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认为它跟儒家思想也没有任何联系，在那个等级秩序仍旧森严壁垒的封建社会，这种学说只能以“隐学”来定义。

王艮的门徒向来不乏，除了颜山农、程学颜、何心隐、罗汝芳、耿定理，在万历朝还有李贽，李贽的出现使得这一门学派达到了顶峰，同时也是对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无论历史学家如何赞誉，李贽都是泰州学派的传承者，他的学说跟王艮学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李贽过于高调，加之跟官场、士大夫有着过分亲密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影响力无疑被放大了。

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1527年出生，二十五岁中了举人，李贽对做官兴趣并不大，或许他认为自己并不能考中进士，他便不在坚持继续科考。二十九岁那年，李贽被任命为河南卫辉县教谕，按照李贽的说法，此时他已经家道中落，还有妻儿要养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若非如此，他断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李贽的理想在于著书作学问，官场对于他是一种折磨，他只喜欢在自己自由的精神世界里翱翔。他在河南为官期间，就已经显露出与上司不协调的现象，工作之余，他便自闭门户钻研学问，但身在官场却身不由己，他的那种自由理想仍旧受到干扰，或许他还没有找到真理的钥匙。

四年后，李贽前往南京国子监担任博士，这是一个好差事，既能养家糊口，又能钻研学问。但好景不长，李贽的父亲病逝，他只能回乡丁忧，加上母亲早已故去，此时李贽已经失去了双亲。在家乡丁忧期间，正值倭寇进攻泉州，他率全族三十多口人登城和全城的父老乡亲一起日夜防守，最终，终于击退了倭寇，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辉煌。

丁忧期过后，李贽带着全家人去了北京等待分配新的官职，在京城的这段日子是李贽最痛苦的回忆，连续十个月，他都未能分配官职，囊中羞涩，他只能靠在别人的私馆中授课来谋取生活，据李贽自己说，他有一次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最终李贽等来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但好景不长，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第二个儿子死掉了，接着，他的祖父又逝世了，李贽只得又回乡守制，在南下的途中，他将朋友和同僚送的丧葬费拿出一半在他曾经任职的河南卫辉县买下一处田产，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卫辉县，让她们母女在田间劳作和靠纺织过活。李贽拿另一半费用将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体面安葬，在此之前，李贽祖先三代五口的灵柩由于不能体面安葬而停放了五十年。就是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能令李贽感到他替家族尽到了义务。

嘉靖四十五年，在家乡再次守孝三年期满的李贽返回了卫辉，此时，夫妻之间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见面之后，妻子告诉他，二女儿、小女儿吃草难以下咽，已经死于饥荒，李贽悲痛连连，当天夜

晚，他跟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此时的李贽心中，我们不知道做何感想，此时李贽已经39岁了，但属于他的人生还远没有到来。

李贽携带家眷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被安排为礼部司务，从九品，是个比从八品国子监博士更差劲的差事，但李贽却开始安稳下来，他在北京一直呆了五年。在这五年中，他接触到了守仁心学，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之路。

从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四年（1576年），李贽前往南京刑部就任员外郎，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在南京这个风气开放、人文荟萃的地方，李贽是如鱼得水，在这里，他结识了诸如焦竑、耿定理、王畿、罗汝芳等泰州派人物，正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主张跟李贽所追求的众人平等的思路一拍即合，李贽终于找到了知音和终身在学术上的奋斗方向。

无论后来如何的艰苦和沮丧，这五年都是李贽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万历五年，50岁的李贽前往云南姚安任知府，临行前，他将女儿和女婿安置在湖北耿定理家，他临行前对耿定理说：“我三年任期满，便归来依靠正四品俸禄来跟你一起探讨学问。”

云南地处边疆，又处于民族杂处之地，历来难以治理，李贽主张行无为之治，在这方面，他明显不知道治民的复杂性，只是一厢情愿的为之，其结果不仅取不得应有的作用，还跟地方的官吏格格不入，云南的三年，李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他再也无意于官场，官场对于他只能是一座囚笼，如今他已经得到了这份正四品俸禄，经济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是禁锢。

但朝廷并不允许李贽致仕，他跑到滇西大理鸡足山躲藏起来，万历八年（1580年）他彻底告别了官场，从此开始了向绵延二千余年的封建礼教抗争的过程。

“万物皆生于两，源于矛盾着的阴阳二气，而不生于一，并非生自三纲五常的天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欤。追求物质享受乃是秉赋之自然，各从所好，各驰所长。”这些都是李贽抨击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语句。

这么些年，李贽的妻子黄氏一直默默陪伴在他的身边，她的付出、她的默默承受，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依靠几亩薄田度日，在灾荒来临的季节，只得依靠野草为生，中国女人的忍耐力在这一刻爆发出来。李贽的放弃仕途无疑是对这位女人的一种打击，但为了丈夫的那个缥缈梦想，她还是默默地接受了。

她跟随李贽回到了湖北黄安，回到黄安并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毕竟自己的女儿、女婿在那里，对于李贽的配偶黄氏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更好，而且耿家家境殷实，供养李贽一家也是绰绰有余，除了耿家，还有周思敬的周家，他们都愿意充当李贽的居停。

李贽在耿定理家中居住期间，开始了系统的反孔过程，虽然王艮学说已经使儒家体系摇摇欲坠，但王艮只是给人以引导，或者给以暗示，到了李贽这里，情况便明显不同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李贽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做学问在哪里都可以做。吴与弼、陈献章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做学问，招收门徒，但李贽为什么不这样？关于此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有着精辟的论述。

黄仁宇认为，在我们这个农耕国度，民众最大的追求就是通过辛勤劳作获得余钱，通过几代的积累获取多余的土地，然后上升为地主阶层，将后代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再通过几代的拼搏，从而使家族中有人能够通过科举步入士大夫阶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然。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见，但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散文家归有光说过，如果他要离开家乡，就必须带着百余口的族人同行，李贽在泉州抗倭的时候，当泉州城被倭寇围起来的时候，李贽就要负责为30余口的族人寻找食物。

通过黄仁宇的讲解，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李贽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他无法履行他所应承担的任务，他没有脸面面对族人，抑或者他一心做学问，不愿意受到族人的干扰。虽然李贽没有给他的家族尽到义务，但他无疑事实上成了这个家族最荣光的人，因为直到今天，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考证的对象。

李贽和耿定理相处的岁月只持续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李贽主要是研究道学，他写下《解老》一书，来诠释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万历十二年耿定理逝世，这对李贽是个打击，他似乎一下失去了交流的对象。

而李贽跟耿定理的兄长耿定向一直不和，其实受耿定理的影响，耿定向也是泰州学派的门徒，他不相信玄而又玄的天理，他也认为天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但跟王艮和李贽不同的是，耿定理显得很低调，他内心对程朱理学提出了疑问，但在日常行事乃至官场上，他还是儒家思想的那一套。

耿定向的思维与行事跟那个时代很多官僚一样，虽然理学、心学已经没落，但这个时代还需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二个人说的话不适合在三个人场合下说，三个人说的话也不适合在五个人场合下说，这就说明公之于众的言论与私下里的活跃从来都不是一回事，推而广之，孔子不一定就信仰儒学，朱熹也不一定就信仰理学，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维持一种秩序的稳定，或者以最小的成本来治理这个最庞大的国家。

正因为这样，李贽说耿定向言行不一，耿定向说李贽既矫且伪。万历十二年八月，罢官多年的耿定向复职为都察院副都御史，这明显引起了李贽的不快。李贽在《答耿中丞》一文中说道：“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子何以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

这番话李贽明显表现出了不以孔子作为是非评判的唯一标准，万历十三年，耿定向再次升职，李贽再也无法忍受，遂离开耿家。离开前，李贽写了《答职司寇》一文，在此文中，李贽对那些他认为的信奉儒家思想的伪道士进行了深刻批判。

“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反不如市井小夫、力田作者，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们阳为道学，行若猪狗。”这是李贽的一番话。他的这段话是对着耿定向来的，他痛恨耿定向这样言行不一的人。

跟王艮、何心隐一样，李贽主张众生平等，这其中也包括男女平等。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一书中对此有正确的描绘，他说道：“在中国，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们的闺房只能自己的丈夫或者未成年的男子能够进入，即使是父亲、兄长也不能

进入，他们出门也是乘坐轿子，除了家里人，他们从不接触其他男子。但这只是针对大户人家的女子而言，平民家的女子则不在此列，他们跟其他男人一样，需要为生活而忙碌，她们也需要下地耕田，走织贩屡。”所以，大户人家的女子只是帝国的极小一部分，封建礼法对大多数女子来说并不适用。

针对李贽的挖讽刺骨，耿定向也进行了反击。他说李贽收受女弟子，随意进出女眷的内房，而且引诱自己的弟弟嫖娼，李贽对此丝毫不理会，在他眼里，既然男女平等，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授受不亲之说。

当耿定向二次升官后，耿、李二人之间的关系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万历十三年，李贽带着妻子、女婿、女儿、外孙、外孙女前往麻城投靠周思敬、周思久兄弟二人，周家建了一座小楼供李贽一家居住，在麻城还有梅国桢一家，跟李贽也是至交。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这是李贽在《剃发》中的诗句。万历十六年，因为家中的叔侄、兄弟不断来麻城逼迫自己回去，他便前往麻城的芝佛院居住，既然入了空门，身边的女眷便不能随行，李贽便打发她们回到福建。为了彻底表示自己跟儒学划清界限，同时避免家乡的族人纠缠，他还剃了发，但是没有受香疤，从这点来看，李贽也并没有入佛教，但既然如此，他也就跟天下的儒生彻底决裂了。

李贽在芝佛院一直住到万历二十九年，一共是住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是李贽著书立作的迸发时期，他刊印了《焚书》与《藏书》，《焚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在将来必定会被焚毁，《藏书》的意思是这部书只能偷偷的藏起来，不能示人。《焚书》是将李贽生平和士大夫们来往的书信以及他所写杂文收集起来，《藏书》记载了自先秦开始，一直到元代800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李贽在藏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而是从是否推动了历史

的进程来考虑。从这个是非判断标准来说，秦始皇、武则天这些行霸道的君主都被李贽推崇，陈胜、项羽这些历史的失败者也被他单独立传，但是中国历史上那些温文尔雅、谦谦君主们却不见其踪，推而广之，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在李贽眼里也是笑谈。

李贽在芝佛院的十三年正是他从61岁到74岁的十三年，他在芝佛院开讲，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来听讲，他是男孩女孩一起收，而且他讲课不拘俗法，他不会教授人们“修身、齐家”这些东西，他讲课完全是率性而为。别人都教育孩子走路要轻、说话莫大声，李贽偏要他们蹦蹦跳跳翻跟斗，大声吆喝震天吼；别人教书在白天，李贽让孩子们白天帮大人种地，晚间来听他讲学。李贽自己也开荒种地，体会劳动的乐趣，但他出入坐轿，又保持了士大夫的优待。

李贽在某些方面的作风的确有些荒诞，或许有些故意为之，从这点看，李贽这个人又很矫情。有一回，李贽给小孩子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冥思苦想想不出来答案，李贽便笑道：“皇帝老子去偷牛是指君不君；满朝文武做小偷是指臣不臣；公公拉着媳妇手是指父不父；孩子打破老子头是指子不子。孩子们听完这个谜底都很兴奋，他们四处传播，在当地带来很坏的影响。

这还仅仅是个个例，李贽在麻城居住期间跟御史梅国桢一家来往过密，梅家在当地是世家，梅国桢又正在西北掌权，梅国桢有一位孀居的女儿叫梅澹然，梅澹然拜李贽为师，李贽说澹然是“出世丈夫，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李贽还跟梅府的另外几个女眷，以及其他大户人家女眷也有来往，梅澹然在家中筑一绣佛精舍修行，李贽则经常跟这些女眷出入绣佛精舍，甚至进入女眷的卧室。李贽将她们取法号为善因、明因、自信、无明、澄然，除了颂扬梅澹然以外，李贽对

这些女眷也赞誉颇多，他说：“此间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

李贽还专门有一首题“绣佛精舍”的诗：“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着，龙女成佛今又来。”

李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他将他与这些豪门女眷交往的言谈及书信汇集成册，编成《观音问》，李贽对他与女性的交往毫不避讳。

李贽曾在给梅澹然的信中写下一首诗：

盈盈细袜随风雪，

点点红妆带雨梅。

莫道门前车马杳，

子规今已唤春归。

李贽在《云中僧舍芍药》一诗中更是写道：

芍药庭开两朵，

经僧阁里评论。

木鱼暂且停手，

风送花香有情。

笑时倾城倾国，

愁时倚树凭阑。

尔但一开两朵，

我来万水千山。

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李贽对梅澹然的情感油然纸上，如果李贽只是跟平民家的女子或者妓女厮混倒没什么，关键问题是他在跟这种世家名门的女眷交往，而且还那么高调的把他们交往的细节墨写下来，这是对封建伦理秩序的严重挑战。面对天下汹汹而来的指责，李贽理智气壮的反驳道：“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

李贽跟梅澹然的关系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是一位具备士大夫身份的60余岁的老者跟一位30余岁的世家女眷如此高调交往，这不仅丢的是全体儒家信徒的脸面，更丢的是帝国的脸面。

我们不晓得李贽如此刻意为之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或许像耿定向说的那样，李贽既矫且伪。每当有衣冠楚楚的士大夫来听李贽讲课的时候，他便大袖一挥道：“读甚么书，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一些吊儿郎当的后生秀才们真的带着青楼妓女去见他时，他便破颜笑道：“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

顾宪成说道：“李贽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卓吾平日议论，往往能杀人，此语却能活人。吾不得以其人而废之。”

但是依然有不少高官和在野的士大夫们与李贽交厚，受他们的邀请，李贽在芝佛院居住期间，分别前往山西、北京、山东、南京游历，在此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在南京和山东先后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见面，由于李贽偏信“禅道”，所以与利玛窦信奉的“修身学”格格不入，但是他依然保持了跟利玛窦平等交流的态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梅澹然书信邀请，李贽回到麻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芝佛院被湖广佥事冯应京指使人纵火焚毁，李贽逃到河南商城县的黄檗山中，李贽好友，御史马经纶听说后将李贽接到北京通州的莲花寺中。

万历三十年是这位异端分子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年，士大夫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隐忍，在李贽抵达通州后，再也按捺不住，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开始上疏劾李贽了。

“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掠人妇，同于禽兽而不恤。近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不知尊孔子之法，而溺于禅教沙门。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三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李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张问达在奏疏中所说得李贽劫人之财是指李贽在芝佛院期间曾四处写信向富裕之士讨要钱财，而且张问达还提及在李贽的蛊惑下，士大夫中也有人开始弃儒信佛，而且年轻的生员们也喜其言论，四处传播。

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得到士大夫们的响应，他们纷纷附和，要求皇帝处理这个异端分子。万历对此事并不感兴趣，什么男女作风问

题，什么反孔言论，什么给秦始皇、武则天翻案问题，都不是这个皇帝所关心的问题，他对基督教都采取了包容的态度，更别说李贽的那点言论。他于是便让锦衣卫将李贽逮到狱中，然后再遣返回籍。

“为何要著那些妄书？”锦衣卫问道。

“我著的书对于圣教来说有益无损。”李贽回答道。

当李贽听说朝廷要遣返他回福建的时候，他绝望了，对于他说，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回到家乡，因为那对他来说意味着理想的破灭。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六日，75岁的李贽在狱中以剃发的名义借来剃刀自刎而死。

李贽是本朝难以评说的人物，笔者在撰写本章的时候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厌烦。李贽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的思想秉承了泰州学派一贯的主张，他厌恶道学家的虚伪，他主张返朴归真的童心说，他反对一切以孔孟之道作为是非评判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他抛弃了儒家的历史观，从客观、理性的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而这又跟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观”有殊途同归之处，李贽的这种是非评判标准对于今人来说无疑使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

但我们明显看到，李贽自有他的自私、虚伪之处，他的一切行为都有极强的目的性。如果对做官不感兴趣，大可像王艮、何心隐、耿定理那样终生不考、不官，李贽出身世家，家里的田租并非不能供养他做学问，而不是带着妻儿到处跑。

李贽的著书、做学问都带有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与女居士的交往大可只限制在精神、情感上的寄托，而不必刊印成书，弄的天下皆知。他更多的是对他人的批评，而不是建立自己的思想观点。

世间的阳一套、阴一套世人皆知晓。晚明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士大夫娶妾、押妓已成平常，但大都是私底下进行，没人像李贽那样弄的满城风雨；孔孟之道究竟是否是真理，世人心中也自有一套标准，也没必要像李贽那样激烈抨击。

李贽通常将所有人划到了他的对立面，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开始做主观臆断，他的两部著作取名《焚书》、《藏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两部书，并没有像他本人臆想的那样这两部书无法被后人所知晓。

李贽为了自己的理想，也过于自私，几个子女在他长年的流离颠簸中死去，当家族中不断来信催他回去纳妾继承香火的时候他毅然搬到佛堂中居住，当家中来了一个侄子声称要过继给他的时候，他又毅然剃发。他不像颜山农、何心隐那样主动背负起家族的责任，并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创建大同社会。为了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李贽又提出私心说，他说道：“趋利避害，人之同心。”虽然如此，但李贽说此话时心中是惶恐的。

1588年，在女婿从家乡福建泉州写给他的信中告知了妻子黄氏的噩耗，李贽连写六首诗来表达了他的悲伤，诗中说她“慈心能割有，约己善持家”。李贽在给女婿的回信中说，“夫妻四十年来未曾反目，得闻她的噩耗后，自己夜夜都梦见了她。”这个女子几十年来默默陪伴着丈夫颠覆流离，尤其是在河南的那三年，靠着吃野草过活，眼睁睁的看着二个女儿在眼前饿死，那是一种何等的悲伤。

虽然在她临死前，不断写信劝李贽回来，但李贽终是没有回来。

16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虽然封建礼教已经摇摇欲坠，但是它依然禁锢，李贽虽然言论惊骇，尤其是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非从儒家意识形态来进行，就是放在今天亦显得令人不舒服，但在那个时代，

他也并没有遭受很严重的迫害，如果统计起来大概只是三次。一是在送袁宏道离开武昌，游黄鹤楼的时候遭人群殴，二是其所居住的芝佛院被冯应京纵火焚烧，三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遭到张问达的弹劾。

李贽，这个坚持自由信仰的异端分子，虽然继承了王艮学说，但他无疑公开打起了反儒大旗，在那个思想行将崩溃的年代，他扯掉了儒家思想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没有人要杀掉他，也没有人要处理他，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无法原谅自己，李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言自语。他跟海瑞一样是个令人感到麻烦的人，他不懂得如何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而又能够让人们对他的学说引以为重。于无形之中发力，或者只强调结果，而不强调结果本身才是真正的高手。李贽虽然很高调，但许多时间以来，世俗也并没有对他逼迫过多，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事中张问达才上疏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世俗自有世俗的理由，正像泰州学派的核心主张“百姓日用即道”那样，一切真理只存在于日常之中，只存在于世俗之中，除此之外，像海瑞、李贽那样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只是当事人不觉得而已。我们在这里重提李贽，要特别指出的是，李贽现象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市民阶层兴起之下，人们对于民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一种追求。

李贽自认为士大夫们虚伪，但他不知道自己虚伪否，李贽认为自己离经叛道，但在别人看来只是看笑话而已。

5 明朝的基督教

基督教大约从唐朝起开始传入中国，后来唐武宗灭佛，导致基督教一度中断，元朝时基督教二次传入中国，洪武灭元后，基督教再次中断，到了16世纪末，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

当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的时候，他们最初是来到一个叫澳门的地方，两广总督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消灭海盗，就把澳门岛给你们。后来这些葡萄牙人消灭了盘踞在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他们如愿以偿的得到了澳门岛，这样他们便在远东有了一个合法的落脚点。他们在岛上修建了澳门城，城上有坚固的火炮，曾经打退了荷兰人的进攻，而且还修建有教堂、神学院，大量的神父从欧洲来到这里。

大概最开始来到澳门的是一个叫沙忽略的人，他想通过澳门进入广东传教，但被广东地方政府所拒，神父从澳门学院的窗口眺望着大陆，喃喃的说道：“岩石呀！岩石！你的大门何时才能打开。”

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很幸运的是，新任的两广总督派人来邀请利玛窦去肇庆传教，利玛窦和他的牧师来到肇庆，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但城内的百姓经常将石块扔到他们的房顶，神父的仆人抓住一个正在扔石块的小孩，说要到官府去告他，这边刚说完，那边就有百姓跑到官府去控诉神父虐待儿童，接着，又有人控告利玛窦在肇庆城奸淫妇女。

虽然神父们的进展并不顺利，但他们毕竟从一个小岛上进入到了大陆，但好景不长，这位对基督教宽容的总督被调离，新任总督勒令利玛窦离开广东，但利玛窦已经在肇庆住了七年，离开的时候，神父跟他在这七年时间里发展的基督徒抱头痛哭。

但事实上，神父并没有离开广东，他又被勒令去韶州，在韶州传教的日子，他一样遭到当地百姓的袭击与骚扰，他所发展的基督徒也遭到当局的关押与毒打。在韶州，他认识了前南京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瞿太素，并成功的发展了他入教，在瞿太素的运作下，利玛窦得以跟一些士大夫们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关系。

为了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利玛窦开始蓄发穿汉服，开放图书馆让民众免费参观，他绘制世界地图让人们观看，并将西洋玩意儿赠送给当地官员，更为重要的是他将儒学和天主教结合起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这些无疑获得了成功，自愿入会的人开始增多，他们以士大夫和士大夫的子弟为主。

呆在广东并不是利玛窦的理想，他想到南京去，并最终到北京去，甚至还想见到万历皇帝。

1595年，利玛窦跟南京兵部侍郎石拱辰一起前往南京，时值朝廷正跟日本在朝鲜开战，帝国这个期间对外来元素是排斥的，而且南京的士大夫们也担心因此受到言官们的弹劾，进入南京城的利玛窦又被赶了出来。

接着，他折回头去了南昌，在南昌他受到当地一个王爷的接待，并让这位王爷成功入教，但利玛窦在南昌依然不断跟当地居民发生冲突，他深深体会到这个帝国的“华夷有别”。

1598年，神父重返南京，由于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他在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士大夫和勋贵们对他绘制的地图，还有机械仪器、几何图形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利玛窦对儒家思想中的自然法则、理性法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相比程朱理学而言，他更推崇先秦儒家，因为先秦儒家更符合

合天道法则、理性法则，而程朱理学却强调个人对“天理”的理解与顿悟，推而广之，利玛窦对“心灵顿悟型”的道教与佛教也是排斥的。利玛窦在宗教文化上的不同理解自然在南京遭到了佛教徒的非议。

当时在南京住着一名有名望的僧人，他叫李本固，本是北京城的御史，因为上疏要求神宗册立东宫而被罢官，之后他放弃儒家信仰，出家为僧，一直住在南京。

李本固曾在跟儒生的一次辩论会上大谈佛家学说，贬低儒家学说，引起现场一位士大夫的不满，那位士大夫激动地说：“你对本土的儒家思想不加赞赏，反而推崇从外国流传进来的佛家思想，是何道理，利玛窦神父是西洋人，他不也信奉儒家吗？”

这位士大夫既然提到了利玛窦，李本固便邀请利玛窦前来与他辩论。

在一个有很多儒生的公开的场合，利玛窦首先发问：“请问你对造物主有什么看法？”

李本固回答道：“我并不否认有一位造物主存在，但我认为他并不是多么了不起。”

“造物主可以创造天地，你可以吗？”神父接着问。

“我也可以。”李本固答。

此时屋中有一火炉，利玛窦指着那火炉对李本固说道：“那你就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火炉出来吧。”

“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李本固气愤地说道。

李本固接着又问道：“听说神父会占星，那么神父占星的时候是跑到天上呢？还是星星来到人间呢？”

“都不是。”神父说道。

“占星的时候只是依靠星星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像。”神父接着说。

李本固显得很兴奋，他跳了起来说道：“这就对了，用这样的办法，我就可以创造世间万物。”

利玛窦立刻反驳道：“我们心中的影像都是来自实物本身，难道说心中的影像就创造实物了吗？”

接下来，宴会开始，大家都落座，在场的儒生谈起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半天也争论不出个所以然，利玛窦抛出了性本善的观点，这得到了儒生的一致赞同，但是李本固却提出了性本恶的观点，随后，李本固开始引用佛家经典。

利玛窦说道：“我们互不信奉对方教义，就不要引经据典了。”

随后，这场争论以无果而终，不过，看起来利玛窦似乎占了上风。这场争论其实所面对的焦点是“心性”问题，佛家教义提倡“心性”，而基督教义反对“心性”。基督教义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要通过信耶稣来赎罪，这样人死后才能升到天堂；而佛家教义提倡人通过省悟来体会到“万物皆空”的道理，从而获得超脱。另外，我们从儒生们争论儒家思想早已定论的性本善、性本恶的问题可以发现，到了16世纪晚期，大明朝的儒生似乎对于儒家思想也产生了动摇。

1600年，在南京士大夫们和宦官的帮助下，利玛窦开始乘船沿着运河前往北京。在临清他遇到了宦官马堂，在山东的其他地方他还遇到了李贽。利玛窦将带给皇帝的礼品展示给马堂看，两幅绘在亚麻

上的精美图画，一幅是救世主的，另一幅是圣母的，还有一架琴，一架自鸣钟和几个三棱镜。

因为有了太监，所以神父要来北京的消息迅速传递给了万历皇帝，万历同意神父来京，他对神父带来的这些玩意儿非常感兴趣，尤其是那座机械钟。皇帝将圣母玛丽亚的像赐给了他的母亲，由于李太后信佛教，她便把这图像束之高阁，听人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后，都对西方的那种逼真画像感到不适应，这显然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皇帝和宫中的宦官们不懂这种机械钟如何使用，便让利玛窦手把手教宦官们如何使用，一直到教会为止。皇帝还不断派太监去向利玛窦询问欧洲的地理、饮食、文化、建筑、婚姻，当他听说欧洲的君主都居住在城堡中，每天都要上下楼梯，这位皇帝显得十分惊讶，他说道：“这不安全嘛，万一摔倒怎么办？”

皇帝不仅对西洋玩意儿感兴趣，他更想亲眼见见这位西洋传教士，但是自己已经有12年不接见大臣了，而且自己也曾说过除了太监、宫女外，他不见任何人，所以，这位脾气倔强的皇帝不能让自己食言，以给文官以口实。所以，他派人画了一幅利玛窦的等身像，皇帝看着利玛窦的画像，笑着说：“原来是个回人。”

利玛窦神父最后表示道，自己希望能够在北京传教，并死在这里，神父的请求无疑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

1610年，利玛窦逝世，神宗赐地安葬这位神父。从16世纪开始，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不畏艰险，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终身，更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无论对于西方，还是对于东方，这都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东西方开始在思想上开始交流，而不仅仅是经济上。明代的士大夫们虽然对于基督教无法做的完全接受，但是

他们保持了平等交流的心态，而且还有部分士大夫们开始信仰基督教，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西方的机械、几何原理表示出了浓厚兴趣，利玛窦绘制的《坤輿万国全图》更令他们感到震撼。

从利玛窦与和尚的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和儒家同属“修身”类哲学，而道教、佛教、理学、心学则强调心灵的感悟，虽然在17世纪以后，儒学成了欧洲的时尚，而且还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催化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在中国，儒家思想却进入了死胡同，它正从理学、心学向隐学、实学转变。

以下为明朝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所翻译的一些西方书籍，有的是用拉丁文和罗马文写成的。

《测量法义》《表度说》《泰西水法》《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乾坤体义》《圆容较义》《天问略》《职外方纪》《远镜说》
《寰有诠》《名理探》《主制群征》《寰宇始末》《五纬历指》《性学粗述》《坤輿格致（矿冶全书）》《建筑十书》《数学札记》《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原本》《测量全义》《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神功催吐药》《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远西奇器图说》《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西国记法》《性学述》《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

6 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推动

万历王朝不仅商业发达、思想自由、舆论宽松，而且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也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时期。

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畅销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书中描写到正处于元朝时中国的那种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普遍流通的纸币，大元王朝的繁荣、自由与宽松呈现在这位欧洲人眼中，而这些对处于黑暗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天堂。

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以及货币黄金化，这些都促使了冒险家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屈一指的就是东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似乎不可避免。

耶稣诞生后的第1583年，历史上最伟大的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写给万历皇帝一封信，抬头是“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伊丽莎白在信中表达了贸易互惠的想法，希望英中能够进行贸易，但是特使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这封信也随着航船沉到了海底，只到1978年才打捞起来。

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游历了22年，1636年他写成了《大中国志》一书，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极其清洁干净，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和公共场合，他们通常在街上设有三四处必需的或公共的休歇处。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他们回答说：大明有完善的福利，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

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们每年给全国的老人举行节宴，由皇室支付费用，以示对老人的尊敬，因为老人是道德的代表。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他们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是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

我们惊奇的看到这个国度的贵人有良好的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问题时候的认真。他们有自己的科学革命和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他们富于文明和教养。他们的商业活动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他们有先进的大船制造技术，其制造的巨轮，设计精良，远先进于欧洲。他们是最先进最文明的人。

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羨，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明朝的政治体制如此描述：

“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做的决定。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经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的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贵

族政体。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者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须由大臣审阅呈交皇帝。

“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否则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大其权力。当然皇帝可以对和他家族有关的人进行赏赐，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这笔赏赐不能列为公家赠款，皇帝所做的赠礼也不能从公款中提取。”？

“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某些方面相当于我们要称之为公众良心的保卫者的人，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涉及皇上本人或皇族，他们也直言无忌，他们如此恪尽职守，真使外国人惊奇，并且是模仿的好榜样。无论皇上还是大臣都逃不过他们的勇敢和直率，甚至有时他们触怒皇上到了皇上对他们震怒的地步，他们也不停止进谏和批评，直到对他们猛烈加以抨击的恶行采取某种补救的措施为止。”

“所有这些呈送给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他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递到帝国的每个角落。这种文件编辑成书，如果内容被认为值得留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

“几年前，当今皇上想册立他的次子而不是长子为储君，因为这个幼子受到他和贵妃的宠爱，这一更易违反了国法，皇上收到了大量指责他的陈情书，最后皇上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大臣们以集体辞职为威胁的条件下，不得不表示在立储这件事情上改变了主意。”

毛佩琦在他的论文《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中写道：

1621年英人伯顿在他出版的《忧郁症的解剖》一书中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有组织良好、效率很高的政府，有完善的选

拔举用人才的文官制度，其科举考试贯彻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等等，以此对照着英国当时黑暗的贵族政治进行辛辣的讽刺。

他说：“中国人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由于出身的高贵。他们官吏的职务，不论在战时或平时，就是保卫和治理他们的国家；而不像许多人那样，只知道放鹰打猎、吃喝玩乐。”

这样，他便开启了“中为洋用”的风气。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7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方面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钟表、几何原理、机械、福音，另一方面，东方的内阁制度、考试制度、儒家文化也由这些传教士带到了西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同时并举，在17世纪的欧洲不可避免的刮起一股中国热，在文艺复兴和儒家文化的推动下，终于迎来了欧洲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中世纪。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

1584年西班牙教士门多萨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书中说道：“中国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享受过“天主的光辉”，但他们一样生活的很好，他借此向神学发动进攻，为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基础。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有影响力的书，书中说道：“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1756年，为了反对英国首任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独裁统治，英国议会开始用中国的文官谏议制度来对他进行抨击。

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闻》，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神学”是不合理的，他主张用孔子“简单朴素的语录”来代替神学。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热”，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种情况下，百科全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更是主张以儒家理性道德观念代替基督教神性道德观念，并且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作为一个西方的旁观者，他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历久不衰，必须仰赖道德。”

明王朝跟宋朝一样，奉行儒家体制，而且是一种极端保守、压抑人性的儒家体制，先秦的那种血性、张扬的儒家文化已经被阉割的不成样子。朱元璋时代，帝国由大大小小几百万个乡村组成，朱元璋实行乡村自治的原则，禁止官吏下乡，由村中长老治理一切事物。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黄的这种观点具备不可原谅之错误，中国的历史跟欧洲不一样，欧洲的气候、河流、多山的地理决定了这是一个商业文明盛行的地方，从公元前的希腊、罗马时期这里就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商业关联和借贷纠纷，所以它需要成熟而完备的律法来调节民事和经济纠纷。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农耕帝国，全国由那么多散居各地大大小小的乡村组成，农业人口一直占据帝国的绝大多数，当帝国管理不过来的时候只有让所有的乡村实行自制，而对于这么多大面积散居的乡村如何治理则是一个问题。用单纯的法制治理乡村已经是不现实，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每个人的步调又不一致，单纯的法律治国不仅会带来低效率，也会使官员们疲于奔命，更有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抗法行为的发生。

基于这种现实考量，在秦王嬴政没有统一中国之前，我们的先知圣人就开始制定礼法来建立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原则，用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用道德代替法律会使得我们这个国家更安定，会使统治者花费较少的精力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道德代替法律不仅不是两千年来问题之症结，而且是我们这个国家治国的优越典范。在这方面，西方人也有相同的看法。

他们说：“中国人用道德代替神学，他们的法律不仅惩恶而且扬善，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历久不衰，必须仰赖道德。”西方人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我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用儒家治国的根本原因吧。国情不同，必须选择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欧洲的宗教政治行将结束之际，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它自然法则和理性原则给欧洲带来一股新风，对于中世纪宗教政治的瓦解和启蒙运动的产生无疑具有加速度作用。与此相

反的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经过二千多年的运转却走近了一个死胡同，拜金主义、女色主义、非君主义都在不断的冲刷儒家文化的根基。

万历朝不仅是商业蓬勃、思想自由、文化昌盛的时代，更是东西方文化全面交流的时代，这个时期正处于欧洲中世纪的晚期，教会的力量依然强大，从欧洲的传教士的嘴里和他们的记载里，这些欧洲人发现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跟他们哲学观相似，却又显得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东方的儒教帝国。

欧洲人发现道德可以代替神学，君权也并非神授，他们不顾一切的汲取儒家文化的营养，并最终通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将启蒙运动带到了整个欧洲。

7 茶陵诗派与后吴中诗派

正德朝是整个明王朝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期，在这个转折期不仅体现为心学的完善，更体现在诗歌上，这个时期诗歌上出现了不拘格式、随心所欲的风格，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在民间，思想文化已经从严格限制伦理纲常的理学向强调内心、随心所欲的心学转向。

明代初期的诗歌以吴中四杰为代表，这四杰是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他们都是元代遗民，诗歌大都是给故元或张士诚唱赞歌的，后来被朱元璋以各种理由杀掉了。国初朱元璋、朱棣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态度，理学的盛行都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沉闷，在这种沉闷的气氛下所流行的诗体是杨士奇、杨荣、杨溥创立的台阁体。

这种台阁体只是文人对当局的一种应付，内容平乏、格调沉闷、套话连篇、味如嚼蜡，多为场面上应对之词，这些毫无生气的词句实际上也体现了文人深深的无奈。

从成化年间起，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松动，陈旧的台阁体诗风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皇帝的垂衣拱手，文人的自由奔放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就这个时代本身来说，它的诗歌风格应该是向着更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方向转进，但很遗憾我们的诗歌风格却转向了复古。

李东阳是茶陵诗派的领军人，他不仅是弘治、正德两朝的资深阁臣，更是一代诗歌的开创者。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所以他所领导的流派被冠以茶陵诗派，李东阳位居高官的身份一方面对这种流派的发展形成了推动，另一方面却又是自身的桎梏。

台阁体的尴尬使得文人们对我们的艺术创作进行反思，汉唐那种雄浑、豪迈的诗歌去了哪里？我大明朝难道只能依靠无病呻吟的台阁体来文过饰非，来彰显帝国的文治武功。这些迷失的文人开始寻找改造的方法，但能走的路似乎也只有复古这一条，也就是从汉唐中寻找重新点燃诗歌的激情。

这种茶陵诗派就是复古派，主要是模仿唐代李白、杜甫的风格。李东阳和他的同僚们受制于官场和身份的限制，不能够赋予诗歌以新的颜色和寓意，也不能够创作出跟时代发展紧密结合的诗体。李东阳这样的官僚依然逃脱不了礼制的束缚，他一方面对旧有的台阁体不满，另一方面对士风的转换也没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只好在故纸堆里寻找残存的信心。但这早已不是盛唐的时代，对于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如何去追寻只能是就地打滚，甚至是弄巧成拙。

跟庙堂上的沉闷甚至是复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德年间民间的诗歌开始活跃起来，在江南以唐伯虎为首形成了后吴中诗派，前吴中诗派的四人已经全部被朱元璋干掉了，后吴中诗派除了唐伯虎之外，还有文征明、祝枝山、沈周。

后吴中诗派的这些人大都生活在民间，文采风雅、仕途不顺。他们没有官场的羁绊，甚至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束缚，他们对生活，对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体验，这种情感上的自然流露也就反映在了诗歌上。

对于后吴中诗派我们无法说其所创作诗歌如何富有影响意义，实际上其口语化的风格、生活化的风格并不能在明代的思想文化上带来多大的影响，但他们却反映了明代社会的萌动性，在上层结构仍旧保守、禁锢的情况下，底层社会已经在进行着自我改造，而后吴中派的诗歌恰巧反映了这一点。

唐伯虎名寅，字伯虎，生于成化年间，苏州府吴县人，祖上为山西商人。15岁考取秀才，19岁那年双亲、妻子相继离世，家道开始中落，好友祝枝山劝唐寅潜下心来好好读书考取功名。28岁那年，唐伯虎去南京参加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故而唐伯虎又名唐解元。弘治十二年（1499年），29岁的唐伯虎赴京参加会试。

此次会试唐寅是与江阴巨富徐经一同前往的，徐家在江南是大家，徐家世代在大明朝皆是知名人士，徐经祖父徐颐、父亲徐元献、玄孙徐霞客都是载入史册的人。徐家有一“万卷楼”，里面所藏皆是宋元战乱以来遗留下来的古卷，徐经好友钱福曾游览过万卷楼，后来专门写下《万卷楼记》，钱福在《万卷楼记》中写道：“兹楼也，储川岳之精，泄鬼神之秘，究古今之奥，焕斗牛之躔，知不可以金谷，平泉视也。”

徐经自然是名声在外，就连京城也知道他。此次他与唐伯虎结伴而行进京赶考，唐伯虎是去年应天府乡试解元，如此阵势你想不关注都不行，果然，两人还没到，京城便早已闻声。两人抵达京城后便赁下一处宅子，随即在京的同乡、熟人纷纷前来拜访，一时摩肩接踵。徐经带着六名童子，每次出门都是招摇过市，把个北京城搞的是喧闹异常，这几天从大内到中枢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俩人。偏偏这个时候，徐经又领着唐伯虎拜访此次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人们不禁浮想联翩，程敏政也是南直隶人，对徐、唐二人极为推崇，平日里就有书信来往。

此次会试的主考官除了程敏政，还有一个是李东阳。而这次会试试题出的生冷、怪癖，众考生皆答的一塌糊涂，唯有两张卷子写的颇有文采，主考官程敏政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徐经和唐寅的。程敏政的这句话很快传遍了京城大街小巷，也终于印证了人们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就是徐经、唐伯虎并无真才实学，此次进京想通过贿赂的手段

取得功名，而且唐伯虎还邀请程敏政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这些都加强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很快一场科场舞弊的大案的奏书搁在了弘治皇帝的案头，弘治皇帝读完后勃然大怒，下令将程敏政、徐经、唐寅三人投入大理寺的诏狱，徐经受刑不过便招供自己拿金子贿赂程敏政，然后程敏政将试题给了自己，不仅如此，唐寅也使了黑钱。

对于这段经历，唐伯虎在给好友文征明的信中写道：“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养尊处优的文人哪里见过牢房的架势。弘治皇帝让李东阳复审，李东阳在复审中发现被程敏政赞扬的那两篇稿子并非出自徐经、唐伯虎之手，而且后来徐经在刑部和吏部会审时翻供，说自己是屈打成招，到了此时，此案已再无悬念。但迫于舆论压力，会审认定徐经和唐伯虎在考前拜访主考官也是犯法，仍然有举人身份的徐经和唐伯虎被贬到浙江的县城为吏。程敏政出狱后不愿为官，忧愤而死，唐伯虎耻于为小吏，从此远离官场，徐经还盼望新天子正德能够为其平反，故而于正德二年前往京城打探，但终是失望，徐经却于杭州的永福禅寺病死。

徐经的祖父徐颐曾任过中书舍人，当时朝中风议徐颐的官职是拿赏财贿赂王振而得，王振死后，徐颐自然也被罢官。徐经的父亲徐元献会试不中，回乡后发愤读书打算来年再考，结果用功过度而死，而他们的后代徐经也是如此。科举考试摧毁了徐家三代人，不仅如此，后世子孙虽多加努力，仍旧是无缘官场，一直到徐霞客童试不中的时候，母亲便没再要求，此后徐霞客大半生便在游历中度过。社会的发展给知识分子更多的选择途径，你可以教书育人、你可以经商、你可以出版自己的书籍、你还可以游历和当一名医生。

发端于弘治年间的科场大案表面上看是民众对两个明星人物的排斥，更深层次的原因乃是我们这个社会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那种

冲突，历史虽然已经进入到弘治年，底层的商业已经开始踊跃，但对于中枢来讲，它依然容不得商业文化的存在。而这种反映在人事安排上的冲突只是两种文明的一种小冲突，如果它能在底层社会中引起大的爆发，那才真正意味着大时代的到来。

唐伯虎回到家乡后，第二任妻子离他而去，他开始寄居在吴趋坊巷口的一处小楼中，以卖画为生。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丹青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首诗是唐伯虎在吴趋坊居住的时候所作，诗中真实的反应了诗人那个时候的心境。也就是在吴趋坊居住期间，诗人结识了苏州名妓沈九娘，两人互生爱慕，并共同生活在一起，后来生下女儿桃笙。

几年后，诗人用卖画的钱在城北废弃的桃花坞盖了几间茅房，这里就成了他的桃花园。平日里经常跟沈周、祝枝山、文征明饮酒作诗、作画。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是唐伯虎所作的有名的《桃花庵歌》，这是一个较为正确的版本，这首诗歌正是诗人在桃花坞生活期间所作，它生动的描绘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无论诗人如何洒脱，都掩盖不住诗人生活的窘迫，无论诗人如何淡化，都回避不了他内心世界的纠结。

我们的诗人依旧对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考耿耿于怀，并成了一生中都挥之不去的心结。诗人并不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官场，即使那场科举能够得中，依然会是今天这个结果，世间很多事情虽是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诗人的后半生始终活在虚幻之中，他不似吴与弼、徐霞客那般洒脱，一件小事情都会令其纠结一生。实际上，从弘治十二年的那场科举大案来看，以及嘉靖、万历两朝士大夫的命运、际遇以及选择来看，从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取仕对于一般文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好的出路。知识分子一定要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这点来讲，我们后面将会讲到的终身不科考的王艮、何心隐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坚定的认定，而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

唐伯虎虽然身在乡间，但不等于他默默无闻，喜欢招揽人才的宁王对唐寅伸出了橄榄枝。唐寅来到宁王府后发现宁王行为怪异，而此

时到处流传着宁王要造反的新闻，有了前科教训的唐伯虎开始装疯卖傻，并离开了宁王府。虽说离开了宁王府，但毕竟是跟宁王有牵连的人，在宁王出事后，唐伯虎也遭到了调查与警告。这件事情对唐伯虎又是一次打击，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渐渐不行了，卖画的钱连生活都维持不了，加上沈九娘先他离世，唐伯虎只好依靠祝枝山、文征明、王宠接济。

嘉靖二年（1523年），唐伯虎前往亲家王宠家，王宠家挂了一幅苏轼的真迹，上面有“百年强半，来世苦无多”一句，这句话触动了唐寅的心思，他回想自己凄凉的一生，回去后便病倒了。当年死于桃花庵中，享年53岁，他的好友凑钱将唐伯虎安葬，祝枝山写了千余字的墓志铭，后世人关于唐伯虎的生平很多都是从这块墓志铭上来的。

唐伯虎一生虽然作了许多诗，但诗页大多散佚，一名常熟书商将其散于各处的诗集收集起来，做为了一本诗集出版。唐寅跟许多的文人一样，生时寂寞、死后辉煌，幼年的安逸生活造成了无法承受挫折的压力，这点也跟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一旦科举失利则终身愤世嫉俗、自轻自贱。

在本章节中虽然以较大篇幅介绍了唐伯虎，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说明明代中期诗歌风格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变迁。从后世人在小说和戏曲中将唐伯虎描绘成一个放浪形骸、纵情声色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明代人追求思想解放、个性独立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唐伯虎这样的一位人物充当代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内心诉求。但此种诗歌的自由风尚只限于民间。

另外，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本来也是后吴中派诗歌的代表，但入仕后竟也受环境的改观转变为茶陵派，这个事例表明，到了正德年间，民间风气虽然已经活跃，但中枢依然保守，伦理道德依然

在禁锢这个社会，两种思想开始在帝国碰撞，并在以后的岁月越发激烈起来。

8 繁荣的小说市场与明代的文艺复兴运动

我们回过头看嘉靖王朝，皇帝的虚伪与专制，首辅的恭顺与调和似乎喻示着在这个保守而停滞的王朝没有太多革新性的东西，但这只是对中枢而言。在我们的民间，在思想、文艺、经济方面它依旧是沿着本来的脚步高歌猛进。在思想上，以王艮、何心隐为代表的心学传人将他们的民本思想、启蒙学说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文艺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小说的涌现更是给帝国的文学市场带来革命性的跃进，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经济上，它的商品经济继续活跃，白银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市井文化仍旧在成形，财富进一步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搞清楚了这些，我们会知道，抛却中枢的保守不谈，我们的嘉靖时代依然是个伟大的时代。

吴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的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施耐庵曾中过进士，后辞官不做，罗贯中则是以民间说书艺人的身份出现，两人活动的范围大概便是今天的苏州、杭州一带，这一带在元末也是戏曲的繁荣地，这里聚集着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从中熏陶到了不少朝章典故，这对于两人进行文学创作大有好处。在元末的那个动荡岁月，两人还一起参加了张士诚的起义队伍，成为张士诚的幕僚，但自以为是的士诚听不进臣属的意见，眼见张士诚迟早会败亡，两人便离开张士诚彻底绝离了仕途，从此专心进行文学创作。

洪武开国后，为了避祸，两人开始隐居起来，专心讨论《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创作，《水浒传》大概先于《三国演义》创作完成，施耐庵死后，罗贯中对《水浒传》的书稿进行了整理、修订。

《三国》、《水》开创了我国章回体白话文的先河，而这种章回白话体就是说书体，从这里也似乎可以表明作者的身份与职业。

洪武十三年罗贯中携带《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书稿四处寻找出版商出版，但两人的小说属于首创章回白话体，在以戏曲、杂剧为主的图书市场前景不明，所以没有书商敢投资。罗贯中到死，他和施耐庵的书都未能出版，最终报憾终身。生前寂寞、死后辉煌，这是许多创作者的结局，在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有许多璀璨的作品都被淹没了。

虽然这两部宏观巨著由于书商的保守、谨慎未能出版，但此后一直以手抄本传阅，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虽然仍未出版，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有一些人通阅这两部书，其中就包括那位少年朱厚璉。

嘉靖元年，在实习官员张璉的帮助下，嘉靖取得了对官员们的初步胜利，但以外藩继位的他面临群臣的压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令武定侯郭勋刊印《三国演义》，以官方的形式在全国出版，这是中华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时至今日，我们的文艺作品仍是这种章节式的通俗风格。

但在识字率不高的明代，文艺作品更多的是通过说书艺人的嘴来传播给劳苦大众。

嘉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刊印《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演义中树立了很多忠君的榜样，例如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一部《三国》宣扬的就是“忠义”二字，嘉靖此举就是要营造一种忠君的氛围，来向这些桀骜不逊的官僚们施压。

嘉靖七年，皇帝斗倒了杨廷和，颁布了《明伦大典》，随即他又令郭勋刊印《水浒传》，《水浒传》中宣扬的也是忠义二字，梁山伯的一百单八将好汉讲的就是忠义二字，这些都是令嘉靖皇帝受用的事情，他就是想通过这些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忠君的思想。

除了这两部小说外，在明代还有另外两部有影响的小说《西游记》和《金瓶梅》。它们虽然刊印于万历年间，但却是创作于嘉靖年间，所以这两部著作自然也脱离不了嘉靖时代的背景。

与施耐庵、罗贯中不同的是，吴承恩作为落第秀才的身份生活在嘉靖年间，他40岁才取得秀才的身份，之后两次乡试都落榜，这跟吴承恩的才华并无关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按照常规答题，他想答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才华。

连续两次落第，吴承恩心灰意冷，理想的破灭、现实的困境使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吴承恩前往浙江省长兴县做了两年县丞，离职后开始投入小说创作之中。年轻的时候吴承恩就对神怪类书籍感兴趣，《山海经》、《搜神记》、《酉阳杂俎》都是他常读的书，而此时印度文学的浪漫之风从宋朝开始就传入中国，心学思想的传播更是给我们的文人提供了大胆想象的空间。《西游记》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和反抗专制的思想，但它对佛教的宣扬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这部作品不应该归结到启蒙作品的行列。《西游记》带有明显的扬佛贬道的倾向，虽然我们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否能说明作者是借此部作品来讽刺嘉靖呢？

章回体的白话文小说，以及以章回白话体为基础的神怪小说在本朝都已经出现了，所缺的是写实类作品，因为《三国》、《水浒》是历史类作品，《西游记》是神话类作品。很快一部写实类作品孕育诞生，它就是《金瓶梅》。

我们对于《金瓶梅》的关注绝不是因为它所描写的情色内容，情色虽然是文学的永恒的话题，但它只是作为吸引读者兴趣的点缀而存在，它从来都是无关一部文学作品的宏旨。《金瓶梅》取材于宋代的故事，但是描写的却是明代的世情。

《金瓶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中国第一部描绘市风民情的文艺作品，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它从过去描写英雄、神仙人物转向描写市民阶层，它从颂扬光明、理想到揭露黑暗，这都是写作手法上的创新，《金瓶梅》整部著作格调灰暗、压抑，让人感觉到绝望，感觉到了社会的迸裂。

《金瓶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跟嘉靖时期的整个时代背景有关。明朝从宣德以后，洪武、永乐两朝的高压态势已经不复存在，这种解缚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学上。台阁体的诗文向描绘自然、明快的后吴中诗派转变，文艺作品也从戏曲、杂文向通俗小说转变，与之对应的是心学的兴起，尤其是王艮、何心隐等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推动，另一方面，商业的兴起，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得社会财富在积累、市井文化在形成，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将这些日常生活真实的记录下来。

《金瓶梅》没有矫揉造作，它所描绘的就是一种真实的明代中期以后的市民生活。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男欢女爱、官司诉讼、主仆之间、街坊邻里、坑蒙拐骗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也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一个富贵之家的男盗女娼。男盗女娼自古有之，只是在这里第一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它深深的揭露了在人性解放、拜金主义盛行的明朝时代，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道德的沦丧自古也是有之，或许在思想更加活跃，商业更加发达的明朝才变得显性起来，无论这部作品如何伟大，它所描绘的只是明代的一种剖面，它不能够代表我们那个时代的所有一切。

从这种市情小说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糅合，酒馆、赌坊、妓院这些东西都是在宋代由西域传入中国，而文学中所具

有的浪漫色彩则是从印度传入，所以中国的文化在西晋灭亡后就糅合进了西方的色彩。

嘉靖王朝小说市场的繁荣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自由、文化昌盛、商业繁荣，嘉靖从自身的政治需要直接促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不朽名著的问世，从此以这两部书为蓝本的演义类小说越来越多，占据了帝国主要的图书市场，《金瓶梅》的问世更是在万历朝推动了世情文学的流行。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嘉靖一朝出版的书籍超过了历代的总和，这也同时给没有出路的文人以新的生计，他们的价值有了新的体现方式。这都归功于我们这个看似伟大的时代。

在古希腊被北方的蛮族马其顿所灭后，在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日耳曼所灭后，欧洲便进入长达1000多年的黑暗中世纪。在蛮族统治下的欧洲，这些蛮族不懂文字，只有依靠传教士通过神学来禁锢一切，从此那充满人性之美的欧洲古典文化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在经历了神学政治1000年的专制统治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存的典籍和遗迹之中发现了古典文化充满人性的美，由此开展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而在中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便进入文化钳制的时代，先秦时期那种关注周遭世界，关注普通人生活，充满情爱之美的儒家思想先后被改造成宣扬宿命论的西汉儒学和压抑人性的宋明理学。而从明代中期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井阶层的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们更加注重人本身的需求，人本身的欲望，人性本身之美。而明代的小说，后吴中诗派的诗歌，公安三袁的散文，还有徐渭的画则是明代文艺复兴的代表。

9 性灵之风与明代的智者学派

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出现了智者学派，他们强调人的价值，关注周遭的世界，反对神的意志和权威，并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一阵风刮来，它是热风，还是冷风，不取决于风本身，而取决于人的感受。一人感到热，那么它便是热风；一人感到凉，那么它便是冷风。

而在中国，随着宋明理学被官方确立为指导思想，人本身的思维被禁锢，一切从纲常名教出发，人本身的需求被压抑。到了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队伍的壮大，财富的积累，人们越来越关注人本身的需求，提倡人性之真，反对对人性欲望的压抑，李贽的童心说和私心说正是产生于这个背景之下。

除此之外，产生于明代晚期的性灵派主张展现人性之真，直接抒发人的性灵，表现真实感情，他们强调“真”、“性”、“灵”，由于性灵派也关注人本身的价值，所以，他们可以看做明代的智者学派，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徐渭和公安三袁。

徐渭幼年失去父亲，青年丧妻，科举不第，徐渭的人生是灰暗的。徐渭在心学的影响下，对个人意志看的尤为重要，他提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只要对他人有用的人，皆是圣人。徐渭的观点跟王艮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在他们眼里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为圣人。

徐渭从三十岁开始习书画，在书画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他的忧伤、愤慨、苦闷、豪情、不羁、激动、欢乐尽皆灌输在画作之中。他的草书更是将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展现了出来。

徐渭像庄子一样，注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在连续科考不第的情况下，他便对官场彻底不抱希望，他也曾在胡宗宪和李春芳府上做幕僚，生性喜自由的他对这种幕僚生活并不热衷。在辞去幕僚之后，徐渭开始周游大明的大好河山，在周游南方的名山之际，徐渭开始研究南方的戏词剧本，徐渭写的剧本大都对封建礼教进行抨击，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而且在词曲的格式上放任自由，随意书写，崇尚自然，带有一股清新、自然的人文主义之风。

在周游北部边境的时候，徐渭迷醉于那种胡汉杂居的景象，此时大明朝经过隆庆开关后，明蒙之间已经实现了和议，胡汉杂居的景象在大明朝重新显现，长城内外又开始繁荣起来。徐渭写下了《边词》、《胡市》等诗文。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尤其反感，他认为诗文就应该直抒胸襟，表达人的真实情感，做出自己。不应该去模仿古人，模仿古人不过是鸟学人语，即使学的再像，也不过是鸟语。

徐渭可以看做是明代性灵派承上启下的人物，真正将性灵主义推向高峰的是公安三袁。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县人，三人皆以诗文为研究对象，且反对复古，提倡“真”、“性”、“灵”。“真”为真实，通过诗文表达作者内心真实的感情，“性”为性情，表达作者本来的性情，“灵”是通过诗文表达一种灵气、灵动，而不是那么刻板，因为公安三袁又被称为性灵派。

袁宏道是公安三袁的主要代表，袁宏道早年科考不顺，后入禅宗，以求获得精神上的解脱。袁宏道在李贽居住麻城期间，曾去拜访，俩人相谈甚欢，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

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后被授予江苏吴县县令，这应该是属于进士里面的优差。袁宏道跟李贽一样，不喜官场的羁绊，更喜欢追求一种绝对的精神上的自由。辞去官职后，袁宏道开始游山玩水，写诗作文，反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

后袁宏道赴京任职，与兄弟还有其他友人一起创立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评诗论文，系统阐述了性灵之说。

袁宏道的兄长袁宗道最初在诗文上模仿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但他逐渐发觉没有出路。袁宗道试图在诗文上开辟一条新的路径，但始终不得门径，在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后，袁宗道结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袁宗道深受他“心性”之说影响，袁宗道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体验。

后兄弟三人于麻城与李贽会面，袁宗道深受李贽个性解放之说的影响，开始对文坛上“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派进行批判，并促进了“性灵说”的形成。

袁宏道和袁宗道的弟弟中道跟他的两位兄长一样，在很小的时候便显示出聪慧的性格。他受佛道的影响也更早，对性灵之说的表达也比兄长二人更加强烈。

公安三袁对于性灵学派的创立在大明王朝的文坛上开启了一股新的文学之风，他对于打破复古派对于文人思想上的禁锢起了绝对性作用，从此中国的文人更加注重自身的感受，诗文流露出一种真性情，形式更加随意、自然。这种表象推及实质的话，便是一种人性的解放。

10 成化新风

方志远认为，成化年之所以是明王朝的转折期，因为成化年商业开始繁荣、思想开始自由、生活开始奢靡、皇帝开始放权，成化年标志着一个商业和文官政治高度成熟的时代开始。

《菽园杂记》是陆容所作，陆容是成化时代的进士，《杂记》中所记的侧重于一些奇闻轶事，是研究宣德至成化朝的重要史料，《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史料。

马尾裙始于朝鲜国，流入京师，京师人买服之，未有能织者。初服者，惟富商、贵公子、歌妓而已，以后武臣多服之，京师始有织卖者。于是，无贵无贱，服者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者，下体虚縻，取观美耳。阁老万公安，冬夏不脱：宗伯周公洪谟，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驸马，至有以弓弦贯其齐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有关马尾裙的故事。马尾裙本是朝鲜服饰，成化年传入明朝，开始只在普通富人和歌伎中流行，但渐渐的士人和王公贵族竟然也穿了起来，最后竟然发展到皇帝和武将也身着起来，并为它取了一个优雅的名字——曳撒。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那浓郁的朝鲜风，到了成化末年这种裙子竟然发展到人人皆穿的地步。从这里我们看不到等级秩序的差别，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是马尾裙的拥趸者，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到了成化年明朝人那种追求个性、展示自我的精神。

人们为了争相好看，还不断在裙子上加以点缀，最后竟然发展到有人去拔官马的鬃毛，而且武将在上马训练的时候竟然也着此裙，到了这个时候，马尾裙的风靡已经到了影响帝国军事安全的高度，所以

在弘治朝便禁止穿此裙。裙子本来是女人之物，现在大明朝的男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争相穿之，由此可见大明朝的风气已经到了何等开放程度，不仅如此，成化年的风气开放在其他方面也都体现出来。

庚午，户科都给事中丘弘等言，近来京城内外风俗尚侈，不拘贵贱，概用织金宝石服饰，僭僣无度，一切酒席皆用簇盘糖缠等物，上下仿效，习以成风，民之穷困殆由于此。

——《明实录·宪宗实录》

申奸淫居及丧宴乐之禁，时京师淫风颇盛，居丧之家张筵饮宴，歌唱戏剧，殊乖礼法，给事中丘弘言，欲将奸妇枷号示众，禁约居丧者不许非礼宴乐。

——《明实录·宪宗实录》

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乘马。

——《菽园杂记》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赍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菽园杂记》

这是史书上记载的反映成化年风气变化的四个经典案例。第一个反映了民间消费日趋奢靡；第二个例子反映了民间士风日下，通奸嫖宿已成平常，甚至在服丧期间仍是乐声阵阵；第三个例子反映出成化年后明代官员突破禁止乘轿的成例，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第四个例子反映出江南的士大夫子弟热衷于唱戏，扮演倡优。这四个例子皆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成化年社会风气日益向奢靡、追求排场、享乐方向转移，的确，成化年只是一个开端，从嘉靖以后，尤其到了晚明，这种涣散的风气日益得到体现。伦理纲常被打破、勤俭朴素被抛弃、仁义道德被隐藏、奉公体国被遗忘，从成化年起，我们这个帝国就注定了走向灭亡的结果，这是庞大帝国的宿命。

风气的转变在成化朝来说只是一个方面，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商业开始繁荣起来。中国古代的农耕王朝向来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我们都知道，凡事发生都有它发生理由，“重农抑商”作为一个延续千年的国策自然有它的道理。东方大陆有适宜耕作的土壤与气候，封建集权的国家政治制度又给开展农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而西方的欧洲则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欧洲分散的小国必须依靠商业才能存活，东西方经济形态的不同是由一系列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这跟主观条件并无关系。而东方的中国一旦背离了主业，开展商业，那么就会带来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大面积经济作物的种植，其结果只能是粮食产量下降，威胁到帝国的经济安全，所以“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不难理解。洪武皇帝建立大明朝后更是将“重农抑商”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此宋元以来的那种蓬勃发展的商业被打断，国人的那种由于重商主义而带来的冒险精神也被泯灭，但历史的发展总是朝着他本原的规律进行，大明开国一百年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长，商业文明的回归已是势不可挡。

从成化年间起，各处商业开始活跃，店铺林立、市镇增多、运河上漂的到处是南来北往的船只，经商的利润是越来越高，此时的帝国

已是人人经商。

朱见深自然也加入这个行列，他很早就对经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让宦官从民间低价收购各种玩意儿，然后再高价售给他人，从中获利。他也给喜欢的宦官盐引，让他们去牟利，当然皇帝也要在其中分成。这还只是皇帝，宦官经商更是普遍异常，前面提到的那个南京镇守太监谭力朋只是一个个例，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宦官做的都是无本买卖，到各处巧取豪夺，然后再高价出售，一次能获利数千两。不仅皇帝和宦官做起了生意，帝国的文官对于此事也是乐此不疲，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文官们敛财已经不是靠贪污财政公款，也不是靠向他人索要，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自己做生意。

行人司右司副张瑾和给事中冯义利用出使占城的机会夹带私货前往占城销售，获利颇丰；给事中林荣和行人司黄乾亨出使满刺加国，两人在船上夹带私货，而且还顺便让其他商人也搭乘其船，因为大明朝实行海禁。由于商人带的货，加上两人自己带的货，导致行船超重，在海上遇风沉没，林、黄两人也葬身海底。除了夹带私货去境外销售之外，还有很多文官通过贩卖官盐、木材获利，普通官吏如此，涉及到经济管理部门的更是如此。朱见深对这些也没有过多的干预，自己敛财，还不允许别人敛财吗？只要你们不来干涉我的私生活就行。到了这个时候，官场已经形成一种风气，那就是不靠工资了，人人都有捞钱的路子，发展到最后很多人连班都不上了，朱见深几次朝会都发现下面没有什么人，朱见深也是“亨亨唧唧”的应付了过去。

这股经商之风不仅风靡于皇宫与官场，更是刮到了民间。“士农工商”，这是封建时代的职业排名，在那个年代，读书人唯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才是唯一出路，从此不仅是自身荣耀的问题，更是家族世代荣耀的问题。但谁都知道，此举的确风险很大，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基本上就是神话，但到了成化年，随着商业兴起，给读书人提供了更多

的选择，那就是走经商之路也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在这种思潮下，学子们纷纷弃学经商。

周宪是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父亲早亡，兄弟三人全靠寡母一人拉扯，周宪和兄长皆是读书人，但眼前的困境让周宪坐不住了。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继续读书，母亲就会很劳苦，如果我弃学经商，虽然我会劳苦，但母亲会轻松许多。不久，周宪便抛弃书本，独闯汉口，赚的钱补贴了家用，并帮助兄长和弟弟完成了学业，母亲也得到了休息。

苏州府的昆山县有一人名方麟，初为读书人，后来弃学随其岳父经商，有人问他“子乃去士而从商乎？”意思是你怎么能丢掉读书人的饭碗去从事商业这样下贱的职业。方麟的回答是“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意思是你只知道读书人不屑于从事商业，但是你不知道商人也不屑成为读书人。

“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这两句话是震撼的，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学而仕之的观念，读书做官不再是万民的最高梦想，它甚至在金钱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既不能贴补家庭，又不能孝敬父母，在投资小、见效快的商业面前，读书这个职业竟然开始摇摇欲坠。

不仅如此，大明朝还开始了“开捐纳监”，只要捐钱、捐米或者捐马就可以获取生员资格入国子监读书，届时直接参加乡试，而这些捐生由于经济条件较好，自小就获得良好的教育，所以往往能够在科举中胜出，令人刮目相看。商业的发展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地增税的关卡不断增加，商业税占税收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风气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活跃的确是互为表里，商品经济的活跃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风气的转变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两者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来临。

11 明朝的达尔文与明代的市场经济学家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从此打破了上帝造人说。但殊不知，在大明朝，思想家王廷相早达尔文300年提出了进化论与丛林法则。王廷相是以文御武的典型，曾担任兵科给事中、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王廷相是一位典型的唯物思想家，他对天文学、生物学、地理、音律都有深入研究。

王廷相提倡独立思考，反对因袭旧说。王廷相认为那些将先古圣儒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人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身水平低下，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这体现了王廷相坚持发展的思想。

王廷相的唯物论体现在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上。理学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意识的理，理生物质的气，理在气先，气生万物。王廷相还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反对天地有主宰的学说，他说国家处于危难，人民流离失所，都是当政者失职，跟上天有何关系？祥瑞与灾害是自然的作用，跟人的主观有何联系？

在历史观上，王廷相跟马克思一样，坚持发展史观。王廷相认为历史是不断由新的制度代替旧的制度组成的，而每种制度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并不适用于别的制度。王廷相说井田之后有阡陌，分封之后有郡县，天下哪有不变的制度。这正好是跟戊戌变法中那些顽固派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针锋相对。不仅如此，王廷相认为天下有许多国家，而中国仅仅是这其中一个国家而已，没有必要将自己当做天下的中心。王廷相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跟哥白尼的日心说有殊途同归之处。

王廷相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思想，他指出自然万物非为人所设，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高级，能够

支配其他动物而已。王廷相的这种观点不仅否定天生万物，更是将人与动物拉到一个起跑线上，在儒学仍占统治地位的大明朝，可以说是地动山摇之举。

陆楫是明代中期的经济思想家，礼部侍郎陆深之子，自小便显示出与常人不一样的性格。明代初期，社会淳朴之风兴盛，从帝王到普通之家都崇尚节俭，到从成化开始，随着经济发展，财富的积累，一股奢靡之风在社会中盛行。在政府不断下禁奢令的同时，一些人士对政府的禁奢令提出了质疑，其中最著名的是陆楫的《禁奢辩》。

陆楫认为节俭能够使一个家庭富有，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却无利。整个社会越奢侈，越有利于人民生计，撑船的、打渔的、唱戏的、卖酒的都能够得利。陆楫并且认为吴越等地越奢靡，从事工商等末业者越多，越能搞活地方的经济。可以说陆楫的观点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也就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富人的浪费也带动穷人收入的增加。

陆楫的奢靡促进经济增长观点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明王朝，人们对财富，对消费方式，对农工商的关系产生了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革命性的。

12 明代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

嘉靖十九年，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家中逝世，四方送葬者从官员、士绅到平民百姓有数百人之多，至此这位从秦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此逝世。在王艮病重期间，四方百姓仍是不断涌来，王艮在病榻上仍是耐心讲解，解答他们心中的疑惑，王艮以他的身体力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王艮虽然去世，但他的传人继续将他的泰州学说发扬光大，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王艮的学生皆是在帝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无不坚持“安身立命”、“百姓日用即道”的准则，他们有着独立的操守，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不惜舍身成仁，他们的目光始终在底层百姓那里，他们追求一种干净的世界，他们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一股新风，一种真正的关怀人性之风，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先秦的基础上再次推向一个高度。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王艮和他的弟子们跟王阳明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王艮和王阳明的学说是同时产生，他们都受到陆九渊、吴弼之的影响，只是由于王阳明更具备权威性，所以王艮拜在了王阳明门下，王艮的学说和王阳明也有着本质不同，在心学上，王艮走的更远。王阳明虽然反对理学，但是他在南方平叛中杀人太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维护的是君主专制和伦纲理常，这点跟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王艮的亲传大弟子是徐樾，徐樾进士出身，曾做过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司，他是王艮的忠实信徒，曾经打算辞官专门钻研学问，后来在跟云南土司的作战中战死。

徐樾只是泰州学派在官僚中的一个代表，在王艮死后，真正再次发挥影响的是徐樾的学生颜钧。颜钧号山农，他跟王艮一样四处讲学，曾经两次轰动京城，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四方举子无不争相听之。泰州学派的这种不论受众对象四处聚讲的方式具有比其他学派传播更快、更广的效应，颜钧赞成男女平等，提倡寡妇再嫁，他创立“七日闭关法”，他认为世间职业皆无差别，安身立命乃是人生追求，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只需率性而为，不需要克制欲望去追求。压制人性的欲望跟孔孟之道也是违背的，由此看出，此时的心学不仅强调心的体验，也同时强调身的体验。

颜山农在教授弟子率性而为的时候创造了“打滚法”。当弟子问他率性而为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就地打了两个滚，告诉弟子这就是率性而为，令人瞠目。

泰州一派的人大都身体力行，颜山农也是如此。颜钧的家乡位于江西省吉安府永新县三都村，为了推行教化，他在三都村成立萃和会，自己家庭和本族里的媳妇们、兄弟子侄孙子们、仆人、再加上村里面的其他村民一共七百人参加了这个萃和会，萃和会的成立标志着在500年前的大明朝出现了群体主义和乡村运动。

现在看来萃和会只是一种乡村自律组织，它既无政治目的，也无经济目的，它的重点在于劝戒乡民好好做人，它悠悠向导，劝人从善，力图恢复三代的淳朴民风，它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洪武心目中的那种理想乡村模式。

萃和会给三都村带来的效用是迅速的，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几岁孩童皆有内心通灵的感觉，人们皆辛勤劳作，邻里之间皆互相迁让，婆媳之间关系融洽，兄弟之间也相互和睦，妯娌之间其乐融融，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三代之治隐隐已现。

在萃和会创立的时间内，帝国有无数的眼睛盯着这个小小的乡村，他们在捕捉这个时代的不寻常气息，没人知道这种涌动的暗流将会将我们的帝国带向何方，如果可能，最好将其扑杀在萌芽状态。

颜钧，颜山农的名气越来越大，江西督学苏枯亲自上门下拜，江西巡抚何迁的两个儿子因仇互殴，山农前去一番讲解，兄弟俩人顿时和好如初，何迁为了答谢颜山农，将自己的官船送给山农做巡游讲学之用。

颜钧的言论终是招致保守派官员的不满，南京左都御史，王学右派人物耿定向以讲学名义将颜山农诱骗至南京杖责五十，以盗窃官船名义将颜山农关押三年。

出狱后的山农听说王艮逝世的消息后，亲自前往王艮墓旁搭草屋守墓三年，颜钧走到哪里，听他讲学的人就跟到哪里。守墓结束后，听说自己的老师徐樾战死，他又亲赴云南辗转数年寻找徐樾尸骨葬在王艮墓旁。

颜山农创立的萃和会并不存在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他这个灵魂人物离去后，很快便轰然倒塌。

在颜山农死后，他的大弟子何心隐才是真正将泰州学派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们要说明的是，王艮、何心隐、李贽都是这一学派阶段性的人物、灵魂性人物。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29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

朋友那样是平等的，何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在今天也是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但这个聚合堂维持了12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

聚合堂的覆灭是跟税收有关。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大明朝的税制虽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灌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12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

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进京。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以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62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大、措辞之烈世所罕见，当年在武昌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张居正的学潮。

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21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别，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1579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6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专制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这个社会容不下异端思想。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我们

的关注。除此之外，聚合会这种纯粹公有制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否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活积极性？由于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它应该是印证了我们头脑中的疑问。

13 明末民主思想家

没有人会怀疑明代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年代，这个时期不仅有阳明心学，更有王艮隐学，而且在晚明行将就木的年代产生了三位巨擎，他们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他们三人的思想有一些共同点，但也各有侧重，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王夫之信奉唯物主义，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

在晚明那个天崩地裂的年代，面对农民暴动帝国束手无策，面对异族入侵汉族官僚束手待毙。到了此时，世间万物先有理，还是先有气；理在外间，还是在心间；道是需要穷索，还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显得幼稚可笑。当人们发现这些争论已经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時候，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了经世致用，此时，一切不能经世致用的学说都成了伪学，士大夫们的空谈和坐而论道都面临千古笑谈的窘境。

人们不知道这股风从何时刮起，但我们绝对知道它不是从黄土高原上造反的农民大军和满洲人入侵开始刮起，它从万历晚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李贽批判道学家虚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进入崇祯年，皇帝也益发感到这些通过八股文而取仕出来的儒生之废材，他不得不启用那些有着灵活而成熟从政经验的官僚，这个时候，皇帝比任何人都渴望经世致用，也比任何人都憎恨心性空谈。

这股经世致用之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刮起来的，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实学”，有清一代，官方所奉行的就是实学，这种实学在晚清更是突兀出来，但我们要明白这种实学之风从晚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晚明思想家顾炎武对士大夫们的空谈之风尤其深恶痛绝，他认为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跟孔孟儒学背离的。他认为理学、

心学所讲的东西都是孔孟学说所不谈的，而孔孟学说所谈到的东西又是理学、心学所不讲。顾氏认为理学、心学皆是空谈，而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却是经世致用，因为孔孟学说强调的都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对于顾炎武来说“修己治国”都是经世济用，而理学、心学却在那里扯世界的本源性。

实际上顾炎武的认知又使儒家思想回到了起源点，我们前面讲过，儒家思想之所以千百年来丧失统治地位就在于它对世界的本性缺乏解释，所以这才产生了理学、心学，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理学、心学走的过于极端，正向顾炎武认为的那样，它背离了儒家文化。

现在顾炎武重提儒家传统文化，那么又将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的本源是什么？因为解释不了这个问题，儒家思想依然面临窘境，顾炎武认为世界的本源就是经学，所谓的经学就是指儒家经典，可以说成是儒家十三经，顾炎武认为这些经学就是世界之理，一切都源于此。实际上顾炎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甚至自相矛盾的，将结果解释成原因，或者将原因解释成结果，都无法令人信服。

虽然顾炎武对一些哲学性问题的解释跟程颢、陆九渊一样显得空泛，但王夫之显然在这方面要具体一些。理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两者都认为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不同的是理学认为这个先于物质而存在的意识存在于外部，而心学认为这种意识存在于内部。思想家王夫之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他属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也就是在反对理学、心学方面，王夫之明显比顾炎武更有针对性。

有一次王阳明跟他的朋友外出游玩，朋友问：“山岩中的花在生长与人心有关否？”王阳明说：“你去看花，花就存在，你不去看它，它

就不存在了。”王夫之对阳明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说道：“浙江有座山，我没去那座山，难道那座山就不存在吗？”

王夫之的唯物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气理论，二是他的知行论。“气”就是指物质，“理”就是指意识，朱熹认为理在气前，世间万物先有理后有气，也就是意识决定物质，但王夫之认为，气在理前，没有气也就没有理。

除此之外，王夫之对朱熹和王阳明的知行观也进行了批判。朱熹作为理学的代表，他认为知在行前，先知后行，而王阳明反对将知行割裂开来，他认为两者是一体的。但王阳明仍然认为知在行前，没有知就没有行，这实际上跟理学的知行观并无本质不同。而王夫之恰恰反对知行合一，他认为行在知前，没有行就不可能有知，王夫之的知行观就是实践观，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必须通过实践，实践是一切事物的源泉。王夫之的知行观和朱熹、王阳明的知行观涉及的还是一个唯心、唯物的话题。任何的认知当然来源于实践，但当后人系统的总结出认知后则没必要一步一步再去实践，但是通过实践却又能在认知的基础上获取更深度的认知，所以，知源于行，知行合一，行知合一，这才是明理。

唯物主义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在明末理学、心学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本源性的重新思考，并将中国的哲学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明末唯物论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还产生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而这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

虽然人们公认比卢梭早100年的黄宗羲是世界启蒙思想的代表，但这明显偏颇，我们认为世界启蒙思想的鼻祖是王艮而非黄宗羲。

黄宗羲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对君主政治的抨击上，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是天下的奴仆；黄宗羲还认为士大夫出而为仕应该

是为了天下，而非为了君主；他还主张用宰相和舆论来限制君主的权力。

事实上，黄宗羲的思想并没有太多的新鲜特点，儒家文化的本质就是限制君主权力，只是黄宗羲将这一层隐晦的意思露骨的表露了出来，16世纪晚期的中国更是刮起一股非君浪潮，东林党和复社更是提出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的口号，而且大明朝的文官制度更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制约，帝国早已经进入君臣共治的时代。我们不明白黄宗羲为何提出此观点，大约是对晚明那个天塌地陷的时代背景有感而发，黄宗羲痛恨那些为了私利将天下搅得大乱的政治强人，他希望能够用法治来维持社会秩序，用民众的权力来抗衡政治领袖。

黄宗羲的思想当不得启蒙思想，启蒙思想是指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思想，它是对所有人来说的，但从黄宗羲的思想中明显看出他所维护的仍然是少部分士大夫们的利益，而将绝大多数劳苦大众排除在外。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明代启蒙思想只能是真正具备民本思想的王艮，他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学说清晰的表明所有的民众都能获取认知的权力，所有的民众都是自由而平等的，而且他还认为民众可以充当君主的老师，这更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冲击。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表面上看起来反对理学、心学的清谈，但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清谈，推崇经世致用的他们在农民暴动和清兵入关的时候何尝能够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国之将亡的时候，他们还在纠结于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减税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当清政权稳定运转多年后，他们仍旧躲在深山里逃避剃发易服而自娱自乐，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提不出任何本质上的历史经验得失，有的只是跟朱熹、王阳明一样的清谈。

第二章 制度：大明王朝的非君主主义

1 成化皇帝的垂拱而治

明成化年间，一切都是那么强大，一切都是那么弱小。我们的王朝已经进入一个奇特期。它充满了暮气，然而却生机勃勃；它保守、墨成，然而却是商业经济的开始；它一身正气，然而却妖人四起；它力图恢复儒家规范，然而却开奢侈、糜烂的先河。正统王朝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王朝，阴沉的君主、神秘的皇妃、跋扈的太后、充满理想的宦官、迈入轨道的官僚集团、民间的妖人、充满战斗力的流民，各色人等开始在这个帝国摇曳，没人知道我们的帝国要驶向何方？

历史进入正统年，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这位皇帝名叫朱见深，他还有八个弟弟，无论他是否被立为太子，他都似乎不是皇位的唯一人选。的确是这样的，在土木堡之变后，在太后的提议下朱见深被立为太子，随着郕王继位，敏锐的太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他将朱见深接到自己的身边由侍女万贞儿抚养，不允许任何人接见这位皇子。后来随着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朱见深被改立为沂王，当他搬到沂王府后仍是由大他17岁的万贞儿抚养。仍为幼儿的朱见深对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没有他的父亲体会深刻，对于他来说，身边有万贞儿在就可以了。此时的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被锁在这深宫中，他不知道外面的世

界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母亲周妃要在南宫陪伴自己的父皇。

一直到父皇重新登基，自己才重新搬回东宫居住。此时的朱见深已经是个孤僻的孩子，他迟钝、木讷、方脸、大耳，不喜言谈，不喜交流，英宗跟他谈不上什么感情。英宗更喜欢跟自己在南宫那些亲密无间的孩子，英宗复位后一直有想将见深废掉另立的意思，但此事的确事关重大，一个太子两次被废这意味着什么？英宗皇帝不得不慎重，但他的心思大学士李贤是知道的，李贤也知道皇帝的症结在哪里。

“皇上，社稷为重，皇上切要三思，即使太子无能，有我们这些阁臣在，一样可以辅佐社稷。”李贤这样对英宗说道。

李贤的话打消了英宗的顾忌，一则换太子对社稷的确震动巨大，会搅动各方势力，使平静的朝堂重新翻滚起来，二则对于太子能力的忧虑，李贤进行了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不一定能令英宗完全释然，但至少能部分打消英宗的疑虑。除此之外，李贤的话释放出来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能够掌握帝国的命运，皇帝更多的只是发挥一个礼仪上的作用。我们的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重回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朱元璋所设计的体系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终于面临崩溃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李贤让朱见深在英宗病重期间来到英宗床前，见深抱着英宗“嚎！嚎！”大哭起来，不管是真是假，父子俩的关系在这一刻的确拉近了。

因为这些因素，李贤在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成了朝堂上的资深阁臣，文臣们开始希望能将朱见深培养成他们喜欢的模范君主，帝国的官僚们开始引导朱见深一步步走向他们所设计的道路。

每朝新天子继位后，除了颁布大赦天下的告示，还要做的就是平反，新天子的威信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成化年平反首先就是要为于谦平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于谦一定程度上属于代宗那个体系之人，而且在朱祁钰要废掉自己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不管于谦同意不同意他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如果替于谦平反心理上过不去，但朱见深毕竟与朱祁镇是隔代，心理上的这个坎他还是能迈过去。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替于谦平反是不是对朱见深作为皇帝的正统性产生动摇，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新天子似乎对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他很快对于谦平了反，不仅如此，英宗复辟后所处理的一系列官员都被朱见深平了反。

眼见朱见深的所为非常得人心，文官们开始酝酿推动另外一个更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对朱祁钰的定位问题，此事关系更大，众人们虽然心中皆存此事，但无人提及。没人提及但并不代表人们不关注此事，事实上，对于谦等人平反和对景帝平反是一脉相成的，一旦开了个头就不能停止下来。紧张的气氛是令人沉不住的，总有心浮气躁的人跳了出来，抑或真的是憋不住了，抑或是有人指使，抑或从天子那里觉察到了某种信息。第一个上书替景帝翻案的是荆门州训导高瑶，高瑶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而被安排了一个训导的职位，成化三年高瑶上书要求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和庙号。帝国很多敏感的事件都是由身居外地的小官们挑开，而这些小官们也就此名扬千古，载入史册，或许改变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捕捉到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们的上书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此事既已挑明就不能回避，皇帝将高瑶的奏章让部院廷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皇帝态度暧昧，阁臣态度一样暧昧，终于在成化十一年由朱见深主动提出恢复了祁钰的帝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皇帝很显然走在文官们的前面。成化皇帝开本朝风气之先，朱见深登基后的一系列作为都为文官的谏言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虽然成化年官员们

谏言不像万历朝那般波澜壮阔，但它毕竟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洪武时代以来对言路的压制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文官们的上言都是泛泛而谈，既无新意，又不具备可操作性，皇帝表面上对这些文臣们的进言表示赞许，实际上也是不置可否。虽然我们这位君主广开言路，但一旦文臣们的言论涉及到了他的私人兴趣，他也表示出了不耐烦，甚至是大发雷霆。

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像文臣们所期待的那样中规中矩，他对儒生们开展的经筵没有丝毫兴趣，他更厌烦日复一日、琐碎非常的礼仪、朝政，他跟他的祖父宣德皇帝一样更热衷宫廷生活，但他更进一步，也更荒诞。他除了对新奇的玩意儿感兴趣外，他还喜欢跟道士、僧人搅在一起，他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很阴郁，不喜与人交流，他总是闷在宫廷里写字、作画、听戏，他更迷恋比他大17岁的万贞儿，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似乎是个局外人，只有万贞儿是他的全部。

见深的大婚进行的很迅速，在他即位的当年他就结婚了，皇后为吴氏。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大明朝的皇子和公主都是跟小吏和平民家联姻，这吴氏也不例外，父亲为禁军指挥使。在那个时代吴氏似乎是整个京畿地区唯一符合皇后的人选，她的家庭既不显赫，也不卑微，他端庄、识大体，但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然在大婚一个月内就被废掉。这件事情令举朝瞠目结舌，人们惊讶的原因的不是因为皇后被废，而是这位皇帝在废后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决绝，仿佛吴氏戳到了他的痛处。吴氏的确戳到了他的痛处，对于朱见深来说，替于谦平反，恢复朱祁钰帝号这些都没什么，但有个节骨眼绝不允许别人去触碰，这个节骨眼就是万贞儿万氏。

朱见深小时候就没有受到父母的疼爱，他是个孤苦伶仃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就是这位万氏，在他的个人世界里万氏就是一切，他的不自信，他的抑郁情绪都需要靠万氏来缓解。虽然我们这位皇帝结

了婚，但对万氏依然宠爱，而皇后吴氏对这些事情就不了解了，她看见的只是万氏的跋扈，她是后宫之主，当然要行使皇后的权力。吴氏与万氏发生了冲撞，万氏竟然反客为主，朱见深对吴氏冲撞了万氏极其不满，所以坚决废了她。此次后宫的一次碰撞只是成化年的一个开端，但它清晰的对我们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个帝国依然不平静，正统朝被一个太监掌控，而成化朝似乎又要滑入一个女人手中。

这位万贞儿并不是很漂亮，她有着男性的气质，喜欢戎装佩刀矗立在皇帝身旁，给皇帝以安全感，除此之外她的房中术大约也很好，能够把我们的皇帝牢牢地驭住。所幸的是万氏的威力只在宫廷，她并没有像王振那样跟帝国的官员们发生冲突。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女人对社稷的危害更大，因为她会影响到皇位的继承问题。吴氏既被废，那么还是要遴选新的皇后，无论如何说，万氏都不符合皇后的标准，不管是英宗的正室钱太后，还是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都容不得这个女人。有了前次教训，新选的王皇后始终不敢跟万氏较劲。

皇帝的这位保姆虽然跋扈，但此举更多的只是宫中内部事务，于礼仪上关碍并不大。成化二年万氏产下一子，皇帝高兴，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完美的事情，但帝国也只有他一人高兴，因为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这个女人将来成为皇太后。为了不让王皇后生育，朱见深甚至根本不去皇后那里居住，现在终于好了，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年底这位婴儿就夭折，皇帝似乎一下子跌入谷底。接下来的二三年时间里，宫中再也传不出宫女怀孕的消息，原来这位保姆令太监给每位怀孕的宫女吃流产药。

但还是有一名宦官于心不忍，只给一名怀孕的宫女吃了半份流产药，这名宫女终是将孩子生了下来，他就是日后的弘治皇帝——朱佑樤。人们将这名皇子隐密在宫中偷偷抚养，后来他被周太后接到宫中。这是一个转折点，它基本上标志着万妃时代的结束，从此这个女

人对后宫已不具备控制力，虽然她是站在帝国最高处的女人，但是她不能跟全天下作对，一旦她的保护伞没了，她将会粉身碎骨。这位女人的嗅觉也是异常灵敏，朱佑樘的出现使得形势出现了倾斜，朱见深的内心也产生了变化，这个聪明的女人明白如果再一意孤行只能是适得其反。

朱佑樘的出现使得帝国的最根本问题得以解决，后宫的问题也只是在小范围之内，这也使得帝国的官僚们能腾出手来进行一些其他问题。成化初年起，自英宗年代就延续的南北党争在成化朝又拉开序幕，并带来一个言官沸腾的年代。

英宗皇帝不喜欢南方的官员，尤其是江西籍的官员，在大明王朝近三百年御宇的岁月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江西籍的人物在主宰帝国的命运，大明官场一直有江西人士把持科场之言，这还不是最令帝王关心的问题，最令帝王关心的是江西籍的言官们。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享誉天下的言官皆出自江西，到了成化初年帝国的内阁中还有两位重臣是江西人，他们是陈文与彭时，而内阁首辅却是河南籍的李贤，成化年间文官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会爆发。

罗伦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大明朝的官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全国官员数江西，江西官员数吉安，似乎明王朝的一小半官员都来自吉安这个地方。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成化二年（1466年）罗伦便开始发难。他攻击的对象是内阁首辅李贤，弹劾的话题是李贤在父亲死后不按规制守孝三年，只在家中呆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回来了。

我华夏以伦理道德立国，一方面通过纲常维持了一种松散而稳固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成了我们文明的组成部分。安史之乱标志着大唐帝国多元文化实践的失败，从此华夏重归单一文明，如今伦理纲常重新成为这个帝国唯一遵循的风尚，身为国家首辅竟然做出如此有违

伦理道德的事情，在大多数士子眼里这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无论你是否身居要职，无论你对社稷的作用多么大，都是不能违背这一准则，因为这是我们文明的核心，我们这个民族存在的理由。

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它既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虽然如此，李贤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他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现他跟整个帝国的官僚决裂了，实际上官僚们是想借此事掌握舆论权，虽然朱见深将群臣压了下去，但在这年的年底李贤却死去。李贤的死标志着在宪宗面前再也无挡箭牌，帝国的话语权不可避免的滑入文官手中。

罗伦事件过后仅一年，翰林院的大能们又开始没事找事，这次有位叫章懋的编修上书反对元宵节点灯，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朱见深自然又将章懋贬黜。罗伦、章懋都是极有气节之人，被贬黜后随即辞官回乡，终生著书讲学不再出来做官，以自己的操守诠释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不贪权、不恋财、不惧生死，他们杜绝碌碌无为，他们更喜欢青史留名。虽然皇帝处理了罗伦、章懋，但帝国以他们为榜样的言官一波接一波，皇帝再也无法压制他们，此时的皇帝已经显示出倦政的信号，也许大明朝此后的行政特点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

慢慢的皇帝不再喜欢跟文臣们沟通，朝政都交给内阁处理，司礼监负责批红就行了，士大夫们期待的君臣共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而我们的皇帝沉溺宫中跟各色人等交往，这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工匠、医生、画家、戏子、作家、道士、僧人、法王、术士、魔术师、罪犯、性学家、色情小说家、春画画家都能在帝国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且还是很好的舞台。

这的确是个人才迸发的年代。如果你是江湖潦倒的艺人，你最好去京城，在午门附近支一个摊子，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宦官来找你，将你招进宫去，从此衣食无忧；如果你能写出奇闻异志的小说，你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去皇宫投稿，放心，不会存在退稿的情况；如果你懂房中之术，能授以新奇的秘法，那也不错，你也能找到工作，最好是还能研制出类似大力丸之类的丹药；如果你能看星相，或者会些法术，能将白银变成黄金，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是地方官犯了法，你也不用担心，赶快逃去京城，以最短的时间学会一门手艺，然后再通过宦官的门路进入宫廷，你就能免除处罚，但从此你就不是士大夫的身份了，而成了宫廷豢养的娱乐人士。所以在这座宫廷里，除了江湖人士之外，还有一些中过科举的士大夫们。而这些士大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屑于跟这些江湖术士为伍的人，而另一类则比江湖人士还要江湖人士。

对于宫外的官员们来说，皇帝的意思很明白，我不干涉你们，你们也不要来干涉我。此时的大明皇宫内的确热闹，也许人们不知道宫中到底是如何热闹，但所有的人知道那里的确热闹。

皇帝除了供他们吃喝外，还绕过吏部和兵部授予他们文职和军职，前后共封了一千多人传奉官的官职。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所有人都是无拘无束，你的才情尽管发挥，披头散发没人怪你，哪怕是赤身露体也没人笑话你，这些只会被当作个性与才情的展现。对于已成

为污秽之地的皇宫，文臣们自然不能容忍，皇帝与文臣的冲突又将展开。

面对滔滔而来的奏章和指责，我们这位皇帝采取了灵活应对的策略。他将为首的几位大学士采取封官的策略来拉拢，对于其他人则挑其毛病加以斥责，正是这种分化瓦解、又拉又打的策略使得我们的见深同志在面对滔滔洪水的时候如稳固的堤坝一样屹立不倒，多年以后人们回想起这段往事，仍然对这位皇帝的手段佩服的不得了。在这方面他远比他的后世子孙们强，他学会主动进攻，他完全不用强就把握了话语权，的确，大明朝到了成化年，文官们自身也不干净，贪污纳贿、旷工押妓。

朱见深成功的阻击了群臣，自从李贤死后，大明朝失去能够制约群臣的人物。成化年注定是个热闹年，宫里热闹，宫外也热闹。群臣在宫外也互相倾轧，党争已经隐隐若现，朱见深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乐得个清静自在，但我们的帝国从这一刻起似乎失去了它的凝聚力。的确，民间也是如此。

朱见深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不上朝的皇帝，他跟后世的那些不朝的皇帝还是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原因上。后世不上朝的皇帝大多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而这位皇帝的不上朝却是由于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

朱见深自小幽闭在宫中，由万氏抚养长大，他得了很严重的自闭症，他害怕见生人，他上朝的时候看见那么多人他会紧张。不仅如此，他信道教，每天天没亮他就要起床做功课，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他厌倦上朝。难得上了一次朝，内阁首辅万安了解皇帝的心思，当其他群臣好不容易见了皇帝一面，有很多话要奏给皇帝听时，万安却连忙跪下来三呼“万岁”，眼看首辅如此，其他群臣也只好跪安。所以，成化朝万安得了个“万岁阁老”的称呼，眼见万安如此，内阁其他二人

刘珣、刘吉也只好跟着捣浆糊，所以人们又送内阁一个雅号“纸糊三阁老”。从天顺年间起，内阁大学士逐渐兼任各部尚书，所以人们又称六部尚书为“泥塑六尚书”，到了此刻，我们的王朝从皇帝到大臣都开始奉行无为而治。

早已倦怠政事的朱见深开始对神仙鬼怪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修真，希望能够长生，即使不能够长生，也希望能够长寿。

成化十九年，见深召见了神仙王士能，王士能说他是江苏灌云县人，生于故元至正年间，今年一百二十岁了，但看起来却像四十岁的人。王士能告诉见深，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四川的一处雪山中遇到一位异人，异人只有三尺长，却鹤发童颜、形如婴儿，王士能伺候老人三年，老人才教授他长生之术。见深问道长生之术为何物，王士能说道“不食荤、不近女色、不贪财、不生气”，皇帝听说后觉得难度太大，便打发王士能回了去。

除了王士能，还有个尹继先。尹继先自称生于南宋绍兴年间，已经三百多岁。不过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一百二十岁已经是人类寿命的极限，如果说王士能的寿命长度还有可能，那么这位尹道士绝对是自吹自擂。

这些清心寡欲的修真人士不对朱见深的胃口，他更喜欢跟一些会玩魔术的方士搅在一起。这些方士都是朱见深让太监去民间找来的，李孜省是他们其中的杰出代表。李孜省本是地方官吏，因为犯了法正被通缉，躲到京城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让出宫寻找方士的宦官撞见了，便带到宫里来。李孜省自称他会道教的“五雷法”，善以符篆治病。这“五雷法”是道教的祈雨法术，能够将天上雷公召唤出来降雨。宪宗让李孜省演示，李孜省的祈雨法术时灵时不灵，大概他也懂一些天文知识，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不会下雨。李孜省又说他会“扶鸾术”，这“扶鸾术”是道教请仙的法术，主要是将天上的神仙请

下来。见深对这一法术也异常感兴趣，便让李孜省表演，李孜省跪在地上焚香祷告，不大一会，屋檐上出现两名仙女，见深连忙让两名仙女下来，两名仙女下来后，仔细一看，原来是宫里的宫女，顿时让人大跌眼镜。

除了这些仙术外，见深对变魔术也很感兴趣，僧人继晓是变戏法的高手，他能将水银变成银子，能将银子变成金子。通常这都是障眼法，事先将金银准备好然后替换之，虽然要自己掏腰包，但成功后皇帝一高兴都有赏赐，而且赏赐比自己付出的成本要多，但造金炼银之术是不能持续的，它只能陪皇上玩玩而已。

成化王朝注定是个转折点，帝国的权力终是向官僚手中移交，君臣共治在这一刻实现，从此权力的运作既不是依靠强悍的君主，也不是依靠耀眼的文臣，而是依靠制度与程序，任何人都要遵循的一套制度与程序。国家大事由部院提出意见，然后内阁廷议，廷议的结果票拟，报司礼监批红，然后由六科签发执行，在这个程序中，国家的决策是集体决策，避免了大臣的独断专行，而且内阁的意见司礼监和六科给事中都可以驳回，有了两道过滤器；皇帝的圣旨首先下达到司礼监，然后由司礼监转达到内阁，内阁廷议，然后票拟报司礼监批红，最后由六科给事中签发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三道过滤器，也就是司礼监、内阁和六科，这三个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将皇帝的圣旨驳回。这套程序虽然繁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推诿、扯皮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他却能避免君主和文臣的独断专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在没有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文臣的时候，依赖这套制度也能够保证帝国的平稳运转。

这还只是明朝成熟的政治体制，它还有其他的配套措施来保证整个国家平稳有序的运行。它有一套以六科和十三道御史为核心的遍布天下的监察系统，这套监察系统既可以减少官吏的腐败，又可以匡正

朝政得失；成熟而完备的科举制度更是以公平的方法保证了官吏的选拔；明王朝实行府兵制，世袭的士兵是帝国的人，而不是武将的人，这样就可以将士兵和他们的将领切割开来，各地的总兵也只有训练权，没有调兵权，这些措施都避免了武将做大；帝国除了一套文官系统外，还有一套宦官系统，这套宦官系统跟文官系统一样也是遍布天下，人数也是一样多，明王朝就是依靠这两大中枢系统保持一种平衡，虽然有的时候这种平衡并不存在；除此之外，为了避免外戚专政，皇室普遍都禁止跟文臣和贵族联姻。通过这些措施，历代以来的文官专政、宦官专政、武将专政、外戚专政都成功避免。从这以后，皇帝更多的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个执行各种礼仪、彰显伦理道德的象征，整个国家没有留下个人表演的舞台，也不需要伟大的人物，所有的人只是一颗颗螺丝钉在机械的运转。皇帝似乎不需要跟文臣见面，文臣之间也不需要见面，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文书进行，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了“文牍政治”的模式。

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正是皇帝的不作为，使得帝国提前进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皇帝的权力在这一刻也被限入一种制度化的运作模式，它必须通过繁琐的程度才能体现出来，这种程序化的皇权究竟有多少是皇帝本来的旨意，我们已经很难看清。

政治上虽然进入停滞与制度期，但民间却进入了活跃期，而正是政治上的这种无为与慵懒带来了商业的蓬勃发展、风气的松散与奢靡、思想上的自由与活跃。皇帝虽然歇息了，但成化朝的文臣并没有因此而耀眼的表演，以万安为首的南人党和以刘珝为首的北人党仍是吵闹不休，文臣们仍旧是延续了前几朝的思维与行事方式，言官们虽然开始跃跃欲试，但此时还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在体制的推动方面皇帝似乎还走在他们前面。

后人回顾成化王朝时，都认定这是明王朝的一个转折期，虽然王朝还没有进入自由、奔放的嘉靖、万历时代，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改变。当我们回顾成化王朝，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帝国本质上没有大的改观，虽然北部边境和南方有摩擦，还有延续几朝的流民问题，但这对于一个复杂的国家来说也是每朝都有的事情，皇帝的荒诞与文臣的内斗、无为也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例常之事，这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患的成化王朝仿佛一下子进入休息期，所有一切也似乎进入散漫、慵懒的状态，虽然王朝更多的依靠制度来运行，但我们也从这种无为之治中发现潜伏的危机。

从这以后，皇帝不再信任文臣，文臣们为了自保开始结成党派，道德开始沦丧，重商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中枢对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国内弱势群体开始专制与残暴起来，甚至采取卑鄙的措施对付之，这些跟君主的不作为，文臣的推诿、扯皮不无关系。虽然帝国进入了制度化的运行模式，但是由这种制度化运作模式所带来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起来，这些都会在以后的岁月中更加显性的表现出来，并最终将我们这个帝国带上了不归路。

对于成化王朝，我们是矛盾的、是纠结的、是难以评价的。它既踌躇满志，又保守没落；它既开放、又混乱。朱元璋和朱棣的高压、专制时代必须要改变，但改变后的帝国却又显得重心不稳。虽然对于成化王朝我们矛盾、纠结，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历史走到了这一步是它本身的规律造成的，虽然历史都有休息与整理期，但终究还是要延着它本来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人口的增长、社会管制的放松、商业的繁荣、新思想的崛起、民众观念的改变都使得我们这个帝国已经不可能由上端随意把持。

2 儒家礼法压抑下的弘治皇帝

历史的周而复始和王朝的周而复始都是在老生常谈中度过，每个新建立的王朝都是要清算前朝的错误，接着，新的王朝在时间的运行中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再让下一个王朝来清算。同样，每位新皇帝上任后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通过对前任皇帝主政期间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来获取人心，该平反的平反，该升职的升职，该免职的免职，然后再让下一任君主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弘治王朝自然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拉开序幕。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贵妃万氏逝世，朱见深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寄托，他曾经说过，如果万贞儿不在了，朕也活不了。同年八月，皇帝在丹药对身体的长期摧残以及万氏死去的双重打击下撒手人寰，新任的皇帝名唤朱佑樘。虽然明朝这个时候并不存在君主继承问题，但纵观三百年的明朝历史大部分继承人的日子也不好过，皇子都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培育期。明王朝过于强调皇统的重要性，反而在这个更根本问题，也就是继承人性格的养成上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来自父辈、叔辈、后宫的干预始终给年轻的皇子造成压力，文官们的说教也令皇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已经对政事产生了厌烦，这些都养成了他们成年后抑郁、孤独的性格，我们这位朱佑樘也同样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他的生命是宦官和宫女共同保下来的，出生后随即送到废后吴氏那里抚养，最后又转到太后周氏那里，有强势的周氏支持，万氏的所有努力终成了泡影。朱佑樘对这位万阿姨是警惕的，他知道这位阿姨想做什么，所以当万氏将朱佑樘邀请到她的宫中时，朱佑樘面对满桌子琳琅满目的菜肴时他竟然不动一筷，当万氏硬是央其吃菜时，他竟然说出害怕菜中有毒的话来，此话一出，万氏大为震惊，她也意识到

时到如今自己是多么的愚蠢。所以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直接把它说出来也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时到如今，万氏只好改变了方法，她对朱见深的管制放松，允许他随便接触其他女人，并不再迫害婴孩，在这种情况下，朱见深的儿子一年出来一个。虽然见深第一次见到朱佑樘的时候激动不已，但当孩子多起来的时候，那种欣喜感也会慢慢淡去。万氏自然在朱见深耳边吹风，让他废掉佑樘另立，朱见深对这个跟自己一样毫无个性的儿子自然也不喜欢，但此事毕竟是兹事体大，不久，泰山连发地震，文臣们就这个事情对皇帝提出警示。虽然明王朝大部分皇储在继承过程中都产生或大或小的风波，但所幸的是每位皇子的继承都是严格按照宗法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方面明朝皇帝的做法值得表扬，因为他成功的规避了因为皇子争夺皇位而在文官中形成的派系问题。

朱佑樘的不幸不仅体现在他那种战战兢兢的生活，更体现在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她那可怜的母亲，甚至不记得母亲的容貌，在他荣登大宝后屡次派人前往广西寻找母亲的娘家，结果都是无果而终。这些因素都使他养成一个很和蔼、很宽容的人，明朝三百年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宽容的皇帝，他很符合文臣们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在他死后他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在朱见深逝世后一个月，朱佑樘登基做了皇帝，朱见深留给朱佑樘的是一个稳健的基业，内部的流民问题已经成功解决，各项制度已经完善，边境的烽烟渐渐熄灭，后世的财政危机和令人头疼的党争也并没有出现，可以说朱佑樘当好一位“垂衣拱手”的天子就行了，但他不希望这样，但想成为一名勤政的帝王，他更想在文臣中做一个表率，以弥补父辈的不足。

朱佑樘继位之初就面临着要纠正父亲主政时期的一系列荒诞的举措，宫中的道士、方士、僧人、术士都被一股脑的撵了出去，朱见深

绕过吏部封的二千名传奉官也皆被罢免。朱佑樘在父亲的寝宫中发现了一本淫书，上面记载的都是男女交合之事，书的封面落款是“臣万安呈上”，朱佑樘看见这些后大为震惊，他从此感性的知道父亲整日在做什么，他也知道万安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让太监将这本书拿给万安看，万安看后羞愧难当，随即辞去职务，从此离开政治舞台。

万安的事情还牵连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对贵妃万氏的处理问题，因为万安跟万氏同姓，所以硬拉了个本家。万贵妃是帝国除了朱见深令所有人厌恶的人，虽然此时万氏已经死去，但是名份还在，官僚们希望新任皇帝朱佑樘将万氏一棍子打死，扒去她的名份。虽然自己也几乎被万氏害死，虽然传说自己的母亲也被万氏害死，但朱佑樘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万氏的问题关乎到父亲的名声。

到了这个时刻，对成化朝的清算已经全部结束，朱佑樘可以开始他的时代。由于成化朝用的一批干部在弘治朝被罢黜，所以弘治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任用一批干部。

朱佑樘首先将太监怀恩从凤阳召回北京仍旧掌印司礼监，人们通常认为司礼监跟皇帝保持一致，但成化朝司礼监在怀恩的领导下对皇帝的掣肘比内阁还要大，结果导致皇帝不得不开设西厂另建一套宦官班子。除了之外，一批正直、娴熟、能言的官吏被委任到重要位置上，他们是吏部尚书王恕、兵部尚书马文升、其他还有像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批人。

整个弘治朝围绕在皇帝身边就是这样一帮正直而又至暮年的大臣，老人政治又一次出现，弘治皇帝对这种老人政治十分偏好，他多次说过处理政事要戒急、戒躁，弘治皇帝将这种守成发挥到了极致。

弘治十八年的确是平平淡淡的十八年，对于文臣来说它是最值得怀念的十八年，但对于后世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确实是没有何事可

记，但我们仍在努力搜索历史的亮点，剥去它那平淡的外衣，我们依然能够发现隐藏在弘治王朝下值得关注的东西。那就是皇帝跟文官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他努力的使自己符合一个儒家的君主形象；他对他的儿子正德极其溺爱，而这种溺爱表面上看无关痛痒，但实际上它直接影响到了帝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走向；弘治皇帝还采纳户部尚书叶淇的建议，废除食盐开中法，实行纳银法；除此之外，弘治朝是个典章编纂的阶段；可以说弘治朝基本上是延续成化朝的特点，这两朝可以看作是明朝前期与后期的一种衔接，从这以后文官更加活跃、商业更加兴起、风气更加开化，成化年可以说是后世的一种开端，而弘治朝却是对大明开国一百多年来的一种总结。

万妃的进逼、生母的早死、生父的不喜这些都使得年幼的朱佑樘在宫中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他甚至不得不经常扮成女孩子来逃避别人的视线。他始终是小心翼翼，做事情是中规中矩，以此来抵消老皇帝对他的不满，但这些除了给他戴上一顶懦弱无能的帽子外，对于事情本身来说只是于事无补，他不知道在被强大的儒家学说笼罩的帝国无人能动摇他的位置，除非动摇他的人想自绝于这个国家。正是幼年的这些经历使得我们这个皇帝常常感到凄苦，他对人对事有了更多的理解，他成为一个宽容和令人好以理解的人，对于别人犯的错误他也常常能够原谅，对于别人的意见他更是虚心接纳。父亲的荒诞他是感受颇深，所以他发誓要做一个令臣民爱戴的好皇帝，并严格遵循儒家规范。

对于几乎令所有皇帝都厌烦的“经筵”，我们这位皇帝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不仅大开经筵，而且还开每天都讲课的小经筵，不仅每天都御早朝，而且还御午朝。皇帝不仅将自己陷入一种桎梏中，还将群臣陷入一种桎梏中，我们似乎发现这位皇帝过份注重一些文章主义和琐碎的小事情。皇帝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获得文官的完全认可，他们反而是步步紧逼，皇帝的一些微小差错也得不到他们的原宥。

我们这位皇帝一生凄苦，童年没有欢乐，成年后更是如此，他希望天下能够在自己手里实现大治，但是弘治年跟正统年一样偏偏又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代，皇帝的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并没有换取上天的宽容。皇帝对于自己的人生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希望下代不要再像他那样度过，对于自己的唯一儿子正德，他希望他能够快乐，而不是像他那样苦闷。

虽然有很多传说朱佑樘跟宫里的其他宫女发生过关系，但明显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他也成了中华帝国史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皇帝，虽然皇后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小儿子后来夭折，唯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自己缺失的东西希望能在儿子身上弥补，所以皇帝对他的儿子很放任，让他自由玩耍。我们这位小皇子天生活泼好动，喜欢踢球，喜欢骑马射艺，作为帝国唯一的皇子，没人对他的正统性产生任何异议，他可以高度的自信，对于他来说世界是阳光的，而不是父亲童年的那种阴郁。但这并不代表朱厚照对父亲的历史一无所知，随着年龄的成长，朱厚照对父亲的过往还是略知一二，对于儒家规范对君主的压制更是洞若观火。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朱佑樘时常左手提着灯笼，右手牵着朱厚照，在内侍的陪同下避开文官的视线，从宫中的角门出去，来逛民间的街市。父子俩其乐融融，更像是一对民间的父子，脱离了皇宫的桎梏，朱佑樘这个时候才展现出他的真性情，他更喜欢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无拘无束的生活着，或许之前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伪装。

一天夜里，父子俩路过六科给事中办公的地方，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给事中们还在这里处理政事，朱厚照大声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弘治连忙摆摆手说：“你小声点，惊动他们就完了。”

“他们不是你的臣子吗？难道还怕惊动他们？”小小的朱厚照对此十分不解。

“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出宫去，第二天言官们的奏章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弘治皇帝无奈的说道。

这一刻，朱厚照明白了皇帝也并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也要受某种规范的约束，而孩童的朱厚照对此种规范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从这一刻起他就有了跟这种规范斗争的决心，跟这种生活方式决裂的想法，朱厚照也成了大明朝第一个挑战儒家行为规范的皇帝。不仅如此，正德年间从皇帝到民间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追求自由而解放的思想浪潮，大的时代终于来临，朱子理学已经是摇摇欲坠。

朱佑樘对正德的放纵终于遭到文官的不满，兵部尚书马文升上书要求皇帝加强对太子的教育问题，不要让他整日跟宦官们在一起厮混，士大夫们已经对这位帝国的继承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希望他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遵循儒家行为规范，朱佑樘终是守住了他的底线，那就是他坚持给儿子留下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希望他将来像自己一样。

弘治八年以后，在自然灾害减轻，治理水患基本结束，一切都步入正轨，并开始欣欣向荣的时候，皇帝上朝便日渐稀疏起来，这些都招至士大夫们的猛烈批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弘治一朝皇帝与文臣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史书上描绘的那么美好，压制了自己真性情的皇帝似乎跟文官们有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微妙东西。

弘治是一个守成的君主，他只想遵循祖宗成法，消除那些违背祖宗成法的东西，以期使明王朝达到长治久安，他无意于推动这个时代向前发展，但这个时代的发展日益依赖的是内生性，而不再外部力量的推动。洪武时代为了解决边疆军队的粮食问题，皇帝让盐商去边疆开展商屯以换取买卖食盐的资格——盐引，但商屯的规模无法跟军屯相比，到了成化、弘治朝，盐引日益被权贵、宦官所垄断，导致食盐无法畅销。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奏皇帝将商人购盐由开中法变

更成纳银法，也就是交纳银两就可以获取买卖食盐的权力，如此以来，盐商们纷纷从边疆回到内地，用银子换取盐引，国库的银子也充裕起来，大的商帮也开始形成。叶淇的盐法改革和宣德年的金花银改革，以及后世的“一条鞭法”一样都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由农耕经济向商品经济跃进的重要事件。平淡的弘治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改革，它跟后世的隆万大改革可以说是“云泥之别”，但对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隆万改革，此次的盐引改革却是事半功倍。

除了盐法改革以外，弘治朝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编修典章。通常一个王朝在建国初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训政，告诫后世子孙如何做，在王朝的前期编修典章是为了弘扬功德，而中期编修典章是为了追寻祖宗成法，以整顿、总结为目的，后期编修典章则以变更为目的。而弘治朝正是处在明王朝的中期，虽然朱元璋对于后世治世自有一套章法，但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祖宗成法似乎已经不适合当今的需要，弘治皇帝为了遵循祖宗成法自然需要系统的对祖宗成法进行强化，为此编修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涵盖了国初一切制度、礼仪、法律，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在这里又被大大强化了。为了对《大明律》进行补充，弘治朝还修订了《问刑条例》，《问刑条例》上面记载的都是从建国到弘治朝的一些判案条例，对于无法通过法条审判的案子可以比照《条例》进行，到了此刻，大明朝开始在司法中引入了律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中国的明王朝得到了巧妙结合。

弘治朝不仅是后世士大夫怀念的一个王朝，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历史爱好者来说也是应该得到尊敬的一个王朝，弘治皇帝的确是个好皇帝，他省吃俭用，削减各种用度；他心系黎民百姓，削减赋税；他治理水患，以工代赈；他清理占田，抑制兼并；他性格宽容，从不打骂官员；他宵衣旰食、披肝沥胆。在皇帝的励精图治下，赋税和人口较前几朝都有明显增长，弘治朝国家赋税收入从二千五百万石增加到二

千七百万石，人口从弘治元年（1488年）的9113630 户增加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10508935 户。

后世人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我们这个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我们的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不仅如此，我们从中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日益依赖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开始兴起，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们的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再是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只会使我们陷入一种狭隘的桎梏中。

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只是因为他们的君主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他们的意志，既然没有衰败，也就不存在什么中兴。弘治皇帝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但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皇帝的个人意志与封建礼法的冲突不是一代君主所能改观，弘治王朝更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是后面的一个开始。

3 被禁止出宫的正德皇帝

历史进入正德年，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拉开帷幕，我们的明王朝终于进入多姿多彩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精彩的人生。虽然它只有十六年，比弘治王朝还短了两年，但它可记载的事情却比弘治王朝多的多，对于士大夫来说，它是荒诞、令人不愿意回想的十六年，但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它却是资料丰富的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从中枢到民间，整个帝国都在跟随那个活泼的孩子一起跳动。

朱佑樘给他的儿子选了三位顾名大臣，他们是刘健、谢迁、李东阳，时人对这三人的评价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侃，这三人都令朱厚照头疼的人物。

朱厚照继位之初也曾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像他父亲那样，兢兢业业、披星戴月，但这明显不符合他的性格，起初他还能坚持每天早起早朝，但随后开展的经筵他再也忍受不了，皇帝自小受到多种类型人的引导，他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不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被迫接受儒生们的絮絮叨叨。皇帝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抵制经筵，终于在正德元年（1506年）他等来了大婚的机会，皇帝以此为借口暂停经筵，此一停就再也没有开过。

皇帝选择配偶的决定权通常并不在自己手里，而在两宫太后手里，正德朝的两宫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室选择未来的后宫之主自有它的一番标准，这个人的家世不能太显赫，她也不应该太漂亮，她更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她甚至不需要有才，她只需要形态端庄，身体壮硕能生孩子即可。对于我们这个帝国来说，皇后跟他的丈夫一样只是执行礼仪而存在，或者还要执行生儿子的义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看不到皇帝和他的配偶之间的爱情存在，皇帝如果不喜欢他的皇后，宫中还有无数的宫女，无论是其他妃子还是宫女选拔的标准都跟皇后一样，皇帝在这个死寂寂的宫里没有任何新鲜感。

虽然朱厚照大婚了，不仅娶了位皇后，还连娶两位妃子，但这三个女人都令朱厚照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令人厌烦的文臣，另一方面是令人毫无感觉的女人，朱厚照此刻切实感到了做一个皇帝无奈，他就像一个囚徒，一个被锁在深宫中的囚徒，但朱厚照明显是有想法的人，他不愿意就这样认命，他希望能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从1506年的8月份开始，也就是他大婚之后，他便开始跟太监厮混在一起，他们在皇宫里骑马、射箭、踢球，皇帝是个很灵光的人，他懂音乐，甚至还对梵文有研究。从这个月开始皇帝时常化装跑出宫去，在宫外的街肆流连，酒馆、赌坊、妓院都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尤其是在妓院里看见各色女人，令他大开眼界。

九月份，皇帝与文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爆发的原因却是前面几朝都不存在的财务问题。

本朝宫中每年开支都是定额，朱厚照登基后开始大手大脚花钱，登基、大婚、庆典，还有数目庞大的其他花销，以及对身边玩伴的赏赐。朱厚照登基不到一年便感到手头紧蹙，便让户部拨钱，户部自然不给。眼看没有钱用，朱厚照再怎么折腾也还是不行的，看来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

朱厚照让户部的官员想办法弄钱，户部的官员只是让朱厚照厉行节约，提不出来什么能弄到钱的法子，户部官员们弄不来钱，太监们弄钱的路子却一条接一条，朱厚照这个时候发现身边的这些宦官们真是不得了。

宦官们搞钱的方法都是绕过户部，到地方去设卡抽商税，去找免税的皇庄要钱，这些措施无疑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对于这些文官们来说只有免税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理念，增税是万万不能的，从洪武开国起，除了崇祯年，本朝的税收只见减少，却未见增加。这种情况却是在人口、田亩、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儒家的桎梏在这里又一次显而易见。

而这次皇帝与文官矛盾的第一次爆发就是由宦官弄钱引起的。明代户部每年会给宦官一定数量的盐引，让宦官购买食盐去贩卖，实际上是在潜规则下给皇帝增加些收入，虽然这不符合规制，但社会的运行自有阴的一套和阳的一套，表面上的谓之阳，私下里谓之阴，阳的可以不去遵守，但阴的就必须要去遵守，否则人们会认为你拎不清。

眼看发生了财政危机，朱厚照突然想起一事情来，户部还欠宫里12000盐引，如果把这部分盐引要过来，又是一大笔钱，想到这里朱厚照非常高兴，便让太监去要。太监在户部那里吃了闭门羹，户部不给，消息传来朱厚照懵了半天。他发觉了一个奇妙的东西，主宰天下的自己在这个国家中连讨要盐引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到，朱厚照终于愤怒了，摊牌吧，这个小牌迟早要摊。

更令朱厚照感到惊讶的是，文官们比他还要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急不可耐，仿佛等待了许久似的。先是给事中陶谐、御史杜旻、邵清上奏书反对，接着天上出现流星，南京的官员们又以此上书要挟，然后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集体上书指责宦官乱政，这些人仿佛是商量好的，朱厚照自然认为内阁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是幕后指使者。

明武宗大发雷霆，他将对内阁的怨恨发泄到户部身上，眼见如此户部官员拿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给6000盐引，朱厚照的怒火依然没有熄灭，自己是皇帝，居然被文官讨价还价，他将内阁三巨头

招了来，要好好问问他们。刘健、李东阳、谢迁态度依然坚决，他们抬出祖制来压朱厚照，并一口咬定宦官拿着盐引干不了好事，朱厚照被激怒了，他驳斥道：“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十人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①朱厚照的这番话可以说已经是对帝国文官的全盘否定，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回去后集体上了一道奏折以辞职相威胁，朱厚照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的决定，同意了户部提出了只给一半的提议。

发端于正德元年的这场盐引之争似乎只是正德年间的小事件，但它却成了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之后，君开始视臣为仇寇，由于儒生的偏执与跋扈，帝国的政治终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越至晚明这种政治上的死结表现的益发显性，这不是偶然因素带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道德思想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不合拍，它不仅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反而成了这个时代发展的羁绊，我们暂时不去探讨这些大话题。我们知道君主随意使用钱财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这只是其中一种。成化朝虽然给官僚政治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但成化朝的文官还未能成型，他们跟三杨一样跟君主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贵族的羁绊、文官的踟蹰都使得此时的文官政治既决然又虚弱。但弘治朝皇帝的羸弱使得官僚跟君主之间的联系被完整的切割开来，官僚日益成为一个独立而又张扬的整体。

锦衣卫钱宁功夫了得，他能双手开弓，他还能经常给皇帝引荐一些新鲜玩意儿，不知从哪里经常弄来一些豹子、老虎，皇帝非常喜欢钱宁，此时的钱宁俨然成了豹房总管。

1512年的战争结束后，钱宁给皇帝引荐了一个新人——江彬，江彬是宣府的一名把总，此次平叛江彬也在征调之列，江彬作战勇猛，但劣迹斑斑被文官多次弹劾。不知道江彬如何与钱宁认识，钱宁

将江彬的故事讲给朱厚照听，说江彬在淮河与叛军作战的时候，面部中箭，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朱厚照听完大为崇敬。

钱宁将江彬带到豹房来了，当江彬来到豹房后，人们发现武功已经不是他的强项，他的强项是讲故事。这位江彬绘声绘色向朱厚照描述战斗中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朱厚照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草原上带兵征战的那种景象在年轻的朱厚照心中产生神往。他开始沮丧自己是个皇帝，为什么不是个将军。除了会讲故事，江彬对军事管理也有一套，他向皇帝详细分析了此次平叛的得失，表达了国家的军事体系急需改组的事实，对于此，皇帝也是感同身受。江彬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将京营与边军互调，将少量边军调往京畿，巩固京畿的防务，然后将部分京军调往边关加以历练。皇帝对于江彬的提议非常赞同，当年底，皇帝便着手此事。

此事遭到了李东阳的激烈反对，他说京军缺乏实际战斗经验，难以抵挡蒙古人攻击，而且边军难以约束，如果调到京城来会影响京城的治安，李东阳拒绝起草调动军队的命令。而皇帝却绕过内阁和兵部直接发布诏令调动军队，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祖制，更是违反了文官统兵的制度。

本来明王朝各地的边军由总兵统领，调兵权在兵部，皇帝能直接调动的只有宦官统领的京营，也就是禁军，对于边军皇帝并无直接调动的权力，但正德皇帝却轻易打破这一制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皇帝试图排除文官的又一次尝试，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拉近本已疏远的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李东阳又一次以辞职抗议，皇帝仍是没有批准他的辞职。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3000名宣府边军奉命调至京城，皇帝将他们搞到北京城内，拆毁了皇宫西边的一些房屋，这些军队挨着豹房住了下来，朱厚照将这支军队视作自己的私人军队，从此他又有事情干了，

那就是看这支军队出操、训练，看江彬如何排兵、布阵，他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皇帝完全将这里模拟成了战场，他身批甲胄巡阅三军，他还搞来一些帐篷搭在那里，他宁愿住在帐篷里而不愿意住在行宫内，他认为住在帐篷里才有战场上的真实感觉。皇帝需要敌人，没有敌人就体验不到真正战场的感觉，他让人将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豹子放了出来，朱厚照手拿武器亲自跟这些野兽搏斗，江彬站立在一旁，一旦发生意外他好出手。意外终是发生了，朱厚照被老虎的爪子抓伤，朱厚照终于歇了下来，他明白再这么折腾下去迟早会把小命折腾掉了。

皇帝并没有完全歇下来，虽然暂时不能进行军事活动，但还能进行其他活动。不久，朝中大臣就听说皇帝经常在京城不该出现的场所留宿，群臣纷纷上书要求朱厚照对此做出解释，皇帝自然是置之不理。

豹房的帐篷内不仅有甲胄，而且还有炸药、佛朗机火炮，这些炸药依然是军事演习用的，北京城内的居民不仅能听见战马的嘶鸣声，而且还能听见隆隆的炮声，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皇帝喜欢花灯，豹房内到了夜晚到处都是悬挂的花灯，照的整座行宫亮堂堂的，事故发生在新年的灯节那天，京城的居民都听见了巨大的火药爆炸声，整座紫禁城的上空弥漫着黑色的硝烟，接着便是冲天的大火，整座豹房被点燃，几座宫殿被烧毁，朱厚照看着这冲天的火光说道：“好一棚大烟火也。”

此事又引来言官的激烈弹劾，朱厚照对付文官也有办法，他经常对官员说要举行重大活动，然后让这些官员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甚至是一天，或者半夜将这些官员叫出来接见。朱厚照的荒谬举动令文臣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他去城南的南海子皇家猎场打猎，将猎获的猎物作为他的战利品分给文官，文官们拒绝接受。

朱厚照早已厌倦了北京城的生活，江彬劝他到宣府居住，那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且宣府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有比北京城更多的乐师和漂亮女人，最重要的是那里可以看见真实的军队跟蒙古骑兵的战斗，朱厚照早有此想法，但问题是如何出去。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我们的皇帝换上便服，带着几个随从骑马从德胜门溜出北京城直向昌平奔去，文官们很快知道了情况便骑马火速追赶，半路上追上皇帝，官员们生拉硬扯，朱厚照就是不愿意回去。

虽然摆脱了文官的纠缠，但当朱厚照抵达居庸关的时候他傻眼了，无论他如何喊门，守关的御史就是不开门，无论他如何在关下声明自己是皇帝，守关御史就是不承认他是皇帝。无奈之下，朱厚照只有返回京城。

一个月后，朱厚照打听到那位守关御史近期要出关巡视，便和随从乘夜急速逃出北京城，经过四天四夜的急速行军，皇帝终于抵达居庸关下，此时那位御史还没有出关。皇帝和他的随从便在附近一个农民家里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御史终于出关，朱厚照火速出关，临行前将谷大用留下镇守居庸关，并交待了谷大用一件事情，那就是对于任何试图从这里通过的文官都不要开关放行。

皇帝这回彻底自由了，他跟文官彻底脱离了关系，哪怕这种脱离只是一种短暂的脱离。宣府虽然已经到了长城边上，但这里的繁华与热闹却丝毫不亚于内地，甚至比内地尤胜，把个朱厚照乐得喜不自胜。不久，宣府一带出现了一款名叫《游龙戏凤》的黄梅戏，戏中讲述朱厚照在宣府梅龙镇游玩，来到李龙客栈，朱厚照被李龙妹妹李凤姐的美貌所倾倒，便开始出手调戏，李凤姐巧妙应对，让厚照欲罢不能，夜里两人随即睡在一起。

朱厚照到宣府来不仅是为了吃喝玩乐，更主要的是要找蒙古人练练拳脚。正统年间，瓦剌的也先强大起来，但随着也先被杀，瓦剌式微，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又开始在草原上雄起。从成化年间起，鞑靼部进入河套，经过成化、弘治两朝的不断战争，蒙古人又断断续续退出河套。正德朝鞑靼部在达延汗巴图蒙克的带领下不断袭扰宣府，这个巴图蒙克明人又称他小王子，属于黄金家族成员，而朱厚照要对付的就是他，这是黄金家族和朱明后裔的一次面对面的互搏。

京城文官不仅被限制进出居庸关，而且被限制离开京城，不久，文官们收到边关一份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名义要求调兵和征集粮草准备打仗的命令，文官们都被搞懵了，他们不知道所以然。这位朱寿是谁？威武大将军是谁？但人们很快反应过来了，他就是皇帝本人，皇帝自己封自己为将军。

皇帝来到宣府不久，小王子带着五万骑兵开始向大同逼来，皇帝亲率增援军队向大同驶来，宣府和大同的明军会合在一起达六万人，双方皆向大同府应州县汇集。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二十一日应州会战爆发，双方主力从清晨战至傍晚，明军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永乐时代似乎又回来了，朱厚照骑在战马上抡着战刀跟着他的士兵一起砍人，眼见皇帝跟着自己一起冲锋，这些明军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战斗至傍晚，小王子不敌，便带着军队退出了战场。

应州一战使我们的这位皇帝荣耀到了极点，他的人生理想终于得以实现，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居住在紫禁城的无聊皇帝，而是敢在战场上冲锋的将军。

随后皇帝返回了宣府，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皇帝才决定返回京城。他下令在京的所有文武百官皆去城门外迎接，皇帝的军队于半夜到达德胜门外，已经在寒风中守候一整天的文武大臣已经不堪其负。皇帝兴致盎然的回到京城，他亲口对官员们说自己亲手杀死一名蒙古

人，文官们拒绝承认此次的应州大捷。虽然皇帝不断坚称真的有一位威武大将军朱寿，而且他就在军中，此次应州之战全凭这位朱寿指挥有方，但文官拒绝承认有这么一位人。皇帝下令封这位朱寿为镇国公，年俸5000石，全体文官昏倒。

回到北京的正德才知道京城的日子是多么无聊，堆积如山的奏章等待他批阅。由于此次朱厚照是偷偷出城，而且还将官员们禁锢在京里，更为严重的是他亲自带兵上战场去跟蒙古人搏杀，现在皇帝回来了，正是文官们找他算总账的时候。

无独有偶，二月份，成化皇帝的配偶太皇太后王氏离世，官员们逮住这个机会，一会让皇帝这样，一会让皇帝那样，搞的个正德皇帝不甚其烦。到了行大礼那天，由于前一天天上下雨导致广场上积水，皇帝便让众大臣鞠躬免跪，此举激怒了众人，群臣纷纷上书指责皇帝有违孝道。到了给太皇太后送葬那天，皇帝将灵柩送到了昌平，安葬在宪宗身边，但他乘此机会跑到喜峰口找了朵颜卫的几个蒙古族首领喝酒。文臣们彻底疯狂了，他们纷纷指责皇帝以送灵柩之名，行巡幸之计，其中有一位叫舒芬的状元，响起了惊天一炮，被文臣视为楷模。

舒芬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正德十二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舒芬为人极为孝道，被人视为孝子楷模。嘉靖年间，其母病逝，舒芬扶柩辞官归乡，后来因其母辞世竟忧伤而死。不仅如此，舒芬为官清正、心胸宽广。一次他家的邻居建房，将墙建在他家的地基上，家人写信让舒芬出面干涉，舒芬写了一封信给家人，信中只是一首诗。

千里捎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自然明白舒芬的意思，主动让出了三尺，他的邻居听知此事，也让出了三尺，至今在舒芬的家乡仍然有这样一条窄窄的六尺巷。“舒芬让墙”和“孔融让梨”一样成了华夏的经典典故，这些典故也彰显了华夏的品德。虽然舒芬对邻里的纷争能够宽容，但却对皇帝违反儒家的孝统不能宽容，士大夫心中自有一把尺度，他们知道哪些方面能够宽容，哪些方面不能够宽容。

舒芬上了一道激烈的《隆圣孝以答人心书》，在这道奏书里舒芬从孝道、天理、人欲三个方面跟皇帝辩论孝道，并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所为有违孝道。舒芬的这一行为我们无法做出恰当的评判，皇帝在祖母丧葬过程中做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我们也无法做出道义上的评判，我们只是知道伦理道德在我们这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行为准则，高高在上的皇帝尤其要遵循这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已经和法律一起成了评判事实的根据。

舒芬的这篇文章跟海瑞的那道《直言天下第一疏》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但与嘉靖皇帝不同的是我们这位皇帝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可怜状元郎熬了一个夜晚写出的华彩文章就这样静静的躺在宫殿的角落里。

虽然舒芬的上书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正面回答，但它很快在朝堂上掀起波澜，这位状元郎很快成为帝国的楷模，无数的士大夫奉其为榜样。六部、翰林院、大理寺、行人司、通政司、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的奏书纷纷砸来，在大明朝文官与皇帝的斗争中，职位低的官员尤其起劲。这些官员们不仅给皇帝施加压力，也同时给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蒋冕领衔上书。而这个时候，

皇帝由于着了风寒，正在卧床不起，这是一个信号，它表明我们的这位皇帝在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虚弱到连偶然的感冒也受不了。

挨到皇帝身体好些的时候，能够下床理政的时候，文官们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要皇帝下罪己诏，就差没让皇帝下台了。我想皇帝这个时候大约对刘瑾是怀念的，他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群人是不能得罪的。

皇帝终于忍受不了群臣，挨到1518年7月份朱厚照带着随从又出去了，临行前给杨廷和留下敕书交待了一下，皇帝此次是要去巡边了。皇帝带着一万人的队伍从宣府出发沿着长城外沿行走，皇帝跟所有人一样风餐露宿，他欣赏着大漠风光，但无人领略到皇帝凄苦的内心世界，此次巡边，皇帝虽然出来了，但他的心还留在京城，留在那帮文官那里。皇帝此次出塞心境与上次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没有了那种意气风发，皇帝与文官们的间隙已经种下了，从此大明王朝的政治已经陷入一种死结。虽然儒家思想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但这已经是一个儒学已死的年代，在以后的岁月中甚至需要引入部落民族的新风和西方文化的新风来荡涤儒学的桎梏，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死结，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死结，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文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一个死结？它跟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复杂有关，一方面它需要一种伦理纲常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以道德行为规范来统驭全局，另一方面它也需要人性的自由、奔放来维持政治与文化上的活力，它们之间是矛盾的，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两面性，更体现了文化上的两面性，当后者过强的时候则不存在问题，一旦后者过弱则会陷入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新旧思想开始激烈的碰撞，君臣开始博弈，帝国的大厦开始摇摇欲坠，越至晚明，这种景象越发突出。

皇帝此次的巡边走了1000多里路，他详细察看了沿长城各处的隘口和兵力部署，最后抵达了陕西省延绥镇榆林卫，经过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士兵死亡、逃跑甚多，减员十分严重，但皇帝始终如一，他跟士兵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这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此后这种情形再也不可能出现。此次巡边由于离京师太远，在视察完榆林卫后皇帝便开始返回，回程途中路过太原府，皇帝住进了晋王府中，在这里他邂逅了一名名叫刘良女的歌女，传说这名女子是晋王府乐工杨腾的眷属，皇帝喜欢上了这位刘良女，并将她带回了北京。

正德十四年二月皇帝回到了阔别七个月的北京，在回程途中他大概不会郁闷，因为他带着一名心仪的女子，在皇帝巡边途中对于重要的奏章，内阁也是快马加鞭送给他批阅。

至此，皇帝跟北部边疆的那种缘分已经结束。他的理想是能像先祖那样能勇敢的踏入大漠，能跟将士一起同甘共苦。到了正德年，由于勋贵阶层的没落，皇帝对于战场的生疏，这些都使得皇帝与他的军队日益疏远，早在成化、弘治年间，皇帝就想带兵出征，但官员们向皇帝阐明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皇帝这才作罢。但到了正德年，朱厚照冲破文官们的羁绊，再次恢复了祖先的那种武功，对于此我们仍很难做出评判。皇帝的个人行为于国家来说作用并不大，但对于正德本人仍是要值得肯定与赞扬，他行程千里，不畏艰苦，他敢于亲临战场跟蒙古人拚杀，后世的皇帝已经不可能像正德这样了，他们都被牢固的禁锢在宫中，终身不出北京城。

另外，皇帝亲自参加的应州之战减缓了蒙古人对宣府、大同的压力，而且应州之战既不像朱棣亲征那样找不到北，也不像朱祁镇那样窝囊，完全是在皇帝的带领下双方酣畅淋漓的一场战斗。我们无法说

正德皇帝有多么伟大的武功，但皇帝的敢想、敢为对于后世之君来说的确是值得他们敬仰的。

皇帝之所以巡边这么久，不愿意与文臣见面是一个原因，因为当他从边疆回来后，他又变着法的想出去，北方已经游历遍了，这回要去的是南方。

几乎就在我们这位主回到北京的同时，内阁大臣就知道他仍要出去，因为当杨廷和将朱厚照丢给他让他处理政务的敕书还给他的时候，朱厚照说，你拿着用吧，以后还有用，这就表明这位皇帝还是要出去。

不久京城就流传着皇帝要南巡的消息，这大概是朱厚照对身边的人表达了这个想法，然后由身边人走漏了出去。

去南方看看，去南京看看，去祖宗的陵墓看看，这大概也是厚照内心许久的想法，所以当他从北部边境回来的时候，他觉得是时候往南方走走了。此时帝国的南方并不平静，流民问题依然存在，刘六、刘七的余众仍在作乱，坊间又盛传封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要造反，朱厚照也想亲率六师予以震慑。

大臣们对皇帝的此次南巡表现出了坚决的抵制，南方乃大明赋税重地，他们害怕皇帝在南方又搞出什么名堂，踢破了这个钱罐子。皇帝在蒙古死了还可以再立一个，钱罐子被踢破了可不好修复了。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和礼部尚书毛澄首先上书反对，他们的这种反对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接着是科道官员，科道官员的声音依然像放屁一样。明王朝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对江南数省的保护尤其严密，一旦这几省发生动乱影响到了明王朝的赋税，大明王朝倾时便会倒

塌。此次文官们之所以要阻止皇帝南巡就是害怕皇帝到南方去搜刮、勒索引起民变。

既然普通的上书没有效果，那就要变个花样玩，自从皇帝南巡的消息出来后，所有的官员都像疯了一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十三日，科道官员就开始了下跪请愿活动，这在大明朝虽然是第二次，但以后这样的活动会经常发生。皇帝让内官出来劝官员们回去，言官们从早晨一直跪倒下午才散去。

而从十三号这一天，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内阁转移到低级官吏，这种转移并不是在南巡这一件事情上的转移，也不是在正德一朝的转移，而是在整个大明王朝的转移，而低级官吏与皇帝的斗争面积更大，铺天盖地而来，旷日持久，对帝国政治的伤害也更大。

皇帝与官员们已经进入僵持阶段，内阁的大学士们，六部的尚书、侍郎们仍旧保持沉默，让低级官员在前面冲。很快，上书反对南巡的低级官吏达100多人，跟那些老成持重的内阁大臣相比，这些年轻的官员说话更直截了当、毫无遮掩，他们直接向皇帝指明现在朝内朝外都是蠢蠢欲动，有的人想谋权，有的人想上位，如果皇帝继续一意孤行，到时候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正德年号在历史上也会跟建文年号一样被革除。

明王朝的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怪圈，它不再是由个别优秀的官僚把握，而是进入官僚集体掌控的阶段，遇到集体联名的事件，如果你不参与其中，就会被视为异类、甚至叛徒，进而受到同僚的排挤，从此，你的仕途也就中止了。这种政治越来越像一个紧箍咒一样，它不仅将皇帝禁锢在其中，更是将全体文官禁锢在其中。

面对着这滔滔而来的奏书，皇帝憋着一肚子火。“我上次生病，没有一个人出来问安，一旦想出去转转，你们这些人就像疯狗一样来咬

我。”皇帝这样表达了他的意思。江彬这些人乘机在旁扇风点火，指出这些人都是在沽名钓誉，又说南方形势不稳，正需要皇帝出去弹压。

朱厚照命令将带头上书的几个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其他100多人全部在豹房外连跪五天，每天上班时间由自己的上司领来，中午回去休息一下，下午接着跪，下午下班的时候再由本部门负责人领回。第二天，皇帝又让关进镇抚司的几个人带枷跪在那里。

这时候各部的高级官员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免除对官员们的处罚，朱厚照依然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求情的人也跪在那里。这个时候，越来越多没有被罚跪的官员主动加入罚跪行列，并以罚跪为荣。紫禁城的气氛达到了新的高潮，官员们相互支援、相互呐喊，豹房里的朱厚照恨的牙痒痒。

三月二十五日，五天的罚跪期终于结束了，朱厚照又下令对着100多人廷杖，每人各杖50，这次廷杖当场被打死2人，随后有11人因伤重而死，官员们的嚎哭声响彻整座紫禁城。官员们的嚎哭声是在表达对朱厚照的强烈不满，听着这嚎哭声，朱厚照的内心寒到了极点。

朱厚照不明白这些整日絮絮叨叨的文官们为何不惧生死，他也不明白文人们读书求仕就是为了心中的理想、抱负，搏个青史留名。

文官们的行为得到了全体市民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被感召，商人开始罢市，它像我们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们这个帝国到了16世纪早期就已经离市民运动不远了。

皇帝开始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果再这样下去面对的不仅是这些士大夫们，而是滔滔而来的民众。皇帝只得取消南巡计划，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我们的宁王造反了。

宁王的反叛使得皇帝有了充分理由南巡，到了这个时候，群臣们再也无法阻止。此次前往南方平叛正是建功立业的机会，不仅朱厚照十分兴奋，就是他身边的人也跃跃欲试，朱厚照随即颁旨让“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统帅六师前往平叛。

大军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二十六日出发，当行至河北涿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前方传来邸报，宁王叛乱已经被一个叫王阳明的南赣巡抚平息，宁王本人也被活捉。正德看到这张邸报，心情顿时跌入冰点，正德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要说还是正德脑筋灵活，叛乱平息了也没什么，继续往前开。

接着便抵达保定府，由于南方的叛乱已经被平定，所以大军不用赶那么急，众人便在保定这个地方歇了下来。朱厚照听说当地巡抚伍符能饮酒，便和他抓阄，朱厚照抓不过伍符被连灌了几大碗，他便把抓来的阄扔到地上让伍符去捡，捡起来的阄当然算输，伍符连连喝酒，朱厚照十分高兴。

离开了保定，大军行至山东临清，临清位于运河边上，南北客商、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里有鳞次栉比的商铺、人满为患的酒馆、人声鼎沸的赌场、曲径幽深的青楼，把个朱厚照乐的手舞足蹈。地方官员对于皇帝的南巡本就颇有微词，如今皇帝来了自然比较冷淡，朱厚照看着那简单、草率的酒席，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吃的很开心。

皇帝已经决定从临清坐船沿运河南下，便亲自驾着一条小船去京郊的通州接刘良女，待到刘良女接到，又在临清玩了十几天，如此一来前前后后折腾了四五十天，于十月二十二日才从临清出发。

十一月十五日船队抵达淮安清江浦，皇帝驻跸在宦官张阳家中，在这里皇帝开始捕鱼、打猎，获得的猎物赐给当地官员，但要当地官

员拿银子来换。十二月一日，皇帝抵达扬州，接着便要去南巡的重心南京，可就在要去南京的时候又出事了。由于此时已到了月底，北京来信催皇上回去主持明年正月的郊祀大典，随行的大学士梁储、蒋冕也不断催促。皇帝说我们去南京搞郊祀，我大明不是两京嘛，南京也是京城，为什么不能在南京搞，非要在北京搞。

大臣们自然也有办法对付朱厚照，他们说南京郊坛跟天地配位的是朱元璋和他的父亲朱世珍的灵牌，而北京郊坛跟天地配位的是朱元璋和朱棣的灵牌，如果在南京搞郊祀等于把都城又迁回南京了，如此以来，可能又有人要造反。说到造反，便将朱厚照吓住了，这件事情就这样被暂时搁置起来。

朱厚照在扬州过的并不开心，当地官员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好东西不让他看见，好玩的地方不带他去，好酒、好菜也没有，民间颇有姿色的女子也主动藏匿起来。到了临行的前一天，扬州的官员们置办了一桌像样的宴席，并请来歌妓唱曲。朱厚照颇有兴致的听完了曲，但宴席并没有动，他知道这顿宴席官员们花了些银两，便对扬州的官员们说道：“这桌饭菜你们花了多少银子，就把这桌饭菜置换成同等数量的银子送过来，就算是你们对联的孝敬。”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厚照渡江抵达南京，他终于来到了大明朝曾经的首都，他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很多血雨腥风、同族残杀的故事，他抚摸着斑驳的宫墙，感受着历史的召唤。南京这里有着跟北京一样的一套班子，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通政司、都督府、内廷各司局，数目庞大的太监和宫女，而且他还带着两名内阁大学士。南京，在这一刻又短暂成了大明朝的首都。

皇帝休息了几天，便在南京过了新年，正月初一这一天便去明孝陵祭祖。皇帝在南京一直待到正德十五年的闰八月，本来计划还要去

苏杭、湖广周游，但皇帝决定回京了。出来已经整整一年，皇帝的南巡是自己付出很大代价硬出来的，一路上官员的冷淡也令正德颇有感触，在南京停留期间，似乎有人对朱厚照发出警告，让他回去。有人将绿色的猪头扔到了朱厚照的寝宫内，在牛首山游玩的时候，不知是谁，将皇帝劫持了一个夜晚。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巡游下去已经没有意义。皇帝此次的南巡并不似表面上那么风光，他显得心事重重，官员们不断的威胁，藩王的造反，身边人的难以捉摸，这些都使得朱厚照对局势担忧起来，还是早日回京吧。

朱厚照临行前来到明孝陵向老祖宗辞行，然后沿着来路北上。北归途中，朱厚照来到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的家里，杨一清跟朱厚照谈了一个夜晚，杨一清告诉皇上，在你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如果继续这样一意孤行，人们就会废了你。杨一清的话令朱厚照冷到了极点，他什么也不想再说了，皇帝继续北上，他又来到淮安清江浦这个地方。皇帝开始独自划船游玩，此时已经是黄历九月天了，前面有个闰八月，按西历推算则是十一月份，也许是天气的阴冷，加上皇上一一直心神不宁，所以驾船不稳，船翻落水，后面跟着的侍卫赶紧跳入水中将朱厚照救了起来。

朱厚照被救起来后开始一病不起，他患了感冒，而且这种感冒引起了肺炎，皇帝开始咳嗽。我们的皇帝虽然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但他实际上孤独、焦虑。文臣们的恐吓、身边人的阴晴、子嗣继承问题都深深困扰着这位皇帝。

船队在运河上再也没有停留，而是直奔运河的终点——通州，皇帝的行驾在这里不动了。朱厚照离境已经一年多了，京城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不清楚，他不敢贸然进京。皇帝在这里发布诏令，将跟宁王平日有来往的官员、宦官、锦衣卫一一抓捕，接着又命令在京各

部院的正职、高级宦官、皇室成员、驸马勋贵全部赶往通州见驾，皇帝在通州发布了对宁王以及跟宁王有关联人的处理意见。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十日，正德回到了阔别一年半的北京城，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对于朱厚照来说却恍如隔世，皇帝的内心世界已经来了一个大迂回，他早已经不是那无忧无虑的孩童。宁王家属以及受牵连官员的家属数千人身着白衣跪于皇帝车道两旁，然后在午门举行献俘仪式，宁王被一条白绫踢死，首犯十多人被斩首，其他包括家属在内的数千人发配边疆。当这些犯人和犯人家属身穿白衣，被绳子拴着从城门经过的时候，全城的百姓都来观看，一片白茫，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没人会替他们叫好，也没人会替他们感到可怜。

宁王一事虽然已经处理完毕，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但还有更棘手的事情在后面，那就是子嗣问题。当年景帝的太子逝世以后，官员们就劝皇帝过继一个儿子放在身边准备着，如今正德皇帝又面临这个问题，虽然官员们早就不断暗示皇帝从近亲旁系中找一晚辈放在身边以备不测，前面提到的状元舒芬的上书，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文官抗议上书都提到了此事。但那时候的朱厚照身体还好，再加上他的心思都在巡幸上，对此事并不上心。现在不行了，自从落水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此次回京后这件事情已经提上日程。

我们老祖宗规定的很多东西都有他的道理，皇位和爵位继承规则为什么是嫡长子？因为他可以明确继承规则，减少动乱。皇帝为什么要早婚、早子，因为只有早婚、早子才能令天下臣民安心，一旦帝王无子嗣，天下的藩王都会蠢蠢欲动，宁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古代王朝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郊祀，郊祀是祭天，祈求上天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绝不是走形式，古代农民靠天吃饭，王朝也是靠天吃饭，一旦气候不好，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流民四起，一

方面要进行赈济，另一方面税收也会减少，如果黄河泛滥了，还要组织大批的人手、调集巨额物资、花费巨额钱财进行修理，持续的自然灾害甚至会摧毁一个王朝。

郊祀那天皇帝只跪了一下就伏在地上不动了，唱诺官唱了一下等待皇帝起来，皇帝始终没有动，众人连忙过去将皇帝扶起来一看，只见地下已经一滩血迹，郊祀被迫终止，皇帝在郊祀的殿中休息了一宿，第二天才回去。

其实早在几年前，太后张氏就已经开始物色继承人选。这个继承人首先必须要在血缘关系近的宗支中选，跟朱厚照血缘最近的就是四叔朱佑沅，成化皇帝的老大、老二都早死，弘治皇帝是老三，按照嫡长子继承规则首先要考虑的是老四这一支子。此时的朱佑沅已经死去，朱佑沅的长子朱厚璉进入了帝国的视野，实际上只要朱厚照没有子嗣，这个位置就是他的，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的祖宗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庞大复杂难以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制定了规则化的继承机制，任何人都要遵守祖宗成法，你不要试图去打破它。朱元璋这么多子孙，如果人人都能继承皇位，岂不是天下大乱。

继承人早就选好了，不管朱厚照知道不知道，同意不同意，这是帝国的决策，这是华夏的伦理。兴王朱佑沅封在了湖广安陆州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县，从这个时候起，京城与安陆的联系也频繁起来，朱厚璉在三年的服丧期未滿就提前继承兴王位，为将来的入继大统做准备。所有人都知道这点，朱厚照也知道这点，大家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我们还有疑问，如果朱佑沅不死他有没有继承权，如果朱厚璉有儿子，他的儿子有没有继承权。我们的继承规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皇位只能往下传，不能往回传，而朱棣的“靖难之役”，朱祁镇

的“夺门之变”打破了这种继承规则，都属于政变性质。了解了这些，我们就知道假如我们的假设成立，朱厚璉的父亲和朱厚璉的儿子都没有这种继承权，如果朱厚照将朱厚璉的儿子或其他宗室的儿子过继过来则又另当别论。

既然所有的事情都已确定，再无悬念，也就无人关心皇帝的病情，只是将他一人静静的搁在豹房等死。世事皆如此，人情皆如此，皇帝也不能例外，当你轻贱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轻贱你，当你失势的时候就应该独善其身，不要要求别人怎么样，也不要往人多的地方跑。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三日夜间，正德皇帝风雨飘摇的生命在豹房中结束了，临行前，他将身边的两名低级宦官叫过来说道：“转告皇太后，国家大事还是要跟大臣们多商议，过去有些错事，都是我做的，跟你们这些人没有关系。”

30岁的皇帝就此离世。

4 儒家体制下绝望而荒诞的君主

明史学家李洵认为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那个时期绝望贵族的代表，他的身上有着16世纪中国贵族的气息。

经历国初那段峥嵘岁月之后，贵族这个群体开始没落，后世子孙已经不可能像他们先祖那样在战场上立功，但同时也被限制进入科举和经商行列，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每年从朝廷那里领一定数量的禄米或者从自家田产那里收一些租粮，过着寄生的生活。只有当朝廷需要出兵征战的时候让他们带兵出征，朝廷需要派人去地方颁布旨意的时候让他们充当钦差，或者让他们充当外交使节出使他国，再或者让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究是这种礼仪性的工作也是他们这个群体中的极少数人能够享有。在这种情况下，勋贵阶层加上宗室阶层从出生那天起就过着等死一般的生活。

不仅他们如此，就是皇帝也是如此。皇帝已经像一个紫禁城的囚徒，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淹没在儒家经典和行政礼仪的汪洋大海里，皇帝也是苦闷的，是绝望的。无论是贵族还是皇帝都要在这种日复一日机械的生活中寻找一些值得消磨生命的东西。

朱厚照虽然贵为皇帝，但他实际上也是16世纪中国贵族阶层的一员，他具备这个团体的一切特征。他不愿意住在皇宫里面，他喜欢跟太监、武官在一起厮混，他迷恋寡妇与妓女，他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当时就有人指出皇帝可能已经神经错乱。当文臣们满足不了他的要求的时候，他经常拿起一把刀子要自杀。朱厚照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在16世纪初叶的中国，从贵族到市民阶层，从庙堂到民间都弥漫着一种冲破封建礼教的氛围。皇帝和民间的那些思想家们一样，都是在新旧两种体系中苦苦挣扎。

贵族的没落、士大夫们的偏执、思想家们的奔放、市民阶层的奋发构成了我们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正德时期仍是沿着成化朝的惯性往前走，社会管理日发松动、商业日益蓬勃、思想领域步入怪诞，所有这一切似乎显示出了超前发展的特征，我们这个社会仿佛进入失控的阶段，但封建伦理秩序仍然牢固，它仍然牢固的维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对于正德一朝以及皇帝本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正德朝总体来说仍是沿着成化、弘治的脉络向前运转，虽然发生了一些新的特征，但还不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变革。皇帝的荒诞与嬉戏只是没落贵族的一种反弹，抑或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叛，对于皇帝来说，“大将军”带给他的成就感要远远超越做皇帝本身。

皇帝的这种荒诞并没有给帝国本身带来什么，实际上是无关帝国痛痒。在如何评价正德一朝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对于人或事不能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或者其他细枝末叶方面来评价，而是要从整体或者更为宏观方面来看待。正德喜欢巡幸也好，宠幸佞臣也好，或者喜爱玩弄女性也好，都不会给我们这个王朝带来任何影响，它既不会使后世君主奋发有为，也不会使后世君主消沉糜志。

皇帝虽然表现出了与前世君主迥异的特征，但他仍然勤政，他在巡边途中也在批阅奏章，他对军事问题很感兴趣，他亲自躬身、以身作则。皇帝待人宽和，平易近人，在他眼里并无尊卑之分，他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精彩，而不是像他的父皇那样苦闷、枯燥。总之，他是一位富有理想、心地宽阔、个性不羁、焦躁任性的人。

正德一朝并无大事发生，前有刘瑾专权，后有流民起义。但对于我们这个幅员辽阔、地理形势复杂的国家来说，灾难、民变乃是寻常之事。正德一朝总体来说，中枢仍旧是一如既往，成熟而完备的体制

和官僚系统已经能够保证国家正常运转，君主只要做好礼仪和继承人的问题即可，伦理道德和政权组织机制使得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僚都没有个人发挥的空间。跟中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开始活跃起来，这种活跃不仅表现在商业和生活上，更是表现在思想文化上。

终是如此，正德朝仍是有着一些亮点。刘瑾的改革是针对王朝的弊端而来，但由于改革过急、过快、过猛，触动了各方的利益而被强行中断；正德朝军队的战备力得到了加强，京军和边军的互调提升了整体战斗力水平，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和对边务的巡查都是对军队的一种整饬；除此之外，具备启蒙思想的泰州学派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皇帝与文官们虽然冲突不断，但整体上来说，皇帝与他的臣僚们并无大的矛盾，他们只是在君臣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对抗而已，这跟后世君臣之间关系恶化的那种情况是不能比拟的。

总体来说，正德朝虽然一切都按惯性运作，但一些新的思想和因子已经开始发酵，它意味着一个大的时代即将来临。

5 无助君王下的大礼仪之争

在正德皇帝死后，帝国并不平静，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皇位空悬了下来，虽然皇位继承人早就确定，但一旦有藩王带兵进京，又该如何？二是江彬问题。朱厚照死后，江彬提督的边军团营仍旧留在京城，在朱厚照生前，文官与江彬的矛盾就已激化，现今江彬存在极大的造反可能性。

正德死后，皇太后和杨廷和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份遗诏，内容主要是传位于已继承王位的兴献王朱厚璁，遗诏发布后，皇太后随即命宦官谷大用、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迎取朱厚璁，这边安排妥当，那边就要对付江彬了。

皇太后和杨廷和联起手来，将驻扎在京城边军的边军遣回边镇，将驻扎在京城内的京军调到京城外围。江彬的军队被解散后，江彬很快就束手就擒，嘉靖元年被处死。从现在来看，江彬造反可能性并不大，当年曹吉祥的谋反实乃是锦衣卫所逼，实际上，明王朝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当局所逼或者错误政策造成的，在这方面，当局有当局的考虑，一方面可以激将法将不安稳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可以建立军功，只是多了许多血泪和宗室相残。

处理完了江彬，杨廷和似乎感到可以轻松了，但真正的麻烦却来临了，实际上，他对这位未来的新主人是毫无所知。

我们的这位新主人的确令人头疼、棘手，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城府极深，外藩就位的弊病在他身上显露无疑，那种不自信带来的麻烦影响了帝国几十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前往湖广安陆州迎取朱厚璉进京师的官员们在北京西南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原来京城来旨意了让朱厚璉以弘治皇帝继子的身份从东安门入皇宫继皇帝位，这是以太子礼继位。

这个旨意出自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从礼法上来讲杨廷和的这一举措有违封建礼法。如果朱厚璉在弘治皇帝生前过继给弘治皇帝为继子，那么在弘治皇帝死后，如果朱厚璉继承弘治皇帝的皇位，那么必须以太子礼继位。

现在朱厚璉是在弘治、正德都无子嗣的情况下以成化皇帝长孙，正德长堂弟的身份继承皇帝位，那就是宗室内部的兄终弟及，所以应该从紫禁城的正门入而继皇帝位。即便朱厚璉是弘治皇帝的亲子，由于他继承的是正德的位置，属于兄终弟及，也不应该以太子的身份即位。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杨廷和的这一举措都是荒谬的。

礼法对于封建家族来说是头等大事，正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杨廷和的想法过于幼稚，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逼这位新皇帝就范，殊不知自己触犯了封建礼法，即使是有人治其罪，也是名正言顺。那么杨廷和这么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杨廷和有他的考虑，他不想让孝宗皇帝这一支子人脉就此完结，他想让这位新皇帝继承孝宗这一支子的血脉，但这种想法明显是打肿脸充胖子，孝宗生前就没有这种安排，中国的宗法制中从来没有给死人过继儿子的，因为过继需要双方的认可。而且即使孝宗还在世，也不可能把朱厚璉过继给孝宗，而是将朱厚璉的弟弟或堂弟过继给他。因为在中国的宗法制中朱厚璉作为本宗的嫡长子为大宗，他的弟弟是小宗，本着“过庶不过嫡”的原则，朱厚璉也不可能过继给明孝宗。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杨廷和的行为都是荒谬的。

京城里来的旨意自然遭到了朱厚璫的抵制，车驾就在良乡这个地方停住了，小小的良乡顿时热闹沸腾。这个不到14岁的少年知道礼法的重要性，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能退让。事件就这样僵住了，杨廷和被当头敲了一棒。大约皇太后也感觉到杨廷和的不妥，便下旨让朱厚璫从紫禁城正门入，以朱厚照堂弟身份入继大统。

朱厚璫既登基，那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这就是对朱厚璫父亲的定位问题。朱厚璫的父亲朱佑沅本是兴献王的身份，现在儿子做皇帝了，如果继续给朱佑沅藩王的身份不合适，因为皇帝不可能去祭拜身份比其低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杨廷和有他的考虑，那就是将嘉靖皇帝过继给朱佑愬做儿子，同时与生身父母脱离关系，考虑到朱佑沅就嘉靖这一独子，从其他近支宗室中再过继一人为朱佑沅的子嗣，承袭兴献王位。杨廷和绕来绕去还是绕在了这上面，这就是他的心思，一方面他不想让孝宗绝嗣，另一方面也许京城的阁臣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他们对这位南方来的少年有种天然的歧视。

果然，朱厚璫登基没几天，就让礼部议自己父亲的庙号问题，朱厚璫的意思是将自己的父亲立个皇帝号，然后将父亲牌位从老家移到京城的太庙中，跟祭祀其他先祖一样祭祀自己的父亲，按说此举也属正当，在本朝也有先例。朱元璋尊称生父朱世珍为仁祖淳皇帝，朱建文称朱标为兴宗孝康皇帝，这些都是生前并没有做皇帝，在后世子孙为皇帝的情况下所上的一个尊称，为的就是行使礼仪上的方便。

嘉靖皇帝的提议被杨廷和驳斥回来，杨廷和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既然朱厚璫继承了人家的皇位就应该成为别人的子嗣。杨廷和还举了两个例子，汉哀帝没有子嗣，将宗室陶王之子过继过来立为太子，宋英宗没有子嗣，将濮王之子过继过来将来继承大统。而且杨廷和还指出，孝宗作为成化皇帝子嗣中的大宗不能绝嗣，所以必须将其

他小宗过继过来继承大宗子嗣。杨廷和的这一说法实际上不攻自破，因为孝宗这一宗绝嗣后，朱厚璫这一宗自然就继承了大宗。

皇帝觉得杨廷和的话有问题，但受制于自身学识和雄辩能力有限，嘉靖皇帝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事实表明一个人的雄辩能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让你掌握话语权，让对方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不攻自破。但是雄辩需要你找准对方的破绽，从而一击而中，这就需要你有丰富的知识，特别是要熟知历史典故，从历史的案例中寻找突破口。

张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弘治十一年的举人，正德十六的进士，其间相隔了23年，张璫都这样坚持过来了。张璫中进士时正处在正德与嘉靖两个王朝交替间，此时他正在礼部实习，当皇帝与杨廷和正在斗法的时候，张璫上了一道《大礼疏》。

张璫是一位对礼仪颇有研究的人，对《周礼》、《仪礼》、《礼记》涉猎较多，杨廷和的专制与跋扈终是招致有的人不满，张璫将杨廷和的漏洞一件件挑了出来，件件打在了杨廷和的脸上。

这篇《大礼疏》从五个方面指出了杨廷和的错误。首先，张璫说不让皇帝认生身父母有违孝道；其次，汉代陶王的儿子，宋代濮王的儿子都是在汉哀帝、宋英宗还在世的时候就过继来的；另外，嘉靖皇帝是按照宗法制伦序继位，跟孝宗皇帝没有关系；根据宗法制中“长子不得为人后”的原则，皇帝作为他人长子也不能过继给其他人为子；最后张璫又说统与嗣不同，继统没必要继嗣，昔日汉宣帝以汉昭帝侄孙的身份继承大统，也并没有过继给汉昭帝一说。

张璫的这篇《大礼疏》上奏上去，嘉靖大喜，尤如拨云见雾一般，他高兴的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必终可完也。”此疏虽然传至

杨廷和那里，但杨廷和并不买账，他虽然斥责张璁“书生焉知国体”，但杨廷和本人却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辩论，其后虽然在他的示意下给事中、御史纷纷上书要求治张璁的罪，但舆论的天平已经向嘉靖倾斜，皇帝已感到底气足了。

对峙双方仍在僵持的情况下，张璁又写了一道奏疏，名曰《大礼或问》，张璁在这道奏疏里重点从“统与嗣”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再详细的论证了一番，而且还附有许多前朝的例证。张璁的这道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礼部侍郎王瓚竟也为所动，杨廷和试图让人去阻止张璁，而张璁绕过内阁直接将这道奏疏从左顺门递进了通政司，《大礼或问》在帝国引起的震动已经超过《大礼疏》，退休在家的前三边总制杨一清竟也读了此文，杨一清给吏部尚书去信道：“张璁此论即使孔孟在生也无法改之。”

真是“檄文如箭”啊！“文章值千金，扭转乾坤看我行。”读书人的作用在这一刻毫无异议的表现了出来。

到如今，文臣只好做出退让，同意称嘉靖生父为本生兴献帝，母亲为本生兴献后，但不加“皇字”，皇帝还须称弘治为皇考，实际上嘉靖认了两位父亲，但与弘治之间并无过继关系，只是一种称呼。这种结局只能是双方各退一部，嘉靖以保全父子关系而获得暂时的胜利。

局势稍微缓和后，杨廷和开始了人事调动。他将张璁调任南京刑部主事，让其远离朝廷，同时将上书支持自己的云南巡抚何孟春调任吏部侍郎，离职的御史林俊任命为工部尚书。杨廷和此举的确不妥，虽然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但身为内阁首辅行宰相之事，的确是违法行为，因为帝国没有赋予他以及他的内阁那样的权力。现在看来，杨廷和的确有欺负人的意味，他更想通过这场大礼仪事件将年轻的皇帝纳入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不是像正德那样脱离了掌控。我们对杨的这一

行为不应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的秩序与缺失、凝聚与涣散、前进与保守、简约与繁琐，所有的人都将埋葬在其中。

正德十六年的安排皇帝并不满意，他最终需要的是给自己的身生父亲上一个完整的称号，那就是有着庙号、尊号、谥号一共21字的完整称号，而且他的牌位也要从湖广移到太庙中，供奉在正德之前，弘治之后，这是朱厚熜的最终想法。那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否恰当，有无过分的地方。我要说的是只要朱厚熜被立为皇帝，那么最后只能是这样的安排。虽然朱标、朱祁钰死后并无完整的称号，但南明政权最后都给他们上了完整的称号，而且南明政权几个皇帝的父亲都有完整的称号。

杨廷和当然知道皇帝最终要干什么，但杨廷和依然位高权重，羽翼未丰的嘉靖皇帝只好与其周旋。皇帝希望有人上书重提此事，然后他再顺水推舟。年轻的皇帝在与杨廷和的较量中仍然处于劣势，皇帝下到内阁的诏书几次被杨廷和驳回，杨的跋扈终于导致有人不满。兵科给事中弹劾杨廷和曰：“昔日钱宁、江彬专权纳贿不去追究，先皇自封威武大将军不去追究，如今却要为皇帝对生身父母的一称呼在这里争，实在是欺国”。

给事中的这一番奏说又打在杨廷和的要害上，杨廷和提出要辞职，类似的伎俩杨廷和已经搞过一次。上次辞职导致一百多名官员上书挽留，嘉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倒杨的时候，一旦他批准杨廷和的辞职，将会导致更多官员的激烈反应。

为了安抚杨廷和，嘉靖帝将这位上书的给事中下到诏狱中，虽是如此，嘉靖对杨廷和已经忿恨到了极点。明眼人都会看出，杨倒台已是瞬息间的事，当皇帝的不满经过发酵，发酵到一定时候就是该清场的时候。

嘉靖二年（1523年），我们的君臣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年内廷宦官上报宫内开支紧蹙，要求派宦官去江南催促织造，皇帝命杨廷和起草谕旨，杨廷和拒不起草，还责问皇上难道要跟几个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吗？

嘉靖不似前几任皇帝，他孤傲而倔犟，眼见杨廷和不合作，他绕过内阁直接颁发了旨意。这下惹恼了杨廷和，杨廷和又提出辞职，这次皇帝再没有挽留，而是直接批准了杨廷和的请求，并以杨廷和不守臣道给杨廷和做了总结。

杨廷和既已离开，嘉靖搬倒了这个礼仪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张璁也没有闲着，在这两年时间，张璁认识一个叫桂萼的人，这人跟张璁在礼仪之争上的观点一致，同时俩人还注意联系一些观点相同的人，最终他们是要组成一个小团体。经过两年的准备、酝酿，倒杨派已经在南京形成，一场大的风雨要来了。

嘉靖三年的新年刚过，桂萼的奏书就来了，他指出皇帝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自己父亲为皇考，并在后面附上其他人的联名。大议礼之争中挺皇派说的话总是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很多嘉靖想说却不知该如何说，或者不适宜说出来的话都由这些臣子们总结出来。

杨廷和已去，南京支持自己的官员已经形成气候，宗室和勋贵也开始倒向自己，自己不是再像正德十六年那样孤军奋战。此时的皇帝以为再无阻碍，但此时的明王朝早已形成官僚一体，这不是杨廷和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派官员的问题，皇帝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官僚。

这次在京的官员们纠集了二百多人抵制皇帝，失去了杨廷和在前面当挡箭牌，皇帝将独自面对群臣，场面面临失控的局面，皇帝急调张璁、桂萼帮他打仗。嘉靖此举令在京的官员们担忧起来，他们害怕

张、桂二人进京增加皇帝这边的力量，便对皇帝退让一步，也就是在皇帝继续尊称弘治皇帝为皇考的情况下允许皇帝称自己生父为皇考，眼见文官退让一步，嘉靖也退让了一步，这样，皇帝在这场争斗中又前进了一步。

本来准备进京大干一番的张璁和桂萼在凤阳这个地方接到让他们返回南京的旨意，原来在嘉靖得到允许更改父亲称号的同时，文官们上书要求禁止张璁、桂萼进京，虽然皇帝不想这么做，但既然自己的要求已经部分得到满足，也只好同意文官的请求。张璁和桂萼却并不打算就这么回去，他们的理想一直是想进京跟这些官员们大干一场，于是两人在凤阳继续上书，要求皇帝去掉对生身父母“本生”的称号，因为“本生”二字就意味着生身父母比弘治矮了一头。

眼见张、桂二人不愿意停手，皇帝也意识到此事不宜停下来，应该趁热打铁继续推进，便命令张、桂二人继续进京。嘉靖三年五月，张、桂二人终于抵京，随即被皇帝任命为翰林院大学士，两人开始放开手脚正式大干，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终于在帝国爆发。

张璁和桂萼给群臣拟了罪状，说他们欺君罔上，皇帝仍然要坚持将“本生”二字去掉。对于文官们来说，这是一个大命题，去掉“本生”意味着兴献王朱佑沅在尊号上可以跟弘治皇帝平起平坐，那么官员们旨在对弘治皇帝的照顾则形同虚设。

官僚们对张璁、桂萼这种迎合皇帝，背叛士大夫群体的叛徒感到十分气愤，以杨廷和儿子杨慎为首的一批翰林学士们打算趁张璁、桂萼进宫的时候将他们二人围殴致死，结果是张璁、桂萼提前得到消息躲在武定侯郭勋府上几天几夜不敢出来，帝国已进入疯狂。

杨慎的名望不仅仅是作为杨廷和的儿子而存在，他曾经作了一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被罗贯中收录到他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杨

慎是翰林院的激进派，他看起来似乎是大明朝的卫道士，但是其不知乃父的行为恰恰违背了礼法。

群臣纷纷上奏反对嘉靖朝令夕改，失信于天下。皇帝将这些奏章纷纷留中，七月十五日这天群臣散朝回来在路上议论纷纷，众人谈起成化年的往事。当时成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不愿意跟英宗的皇后钱太后合葬，这也就意味着周氏想让钱氏另行安葬。周氏的蛮横触怒了文武百官，二百多人齐聚文华门痛哭，大明朝第一次官员集体请愿活动就这样发生了，最后还是周氏屈服，官员们获胜。

谈着成化年间的往事，再联想到如今的时局，众人越说越激动。杨慎再也忍受不了，捋起袖子高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众人纷纷响应，将正在散朝的官员拦了下来，并说“谁不去，众人将共击之。”

这次又聚集了二百多人，众人齐跪在左顺门前，这左顺门是宫内宫外奏章传递之处。二百多人跪在那里齐声呐喊、痛哭，一人领头，其他人附和，整座紫禁城声动震天。刚上完朝正在吃早饭的嘉靖忽然听见外面乱糟糟的，便让人去打听，得知百官前来请愿，便让宦官劝百官们回去，宦官们的劝说毫无效果，局面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午后。

朱厚璁这位十七岁的少年此刻早已君临天下，他面临主政以来的最大一次考验，前进一步将会独掌乾坤，退后一步将会万劫不复。农历的七月，正值暑季，午后毒辣辣的太阳照晒着整座紫禁城，整座皇宫一片静谧，或许还有蝉在鸣叫。皇帝倾听着外面的声音，群臣的哭喊时断时续，还有人在捶门，一声声捶在皇帝的心上，皇帝在心想，他们呆会会不会拿圆木撞门而入。

皇帝已经开始索要名单，宦官拿起纸笔跑到左顺门口记录请愿的人名。很快，左顺门被打开，大批的锦衣卫冲了出来，将一百多人抓

进诏狱，众人开始哭喊，声彻寰宇、撕心裂肺。

二日后，廷杖开始，五品以下的一共180多人被廷杖，17人被打死。至此，这场大礼仪之争已接近尾声，文官们面临彻底失败的结局。皇帝得以去掉“本生”二字，称自己父亲为皇考，称弘治皇帝为皇伯考。在皇帝的大棒政策下，所有人开始噤若寒蝉，士大夫的理想与豪气顷刻间都已烟消云散，所谓的“文死谏”竟是这般脆弱和不堪一击。

皇帝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此时士大夫集团还没能联为一体，皇帝还能够分而治之，而此后严嵩、张居正的失败结局使得文官们明白了跟皇帝合作的后果；另外，更为重要的，在大礼仪之争的开始，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自己挖了个陷阱往里面跳，在自己对礼仪问题还没弄懂的情况下，就轻易下决断，结果是自己的漏洞被对手一个一个挑了出来。

此次的左顺门事件使得官员们明白了冲动的后果，自己含辛茹苦得来的功名不能就这么轻易没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存在于官僚群体中的一种难题，那就是在君主和自身这个团体之间抉择的问题，如果遵循君主的心思，则被同僚们所排斥，如果跟同僚们附和在一起，则往往被其连累。在张璁上奏章驳斥杨廷和之前，湖广巡抚私下里就已经写了份驳斥杨廷和的奏书，只是畏惧杨廷和而不敢上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民主与专制的一面，对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则表现出民主，对与自己观点相异的则表现出专制。重要的是要掌握住舆论的权力，而这又需要有雄辩能力。

大礼仪问题清楚的表明我们这个帝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帝国的精力更多的消耗在这种礼仪问题上，仿佛这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只要礼仪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搞好了，我们这个国家就会长

治久安，而国家的税收、农业生产问题、军队建设问题不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左顺门事件是明王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从此君臣那种融洽关系已基本不复存在，对抗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我们这个帝国已经不再具备温情，它似乎进入一个人人皆小人的时代。

张璁、桂萼自然就成了群臣眼中的小人，虽然有皇帝的宠信，但仍旧摆脱不了众人的敌视，张璁与桂萼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来抗衡这帮官僚。他们首先想到了杨一清，杨一清曾公开反对杨廷和，在张璁等人的活动下，杨一清出山挂兵部尚书衔再次担任三边总制，还有其他退休在家已高龄但是在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官员被张、桂二人活动出仕，另外还有一些因反对杨廷和遭罢免的官员也被张、桂二人弄了出来，这样，在朝中正式形成两派，而皇帝喜欢看着臣子们斗来斗去，张璁此时成了他制衡官员们的工具。

左顺门事件并不是大礼议之争的终结点，此后嘉靖和他的那些支持者们不断将朝堂上的矛盾斗争往大礼议事件上扯，借此加大对反对派的清洗。

李福达是山西淳县人，因为参加白莲教而被官府抓获，后来被充军。李福达从戍地逃脱后跑到陕西洛川，在那里试图继续利用白莲教举事。事败后，李福达再次被官府通缉，他化名张寅，逃到了京城，混入武定侯郭勋的府上。李福达说他会黄白之术，所以深得郭勋器重。没过多久，李福达在街上闲逛被人认了出来，李福达只好逃回山西。当当地官府抓了他的两个儿子后，李福达只好去官府自首。

山西巡抚马禄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并以谋反罪判处李福达死刑。本来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山西巡抚画蛇添足，他又将武定侯郭勋扯上，劾郭勋一个“庇奸乱法”之罪，要求皇帝惩罚。嘉靖只是批

准了对李福达的处罚，对处罚郭勋的奏章并没有批准，按说事情到这里又该结束了，但群臣却不依不饶起来，并最终将李福达一案弄成惊天大案。

大礼仪之争在朝堂上的影响并没有结束，群臣对挺皇派的张璁、郭勋一直都没有好感，此次正好借题发挥，对郭勋穷追猛打。郭勋却并不傻，抑或受到了张璁等人的点拨，他开始把这件事情往大礼仪身上扯，说群臣是为了报复议礼之争的仇。此时皇帝的疑心已经很重，他往往自己假设一个命题，然后把现实往这个命题上套，纵观整个嘉靖朝，皇帝基本上都是这样。

郭勋的话无疑说到了嘉靖的心坎上，在他看来，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去找一个世袭侯爵的茬吗？事实上，皇帝的猜想的确是正确的，官员们就是利用这个案件找郭勋的茬。但郭勋却将这件事情挑明，这无疑将这个普通的白莲教案上升到政治高度，案件最终判定的结果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博弈。

皇帝下令将李福达从山西提到京城，由三法司会审。皇帝既然要替郭勋开脱，那么李福达就必须无罪，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但三法司会审的结果维持了原判，嘉靖只好将三法司的官员全部换掉，桂萼执掌刑部，张璁执掌都察院，方献夫执掌大理寺，这些都是嘉靖的人。三法司重新会审的结果完全推翻了原判，李福达跟徐寅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参与审判李福达的官员全部被流放或免职，受此案牵连的人达40多人。这是皇帝利用李福达一案对大礼仪中反对派官员的一次清洗，而清洗的目标放在了司法系统，空缺出来的职位也被张璁一派的官员迅速补进。

李福达一案的确是扑朔迷离，时至今日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几十年后，四川捕获一妖人，该人供称曾跟山西的一白莲教世家学习妖术，而传授法术的正是李福达之孙。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李福达家族

乃是世袭的白莲教世家，但据李氏子孙的描述，李福达无论是相貌、年龄、生平都跟徐寅不符合，当年的案情的确是冤案，李福达跟徐寅根本不是同一人。

现在看来徐寅只是山西省一位逃亡的匠户，因为儿子被选为郭勋府上的侍童便跑到郭勋府上混日子，后来在街上被人认成了李福达，徐寅则以为自己作为一个逃亡的匠户被人认出来了，便跑回山西，谁知道回到山西后却被当地官府当作李福达抓了起来，当堂判死。徐寅的儿子央求郭勋救乃父，这才有了郭勋跟此案牵连的说法。我想此案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文官稀里糊涂，皇帝也是稀里糊涂，但皇帝认定官员们借此逮住郭勋不放，是为了大礼仪一事。一场莫名其妙的白莲教案件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并导致皇帝对反对派官员的一次大清洗，这表明大礼仪后的朝局仍不平静，无论有没有这次的李福达事件，皇帝对杨廷和一派的官员都会展开清洗，此次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审理李福达一案的40多名官员为此丢掉了官职，但这并没有结束，在审理李福达一案的过程中，全国上书支持此案的100多人皆被免职，这些人涉及六部、各府、道、院，皇帝将此案作为试金石，将官员做出一次分类，然后再剔除之。

都察院、大理寺、六部这些地方的官员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剩下还有个地方就是翰林院。明朝文官三大系统：内阁、都察院、翰林院。翰林院也名列其一，这些翰林学士们一旦发起疯来，比都察院的御史还要厉害。而在大礼仪之争中，翰林院是重灾区，左顺门事件就是翰林院的学士们搞起来的。在发生李福达案这年的冬天，张璁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张璁入阁后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翰林院，他将改组这个贵族化的小团体。

入翰林院的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是新科进士，除此之外，入阁也必须要有翰林院经历，所以这些翰林学士们有了雄傲一切的资本。当初嘉靖将张璁、桂萼弄进翰林院就是要给俩人镀金，提高他们的起点，但张璁、桂萼在翰林院遭到学子们的一致鄙视，没人愿意跟他们俩说话，人们都将他们看作无赖，甚至人们纷纷辞职以示不屑于此等人为伍。但这丝毫影响不到二人的情绪，二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张璁打破了翰林学士必须从新科进士中选拔的惯例，在京官员、地方官员都可以入翰林院，这实际上打破了他们的小圈圈。张璁还重新制定一套考核体系，将二十多名不称职翰林学士调往地方，同时从大理寺和地方选派官员充入翰林院，张璁通过这种方式对翰林院来了次大换血，在张璁的猛攻下，又一个中枢机构倒下了。

张璁对于翰林院的改组一方面打击了政敌，另一方面打破了翰林院这个小团体，破除了结党的问题。都察院、大理寺、六部、翰林院都得到了整顿，剩下的就是内阁，果然张璁在整顿完了翰林院之后便将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内阁。

此时的内阁首辅是费宏，费仍然是杨廷和这个系统的人，以张璁的资历若想取而代之，仍是不可能，张璁想到了一个人——杨一清。此刻杨一清还在陕西任他的三边总制，杨一清已经成了帝国资格最老的人，重要的是他还是张璁一党的人。张璁、桂萼开始活动让杨一清接替首辅的位置，嘉靖本人对费宏并无意见，但在张璁、桂萼的轮番攻击下，费宏于1528年致仕，杨一清成了帝国的首辅。

一个早已退休多年在家的官宦，一个本应安享晚年的官宦，此刻却在张璁的安排下不仅重掌兵权，而且还成了首辅。明代就是有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可能会中进士，但几年后可能就莫名其妙的离开了官场，从此不再踏入仕途；五十岁的人也会中进士，并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开始辉煌。在这里，生命的起点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人生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任何人的辉煌都是一段时间，成名太早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的张璁俨然成了权臣，虽然内阁首辅是杨一清，但实际说话的是他，这都是隐藏在幕后那个人在支持。他在一旁冷静的看着群臣斗来斗去，他明白既不能使一方力量过强，也不能使另一方力量过弱。

大礼仪之争早已变了味，它已经成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已经陷入疯狂，他们不惜一切清除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帮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替换旧的官僚，我们的王朝似乎在永乐之后重回专制，但时代已经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试图控制权力，但始终是力不从心。张璁也由于跟皇帝保持合作而被视为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认为跟皇帝保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矛盾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害，一般人都是这么认为。

嘉靖元年 to 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年是如此类似。洪武三年李善长致仕，近三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愿意放过他，终是在自己临死前一年将其赐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对李善长的擅权不满，但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进行一个总结，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朝堂，但还没有明确他的罪名。在一般人看来，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或许人们得出国人残忍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起来那么残酷的原因。

最终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退休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次发难却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遥远的边镇，位于新疆境内。历史进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控制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没落了，帝国对于西部再也发生不起兴趣。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迎送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到震慑作用。明初哈密控制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阻挡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发兵攻破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承担为帝国守卫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于遥远，帝国对于它的控制始终是无力的，从成化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围绕哈密展开反复争夺，到了正德年间，帝国已经疲惫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失去了兴趣。

成化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但马文升致仕后，正德皇帝对哈密失去了兴趣。杨廷和担任首辅后，重新对吐鲁番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仍然控制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满速儿的人。陈九畴是杨廷和任用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不断开战。1523年，陈九畴在上报朝廷的战报中宣称满速儿已经被他打死了，但此时的朝廷正陷入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实在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但几年后，人们发现这个首领还活着，事情就不一样了。

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终于引起了帝国的关注，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巧妙的与政治联系起来，成为肃清政敌的工具。

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刚踏入仕途就此失去仕途，在这场已经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知道皇帝究竟要走多远。我们的皇帝已经日益偏激起来，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显得有些孩子气，少了君主的气魄。

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有追究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存废的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那些仍然支持杨廷和的官员认为应该发兵夺回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认为应该将哈密交到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吐鲁番互贡来换取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守哈密和吐鲁番人镇守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生死，它对于帝国来说已经成了无关痛痒的东西，张璁一派对它的看法并不是内心真实的看法，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以示区别而已。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已经成了永恒不变的真理。哈密最终的失去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已经处于帝国控制范围之外，控制的成本大于收益。

到了此时，关于大礼仪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皇帝需要对前阶段的战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嘉靖七年（1528年），《明伦大典》编纂而成，《大典》共分六卷，详细记载了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群臣所上的奏书，并对伦理问题重新进行了强调。鉴于很多人对于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了解，以至于产生误解，所以《明伦大典》也起到正人心、靖浮言、明臣职的功效，最重要的是它给后世提供了一种历史案例，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可以遵照执行。

《明伦大典》颁行后，对杨廷和的定罪也随即进行。杨廷和被定以朋党罪、欺君罪、藐视皇帝罪、煽动罪被判死，但皇帝宽大处理，

将杨廷和削职为民。皇帝对杨廷和的定罪并没有定到点子上去，虽然定罪颇多，但不能攻其一点，只要指出杨廷和违背了儒家礼法即可，在这里，皇帝和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抓住这个要害，而避重就轻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要么是认识方面的问题，要么是为了给杨廷和开脱。

《明伦大典》修成了，杨廷和也定罪了，大礼仪的确是告一段落了，但很快它又进入了新阶段，并使旧有的权力集团开始分化，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又开始了。

当年张璁连考六次都没有中进士，但他仍然打算考第七次，因为在他第六次落榜打算放弃考进士而去吏部求个官的时候，有位相面的人对他说，“你不要放弃了，三年之后你会中进士，再三年你将骤贵”。江湖术士的推算大多依据周易、八卦，老祖宗的这些东西大都含有一些自然规律，如果拿来依照比划，或许也有些灵验。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来的快，去的也快，任何不正常的东西都不可能持久。张璁属于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他的高官显位来的不正常，在所有的对立面都被干掉的情况下，他也走到了仕途的尽头。

张璁并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为了议礼而存在，他对于革除官僚体系的弊端起到了推动作用。张璁利用他执掌都察院的机会，开始革退不合格的御史，代之以更加干练的御史，这些平日飞扬跋扈的御史此刻也有倒霉的时候。接着，他又清理翰林院，将不合格的翰林学士斥退，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张璁对都察院和翰林院的整顿也带有打击异己的目的。

这只是张璁改革的一部分。刘瑾掌权的时候往各地派了很多镇守太监和守备太监，张璁秘密请旨撤了一些外派宦官，在前任首辅杨廷和和张璁的努力下，从宣德以来的宦官势力得到了抑制，我们的皇帝

似乎不再借用宦官的势力抑制文官，而是试图对文官本身进行分化，这的确是一种新思路。

以张璁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来源于底层，他们在科举之前在民间摸爬滚打许久，故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同身受，他们掌权后开始对宗室、勋贵、外戚、宦官的占田进行清理，在这一派官员的坚持下，嘉靖初年很多被占去的田地又退还给了自耕农。桂萼更是提出清丈天下田地的主张，并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

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派虽然有改革朝政弊端的决心，但进行的并不顺利，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张璁、桂萼仍是大明王朝的孤独者，反对者自然不愿意与其为伍，就是同派官僚也跟两人保持距离，失去了底层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改革已经是水中捞月。

杨廷和的离去已经有年头了，但我们这个帝国并不安稳，失去了杨派官员的制衡，议礼派的官员们很快便自己斗了起来。张璁的改革首先遭到内阁首辅杨一清的抵制，杨一清属于典型的官僚，他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这些都注定他跟张璁的改革背道而驰，为了对付张璁，他将退休二十年，80岁高龄的谢迁弄进了内阁。可怜谢迁苦撑了几个月后回到家中，不久后便死去。

嘉靖八年，张璁跟杨一清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杨一清攻击张璁和桂萼滥用权力，皇帝将张璁和桂萼一同免职。张、桂既已致仕，张、桂的同僚们便猛烈攻击杨一清，说他收受贿赂、举荐私人，勾结同僚、陷害张璁、桂萼，皇帝又将杨一清免职，并将张璁、桂萼召回，张璁成了首辅，虽然成了帝国最高的官僚，但张璁已经失去了那种锐意改革的兴趣，他也逐渐跟议礼派的官员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渐渐疏远了，虽然他在职位上走到了人生的顶点，应了相面那人所说的“骤贵”，但实际上，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嘉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有二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跟礼仪有关的事情，嘉靖以一个13岁的少年继承大宝，以一己之力斗倒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几百名宦海沉浮的官宦，这给了他极大信心，他认为通过努力，自己想做到的事情还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同时给他的专制与阴暗提供了土壤，他迷恋他的大棒政策，他知道官员是不能相信的。在他御极的四十五年里，他始终是个孤独者，他无法敞开他的心扉，他曾经敞开过，但那没有用。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距离，君臣之间更是如此。

《明伦大典》的颁布虽然是对前面斗争的总结，但皇帝的最终目的还是没有达到，那就是给兴献王上一庙号，并将牌位从湖广转移到太庙中。皇帝的这一想法出乎意料的遭到张璁、桂萼等议礼派官员的反对，这也标志着天朝的议礼事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兴献王朱佑杭的牌位进入太庙的确是一个麻烦的议题，按理说兴献王作为正德皇帝的臣子牌位应该摆在正德之后，但兴献王作为正德的叔辈，牌位又应该摆在正德之前，所以，我们的皇帝又给人们出了一道难题。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抵制，但皇帝并不想就此罢手，张璁、桂萼眼见此事不解决对朝廷伤害很大，便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那就是在太庙旁再立一世庙，将兴献王的神主牌位立在世庙内，虽然此议不符合嘉靖的要求，但皇帝也只好先退一步，至少乃父的神主能够从湖广迁到京城。

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只是迟早的事情，嘉靖年至少还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官场气候还没有正式形成，这个时代不缺官场上的投机分子，一些在左顺门挨板子的官员懊悔不已，纷纷倒戈。不断有人暗示、或主动提出将嘉靖皇帝父亲的神主移入太庙，但这些都遭到了群臣的抵制，皇帝开始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法来向前推进。

君与臣的博弈开始，太极拳成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特色。我们这个皇帝是狡猾的，他不给父亲的世庙单独开门，而是与太庙共用一门，他将对世庙的祭祀放在与太庙一天进行，但这还是达不到他的目的，他仍在努力试探群臣的底线，当他发现这所有努力都无法奏效时，他便转向其他礼仪方面，希望能从其他方面予以推进。

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在礼仪中尝到了甜头，他通过礼仪掌握了权力，他通过礼仪为自己的父母赢得了面子，他开始钻进古书里面，从周代开始研究历朝历代关于礼仪方面的一切史料。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仪斗争，我们的皇帝感到自己俨然成了大礼仪方面的专家，他似乎精通一切礼仪方面的知识，在这种研究中，他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看法是对的，他也越发感到本朝在一些礼仪方面的做法是错误的，既然前面关于礼仪方面错误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那么后面也应该得到纠正。

我国古代帝王讲究祭祀天地，每年的冬至在都城的南郊祭天，每年的夏至在都城的北郊祭地，这就是古代的郊祀，属于最重要的礼仪，比庙祀还要高。古代君主要做的三件事情就是郊、庙、朝，做好了这三件事，你就是合格的君主。但在郊祀的时候，为了让祖宗也享受到这种宏大祭祀带来的好处，让本族也沾点仙气，所以在郊祀的时候都是拿祖宗牌位配位，但是配位的只是一人，这是从周代开始定下的规矩。

朱洪武时代本来天地是分祀的，但后来将祀天和祀地合二为一，拿朱洪武的父亲朱世珍配位，到了朱建文的时候，拿洪武皇帝配位，到了洪熙皇帝时期，便将洪武和永乐的牌位拿过来一起配位，从此这种天地合祭，两帝配位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嘉靖朝。而嘉靖皇帝在对古代礼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这种配位不合古制，于是嘉靖便有了将天地分祀的想法。他私下里对张璁提及此事，希望张璁能够提出来，然后

自己再批准实施，但张璁否决了嘉靖的提议，认为天地合祀仍然遵循周礼，并无不妥之处。

周公制礼，文王制易。周王朝是一个礼乐发达的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关于礼仪的一切都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并延续下来，遵循周礼也成了每个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皇帝没想到昔日支持自己的盟友又一次反驳了自己的想法，他只好寻找其他的代理人，这个人很快出现了，他是吏科给事中夏言。夏言是江西人，正德年进士，初任兵科给事中，嘉靖初年在裁撤京师冗军，清理皇庄占田方面颇有成效。夏言为人机警，善于观察、揣摩，皇帝对于天地分祀的想法已经在朝中流传开来，夏言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一个可以替代张璁的好时机。

气候、河流、地理决定了我国是个农耕国家，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自身都可以满足，故而对外部的商业不感兴趣，这点不似欧洲以商业为主。男耕女织也成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标榜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周礼，我们的天子在每年的立春后会在南郊举行亲耕，这是一个复杂的仪式，要提前三天斋戒、沐浴，然后祭拜先农，天子拿起耒耜三推，三公五推，诸侯九卿九推。而皇后代表地，主阴，故而在背阳的北郊举行亲蚕仪式，由皇后带领在京王公大臣的诰命夫人举行，皇后从桑树上采摘三片桑叶下来，其他诰命夫人按照品级采摘六片、九片、十二片，然后将这些桑叶亲自喂给蚕宝宝。

这个古老而又极为重要的仪式在我们的大明王朝已经停止了许久，如今夏言上书要求皇帝恢复这个仪式，一来以显皇帝皇后对于农桑的重视，二来成就皇帝英贤之君的名号，以承周公拳拳之心。夏言句句说在了嘉靖的心坎上，更为重要的是夏言的上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于亲耕、亲蚕这个传承下来的礼仪是南北分开的。

这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它从深层反映了我们这位皇帝经过惊心动魄的礼仪之争后内心的那种惶恐不安，外藩继位的阴影并没有散去，他想通过修正其他方面的礼仪来显示自己行为的正确性，并给兴献王的神主最终入太庙打下铺垫。

皇帝这个时候发现夏言是个有趣的人，他暗示夏言上书支持天地分祀。夏言在上书中说，天地合祀，太祖、太宗共配不符合古制，还是应将天地分祀，恢复到国初的旧制，此乃中兴之业也。夏言将天地分祀上升到中兴之业，真是阿谀奉承到了极点，但嘉靖听了却很受用，他使命群臣起草天地分祀的诏书，结果却遭到礼部侍郎霍韬的反对。

霍韬是张璁在南京发展的人，属于张璁一派的官员，此时他却跳出来反对，说《周礼》是王莽写的伪书。士大夫们知道皇帝举行天地分祀就是想通过纠正这种礼仪上的偏差来树立他在礼仪上的权威，从而为兴献王的牌位入太庙打好基础，这是士大夫们的底线，他们不允许出现藩王的牌位凌驾于正德皇帝之上。这也说明张璁等人并非毫无底线的阿谀之徒。

嘉靖大怒，他觉得这些士大夫实在是不可理喻，命人将霍韬投进诏狱，就这样分祀终于实现。嘉靖九年在南郊建立圆丘，十年在北郊建立北丘。

嘉靖不但发现本朝的郊祀有问题，他发现对于孔子的祭祀也有问题。孔子本来是春秋鲁国的一位司寇，但后世给他加了很多头衔，汉平帝时候称孔子为“褒成宣圣公”，唐玄宗又将其称为“文宣王”，元武宗又将其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历代祭祀孔子的规格很高，跟祭天相同。嘉靖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圣人，不配享有帝王资格，祭祀规格也不应该与祭天相同，嘉靖提出几点意见，一是称孔子为先圣先师，不再称王；二是孔子的塑像用木制而不再用泥制；三是降低祭孔

的规格；四是跟孔子配位的那些儒生改称先贤先儒，而不是公侯伯子。

皇帝真是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的出，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是个尽头。过去在礼法上总是官僚占据主动，将皇帝搞的不胜其烦，现在却是皇帝占据主动，将官僚们搞的不胜其烦，而且皇帝显然对礼仪已是十分精通，在这方面文臣们似乎丧失了话语权。

本朝以儒家思想治天下，而皇帝却要对这位先儒如此不礼遇，自然掀起了大波。但皇帝对礼仪早已精熟于心，他指出改变祭孔规制正符合孔子本意，孔子历来重视秩序、反对僭越，给孔子授予“王”的称号就是僭越，孔子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嘉靖的一番说辞将这些士大夫驳的哑口无言，他们只会在那里空喊口号，提不出任何有实质内容的见解。

更改祭孔祀典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我们这位皇帝对礼仪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炉火纯青。

在改变了祀孔规制后，我们这位令人难缠的皇帝终于对他父亲的牌位动手了。从商朝起，历代君主都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商周时期君王对于先祖的祭祀是分庙制，也就是每一个先祖都建一庙，但是到了汉代开始实行合庙制，也就是将所有先祖的牌位供奉在一座庙中一起祭祀，此后一直延续至今。而我们的这位皇帝又发现这种祭祀方式不符合礼仪，因为在他眼里，一切都应该遵循周礼，凡是跟周礼相违背的地方都应该修改。既然天地能够分祀，那么祖先也应该分庙祭祀，到了这时候我们终于明白嘉靖要实行天地分祀的真正原因，他正是要给祖先分庙祭祀做铺垫，从而让自己父亲的牌位能够跟其他皇帝牌位一样处于平等地位。

嘉靖十五年（1536年），新建的太庙终于在京城落成，皇帝实现了祖宗分祀的仪式，嘉靖的父亲兴献王跟其他明代皇帝一样也独自占有一个庙堂。五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年，一场大火将新建的太庙全部烧的干干净净，唯独兴献王的世庙完好无损，有人认为这把火是嘉靖放的。不管是不是嘉靖放的，我们只知道的是在此之后，嘉靖又恢复了祖先合庙祭祀的制度。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兴献王也挤进了这个新建的合庙，他的神主牌位供奉在弘治之后，正德之前，兴献王拥有了完整的庙号、尊号、祀号的称呼，全称为“睿宗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帝”，至此从正德十六年开始一直到嘉靖二十四年，历经二十五年，39岁的嘉靖皇帝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对他父亲的全套尊称，他终于可以心满意足了。

嘉靖一朝历经25年的礼仪大改革是明王朝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我们对此的评价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不顾国计民生，不顾嘉靖朝社会出现重大隐患和巨大矛盾的客观现实而去注重这些繁文缛节，过于强调文治和粉饰太平，这些都无益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另外，它使得君臣之间产生间隙，君主过于独断专行，这些给我们帝国的政治也带来巨大伤害。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进步意义。

嘉靖对于祭祀仪式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他不仅让天、地分祀，他还对天、地、日、月进行分祀，对太岁、风雷、云雨、岳镇、海渎、山川、三皇、五帝、神仙的祭祀也进行了修正，这些都使得明王朝改变了周代以后祀典的那种混乱局面，使得各种祭祀开始恢复周礼，有利于礼乐制度的统一与完备。

嘉靖皇帝不畏人言，敢于破除常规，挑战权威，一方面极大的增加了自身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使得明王朝的文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对于孔子祀典的更正更是恢复了孔子的真正形象与历史地

位。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了朱元璋定下来的祖制，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种人为的枷锁，为后期的隆万大改革减轻了阻力。

但无论如何，礼仪的简化已成了历史的惯性，虽说嘉靖以一己之力对抗历史的惯性彰显出他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强悍的政治斗争本领，但于前进的历史来说却是无济于事，而且这种变革还夹杂着皇帝的个人私利，从而显得有些目的不纯，但嘉靖朝的这场礼仪改革却是应该作为周代以来关于礼仪的一场最大变革事件而载入史册。

6 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

嘉靖十七年，皇帝的母亲蒋氏去世，这对于皇帝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双亲已经俱不在人世，皇帝越发感到孤独，毕竟他是外藩继位，北京城不是他的家。他感到有必要回老家一趟，一是拜谒一下父亲的陵墓，二是考察一下母亲究竟应该安葬在哪里。

皇帝南巡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群臣纷纷反对，因为皇帝的出巡跟普通官员不同，他需要大队人马随行，还有沿途修筑行宫、铺宽道路，这些都需要征用民力和花费，嘉靖跟正德又不同，正德地方官员可以不买账，但嘉靖则需要小心伺候，不然只有免职的份。

嘉靖十八年的南巡虽然有阻碍，但比正德十四年的南巡还是要顺利的多，皇帝处罚了几个上书反对的小官了事，但此次南巡并不顺利。先是从南方来了一个叫孙堂的军人乘着黄昏从午门进入，穿过太和门，在奉天殿前大吵大闹，说南方为了给皇帝修行宫累死了不少人，要求皇帝停止南巡，很快，锦衣卫将孙堂抓获，皇帝命严查幕后指使，但负责刑讯的官员很快将孙堂绞死了事。这件事情跟万历晚期的挺击案是何等相似，都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进入宫里，接下来的审讯也是莫名其妙，我们不敢否认这后面没有黑手，但历史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也许是一个愤青的个人行为，也许是一个隐秘的团体在操纵。

孙堂事件使得皇帝的南巡提前笼罩上一层阴霾，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十五日，皇帝留下太子监国开始了他的南巡，这趟南巡是嘉靖王朝的转折点，它直接导致嘉靖一朝的政治走向。

皇帝的南巡并不顺利，他刚出京城就碰到拦轿喊冤的，沿途接驾的地方官员也多有怠慢，这次的南巡我们似乎想到了英宗那年的西巡，那年的西巡也是奇异事情颇多。皇帝车驾于二十八日抵达河南卫辉境内，当晚由于宫女乱丢没熄灭的蜡烛导致火灾，大火借着风势越烧越大，整个行宫被烧个通红，几千人顿时手忙脚乱，所有人都没意识到一个问题，皇帝在哪里？只有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望着那燃烧的熊熊大火毅然冲了进去将皇帝背了出来。

这场大火将皇帝的行宫焚烧殆尽，随从人员烧死不少，连带财物、衣服也焚毁不少，它给皇帝心理上带来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只有先将它寄存在那里。皇帝终于抵达了阔别18年的故乡，纵然他贵为天子，故乡还是物似人非，双亲已经不在，兴王府的一些旧人也不在了，姐姐们也早已出嫁，朱厚熜望着诺大一个兴王府悲从心来，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真希望能够在这一家人其乐融融，就此终老。

正是因为父亲早逝，我们这位皇帝显得特别孝顺，他在故地召集士绅们训话，皇帝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同乡，今天我重回故地，你们当中既有昔日的长辈，也有同龄人，我本人没有什么大德行，如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的内心苦的很，现在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当儿子的要孝顺，做父亲的要好好教育儿子，年长的要照顾年幼的，年幼的要尊敬年长的，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就随口说几句，不做文字表述了，免得有些人看不懂。”

嘉靖的这番话是向乡亲们表明他的孝心，他的确孝心，为了父亲的称号跟群臣斗了二十五年，现在为了选择母亲的墓葬地回到了安陆，在家乡的父老面前他似乎不需要隐藏，“我的内心苦的很”真实表明了皇帝此刻的心境。

皇帝在安陆的十二天里接到了张璁病逝的消息，这对于他又是一个打击，他不想再在这里停留了，于是启程返京，在返京的途中，皇帝看到了沿途的灾民、流民，听见了他们的哀嚎，这对皇帝的内心都是一个触动，他让随行人员拿出两万两银子赈济。在回京的途中，皇帝做出了将其母的灵柩运回安陆的决定，因为在他看来京畿附近的山川没有他家乡的山川有灵气，他也同时做出不再修建蹕道、行宫的决定，他已经对出巡完全丧失了兴趣。这个阴郁的皇帝跟他的堂兄完全是两回事。

皇帝这次的出巡始终带着阴郁的色彩，他回到京城并不高兴，仿佛很久都没有恢复过来。三年后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谋逆案件，虽然宫女最终没能杀死皇帝，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宫女在宫中受到了何等程度的虐待，他们宁愿去死也要杀死皇帝，以解心头之恨。

嘉靖十八年的南巡和嘉靖二十一年的刺杀是嘉靖王朝的大事件，我们这位皇帝刚刚上位的时候踌躇满志，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他进行大议礼，系统的改正祀典，改变了连续几朝宦官专政的局面，他采纳张璁、桂萼的建议清丈瞒报土地、清退皇庄、在江南试行一条鞭法，在人们看来大明朝似乎出现了嘉靖中兴的局面。但当他出去南巡的时候，看见沿途百姓的哀嚎，而这种哀嚎却是对嘉靖之治的一次奇妙讽刺，宫女们宁愿不惜生命也要杀死他，更是对他人格的一次否定。从嘉靖十八年起我们的皇帝便不上朝了，从嘉靖二十一年起皇帝搬到皇宫外面的西苑居住，远离了包括嫔妃在内的所有女人。

皇帝这个时候似乎患了抑郁症，他整日闷在屋子里不愿意出去，他对于一切政事失去了兴趣，每日在烟雾缭绕的炼丹房度过，也许只有跟这些虚无飘渺的道士们在一起，他才能够获得内心的安宁。

从嘉靖十八年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这二十七年的时间里，皇帝除了见了群臣寥寥几次之外，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由于他信奉“二龙不相见”的预言，他的儿子们从出生到长大他也没见过几面，无论是郊祀，还是庙祀他也懒得去了，都由官员们代办。皇帝自我封闭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麻木了世间一切情感。嘉靖时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皇帝似乎也到了他的末日，但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嘉靖时代才刚刚开始，精彩的篇章才刚刚上演。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朴素、最深奥的哲学思想，道教也是中国本土宗教，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道教产生于东汉那个动荡的岁月，但在老子创立道家思想的时候，道教就已经具备了雏形，两汉四百年道教更是据于统治地位。道教主要分为两派，一是符箓派，二是丹鼎派。符箓派主要是依靠画符祛病、祈福、捉鬼；丹鼎派主要是依靠鼎炉炼丹以求长生。符箓派属于张道陵创建的天师教，继承了道教的原教旨主义，由于以画符治病为主，所以行走在民间，面向底层民众，从另一个方面说也具备反叛特征；而丹鼎派因为炼丹所以需要资财作为后盾，所以面向的是权贵，两派之间也互相看不起。到了明代，符箓派是南方的正一教，而丹鼎派则是北方的全真教，嘉靖皇帝所修炼的应该两派都有。

邵元节是江西省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的道长，这龙虎山上清宫是南方正一教的总部，皇帝将邵元节召进宫来，恰逢冬季没有雨雪，邵说他能祈来雨雪，嘉靖让他做法，果然没多久天空降了一场大雪。皇帝封他为真人，统率天下道教。

嘉靖十一年，婚后十年无子的嘉靖开始在宫内设置道场祈求子嗣，一年后嘉靖果然降子，他对道教的信仰已经开始升级。神仙段朝用是合肥人，自称有“化物成银”大法，而且可以将化得的银制成仙器，武定侯郭勋一直都喜欢跟这类人混在了一起，他将段朝用召至府

中，让其炼银。段朝用拿自己的银子或者偷了郭勋家的银子炼了一些器物出来，郭勋大喜，忙将段朝用介绍给了嘉靖。正在愁钱花的嘉靖不禁大喜，在听说喝下用这些仙器盛的水能变成神仙后，皇帝更是大喜。

段朝用拿郭勋给他的一万两银子又炼成银子后给了嘉靖，但很快他没了银子来源，他的法术不灵了，嘉靖皇帝最终还是知道了段朝用骗人的伎俩，他将段朝用抓进狱中。到了此刻，皇帝对黄白之术仍是深信不疑，他认为黄白之术自古有之，只是段朝用法术不行而已。

当邵元节年纪渐大力不从心的时候，便推荐陶仲文。陶仲文做过县级小吏，对神仙方术很感兴趣，邵元节推荐他入宫，陶仲文入宫后施法解决了几次小麻烦，获得了嘉靖的信任，皇帝封他为真人，接替邵元节统领道教。陶仲文的工作主要是炼制丹药，这是一种由铅、汞及其他重金属、草药混和而成的丹药，或许还要加上处女的经血，这种丹药短时间内对身体能起到刺激作用，但长期服用必然给身体带来摧残。皇帝封陶仲文为真人，让他接替邵元节统领帝国的道教，而皇帝也封自己为“忠孝帝君”、“万寿帝君”。

7 无奈的官僚严嵩

严嵩是江西分宜人，跟夏言属于同乡，看来大明朝的官场大半个时间都由江西人掌控，在江西这个人多地狭，科举之风盛行的地方，人人拚科场已经是平常事。

严嵩出身寒儒家庭，自小聪颖，弘治十一年，18岁那年中举人，25岁中进士，正德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作为二甲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严嵩的前途看起来十分灿烂。但恰在此时刘瑾掌权，他所重用的吏部尚书焦芳排斥南方人，严嵩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也不能避免，他回到家乡呆了八年，这八年的时光他并没有白白浪费，他埋头读书，并练的一手好字。严嵩复职后在南京翰林院供职，嘉靖登基后，他又由南京前往北京任国子监祭酒。这段时期，严嵩一直是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他在南京期间也正是张璁在南京期间，他并没有参与到大礼仪之争中去，从此可见此人本性平凡，并无积极争世之精神，只是命运推着他往前走，大约也正是这种性格才使得他能够赢在最后。

嘉靖七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他谄媚的开始，之前的升迁大约便是由于自身的才华与谨慎。在这一年，皇帝派严嵩去湖广安陆州更改兴献王碑文，严嵩在奏书中捏造祥瑞，皇帝大为欢喜。

嘉靖七年还只是处于整场大议礼的初级阶段，严嵩没必要必须要附和嘉靖，但他附和了，这说明严嵩的思想已经转变，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与世无争，埋头做学问的严嵩了，即使自己心中有一百个不乐意，也必须如此，因为你要生存。面对那个虚伪的皇帝，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只有将自己的个性泯灭掉。

严嵩的这番奏书给自己的仕途打开了局面，皇帝将他放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后又担任北京礼部尚书，由于正处于议礼阶段，礼部无疑是位列中枢。嘉靖十五年，皇帝要求将兴献王的牌位移入太庙，遭到了群臣的抵制，严嵩首先附议，此举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严嵩的第二次谄媚。

如果按资历来讲，夏言应该是严嵩的学生，但严嵩对他的这位学生辈十分恭敬，夏言倒是很受用，他认为自己身为首辅理应受到尊敬。一次严嵩请客，夏言故意不到场，严嵩对着夏言的空位拜了许久，夏言听说后便对严嵩放松了警惕。实际上，严嵩的这种矫情的行为稍微有点阅历的人都会看出来，可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夏言，人生太过顺畅的夏言根本玩不过严嵩。但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他知道严嵩是什么样的人，他也看不起这样的人，但他需要这样的人。

严嵩整人的方式很高明，他不明着整，但他可以设计陷阱让你进入彀中，杀人于无形之中。嘉靖十八年（1539年）皇帝南巡至自己的故乡，他视察了父王的陵墓，并对陵墓进行了扩建，虽然他将父王的牌位移入太庙，但他并没有将父王的灵柩移入十三陵，这位皇帝需要的只是一个向父亲表达孝心的名份而已。望着熟悉的故土、南方的山川，心力交瘁的皇帝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终老也不错，但历史将他推上了那个舞台，他只有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拜谒完了兴献王的陵墓后，严嵩建议群臣上贺表，而夏言建议回京后再上，皇帝开始不悦，严嵩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立即拜伏在地再次请群臣上贺表，嘉靖随即借坡下驴，令群臣上贺表。

这只是皇帝与夏言不愉悦事件中的一次小事件，当这种事件不断发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夏言该倒台的时候。皇帝由于体弱多病，便开始信奉道教，祈求能够长生，皇帝既然信奉道教，自然要走道场、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色的纸上，要求词藻华丽、对仗

工整，这些青词只是用华丽的词汇堆积起来，并无实际内容，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不知所云。青词的主要目的是向上天祈祷，以求消灾免难、长寿平安。

青词最初是由道长撰写，但道士的学问毕竟有限，写不出华丽的词章，所以对于青词的撰写逐渐由道士手里转移到大学士手里。嘉靖是个婆婆妈妈的皇帝，他对细节很重视，这样的皇帝很难缠，他将官员能否写出华丽的青词作为官吏的考核指标，大大咧咧的夏言以为这是小事情，便对写青词不重视，他经常将青词拿给别人代笔，或者在宦官监视他的时候呼呼大睡，而心细如发的严嵩深谙“皇帝之事无小事”的道理，他恭恭敬敬的写青词，经常熬夜写青词，这些都被嘉靖看在眼里。

嘉靖每次走道场的时候都命群臣戴上香冠，而夏言说这不是人臣的服饰，拒绝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而且还披上道袍。宫中的道观落成了，嘉靖命群臣上贺表，夏言对此不予理睬，嘉靖搬到西苑去后，命群臣骑马进入，而不许坐轿子，而夏言照坐不误。

自从当上首辅后，夏言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夏言，他的谨慎、他的恭顺都已经不见了。嘉靖二十一年，夏言被免职，严嵩进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严嵩成为内阁首辅。人都有那种通病，一旦大权在握，便飘飘然起来，将过去都忘记了。此时的严嵩也开始跋扈起来，事实表明，已经64岁的严嵩仍需要进行挫折的历练。

一年后，皇帝将夏言召回内阁，重任首辅，刚做了一年首辅的严嵩立刻跌入冰底，他发觉自己在这位30多岁的年轻人面前仍然是一名小学生。复出的夏言开始对准严嵩猛烈开炮，他认定自己的致仕是严嵩搞的鬼，但是他不知道根子还是在自己这里。无论张璁、夏言，还是严嵩都算不上是成熟的官僚，他们跟汪广洋、徐阶、申时行还相差甚远，他们无知而擅权，不似汪广洋、徐阶、申时行那么有涵养。

夏言在一切事物上排斥严嵩，并将阁部中严嵩所用的人尽数斥退，夏言并不满足于此，他是要整垮严嵩，严嵩并无过错可抓，夏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其子严世藩身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夏言掌握了严世藩的贪污纳贿的罪证，在正准备将这些罪证递交给皇帝的时候，严嵩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夏言家里跪哭，在严氏父子的演技面前，头脑简单的夏言又开始摇摇欲坠。

不久，这一幕又出现了，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深受皇帝信赖的人，因为一些小事情而被夏言喊去问话，陆炳也跑到夏言府上长跪。从此，严嵩和陆炳便经常倾谋，所谈论的便是如何整倒夏言。

实际上严嵩对于皇帝来说是一颗有用的棋子，即使夏言将严世藩的罪状递上去也没什么，但严嵩为何要如此，我想严嵩此举是做给皇帝看的，他是想激起皇帝对夏言的愤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严嵩此人做事也太过于斤斤计较，寻常人都看的出来他的悻悻作态，更何况皇帝呢。此时的夏言已经跋扈到了极点，同僚去他家里下跪，锦衣卫的首领他也敢动，太监他也随便训斥，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怎么想，满朝文武怎么想，我相信他自己对此并无概念。

从正统年间起，在军队这个舞台上表演的不再是武将、勋贵，而是文官，这些在仕途上升迁缓慢的文人选择了从军这样一条高风险、高收益的道路，王骥、王越、马文升、杨一清、王阳明都是这个群体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文人都是好战分子，他们残忍、狠毒，帝国绝大部分战争都是由于这些文人为了立战功而挑起来的。如今又有一个杰出代表，他是曾铣。

曾铣是进士出身，曾在福建任知县，后任辽东巡按、山东巡抚，先后平定辽阳兵变、山东民变，曾铣的能干很快使得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开始负责对蒙事务。从正统年间起，围绕着通贡问题，蒙古人不断袭扰明廷边境，成化年随着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的防务又突兀

起来。嘉靖年间，边境问题仍是棘手问题，帝国的政策是加强宣大一带的防御，筑城和修建防御工事的担子落到了士卒的头上，沉重的负担加上上峰急迫的催促导致了大同的两场兵变，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张严厉镇压，而皇帝和夏言都主抚。这一看起来是帝国内部问题的兵变，但实际上还是由外部问题引起，此时草原上又出现一个新的领袖——俺答，他跟前朝的也先一样控制了西抵青海，东抵辽东的大片区域。从嘉靖年间起，俺答几十次去信恳求通贡，都遭到拒绝，明廷方面还诱杀蒙古的使臣，而此时明蒙之间断贡已经30年，蒙古人“夏无布衣、借锅煮肉”，在此种情况下，俺答不断骚扰明廷边境，杀掠甚重。解决蒙古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放下华夷之变的教条，通过通贡、边市的方式解决蒙古人所急需的物资，然后再以分封的方式让蒙古人归顺明王朝，这种很简单的方式在明朝人那里实行起来却是那么艰难。

在王朝还没有找到正确解决蒙古问题办法的时候，夏言却上了一个错误的提案，那就是议复河套。河套本是游牧民族的水草地，历史上当汉王朝强盛的时候往往将他们逐出河套，而不久他们又会回来，如此反复，导致河套控制起来很困难，所以历代王朝对于此地都是弃之不理。本朝初年，朱元璋的大军将蒙古人驱逐出了这片水草地，但到了成化年，他们又回来了，虽然经过王越、马文升的驱逐，但效果并不大。

最先提出复套的是由挂兵部侍郎衔，担任三边总制的曾铣，他在奏书中说，蒙古人占领河套向南可以进攻陕西，向东可以破宣府、大同进入京畿，故而需要将河套收复，曾铣并提出收复河套的一整套办法，那就是首先修筑一条横亘宁夏、陕西、山西的防御墙，然后再随时派骑兵出击，嘉靖随即批复拨款20万两白银修墙，皇帝的支持使得曾铣有了更大的信心。他开始命手下士兵枕戈待发、随时出击，虽然斩获颇多，但过惯安逸生活的边军们对这种折磨人的方式非常不适

应，不仅如此，地方官吏对于修墙也不感兴趣，他们更想通过与关外的蒙古人贸易的方式来获取私利，这点在英宗时代表现的已经很明显。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夏言上了那道该死的奏书，内阁的另一人严嵩无动于衷，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奏书。接到奏书的嘉靖被夏言的豪言壮语调动起了激情，他开始命有司准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计划，并亲自免掉了反对这场战争计划的官员。但嘉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从他数次斥退张璁，数次召回就可以看出来，他在某些事情上就是凭一时兴趣，此次议复河套也是如此。户部一算，费钱太多，加上在主战区陕西、山西由于征发引起了骚乱，皇帝害怕再次引起兵变或民变，便动摇。皇帝甚至斥责严嵩，内阁为何要廷议如此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严嵩将这全推到夏言身上，他说夏言做任何事情都不和他商量。

得到消息的夏言怒气冲冲去找皇帝询问，恰巧严嵩也在那里。皇帝还没有发话，严嵩便首先对此次议复河套的计划进行了驳斥，夏言愤怒的质问严嵩，“在内阁的时候你为什么一言不发，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这番话在嘉靖看来就好像是将矛头对着他来的，因为这听起来正像是埋怨皇帝言而无信。如果夏言记性好的话，他应该记得嘉靖十三年的情形跟今天是如此的相似，在那一年大同士兵第二次叛乱，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主剿，嘉靖也采纳了，但主剿一年效果不大，后来也还是给钱安抚了事，因为此事搞的皇帝很没面子，等于是自己扇自己耳光，而此后张璁也最后一次离开了庙堂。

此次议复河套又搞的皇帝很没有面子，先是兴起冲冲的准备大干一番，还免了山西、陕西反对战争官员的职务，很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泄了气，如此以来这个责任必须要有人承担，正如严嵩所说的那

样，责任全在夏言，皇帝当场给夏言定了句评语“强君胁众”，夏言此刻似乎一下清醒了过来。嘉靖二十七年，夏言以尚书身份致仕，严嵩对此并不放心，他想对夏言再猛烈的敲打一下。

仇鸾是正德年间平安化王叛乱的将领仇钺的孙子，仇鸾袭仇钺的咸宁侯爵位，嘉靖年仇鸾成了三边总制曾铣的部下，由于惧战、怯战，或谎报战功，或克扣军饷等情况，仇鸾被曾铣下狱了。严嵩找到了仇鸾，让他出面指证曾铣与夏言勾结在一起，以求挑起战争以获战功。

当嘉靖看见仇鸾口供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他将曾铣处死，随即将夏言逮捕入狱，并于当年十月在西市被处死。帝国四位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僚，李善长、胡惟庸、夏言、周延儒，夏言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对于史学家来说一直是最难理清头绪的东西，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皇帝杀人并不是因为一件偶然性的事件，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习、发酵。嘉靖杀夏言给安的罪名是“结交边将”，这在古代也是一种大忌，无论文官还是宦官都不得与统兵在外的边将私自结交，虽说如此，但这一制度也并非非要执行不可，皇帝杀夏言的确让人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想还是夏言的那句话触碰了嘉靖那敏感的自尊心，嘉靖自知自己言而无信、朝令夕改，他的内心是惶恐的，夏言的质问让他无地自容，他虽然将夏言免职，但还是不能挽回他丢失的面子，这个把面子看的比什么都重要的皇帝正在使自己陷入暴虐之中。当严嵩出示了夏言与曾铣勾结的人证后，皇帝顺水推舟的将他杀掉了。夏言被捕是在元月份，被处决是在秋后，这中间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皇帝不是冲动杀人，这中间或许还有什么私密的事情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

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戾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

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无障碍。

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时候上奏《请诛贼臣疏》，尽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并将矛头直指嘉靖。谁都知道严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现如今杨继盛上这样的奏书，皇帝会怎么想？

杨继盛其人的确比较偏激，一不能提出针对时事具备可行性的建议，二没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里一味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专门找这样的人当枪使。严嵩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是徐阶在背后操纵，但他找不到证据，尽管受尽酷刑，杨继盛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徐阶身上扯，后来跟张经等人一起被处死。

嘉靖主政期间，一些被处死的人在南北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主战派，比如夏言、张经、王忬、杨继盛，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外的政策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天然的两派。

除了杨继盛，还有锦衣卫沈链。沈链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议和的时候，沈链跳出来表示反对，后来沈链上了一道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书而被关进诏狱，之后被发配边疆，沈链在发配地每日骂严嵩不绝，后来严嵩指使当地的官员将沈链处死。

这两件事情嘉靖都是幕后黑手，因为在整个国家他暂时找不到可以替代严嵩的官僚，他要保下严嵩，所以他对反对严嵩的官员处以极刑。沈链、杨继盛只是帝国的官僚跟严嵩斗争的两个事例而已，像这样的例子在严嵩主政的十四年中络绎不绝。后来的官员也渐渐成熟了，他们知道倒严的关键在皇帝，皇帝不愿意让严嵩倒，严嵩无论如何也倒不了，另外，倒严就不能牵扯皇帝，劾严嵩罪状的时候不能把与皇帝有牵连的罪状写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不仅倒不了严，还会自

取其祸。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皇帝对严嵩厌烦，等待严嵩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深谙此道的就是那个真正隐藏在幕后的人——徐阶。

对于夏言来说，严嵩是水，对于严嵩来说，徐阶才是真正的水。这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年代，冲在前面的人大都早早的废掉，徐阶吸取了这么多人血淋淋的教训，他知道对付严嵩只有一个字——“等”，等待严嵩自己把自己废掉。

即使夏言死后，徐阶也能够独立的生长，因为那个帝国最厉害的人看中了他，他顺利的当上了礼部尚书，获得进出西苑的资格，跻身帝国核心官僚序列。

功成名就的徐阶头脑清醒地很，他仍旧埋头苦干，认真撰写青词，这些嘉靖都看在眼里。徐阶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以他的软实力掣肘严嵩，使严嵩并不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保护了一些反对严嵩的人。严嵩能够打败夏言，因为皇帝对夏言已经厌烦了，严嵩却无法打倒徐阶，因为他是皇帝保护的人，徐阶也自然明白这一点。几乎在夏言被处死的时候，徐阶就上位了，从此严嵩就有了个如影随形的人。徐阶不断的在观察，观察皇帝对这位首辅的态度，寻找着那个临界点。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何的贸然出击或矫情掩饰都可能功亏一篑，甚至会让自己跌进万丈深渊。

虽然一波波的倒严者都倒在了严嵩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严嵩仍然是稳如泰山，诏狱里的拷打、西市上的斩首，这些都使得官愤、民愤越来越大，而这所有的愤怒都会射向严嵩，身为皇帝的嘉靖也不能不考虑官情民意。

严嵩在他60岁入阁的时候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能连续在内阁工作几天几夜而不回家，但在严嵩进入80岁以后，他也渐渐的力不从

心，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他已经无法进行正确的思考和判断，皇帝说的话他也渐渐的不知所云，严嵩对皇帝来说他的作用已经失去，是时候让徐阶替代他了，此时的皇帝已经有了换人的想法。

御史邹应龙是徐阶一党，他们经常在一起合计对付严嵩的计谋，大约在很久以前邹应龙就已经开始酝酿弹劾严嵩，只是难以猜测皇帝的心思，一天邹应龙避雨来到一个太监的家中，闲谈中这名小太监透露了皇帝想弃用严嵩的心思，邹应龙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回去告知了徐阶，在得到徐阶首肯之后，邹应龙上了一道弹劾严嵩的奏书。

这是令嘉靖朝几乎所有文官兴奋的大事件，在历经十四年他们认为的黑暗日子后，这位帝国的首辅终于倒台了，终于可以告慰夏言、曾铣、王忬、杨继盛、沈链的在天之灵了。皇帝勒令严嵩致仕，其子、其孙，以及门客罗龙文发配边疆。

嘉靖一方面对严嵩已经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顺应官情民意顺水推舟。虽然皇帝将严嵩免职，将严世蕃发配，但皇帝却又隐隐有些失悔，我们这位皇帝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身在江西分宜的严嵩敏锐捕捉到了这点，他开始上书问候嘉靖，希望能将严世蕃放回，虽然皇帝还留恋严嵩，但80多岁的人的确再也做不了什么了，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不久严世蕃和罗龙文从戍地私自跑了回来，嘉靖让三法司对二人拟罪，三法司还是想将事情往杨继盛、沈链身上扯，深谙人事的徐阶指出倒严世蕃就不能牵扯皇上，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沈链被杀正是出自嘉靖的旨意，跟帝国处死胡惟庸一样，徐阶想了一个跟任何人没有瓜葛，而又顺理成章的罪名——通倭，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和罗龙文以通倭罪被斩。过不久，严嵩也病死了。

话说回来了，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棋子，这些官僚有必要跟严嵩较劲吗？有严嵩在前面做挡箭牌承担责任不好吗？

严嵩不仅是嘉靖朝有名的首辅，他也是整个大明朝有名的首辅，但他只是行使皇帝代理权的一个工具。在那个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宦官、武将、勋贵日益没落的年代，皇帝需要找一个人来秉承自己的意志，来代替自己对文官行使管理权，张璁、夏言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最后找到了严嵩。

在严首辅主政的十四年里，他能够使帝国的政治保持一种平稳，而没有嘉靖前期的那种波澜起伏。严嵩看起来只是皇帝的一个迎合者，但一些大的事情在他的安排下正在悄悄推进，例如江南的抑制土地兼并和一条鞭法。在一些对外的大事情上严嵩跟嘉靖有着根本分歧，嘉靖主张对蒙古和倭寇采取强硬态度，而严嵩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但严嵩并不敢将他的想法流露出来，只是在遵循世宗意见的前提下再小心应对，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内阁元辅来说，严嵩的日子更艰难，究是如此，倭寇问题在严嵩的主持下也得到了解决，而且为隆庆朝南北同时和议、同时开关打下了基础。

无论严嵩如何风光、如何擅权，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他杀了多少人也好，纳了多少贿也好，其实并不关我们这个帝国的痛痒，它只是文官专制与皇帝的抵触在我们这种官僚政治中的一种反映而已。

嘉靖朝，严嵩一直在如履薄冰的踽踽独行，他是那么小心翼翼，无论跟前世的杨廷和、张璁比，还是跟后世的高拱、张居正比，论专制与跋扈程度，严嵩连他们的背影都摸不着。

8 可怜的皇帝万历

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在嘉靖的最后四年的时间他诞生了，并且存活了下来，嘉靖虽然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神态，但他的内心深处比任何人都要激动，裕王的长子早夭，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无疑成为王朝的世子。

由于良好的成长环境，朱翊钧不似其他皇帝那样从小就担惊受怕，他跟宣德皇帝、正德皇帝一样很小就显露出聪慧的性格，大约三岁半的时候，他就能读书。在张居正成了他的老师后，对他的管教极其严格，小皇子学起习来也是极其刻苦，每天清晨五点钟他就起床，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等在殿外，小皇子开始背书。七点钟开始进早餐，吃完饭休息一下，八点钟开始一天重要课程的学习，学习的内容自然是以四书为主，这样到了十二点钟开始吃午饭。下午从两点钟又开始学习，虽然下午的学习较上午松懈，但也需要对上午的学习内容进行巩固、提高，这样下午小皇子也没有玩耍的时间。

日子就在这么一复一日单调中度过，每年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那就是春节、父皇的生日、自己的生日，即便是在这三个休息日，他也要参加各种礼仪活动。虽然他在出阁读书后，很快当上了皇帝，但过的依然是这种日子，在这方面，皇帝这种公众人物远没有普通老百姓活的自由。

我们这位皇子对于读书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他对身旁的人极其尊重，他甚至能替别人着想。一天皇子在殿外遇到了张居正，他向张居正问道：“先生良苦翊赞。”张居正回道：“愿殿下勤学。”一日皇子看见父皇在宫殿内骑马，朱翊钧说道：“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骋，摔倒了怎么办？”

朱翊钧是个极其孝顺的孩子，每天清晨在早饭之前，他都要去西宫向母亲请安，然后由母亲带着自己去向坤宁宫的王皇后问安。

朱翊钧登基后对他的元辅张先生极其尊重，遇事都跟他商量。一次神宗在文华殿听课完毕，听说张先生腹部疼痛，便亲自下厨调了一碗辣椒面，而且亲自看着张居正吃下去。皇帝与这位张先生之间最令人关注的事情还是开了经筵之后，一天他对张居正说道：“昨日的讲官讲《大学》的时候讲错了一个字，我本想纠正，但恐怕会让他没面子。”

张居正回答道：“讲官小心差错，出于无心之过，望圣上宽容。”

神宗点头答应下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万历作为一个登基不久的小皇帝在听经筵的过程中竟然一丝不苟，连讲官说错了一个字他都能听出来。小皇帝不仅读书认真，对于一些问题他也勤于思考，当他看见周公和孔子的像立在文王的两旁时，皇帝问左右的臣子：“二圣人为什么要旁列？”身边大臣连忙回答：“周公和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他们是文王的臣子，故而要旁列。”

皇帝不仅刻苦学习，对于国家的事情他也有自己的主意，并不是完全听从太后或张居正的意见。隆庆六年，御史胡濙上书以天象示警建议神宗释放宫中的宫女。按理说，此举对于一个新继位的皇帝来说是义举，它可以将那些年老色衰的宫女放出宫去嫁人，但皇帝对此事自有看法。他说道：“如今宫中只有宫女千人，侍奉两宫太后，执掌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尚且不够，更别说要放她们出去，而且有些宫女年纪大了，出去也找不到人家，而且可能还没饭吃。”所以，针对这个提议，万历乾坤独断给否决掉了。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10岁孩子的思维。

除了我们讲述的这些皇帝的特点，我们这位天子还十分的仁慈。太宗皇帝篡位后，不承认建文年号，硬将洪武年号延长了四年，建文皇帝和建文往事成了我们这个帝国所有人不愿意触及的伤痕，但我们这位皇帝却试图在这方面能够正本清源。

在万历登基的头一年，他就下诏在为建文皇帝殉节的文臣家乡建表忠祠，而且给他们的后裔抚恤，万历二年，皇帝又问张居正建文的下落，虽然这个时候皇帝显示出了对建文的关心，但他终究还不敢迈出那一步，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恢复了建文年号，将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去掉，后来在弘光年间，帝国才最终给建文上了一个完整的庙号、尊号、谥号，入继太庙。

我们这位皇帝除了这些性格特点外，他还有一特长，那就是写大字。隆庆六年一次在文华殿读完书，皇帝突发兴致，他让讲官们看他写字，他将纸铺在地上，提起粗粗的毛笔写下几幅直径在一尺以上的大字，他给张居正写的是“元辅”、“良臣”，众人接着皇帝赐予的大字激动不已，他们为皇帝的天资聪颖兴奋不已。之后，皇帝不断在群臣前露手，终于导致张居正对皇帝的劝戒。

“陛下，你的字已经写的很好了，你天纵才华，但是作为君主不应该在这方面浪费太多时间，应该将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你难道忘了汉成帝、梁元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的教训吗？”张居正说道。

张居正的话令这个孩子打了一个激灵，真没想到自己写字也竟然跟亡国之君联系到了一起，他也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处处受到约束，从此他再也没有在人前炫耀自己的特长，他的这一兴趣也就被生生扼杀了，即使在张居正去世以后，他对此也再无兴趣。

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关于这个年幼皇帝的一切都不符合一个孩子的本性，为了展现他合格君主的形象，抑或者在太后、张居正、冯保的

高压之下，他将一个孩子的天性全部隐藏起来，去默默地接受一切。但这种承受之下，孩子的天性还是会偶尔暴露出来。

万历三年的元宵节，皇帝想放烟火乐一乐，但前几年的元宵节放烟花活动都被张居正禁止了，今年他小心翼翼的征询张先生的意见。

“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皇帝问道。

“非。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糜费无益，是在新政所当节省。”张居正说道。

小皇帝满怀期待的神色黯淡了，半晌才说道：“然。”

虽然皇帝像在其他事项上接受张居正的主张一样接受了这次禁止燃放烟花的主张，但皇帝内心深处已经对张居正不满，这种不满皇帝自己并不知道，但是这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它会经过日积月累最终以极大破坏力爆发出来，而此时的张居正却浑然不觉。如果有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又喜欢搬弄是非的人在旁边，那么他就会抓住这些机会，慢慢的，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向皇帝进言，最终搞垮张居正。

皇帝的恭顺绝不意味着这是他的天性，他跟弘治皇帝一样是受压抑的君主，他们本应该有真性情的一面，但特殊的身份和儒家行为规范限制了他们展现自身真实一面，随着1578年皇帝的大婚，这一局面开始改观起来。

由于皇帝已经成家，他脱离了后宫的监督，可以独立的跟太监和宫女在一起，这些从民间来的人自然懂得生活的乐趣，他们知道如何引导皇帝一起玩。从这个时候起，皇帝才知道原来人生可以很精彩，他经常身着紧袖衣衫、腰悬宝刀，在宫女、宦官的簇拥下，在宫内横冲直撞；他也经常喝的酩酊大醉，跟宫女们一起搂搂抱抱；他或者看着太监、宫女们表演着戏曲，或者加入他们其中。

1580年，皇帝已经十七岁了，在一次夜宴上皇帝喝得大醉，他兴致盎然，让两个宫女唱曲，两名宫女推说不会，皇帝不禁勃然大怒，他为宫女拂了他的意思而感到愤怒。皇帝已经怒了，但宫女、太监们还在那里笑，皇帝不禁将桌子一拍大声喝道：“拉出去斩首。”

太监、宫女们这才慌了，两名宫女立刻跪下求饶，太监们也纷纷求情，眼见这些人纷纷讨饶，皇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便松了一口气说道：“本来你们违抗圣旨，理应斩首，但今天以割发代罚。”

说完，皇帝亲自拿起剪刀从两名宫女头上各取下一缕发髻，这些做完后，皇帝憋不住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看见皇帝突然发笑，众人都松了一口气。皇帝扭转头看见那几个求情的太监，不禁又发脾气道：“你们几个着实可恶，给我拉出去棍打。”

也许多年后，你会发现，这位皇帝只适合做一个富贵家的孩子，他并不适合充当君主。万历七年的这场闹剧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冯保将皇帝的行为告诉了太后，太后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她装出十分悲痛的样子，她身着一身素衣，去掉所有装饰，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威胁要废掉朱翊钧的皇位，立他的弟弟潞王为帝。皇帝慌到了，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慈圣皇太后面前苦苦哀求，他甚至在跪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获得了太后的原谅。

事后，李氏跟张居正、冯保商量，将皇帝身边的那些活跃分子全部斥退掉，代之以翰林院的学士们充斥他的闲余生活，就这样，刚刚体会到人生乐趣的皇帝又被以更多的儒家经史子集所充斥。

1580年的事情在皇帝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痕，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的正常氛围下度过必然会对他的身心造成伤害，并在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出来，而由于他的皇帝身份，这种伤害会放大到整个帝国，给整个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

表面平静的1580年，因为一个小事件最终会成为后面一系列大事件的积累，并使帝国几十年来运行疲惫。

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十七日，这天是大明帝国史上重要的一天，皇帝亲自穿戴整齐和文武百官一起浩浩荡荡走在长安街上，一直从午门步行到天坛去祈雨，为了以示虔诚这十多里的路是皇帝亲自走过，北京城的百姓得以一睹天颜。

这位皇帝身体微胖，短须，他的体形像他的父亲穆宗皇帝，但他的眼神却像他的祖父世宗皇帝，万历皇帝步履坚定，他的每一步走的都特别认真，我们不知道这位皇帝要表达什么？抑或虔诚、抑或勤政、抑或其他的东西，但从此的大规模祈雨活动，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所以的确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但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位皇帝仍旧喜欢演戏。

万历皇帝一生最大的亮点大概就在用人上，用知人善任来形容他的确一点也不夸张。神宗在用人上注重官员所具备的从政或从军经验，而不再是资历，他尤其对武将很重视，他试图改变军人那种可怜的地位，承认他们的功劳，不让他们承担政策失误的责任，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宽和，在万历朝我们才可以看见许多武将的精彩人生。

万历十一年（1583年），吏部会推宣大总督郑洛总督京营，四川巡抚孙光裕为南京大理寺卿，会推结果出来后，神宗很不以为然，便召来首辅申时行谈了他对此次人事变动的看法。

神宗说：“郑洛在边疆干的不错，现在放任京城闲职有什么意义？孙光裕去四川没多久为何又推升？”

万历十三年（1585年），万历在平台召见内阁阁臣商讨用人问题，这是中断了近百年的平台召对再次恢复。皇帝的意思是对于边将

还是要久历地方，不能轻易变动。

接着，有人提出应从中枢中推选人才担任边帅，万历否定了这项提议，他说廷臣地方军政经验，应该从久历地方的督抚、巡按中挑选。在整个万历朝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晏处深宫的君主居然有着洞悉一切人才的能力，他比那些宦海沉浮的官僚更能知人善任，只要是他要用的人，无论弹劾多么的惊涛骇浪，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抵住。

不仅在用人方面，皇帝在一些历史观方面也显示出了独特的见解。万历十六年（1588年）二月，经筵完毕，阁臣正要离开，司礼监太监张诚赶了过来，让诸位大臣等一下，皇上有话要问。

张诚说：“皇上问先生们，魏征这个人怎么样？”

申时行答：“魏征敢于直谏，乃是贤臣。”

张诚说：“皇上说魏征先侍李密，后侍建成，再侍世民，乃三姓家奴也。”

申时行答：“皇上说的是事实，但是伊尹先辅佐桀，后辅佐汤，后被称为元圣；管仲先辅佐公子纠，后辅佐小白，孔子称其仁；就是本朝的刘基、陶安、詹同辈皆是故元旧臣，他们也辅佐本朝太祖，所以，魏征仍是贤臣。”

张诚将申时行的话转达了万历，万历仍然坚持己见，他又让张诚去询问对李世民的看法。

张诚对申时行说：“皇上认为唐太宗胁父弑兄，非为明主。”

申时行说：“太宗虽然于伦理有亏欠，但他敢于纳谏，仍称得上是明君，皇上应当学习的楷模是尧舜禹汤，唐太宗何足言哉？”

张诚将申时行的话转达给了万历，稍顷，张诚又过来传达旨意，说以后在经筵中停讲《贞观政要》。第二天，皇帝又让张诚去内阁传话，重申了对魏征的看法，皇上说：“魏征忘君事仇，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万历十六年的这场关于魏征和李世民的讨论实际上发端于文臣在经筵中喋喋不休的讲述李世民纳谏的事例，意思是让万历也听从文官的谏言，皇帝自然对这样的事十分反感，所以这场对历史人物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君主和大臣为了各自利益的斗争。

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为洮州事件皇帝再次谈到了以文驭武的问题，皇帝说：“各地督抚平日里把将官轻贱凌虐，牵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却才用他。如果边将有了功劳，督抚则将功劳居为己有，一旦出了事情，则将责任推给武将。”

皇帝的话令申时行支支吾吾难以回答，的确，在某些方面，这位呆在宫中的皇帝看问题还要比他这位首辅深刻。另外，从万历亲政以来的种种表现，他对帝国的文官制度或者说言官制度深恶痛绝。

在倒张运动彻底结束后，虽然朝堂上还有关于张居正的一些争论，虽然还有人将自己的政敌往张居正那个阵营攀扯，试图以此种方式消灭对手，但万历皇帝显然对这些事情已经不再发生兴趣，万历十三年关于张居正的一切争论已不再是帝国的政治议题。

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十四年皇帝在亲自处理政务中度过，他对用人、边防、农田水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无疑比内阁阁臣们更成熟。一个从未走出宫门，并无太多行政操作经验的皇帝竟然比辅臣看问题还透彻，只能说张居正之后的辅臣已经集体进入守旧状态，无人再敢革新，无人再敢担待。

当万历亲政后，他发现对于一些事情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官员们，尤其是低级官吏们不断加以阻挡，甚至是上奏疏指桑骂槐，在一些问题上他甚至要跟内阁大臣商量着来解决，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文官厌恶起来。

神宗与申时行之间的召对录是研究万历一朝的重要钥匙，申时行作为文官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带，它直接反映了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走向。

一日神宗将首辅申时行唤进来，他从袖子里拿出来两份奏疏，原来是吏部员外郎顾宪成和刑部主事王德新的奏疏。顾宪成和王德新的奏疏主要是针对皇帝庇护内阁大臣而发，因为万历第二个十年局势依然艰难，文官们互相攻击诋毁，通常都是由一些芝麻大的小事情引发大的政治风波，从而导致一批人丢官，这些下野的文人更会在民间推波助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团体的利益，而不再是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帝国终是滑向无序与混乱。

顾宪成和王德新在奏疏中要求皇帝维护科道言官的利益，不要对内阁阁臣太过于偏就，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申时行对顾宪成和王德新的处罚只是罚了俸禄了事，皇帝召申时行来就是为了这个事。

“先生拟的太轻，还要改票来。”皇帝对申时行说道。

“这两个人太过于狂妄，皇帝量同天地，何必要跟他们见识呢。”申时行说道。

“这两个人背后一定有主使之入，先生去查清楚幕后主使之入。”皇帝又说道。

“像这种建言的人，有的是忠诚之人，不知道忌讳；有的是愚昧的，只是道听途说，未必背后都有人主使。”申时行反驳道。

“还是沽名卖直的多，如果不重处，这些人就不会停止。”皇帝说道。

申时行还想辩解，万历已经不耐烦道：“先生还是改票吧。”

结果顾宪成调任外地连降三级，王德新削职为民。

虽然神宗亲政后他试图管理好这个国家，他也很勤奋，上朝、批阅、经筵、祁福、祭祀这些封建君主的日常工作他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但是直到这个时刻他终于体会到治理国家的难度性，他的意见通常得不到执行，他甚至要向内阁阁臣哀求来更改票拟，他开始绝望了，这就像兴冲冲做事的孩子，一旦遇到挫折，一旦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便开始畏难，开始心灰意懒。

当前面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当时任首辅申时行只是充当一个和稀泥角色的时候，这位皇帝所有的抱负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皇帝因病连免数日的早朝，到了二十六日群臣聚集在太和殿前等待早朝，但宫内传来的消息仍是免朝，群臣盘桓不愿离去，一定要让宫里给一个何日上朝的说法，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三十日上朝。三十日群臣又来到殿前，结果内侍传出话来说：“皇上说他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要求休息。”

内侍的话顿时令群臣哗然，人们纷纷离场，开始了各自的盘算。很快有官员上疏万历，说皇帝身体不好是因为房事过多，希望皇帝能够爱惜身体。收到奏疏的万历勃然大怒，他忙将申时行喊来，命他票拟处罚。申时行一面票拟，一面上疏补救，申时行的票拟皇帝不满

意，他绕过内阁直接发布谕旨将这名上疏的官员杖责六十，削职为民，永不叙用。

事后，皇帝还解释道：“朕的毛病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言官总来烦人让朕动了肝火。”实际上皇帝这个时候也的确身体出现问题，我想大概是高血压的可能性较大，万历本来较胖，食物中含蛋白质又多，平日里运动少，再加上与文官们的关系总是令人不顺心。我们也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皇帝在自身身体不佳的情况下，他正好以此为借口免了与文官之间的沟通，因为在他日后身体好的时候他依然不再上朝。

皇帝上不上朝对于国家来说已经没有区别，此时的帝国依靠的是文官系统的惯性在运作，皇帝只充当好垂衣拱手的天子即可，任何的独断专行都会招致文官们的激烈反对，但这绝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不上朝。他们希望皇帝能充当好各种礼仪的角色，早朝、经筵、郊祀、庙祭，这些活动都要有条不紊的进行，总而言之，君主是要像木偶一样任文官们摆布。

9 皇权衰弱下的国本之争

万历的皇后王氏是锦衣卫千户王伟之女，万历六年皇帝大婚后，她被册封为皇后，当时皇帝十五岁，她十四岁，万历九年王皇后诞下皇长女，从此皇后再也没有生下男孩。也许都是低微出身的缘故，也许都是没有男孩的缘故，这位王皇后跟英宗的钱皇后、宪宗的王皇后一样显得低调而随和。

眼看皇室一直无男孩，太后便和张居正商量册立嫔妃，万历十年三月册封了九位嫔妃，其中就有皇帝后来宠爱的郑妃。但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万历九年皇帝跟太后宫中一位宫女发生关系导致这位宫女怀孕，到了万历十年此事已经公开化，在太后的干预下，皇帝将这名宫女封为恭妃。这名宫女也唤王氏，是锦衣卫指挥僉事王朝襄的女儿，在她还是幼儿的时候被太后看中，成为伺候太后的宫女。

万历十年八月份，王恭妃产下一男婴，虽然这是举国臣民欢庆的时刻，但万历皇帝却显得心事重重。他对这个男孩的母亲并无感情，此时他的感情有了依托，那就是德妃郑氏。郑氏是北京郊区大兴县人，父亲郑承宪，哥哥郑国泰，寻常人家。郑氏相貌标致、聪颖伶俐、热情大方，她能够陪皇帝读书，她懂皇帝的心思，她把皇帝当做一个平常人看待，最重要的是天下人都抛弃了皇帝，她不会抛弃。这才是皇帝喜欢她的真正原因。

这位皇帝小时候就处在铁三角的威压之下，亲政之后仍是郁郁不得志，没人体会到他那份孤独的心情，诺大的帝国，空荡荡的紫禁城，只有郑氏才是皇帝的陪伴者，她知道皇帝的苦闷、无助，她也不断给皇帝打气，充当他的后援，如果没有郑氏，这位皇帝能不能活到万历四十八年还是一个问号。

十一年，郑氏生下了皇二女，皇帝加封她为贵妃，位于王恭妃之上，此举大大不合礼法，因为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在后宫中终身要排在第二的位置，即便王皇后死去，皇后的位置也是她的，儒家的礼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它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秩序性。

皇帝对郑氏的喜爱已经不再是秘密，针对皇帝封其为贵妃，群臣反对的奏章一件件被送进宫来，在这方面郑氏显得比皇帝老练的多，她直接让皇帝留中不理。

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因为对于他的生母的偏爱，皇帝对这位朱常洵倾注了过多的关爱，而此时由于皇二子的夭折，这使得朱常洵成为事实上的皇二子。皇帝对朱常洵的溺爱，已经使得群臣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性，立储问题解决不好，所有的人心都会不安。

按照年头算，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个年头了，首辅申时行上疏说，“皇长子已经五岁了，请陛下早立为太子，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神宗接到首辅的上疏只批复一句：“皇长子年龄太小，等过两三年吧。”

官僚们已经吹起进攻的号角，不知道皇帝此时此刻知道不知道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场延续三十年的战争。皇帝是明白人，他这头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将郑氏由贵妃提拔为皇贵妃，消息一出，舆论又是一片哗然。户科给事中姜应麟说：“郑贵妃虽然是贤惠，但她所生的只是皇三子，而恭妃所生的是长子，恭妃怎么能居于郑妃之下呢？伦理不顺，人心不安，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顺应舆情。”

神宗接到这份奏疏自然又气得不得了，虽然处罚了姜应麟，但更大的反对浪潮开始一波一波的涌了过来。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雒于仁上了那道《酒色财气四箴疏》，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皇帝将内阁一千人等叫进毓德宫，在谈完雒于仁的问题后，申时行将话题一转，提到了国本问题。

“如今皇长子已经九岁了，中外已经沸沸腾腾了，还是早立下来。”申时行说道。

“这事我知道，朕无嫡子，自然遵循长幼伦序，郑妃怕外面有疑，也是催促立长子为太子，但长子身体一直很弱，还是待他身子骨长结实了再说吧。”万历的一个太极拳将申时行的提议推了回来。

要说皇帝和申时行两人都特别会演戏，他们的一问一答看似都是废话，但却反映了高层博弈的新阶段。

眼见万历如此装聋作哑，申时行不慌不忙又抛出一个新的议题。

“皇上，皇长子已经九岁了，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皇上当年六岁就读书了，现在春天来了，臣等恳请皇帝趁此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申时行说道。

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等于承认了皇长子的皇储身份，将来再想改过来就难了，这些皇帝岂能不知。皇帝说道：“读书这个东西看资质，朕五岁能读书，但皇长子就不行。”

“资质这个东西还是看后天豫教的，我看皇长子资质聪颖。”申时行反驳道。

此时万历皇帝已经不耐烦了，他摇摇手示意申时行等人退出去。正当申时行等一班内阁大臣步出毓德宫向外走去的时候，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内侍走过来说道：“皇上已让人唤皇长子来，让先生们见一见。”

申时行听这么一说立刻停了下来。不大会，皇帝又命太监出去询问申时行等人听说能见到皇长子欣喜否，太监出去询问了一下，回来报告皇帝说诸位阁臣欣喜非常。万历听见后，笑着点了点头。

不久太监出来喊道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到了，内阁大臣们这才又重新进入毓德宫。只见皇长子和皇三子站在皇帝的身旁，这是大臣们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两个儿子，只见皇长子朱常洛瘦高的个站在那里，显得柔弱而可怜。

但内阁大臣并不这么想，能得见皇长子尊严，他们显得异常兴奋，连忙齐声赞叹，皇帝谦虚了一下。

申时行接着又延续了刚才的话题，皇帝说道：“已经让太监们教皇子读书。”

申时行又说道：“皇上六岁就读书了，皇长子即使现在出阁读书也是晚了。”

“朕五岁就能读书了。”皇帝又一次纠正了申时行。

接着，申时行又凑过来仔细看着朱常洛，屋内光线昏暗，看不仔细，皇帝亲自将朱常洛引到亮的地方让申时行看个仔细。

申时行看完后说道：“圣上有此美玉，何不仔细雕琢啊！”

神宗叹了一口气道：“朕何尝不知，皇贵妃也一再让朕如此，只是朕考虑到他不是嫡子。”

申时行接着又说了一句客套话，便跟众内阁大臣退了出去，万历十八年春节这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这次谈话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为什么申时行一再强调皇帝六岁就出阁读书，而皇帝本人却一再更正自己五岁就能读书。皇帝是想强调读书的资质问题，意思是没有资质，即使年龄大也没有效果。而申时行偏偏不顺着神宗的思路往下说。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两次提到郑贵妃也劝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此举完全是维护郑贵妃，平息外界的舆论压力，但皇帝强调这点完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皇帝提到朱常洛不是嫡出，万一将来王皇后又产下男孩怎么办？那么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皇帝不立太子究竟是因为朱常洛是庶出，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才初步确立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这就说明万历皇帝绝不是嫌他是庶出才不愿意立其为太子，真实的原因仍旧是郑贵妃所生的那个小皇子朱常洵。

第四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这次召对录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申时行等人第一次退出去的时候，皇帝又让太监唤他们回来，说让他们瞧瞧朱常洛，难道皇帝对这位儿子有着浓浓的父子之情。真相绝不是这样，这位皇帝又在演戏，他希望通过此举在群臣面前展现一幅父子情深的场景，来让文官们相信自己绝不是不想立这位孩子为太子，从而缓和内外气氛。事实表明，这样的戏皇帝以后还会继续表演。

万历十八年正月间皇帝的这场戏是失败的，他本想在群臣面前展现父子情深的场景，谁知却给文臣们以更大的遐想空间，人们认为这位皇帝是想立皇长子为皇储的。

从二月份开始，内阁大学士们不断上疏，要么要求册立东宫，要么要求对皇长子进行出阁预教，万历这才发现自己弄巧成拙。到了四

月份，内阁大臣竟然以集体辞职来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又打起了太极拳，他传令各部衙门、科道官员，明年开始准备东宫册典大礼，后年正式册封。

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又在演戏，我们这位皇帝根本没个皇帝的样子，他完全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说话婆婆妈妈、罗罗嗦嗦，家长里短非常在行。既然知道皇帝又在演戏，大臣们自然不肯放过，万历十八年的国本之争骤时突兀起来。

册立东宫，礼部当然是首当其冲，礼部尚书于慎行率领全体礼部同僚上疏催促万历立即正位东宫，神宗大怒，罚于慎行和他的同僚们三个月的俸禄。

万历十八年的争论就此结束，很快到了万历十九年，整个一年没见任何动静，群臣又将准备新一轮的攻击。此次攻击不是由内阁阁臣发动，而是由低级官吏发动，最后仍然是由内阁阁臣联名上了个奏疏。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四辅王家屏联名上了一道奏疏，奏疏是由许国草拟，许国将申时行的名字列在了第一个。

皇帝看完奏疏后命内侍去责问申时行为何跟小臣混在一起，申时行有口难辨，只好说他们将我名字列上去了，我根本不知道。

虽然如此解释，但谨小慎微的申时行还是内心不安，于是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在密揭中申时行说道：“臣不知道他们联名上疏的事情，圣上既然有自己的计划，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来，不要因为一些小臣而妨碍册立大典。”

神宗看完这张密揭，还随手批复了一句，但神宗却将这张密札跟其他奏折混到了一起，这些经过批复的奏章将会转到内阁，再由内阁

下发到六科，申时行写给皇帝的密揭到了科道官员手里其结果可想而知。

这份密揭最终到了礼科给事中罗大紘的手里，罗大紘将申时行的密揭捅了出去，指责申时行阳里一套、阴里一套，后来申时行府上来人将这份密揭要了回去，罗大紘再去要时，申时行竟然不给。

神宗接到罗大紘的奏疏将罗大紘流放边疆，申时行也上疏补救，皇帝的处罚和申时行的行为在帝国引起了激愤，人们纷纷将矛头对准申时行。很快，这种攻击的矛头由申时行本人转移到全体内阁大臣，这些低级文官得出的结论是内阁大臣在立储问题上集体跟皇帝合谋，背叛了全体臣僚。

这个罪名是令人可怕的，在内阁三辅王锡爵已经辞职的情况下，内阁首辅申时行和内阁次辅许国也被迫致仕，此时的内阁只剩下礼部侍郎，四辅王家屏。

在申时行和许国辞职后，皇帝将赵志皋、张位补进了内阁。万历二十年的形势更加艰难，在申时行离去后，内阁再也不敢再跟皇帝保持一致，即便在立储问题上皇帝屈服了群臣，在其他事项上也不会换取文官的合作，所以关于国本斗争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儒家伦法原则，而是皇权政治跟文官政治的较量问题，不管皇帝与文官本身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斗争更加激烈化，元月份，礼科给事中李献可上疏要求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皇帝将李献可的奏疏下到内阁，让王家屏开票处罚，哪知道却被王家屏原封不动的驳了回来，而且还附上了王家屏自己要求皇长子预教的奏疏。

皇帝依然不依不饶，坚决要处罚李献可，科道言官一共十几人纷纷上疏，他们都遭到罢免或杖责，在这种情况下首辅王家屏于三月份致仕。

王家屏既去，老迈的赵志皋成了首辅，神宗看他那个样子也很为难，便将王锡爵又召了回来。王锡爵回到朝堂后立即上疏要求皇帝册立东宫，皇帝却让一名内侍在深夜来到王锡爵的府上带来了皇帝的密函。

皇帝在密信中写道：“立储规则为立嫡不立庶，现在皇后还年轻，万一将来皇后又生子，到时候该如何安置？所以朕的意思是将常洛、常洵、常浩三子一并封王，等数年后皇后再无男嗣，再行册立，卿就按照朕的意思拟一票来。”

王锡爵看完这道密函后，犯起难来，这很明显是皇帝又在演戏。皇帝想通过三王并封来消除皇长子与皇幼子在身份上的差别，然后再从中捣鬼。

如果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内阁的工作也不好开展，如果顺从皇帝的意思，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锡爵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他给皇帝拟了两票，要么让皇长子认皇后为母，这样可以解决皇长子的嫡长子身份，或者将三个皇子实行三王并封，但同时定下何时册立东宫定下一个时间表。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在王锡爵刚刚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宗突然发出三王并封的旨意，并说日后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群臣等了几年，不仅没等到册立皇长子的旨意，反而等来了三王并封，顿时有了被欺骗感觉，群臣纷纷指责皇帝言而无信。

光禄寺丞朱维京说“待中宫生嫡”向来无此成制，刑科给事中王如坚的措辞更加尖锐，他直接质问万历皇帝，“你将立储问题从十四年推到十八年，从十八年推到十九年，现在又推到二十一年，我们还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却来个三王并封，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让人如何信服？神宗接到王如坚的上疏气的浑身发抖。

礼部接到三王并封的旨意也打了个太极拳，礼部提出册封太子礼和三王并封同时举行，对于此议，神宗根本不理睬。群臣纷纷涌入内阁质问王锡爵，双方开始破口大骂，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王锡爵被迫收回这两张票拟，但皇帝那里并不屈服，万历绝望的对王锡爵说道：“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若自认错，置朕何地？”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这位皇帝屈辱的低下了他的头颅。

这是文官政治的胜利，这是帝国士大夫们的胜利，为了我们的华夏伦理，为了他们的信仰与教条，他们前仆后继，不惜丢掉生命与官职，士大夫们的不屈不挠精神坚守了我们的道德底线，也正是他们的力拼才维护了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17世纪的时候，儒家思想的链条越牢牢拴在了每个人的脖子上，而且越来越紧，在那个波涛汹涌的万历时代，高端的政治脉络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节。

万历虽然取消了三王并封的旨意，但他还是以没有嫡长子为由，要求再缓两三年立储。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来质问道：“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如何能来嫡长子？”

万历连忙解释道：“去年冬天皇后身体染恙，朕已经看过了。”皇帝也知道此种解释是苍白无力的。这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锡爵进行了第一次见面，自从这位首辅上任以来，皇帝才第一次召见他。王锡爵还是老生常谈，皇帝自然很厌烦。回去后，王锡爵上了一道奏疏，他说

道如果久不立太子，外间就认为是郑贵妃在搞鬼，为了消除郑贵妃的嫌疑，皇上也应该立刻立储。

王锡爵这一招的确狠，他直接击中了皇帝的那个敏感部位，皇帝之所以一再强调郑贵妃也是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就是因为他害怕外界对贵妃有什么非议，真是害怕什么来什么，王锡爵的话引起了皇帝的不安，他只好先答应万历二十二年让皇长子出阁读书。

虽然朱常洛能够出阁读书了，虽然他开始向着太子之位迈出了艰难一步，但皇帝对长子的学习并不重视。按规制，先生授完课后应该赏一顿酒饭，但给常洛授课的先生需要自带饭食，而且连笔墨都要自备，过去打赏的钱也没有了，每年三十两银子的薪水，比民间的私塾先生还低，而且还要步行数里去上课。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朱常洛自然是备加珍惜，他认真听讲，不像他的先祖正德皇帝那样不耐烦。

朱常洛既已出阁读书，那么册立为太子的事情则已经是箭在弦上。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从小臣开始又启动了一轮政治运动，并波及到内阁阁臣，这次政治请愿除了要求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外，还要求皇长子尽快大婚。

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从小臣到阁臣，再到勋贵、驸马一起上疏神宗皇帝要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并进行大婚，到了此时，皇帝的固执早已经遥遥欲坠。但到了这年的秋天，朝中又流传一个耸人听闻的大事件，有人说皇帝之所以对立太子之事拖而不办就是想等皇后死掉，然后立郑贵妃为后，从而解决朱常洵的嫡长子身份问题。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宪法上来讲即便皇后死掉，继承皇后之位的也应该是生下长子的王恭妃，另外，即便是郑氏成为皇后，他的儿子也不具备嫡长子的身份，因为嫡长子讲究的是原配，无论从宪法的哪一

条看，朱常洵都没有皇位继承权。但是皇帝以此为借口，又暂停朱常洛的册封礼。

万历二十九年，在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内阁次辅沈一贯几次硬顶的情况下，皇帝终于最后妥协。在历经十五年纷纷扰扰的中外压力下，万历皇帝终于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同时举行加冠仪式和大婚礼，三礼仪式结束后，皇帝还专门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时行、王锡爵，感谢他们在立储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到了这一刻，神宗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么多年的政治斗争，为了一个女人，他疲倦了。

虽然朱常洛被立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本之争的结束，在朱常洵仍旧滞留京城的情况下，关于皇位继承问题依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炒作，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朱常洵就藩洛阳才彻底结束，那么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上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奏疏算起，一直困扰了帝国近三十年。

我们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农耕帝国，在这里不需要什么激荡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权力的平稳过渡，因为这样才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当来自西部那个强大的民族灭掉了辉煌一世的商王朝时，我们这个民族彻底告别了渔猎时代，迎来了崭新的农耕时代。为了统治那些蛮荒没有经过开发的土地，周王朝实行了分封制，为了解决权力的继承问题，又实行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这种互为表里的政治机构保证了农耕帝国的稳定性，从而使周代延续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礼乐制度，使我们这个民族开始懂得脸耻，也体面起来，同时，嫡长子继承制更是深入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种继承制度不仅适用于王位，也适用于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权力的继承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抗衡传统的惯性，因为它只需要一种利益的分配规则，通过减少利益参与者的数量来保持一种稳定的政

治结构，正像我前面所讲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选优，它只需要君主充当礼仪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这场国本斗争中，无论万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违背了这一原则，他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

万历年间的这场斗争我们应该感谢所有为了维护这种原则而努力的官僚，特别是要感谢申时行和王锡爵这两位首辅，尤其是王锡爵，如果不是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的硬顶，皇长子就不会出阁读书，而皇长子的出阁读书正是向皇储迈出的关键一步。

10 明宫三案中被当猴耍的皇帝

万历二十九年的苏州民变已经表明这个农耕帝国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成份，君主随心所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君主权力被限制的同时，舆论也早已民间化，万历朝，朝野之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宫里的事情，士大夫家中的事情，甚至军事秘密都无法保证隐私，而且明朝人还好八卦，越是私密的段子，越能引起市民们的兴趣，乃至编成曲来唱。

虽然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立常洛为太子，但是福王并没有离京，郑贵妃依然在皇帝面前吹着耳旁风，对于斗争集团来说，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什么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所以这就需要未雨绸缪，在这种情况下，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开始运作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来打击郑贵妃势力，以稳定体系内的利益。

吕坤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间内，将历史上的烈女事迹编成一本书，名叫《闺范》，司礼监太监成炬去山西从书市上购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见后，对于书中没有自己的事迹感到很遗憾，她便自己写了个序，又命人增补了十二篇，将自己的事迹也加了进去，改名为《闺范图说》，并令其兄郑国泰再版发行。

贵妃郑氏此举的确不妥，自己本来就处在风口浪尖上，现在又借修书抬高自己，只能是火上浇油，文官们对此肯定不满，但又不好公开表达，于是便通过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来攻击，明朝将这种匿名大字报叫妖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受郑贵妃重刊《闺范图说》所带来压力的影响，吕坤上了一道《忧危疏》，他让皇上节约开支，罢征矿税。吕坤此举完全是给这些正愁没处下口的官员们开了一个口

子，很快一份匿名书出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这份匿名书名叫《忧危竝议》，署名人为朱东吉，《忧危竝议》的内容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基础上进行展开，因为《忧危疏》主要谈的是矿监税使问题，并没有谈到国本问题，所以《忧危竝议》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大谈国本问题，通篇充满了主观意淫。

朱东吉：“我看了《闺范图说》之后，感到此书虽然没有涉及易储问题，但吕坤明显是想让福王朱常洵接替太子位。”

另一人：“不可能吧，吕坤乃忠义之士，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

朱东吉：“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另一人：“吕坤既然想通过此书来给天下妇女树立楷模，为何不让朝廷进行官方刊印出版，反而要自己私刻？”

朱东吉：“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孔子见南子的时候，其目的是为了宣传思想，并不是因为南子身份尊贵而屈尊于她。既然如此，吕坤为了他的阴私目的，也不会为了整饬风化而刻意要让官方出版。”

另一人：“吕坤在这本书中对前朝的皇后大加赞赏，这让本朝的皇后情何以堪啊！”

朱东吉：“你见到自古以来有给现任宫妃写传的吗？肯定是吕坤受了某些人的恩惠。”

另一人：“从古至今贤惠的皇后多矣，为何偏偏要挑中明德皇后，将她放在第一位，明德皇后贤德的事情也多的去了，为何要单单强调明德皇后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

朱东吉：“吕坤自然有他的理由，他会说，明德皇后也无子，即使成为皇后，也是跟当今的郑贵妃在某些方面类似而已。所以，你是说不过吕坤的。”

另一人：“大家都说吕坤因为阴谋败露，所以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开脱，这岂不是欲盖弥彰。”

朱东吉：“可不是嘛，《忧危疏》表面上看起来是忠肝义胆，实际上是装模作样。”

另一人：“我见《忧危疏》中说了很多事情，单单不提国本问题。”

朱东吉：“你怎么才发现呢？人们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忌讳提及，很多事情只能意会，不能言明，他吕坤还不知道这些吗？”

另一人：“唉！吕先生写此书可能也是有苦衷，我们应该体谅他。”

由于这个时候皇帝还没有立太子，文官们借着写匿名大字报的方式将郑贵妃编书的目的揭露出来，那就是郑贵妃自比明德皇后，想担任皇后，其目的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太子位，这份《忧危竝议》表面上是打吕坤，实际上是打郑贵妃。

《忧危竝议》一出，吕坤就知道惊涛骇浪即将来到，他便提前辞去了职务。

果然，一位叫戴士衡的吏科给事中上疏弹劾吕坤包藏祸心，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替郑贵妃抬轿，然后又上了一道《忧危疏》来替自己解脱。事实上，郑贵妃只是将吕坤的《闺范》进行二次加工

而已，并不关吕坤任何事情，但是由于它是畅销书，而郑妃又将自己列进《闺范图说》之中，这自然有利于扩大郑贵妃的影响。

戴士衡的上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郑贵妃反而哭诉说《忧危竝议》这份大字报出自戴士衡之手，万历便将戴士衡充军广东了事。万历的确跟郑贵妃夫妻情深，他亲自出来替贵妃解释，说《闺范图说》是朕赐给贵妃看的，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挑事了。

《忧危竝议》明显是人微言轻的低级官僚之手笔，既具有八卦性质，又具备恶毒的政治攻击性质。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了太子，但福王迟迟不去藩国就藩，群臣的心依然无法安宁。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城又现妖书，而此次妖书案明显是高级官僚在参与，不仅涉及国本问题，更涉及到党争问题。

十一月份，京城家家门口出现一份小册子，册子上的题目为《续忧危竝议》，看其样子是万历二十六年的续集，其内容是说郑贵妃想让皇帝废掉太子，改立福王为太子，而且还将内阁首辅朱赓牵扯进来，内容仍然是采取一问一答方式，虚拟了一个叫郑福成的人，署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编撰，御史乔应甲手书。

一人问郑福成：“今天下太平，太子也立了，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郑福成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当今的形势好比将火种放在材薪之下。”

一人问：“你的话太危言耸听了，难道太子的位置不稳吗？”

郑福成：“是的。虽然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但是东宫至今一个官吏都没有配备，怎么能够说天下就太平了呢？因为沈一贯的请求，皇帝才立的东宫，但是现在却不配官，就是为了将来改立东宫。”

一人问：“改立谁？”

郑福成：“当然是福王了。”

一人问：“你怎么知道？”

郑福成：“满朝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用朱赓，‘赓’者‘更’也，就是要将来更立太子。”

一人问：“有道理。但用朱赓难道就能改立太子吗？不怕大家反对吗？”

郑福成：“这个你就知道了。天下趋炎附势的人多了去了，皇长子能立为太子，难道次子就不能立吗。”

一人问：“这些趋炎附势的人都是谁？你能说出来吗？”

郑福成：“这有何不可说的。王世扬、孙玮、李汶、张养志、王之祯、陈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郑国贤、郑贵妃，此其十乱也。”

一人问：“沈一贯难道就不出来说话吗？”

郑福成：“沈一贯为人阴贼，他只会趋利避祸，让他出来说话，没门。”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写此书的人明显是针对皇帝不配备东宫官吏而来的，这是对皇帝的警告，撰写此书的人希望能以此逼迫皇

帝从速给东宫配备官吏，从而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消于无形，从这方面来讲，这份匿名大字报无疑具有极强的正面意义。

但此书又涉及浓厚的党争色彩，编写之人除了要达到警告皇帝的目的，还要打击沈一贯和朱赓。我们知道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这些阁臣都是因为在国本问题上没有逼迫皇帝太急而遭到小臣的唾骂，但阁臣和小臣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考虑的角度不同，阁臣是从全局考虑，他不可能像小臣那样激烈，那样的话只能让皇帝与大臣之间失去缓冲，将事情弄糟。这些小臣们不理解，也不需要理解，事实上，也正是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的力争才使得“国本之争”获取最后的胜利，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小臣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

我们还要提及从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开始，朝野反对阁臣的小臣逐渐形成一个团体——东林党，而在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中，这个团体的人遭受重创，所以，此次匿名大字报事件明显带有党争的色彩。

而妖书中提到的十乱分别是：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三边总制李汶、光禄寺少卿张养志、锦衣卫左都督王之祯、京营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王承恩、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以及郑贵妃。这十人都是在国本之争中倾向于皇帝和沈一贯一边的文官和武官。

神宗接到妖书事件的奏报后，立刻命东厂陈炬查察此事，由于沈一贯跟内阁沈鲤一直有隙，加上沈鲤跟东林党人走的较近，所以沈一贯说妖书是沈鲤的学生——礼部侍郎郭正域——所作，为此沈一贯派人将与郭正域有关的人全部抓捕归案，进行严刑逼供，逼供的结果并不理想，还打死了一些人，看来沈鲤跟此事并不关联。

由于京营捕快陈汝忠被牵扯到妖书一案，所以他在抓人过程中非常卖力。他将郭正域的师爷毛尚文、郭正域的医生沈令誉抓捕归案，

又由于考虑到小孩子不撒谎，陈汝忠又将郭正域奶妈龚氏的十岁女儿带来作人证。到了三法司和厂卫会审那天，东厂的陈炬问那十岁小女孩：“你看到的妖书有几张？”

由于那小女孩根本不知妖书是什么东西，便胡乱答道：“有满满一屋子。”

案子还没有破，办案人员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京城也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厂卫会跑到自己家里来抓人，在这种情况下，三法司找了一个被顺天府革籍的秀才缴生光顶罪了事。

从两次妖书案我们可以明显看见正是由于皇帝在国本问题上一再采取拖延和暧昧的行为导致群臣的忿恨，只能采取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同时迁怒于那些态度阴晴不定的阁臣。一个国本问题使得万历王朝一直笼罩在阴霾之中，这位身材微胖的皇帝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它一定还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

万历三十三年，太子朱常洛的侍妾王氏产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明熹宗朱由校。按说皇长子产子这是好事，但神宗只给王氏封了个才人，并且不允许朱常洛和他的母亲相见。到了朱常洛母亲死了之后，葬礼又极其简单，不久，太子妃死后，葬礼又极其草率，加上东宫内不仅连官吏没有配备，侍卫和宦官也少的可怜，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这个太子只是临时的，他随时有可能被废掉。这个时候太子的母亲已经死掉，一旦皇后逝世，那么郑贵妃名正言顺的将成为皇后，到时候，一切还都是变数，所有人心中都在暗暗发急，这个时候，在文官们的运作下，一个新的阴谋诞生了。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由于此时的慈庆宫没有多少人把守，那名男子举着木棍一直闯了进来，途中遇见一太监，那名男子举棍就打，然后又往里闯，在太子居住的大殿前被侍卫和几名太监抓住。

经过审讯，此人交待名叫张差，蓟镇人氏，但此人明显智商有问题，说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大明朝已经发生过两次了，嘉靖十八年，文官们为了反对皇帝南巡，让一个叫孙堂的军人跑到宫中大喊大叫；万历元年，张居正和冯保为了诬陷高拱，从戚继光军营中弄了一个叫王大臣的智障军人携带匕首进入宫中，说要刺杀皇上。这次文官们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变故，不知道从哪里又找了个智障人士来演戏。

张差举杖闯入东宫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人们自然将矛头对准了郑氏。负责此事的刑部主事王之寀进入牢房提审，他看见张差傻乎乎的样子说：“说不说，不说不给饭，饿死你。”

王之寀又摈退狱中的差役，张差这才说道：“小人小名张五儿，蓟州井儿峪人，父张义，病故。舅舅和岳父让我跟不知名的老公公走，说事成后给你几亩地用，够你受用。老公公骑马，小的在后面跟，初三歇燕角不知名店铺，初四到京。”

“你到京后住在什么地方？”王之寀接着问。

“到不知街道的大宅子，一老公公与我饭，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然后便给我木棍，领我进了宫门，守卫拦我，我拿木棍击他，后来老公公多，我才被抓住了。”张差说。

张差说的都是实情，是宫里的老太监去京郊花钱让人找了一个智障人，张差的舅舅和岳父肯定收了钱，那么关键的问题是谁在幕后策划了此事。很明显，一个智障人士拿根木棍是打不死太子的，所以，幕后策划者只是想把水搅浑，那么此次的挺击事件是文官集团的一次策划，旨在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太子不利情况，可以说，文官们真的是用心良苦。

面对大明王朝又一次诡异事件，皇帝想将它淡化，但官僚们不依不扰，他们上疏指责皇帝对太子冷淡，以及郑贵妃和他哥哥国泰是幕后主使。

五月十一日王之寀在狱中的突击提审取得的应该是事实真相，因为张差说的是不知名老公公，让他打人，没说打谁。但到了五月二十一日，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张差又说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而且让他打小爷，明显在二十一号这天，张差出现了翻供。那么在这十天的事件内，是有人去狱中，让他将矛头往郑贵妃身上扯。

无论皇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他都不想追究下去，以免他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二十八日清晨，皇帝又像万历十八年在申时行面前做秀一样破天荒召集在京的所有官员，这是自万历十九年起皇帝首次公开在群臣面前露面。

群臣来到慈宁宫外，发现仪式庄重，皇帝一身白衣，皇太子、皇孙朱由检、朱由校，还有两个皇孙女也站立在一旁。群臣跟随皇帝向已亡的李太后牌位行叩礼，然后皇帝开始发话了，皇帝说：“有人离间我们父子，自己的儿子自己养到三十多岁，又生了这么多皇孙，焉有不爱之理，而且福王已去洛阳就藩，非宣诏不得入宫。”

接着，他举起朱常洛的手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这时候，御史刘光复跑出来说话，神宗由于身体虚弱、头晕目眩使他听不清刘光复的话，神宗便斥责刘光复不要再说话，哪知刘光复仍然喋喋不休，非要把话说完，皇帝大怒，连声厉声喝道：“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结果，无人应，皇帝只好让几个太监将他捆起来。

许多大臣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如此动怒，首辅方从哲连忙出来说道：“无知小臣，请皇上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赶快给太子讲课要紧。”

“如此大事，朕岂能不知，但现在正在太后服丧期间，你每看我所穿何服？”

接着，皇帝又举起皇太子的手问道：“你每都看见否？如此儿子，我哪有不爱护的？你们有这样的儿子，难道不爱护吗？”

然后，他又让人将皇孙和皇孙女在石阶上依次排开，在群臣面前亮相，以打消群臣的疑虑。

接着，他又说道：“朕与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祖母都知道，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是奸臣。”这句话，皇帝连说了几遍，语气加重，以示警告。

然后，皇帝又扭过头来对朱常洛说：“你有何话？对诸臣说。”

朱常洛首先肯定了万历的意见，接着说道：“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虽然万历皇帝疯疯癫癫的说了一大堆，但他说的并没有自己的儿子到位，尤其是“无君之臣”这个词说的语气已经很重了，朱常洛似乎对于“梃击案”的真相察觉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他不会说的这么重。

万历听他儿子这么说，也赶紧说道：“你们听见皇太子说的么，他说尔等离间，为无君之臣，将使他为无父之子。”

神宗说完，赶紧示意首辅方从哲回话。万历四十三年的这场闹剧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张差、庞保、刘成被判死。最后皇帝再一次面对跪在地上的群臣抚摸朱常洛的头问道：“尔等俱见否？”

“都看见了，皇上。”

由于此次召见来人众多，慈宁宫外摩肩接踵，显得拥挤不堪，众人在退出的时候，队伍更显混乱，从来没有如此近在咫尺的一睹天颜、聆听教诲，群臣个个受宠若惊，莫不欢欣鼓舞，都说是四十年来未有之盛世。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驾崩，享年57岁。

在皇帝死后，朱常洛随即发布一系列诏令，从内库中发银补充军饷，召回矿税中使，补充缺位官僚。在万历临死前，他给儿子朱常洛交待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来立郑贵妃为皇太后，朱常洛本是个性宽厚之人，对于父皇的这个要求他自然答应，因为此时皇帝的王皇后和自己的母亲王贵妃已经逝世。但此举与儒家礼法不符，因为郑贵妃并非万历的正室，而且她也并非朱常洛的生母，所以，这自然又遭到文官的反对。

在挺击一案中，因为太子朱常洛的出色表现，维护了万历和郑贵妃的声誉，同时郑贵妃也明白了朱常洛的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她改变了策略，开始讨好朱常洛。加上此时太子妃郭氏已经故去，所以朱常洛身边是缺乏女性的，郑贵妃开始陆续送了一些女人给朱常洛，其中朱常洛后来所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就是这个时候送来的。

皇宫中的皇子们由于食物过于精细，以及长期缺乏锻炼的生活，所以体质大多不好，而朱常洛又是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下长大。万历四十三年，通过东林党人运作挺击案，才使朱常洛的地位得到改观，他终于可以轻松了，按照一般历史观点，在这五年当中，他的房事过于频繁，对于身体损耗过大。万历驾崩后，他又连续处理了二十天公务，所以从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登基起，到八月十日他便病倒了。

八月十四日，朱常洛服用了管御药房太监崔文升的药，当天夜里腹泻不止，第二日病情更加加重。这个时候，朱常洛已经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便于当月二十九日召见群臣商量后事。在此之前，有鸿胪寺官员李可灼献上红丸一枚，但鉴于崔文升用药不当导致病情加重，所以，首辅方从哲便禁止皇帝用此药。

皇帝听说有此事后便让李可灼进药，死马当活马医，由于此种红丸包含有金属成份，人食用后会感到兴奋。二十九号皇帝服用了一粒，感到效果较好，到了夜晚又服用两颗，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一日凌晨，皇帝去世。

那么新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朱常洛由于长期的心理负担，大约一直便有慢性病，在父皇死后，由于操劳过度，导致疾病复发，加上崔文升用错了方子，所以，到了此刻，朱常洛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至于服用红丸，不过是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已。事后，东林一系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他们攻击郑贵妃，说是贵妃郑氏指使崔文升和李可灼用药害死了朱常洛。实际上，郑贵妃没有害朱常洛的理由，朱常洛对郑氏还算尊重，万历死后，郑氏就想争个皇太后，如果朱常洛死去，他成为皇太后的可能性就终结了。垂帘听政更不可能，在早已成熟的文官政治下，君主政治和女人政治在帝国早已结束。

除了攻击郑氏，东林党更将矛头对准具有浙党色彩的首辅方从哲，由于万历皇帝坚决不用东林党的人，所以，东林党企图利用红丸

案进行全面翻盘。如此以来，红丸一案就具备了浓厚的党争色彩。

东林党对方从哲的非难是因为方从哲按照光宗遗诏对崔文升、李可灼进行了褒奖，从此也可以看出，光宗对自己的病情是知晓的，绝非药物能够改观。方从哲对崔、李二人的褒奖似乎做实了某种口实，面对东林党要求处死两人的要求，方从哲又将崔文升票拟为司礼监处理，将李可灼票拟为罚俸一年，后又改票为驱逐回乡。

东林党对方从哲的攻击就由此而来，在方从哲阻挡住的情况下，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乾清宫的那个女人。李选侍是泰昌的宠妃，万历死后，郑氏想运作皇太后，她则想运作皇后，现在泰昌一死，郑氏则想运作太皇太后，李氏则想运作皇太后，如若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将朱由校控制在手里。此时，郑氏居住在慈庆宫，李氏则将15岁的朱由校弄到了乾清宫。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赶紧跟众大臣商议，说李氏与郑氏密谋控制朱由校欲来垂帘听政，众大臣听说了，立即商议以进宫祭奠光宗的名义，将朱由校领出来。主意一定，首辅方从哲率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刘一璟、御史左光斗、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人连忙进宫，来到乾清宫外有内侍挡驾，杨涟一顿猛喝，没等到宦官回过神来，众人推开挡驾之人，径直走进乾清宫。

众人对着光宗的灵柩哭灵完毕，发现朱由校并没有在灵前守灵，便望向王安，众人见王安向暖阁会意，众人便一起走到暖阁前跪下要求见朱由校。李选侍哪里见过这般场景，顿时不知所措，事实表明，无论是郑贵妃还是李选侍，想跟文官斗法，完全是天方夜谭。

这时候，王安入内对李选侍说，让朱由校跟文官们见个面就领进来。说完，王安便将朱由校牵了出去，众人见朱由校出来了，不拥纷

说将朱由校拥到了外面的轿子里，周嘉谟、刘一璟、杨涟、张维贤亲自抬轿，将朱由校抬到应该属于太子居住的慈庆宫。

要说朱由校还是向着郑贵妃和李选侍，众人让朱由校即日登基，由校不允，只说九月初六日登基。接下来，众人联名上疏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搬到仁寿宫去居住。理由是李选侍既不是光宗皇帝的正室，也不是朱由校的生母。李选侍当然不愿意搬，一直僵持到五号，因为第二天就是朱由校登基之日。左光斗上疏将李选侍比作武则天，李选侍听说左光斗将其比作武氏，顿时大怒，李氏派宦官去质问左光斗，面对内侍的质问，左光斗毫无惧色，反而当着内侍的面将李选侍臭骂一顿。面对群臣的滔滔凶势，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恐吓，这个无知而又可怜的女人只得乖乖的抱着她的女儿皇八妹移居仁寿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王朝，除了皇后外，其他妃子的地位是如何微不足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六日，朱由校即位，宣布本年余下时间改元泰昌，明年改元天启。

从万历皇帝死，到天启登基，短短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实际上是国本之争的延续，是国本之争的余震，是文官们将自己内心深处所担心的事情与现实的突发事件联系起来，他们所维护的仍然是儒家伦理规范。天启的继位并不标志着事情的完结，在几年后，魏忠贤为了打击东林党，编了《三朝要典》，将挺击、红丸、移宫三个事件称为三大案，并对三大案进行重新定性，借此打击东林党。晚明三大案正由此而来。

11 南渡三案中被诬陷的皇帝

旧三案是指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挺击案是东林党人为了打击郑贵妃，确立太子地位而炮制的；红丸案、移宫案是东林党为了在万历死后控制朝政所纠缠的事情。这三件事情本来是政治事件，结果却被阉党用来修《三朝要典》，并定义为三案。

弘光朝在新阉党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东林和复社人开始运作大悲和尚案、童妃案、真假太子案开始了绝地反击。崇祯十七年底，南京西城兵马司接到守门士卒来报，说有一自称法号大悲的僧人说他是崇祯的儿子定王朱慈烺。弘光听说后立刻让提督京营的忻城伯赵之龙、锦衣卫冯可宗讯问。

定王朱慈烺还是孩子，所以这个和尚不可能是定王，但是赵之龙非常高兴，他希望能将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往东林和复社上面靠。

和尚说道：“我是定王，如今国家有变，所以我出家了。本来这个皇位应该是我的，但我不感兴趣，福王荒淫无道不应该居此位，我闻潞王贤明，这皇位理应由潞王继承，我劝尔等速速让福王逊位。”

事实表明，这又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这已经是帝国发生的第四次以牺牲智障人士来搅乱政局的事件。听完大悲和尚的话，赵之龙感到好笑，他便说道：“定王还是小孩子，你怎么可能是定王？”

大悲和尚听这么一问，自己也觉得失言，他又说道自己是万历的儿子，是万历跟宫女所生，所以一直寄养在民间。赵之龙又问他认识朝中哪些大臣，他说他认识申时行和钱谦益。

大悲和尚说的话肯定是有人教他说，但由于此人属于智障人士，所以并没能按照原话表达出来，但他说出了钱谦益，这应该是指使者让他这么说。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时候钱谦益已经跟阮大铖勾结在一起，成了东林的叛徒，所以东林将这件事情往钱谦益身上攀扯也很正常。最后经过刑部审讯，才得知大悲和尚乃是徽州一朱姓人士，在苏州某寺出家。

阮大铖认为这是个机会，他让大悲和尚往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身上咬，而且还开列了一串长达143人的名单，让大悲和尚指证这143人是幕后指使。但弘光皇帝明显不想这么做，马士英也不希望这样，结果这件事情只好以将大悲和尚处死作罢。

当大悲和尚案处理没多久，就闹出童妃案。弘光元年，河南巡按御史陈潜夫上奏称有一童氏女子自称是弘光昔日在藩邸的王妃，现已正派人送往南京。

朱由崧听说后大怒道：“朕元配黄氏，续配李氏，黄氏早死，李氏在贼兵破城后自杀，何来童氏？”

这位童氏在一路被护送南京途中举止轻浮，她始终以皇后自居，沿途各州县衙门皆将她作为皇帝的妃子进行礼遇，但她动耶对地方官员破口大骂，甚至在吃饭的时候掀翻桌子，当沿途官员跪在轿子外面的时候，她甚至掀开轿帘露出尊容喊出一声“免礼”。地方官员皆窃笑，看来众人心里都有数，但却又没有人揭穿。

童氏到了京城后即被关进锦衣卫诏狱，弘光并不理睬她，不久她即病死或饿死。虽然童妃案以一场近乎荒诞的戏剧收场，但民间舆论沸沸扬扬，人们皆说弘光皇帝薄情寡义，抛弃糟糠之妻。

童妃案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真假太子案。由于北京城破后，崇祯的三个儿子朱慈烺、朱慈炯、朱慈炤下落都成了谜，估计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较大。弘光元年，当南明政权正在认定三个皇子已经殉难，而且要确定谥号的时候，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却忽然奏称先帝太子朱慈烺从北面来了，现在正在杭州。

原来去年十二月间，高梦箕家奴穆虎从北方南下的时候遇到一少年，少年举止高贵，两人结伴而行，到了夜晚脱衣就寝的时候，穆虎发现这个少年内衣上织有龙纹。穆虎询问，少年说他是太子。到达南京后，少年来到孝陵突然伏地痛苦。高梦箕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便将他送往杭州照看。

这少年到了杭州，时间长了便露出富贵的神态，他谈吐不俗，昂首阔步，杭州市民皆对他不能等闲视之。

弘光听完高梦箕的表述，大为震惊，连忙令太监李继周去杭州找这个少年。李继周在金华浦江的观音寺内找到这名少年，那少年正在面壁作观。李继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道：“奴婢叩见小爷。”

少年闻听，转过身来，打量了李继周一番，缓缓地道：“我认得你，但遗忘姓氏。”

李继周说道：“奴婢姓李，贱名继周，曾服侍过小爷。现奉新皇爷旨意，迎接小爷进京。”

少年问道：“迎我进京做甚，让帝位给我吗？”

李继周道：“此事奴婢不知。”

接着李继周便将这位少年带到京城。

弘光帝听说少年到了，便令从北边来的张姓和王姓太监前去察看，两名太监一见到少年便立即跪在地上抱着他的双脚嚎啕大哭。两人见少年天寒地冻衣着单薄便一齐解衣给他穿上。

此事轰动一时。京城人闻言太子到此，人人面露喜色，大谈其事。人们纷纷前往少年居住的善庆寺拜访，一时之间，文武官员投帖拜访者络绎不绝。

虽然派去的太监做足了戏，但那少年究竟是不是朱慈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朱由崧又令认识太子的太监卢九德去看。卢九德到了寺内，正视半天，一时难辨，半晌不语。

少年突然呵斥道：“卢九德！你何不叩首？”

卢九德一听此言，如闻五雷轰顶，不由扑通一声跪下叩头。

少年却突然问道：“你隔几时竟肥胖至此，可见在南京受用。”

两人又寒暄了一会，卢九德便叩首道：“小爷保重！”

卢九德回宫后对弘光说道：“有些像，又有些不像。”

正当此事陷入僵局的时候，有人指认出此少年乃是驸马王昺侄孙王之明，王之明跟太子容貌相像，而且做过太子东宫侍卫，就这样弘光命令群臣会审。

会审那天，弘光召保国公朱国纯、首辅马士英及曾为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同六部九卿科道官员会审少年于大明门外。

群臣先后到场，少年向东踞坐，只见他长发垂肩、肌肤白嫩、身躯伛偻、面带愁容。

一名官员将紫禁城的图放在他的面前问道：“此为何图？”

少年道：“这是北京宫殿。”然后指着承华宫说：“这里是我居所。”指着坤宁宫说：“这是母后居所。”

另一名官员上前问道：“公主现在何处？”

少年说：“不知道，想必死了。”

又一名官员问：“听闻公主曾同宫女叩周国舅门？”

少年道：“同宫女叩国舅门者的是我。”

这时候，刘正宗上前问：“我是东宫讲官，你认识我吗？”

少年转头一看，不答。

刘正宗又问：“当年讲所在何处？”

少年答：“文华殿。”

刘正宗摇摇头，又问：“仿书为何？”

少年答道：“诗句。”

刘正宗又问：“写几行？”

少年答道：“写十行。”

刘正宗再问：“讲读何先何后？”

少年答：“忘了。”

正当刘正宗再想问题来问他的时候，少年笑道：“你以为我是假的，便当假的好了，我原本就不想跟皇伯争夺皇位的。”

接着，兵科给事中戴英复上前问：“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门亲鞫吴昌时，太子侍旁，何事何语？”

少年闭口不答。

戴英又问：“嘉定伯何姓何名？”

少年仍不答。

辨认结束后，刘正宗进宫奏道：“眉目全不相似。所言讲所、仿书悉误。”

兵科给事中戴英也奏道：“王之明假冒太子，其伪无疑！然稚年何能办此，必有大奸人挟为奇货；务在根究，宜敕法司严讯。”

第二日又让前东宫讲官，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前来辨认。皂役喝令少年跪下，少年仍像前次一样面西蹲踞。众官拥着方拱乾向前，有人指着方拱乾问道：“此为何人？”

少年一见，即道：“方先生。”

一官厉声喝道：“你是王之明！”

少年道：“我南来，从不曾自己说是太子。你等不认罢了，何必改易姓名？”

虽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果，但百官已经认定少年便是王之明。弘光听众人这么说，便命人将少年好生护养。

至此南渡三案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三件事远没有结束，它们所带来的效应却持续发效，可以说策划者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这三件事情都透着一股邪气，它们发生的时间前后连贯，都是在阉党制造顺案对东林和复社穷追猛打之际发生，而且都是针对弘光政权的合法性而来，虽然并没有让弘光政权垮台，但民间舆论已开始纷纷指责弘光皇帝，使得这个新生的政权开始摇摇欲坠。

对于大悲和尚案，那个和尚是个疯子这点确定无疑，他甚至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定王还是其他王，他上来就质疑朱由崧继承皇位这件事情，显得有些急躁和令人怀疑；童妃案中那个自称童氏的女人从她轻浮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她并不是福王的妃子，至于她是谁，从何处来，已经不得而知了；第三个案子中的那个自称太子朱慈烺的少年应该是一位假太子，因为前去辨认的宦官都不能肯定，而且昔日宫中的讲官询问少年一些讲读的事情，他也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最后干脆不再回答。至于人们所说的少年容貌酷似驸马的侄孙王之明，这倒有可能，而且他在东宫呆过，对宫中的一些事情也知道一些。

三件案子虽然都平息了，但舆论对朱由崧的指责却越发强烈起来，因为人们宁愿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也就是朱由崧抛弃自己的女人，为了皇位不认前太子。这个时候京城里便有歌谣：“若辨太子诈，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先擒王。”实际上从弘光皇帝不断让官员和太监辨认太子也可以看出来，若这位南渡太子真的是朱慈烺，他也想把位置让出来。在这方面他自己后来说道：“朕也想找到太子，若这位少年真的是太子，朕也愿意把皇位让出来，可惜不是啊！”

接着便有一些官员上疏反对朱由崧对待南渡三案的态度，虽然朱由崧进行了斥责，但是当带兵在外的左良玉也上疏反对的时候，形势不再是那么美妙，这个弘光政权已经面临着分裂的危险。

12 那些骂皇帝的大臣们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导致严嵩垮台，嘉靖四十五年皇帝驾崩，这其中四年的时候是徐阶担任帝国的首辅。这四年称不上是一个平静期，它反而是一个危险期，因为严嵩的离去而留下的真空徐阶能不能填补，不仅关系到这四年帝国政治的走向，更是关系到江山能否顺利交班的问题。虽然人人都知道裕王是未来的皇储，但人人都不敢去触碰这个敏感话题，徐阶也不敢跟裕王走的太近，以免再掀波澜。

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嘉靖变得更加喜怒无常、恩威难测，这就使得徐阶等内阁大学士面临的境况比严嵩更加凶险，皇帝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常常主观臆断臣僚们想让他退位，阁臣们对他很厌烦，不想辅佐他，所以他经常的试探群臣，但这些都被读懂嘉靖心思的徐阶轻易化解了。

帝国已经再无严嵩，但整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改观。仍旧是没有人敢拂逆嘉靖的旨意，官场上仍旧是钻营、结党，民生依然艰难，国库还是空虚，失去了严嵩的在前面做挡箭牌，已经有人将箭往嘉靖身上射了，这个射箭的人叫海瑞。

海瑞是明代最有名望的官僚，他非常符合儒家的士大夫形象，他能够名留青史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了一道詈骂嘉靖的奏书，但在西方人编著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并没有出现这位道德君子的名字，看来信奉大历史观的西方人更注重影响历史中更为粗线条的东西，并没有按照儒家规范纠结一些鸡毛蒜皮的人和事，但鉴于海瑞仍是明史中无法绕过的一位人物，我们仍会在本节以及后面的章节中以较大篇幅介绍这位模范人物。

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在这个水天一色的天涯海角，他没有沾染内地刁顽的习气，反而形成纯朴、执著的性格。他出身宦宦之家，按照中国的虚岁算法，他在四岁丧父，如果按照周岁计算，他大概在三岁，甚至两岁的时候便已丧父。海瑞的母亲守节将海瑞带大，海瑞在他35岁那年中了举人，之后连考两次都未中进士，就在第二次落榜的当月他向吏部讨得一官职，乃是福建省南平县教谕。

在南平这个科举盛行的地方，这位只有举人出身来自海南的教书先生并不能够很容易的打开局面，但他却很快打开局面了，不是因为他的才学，而是因为他的个性。福建巡按来到南平学校，海瑞站立在中间，学生站立在两旁，眼见巡按到来，两旁的学生都鞠躬参拜，唯独海瑞仍旧站在那里无动于衷，这样就形成一种中间高、两头低的格局，像极了一个笔架。

陪同巡按前来的南平地方官员质问海瑞为何不参拜，海瑞答，学校是读书的地方，巡按大人既不是圣人，为何要参拜。这件事情之后，海瑞的名声立刻在福建传出去了。

之后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恰逢严嵩一党的鄢懋卿南下巡盐，竟然慑于海瑞的威势，愣是不敢去淳安，而是绕道而过，如此一来，海瑞的名声更是响亮了。

后来海瑞又担任江西省兴国县知县，再后来又升户部主事，嘉靖四十四年海瑞上了那道指责嘉靖的《治安疏》，在疏中海瑞说他要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

这篇《治安疏》主要从三个方面表达了作者的想法。首先，海瑞举出了汉文帝和贾谊的例子，指出在历史上被认为实现了大治的汉文帝，实际上也多有优游退逊、怠废政务之嫌，接着，海瑞又进一步说

明即便是汉文帝这样的贤君也需要像贾谊这样的臣子来劝诫，那更不用说嘉靖了。

接着，海瑞便对嘉靖治理下的弊端进行总结，指出世宗皇帝富有四海、一意玄修、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无父子之心、无君臣之义、无夫妻之情，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最后，海瑞对于如何革除弊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有泛泛之谈的见解，但有两条还是有实际性和具备可操作性。一是屯田、运盐应该恢复实物征收，二是按地亩交粮、按人口应役，海瑞的这两条都是针对农业生产的，只有稳定了农业，稳定了帝国的根本才能谈其他的。至于让皇帝节俭，惩治贪官并不具备实际可行性，也无关这个帝国的根本。

海瑞最后说道只要按照他说的几点去做，天下很快便可出现大治，而且这些也不需要皇帝太劳神，只要稍事节省和振作就行了。海瑞在这点上过于理想化，不在其位、难知其政，中国的社会几千年走过来，民生一直都是困苦的，何时见过民生富庶，内阁首辅、封疆大吏退休之后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小民百姓，寥寥富户也是经过数代的积累。

海瑞的这道奏疏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想让皇帝接纳谏言，正像他在开篇和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世。那么君道有何不正？臣职有何不明？按照海瑞的说法，臣僚的职务就是规劝皇帝，向皇帝纳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为君之道也就实现了，天下也就大治了。

海瑞的观点是想通过君臣共治的方式来求万世治安，但他不明白农耕帝国治事的复杂性和因循性，几乎每任皇帝在继位之初或者每位官员在上任之初都想大刀阔斧的整顿，以求能够建功立业，但久而久之都偃旗息鼓。

海瑞的上书不是偶然的，虽然皇帝一直怀疑后面有徐阶一党的指使，但事实表明这就是他的个人行为，与他人并无关系，究是如此，这也不是一件孤立事件，它跟严嵩被罢黜后的那种輿情有关。严嵩在任的时候，虽然群臣对皇帝不满，但有严嵩在总能分担一些矛盾，严嵩一死，在形势没有改观的情况下，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这个帝国最高的统治者——嘉靖，海瑞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上了这道奏疏。可以说海瑞的奏疏非常的及时，打在了每个人的心坎上，他说出了所有官员想说而又不敢说说的话，他扒掉了嘉靖身上的虚伪面皮，对嘉靖之治是一次彻底否定。

海瑞是抱着必死之心上了这道奏疏，这是个一心为国为民的人，跟后世那些上书以邀直名的伪君子有着本质区别，正因为如此，嘉靖皇帝原谅了他，但对于他的这道奏疏来说，多是干吼之词。大明朝走到了这一步，最大的问题是财政的疲弱，而导致财政疲弱的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但是海瑞在奏疏中并没有对这些根本的问题有所阐述，也就使得这道奏疏只是起到了一种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海瑞这种不畏死，敢为名请利的官员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

除了海瑞骂皇帝之外，万历朝的雒于仁骂万历也很有意思。

从万历十四年到十七年皇帝的身体一直没有起色，期间关于立储的问题已经突兀出来。十七年底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道大明朝最响亮的奏疏，这道奏疏名为《酒色财气四箴疏》，雒于仁在这道奏疏里将皇帝的病因条理化的归因于酒、色、财、气。

这篇《酒色财气四箴疏》通篇都是作者在主观臆断、想象。他说皇帝白天喝酒还不满足，到了夜晚还要喝，然后趁着酒劲持刀舞剑，举止癫狂，此乃酒也；皇帝宠信十个英俊的小太监，他不断的宠幸郑

贵妃，此乃色也；皇上富有四海，理应节俭，但如今到处向人索贿，经常在宫中拷问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张鲸给银子则包庇他，上疏的给事中没银子则诬陷他，如果皇帝不纳贿，缘何诬陷忠良，而信任谗佞，此乃财也；至于气，皇帝在宫中动则杖责宫女、太监，即使太监、宫女有罪也应该付诸律法，怎么能随意杖责呢？另外，皇帝还对朝中的一些正直的大臣心怀仇恨，动耶将他们关押起来，此乃气也。

可以说雒于仁这篇奏疏完全是捕风捉影、造谣中伤，而此时的大明朝已经进入了以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换取美名的境地，雒于仁的上疏完全是颠三倒四、不知所云，甚至会让人以为雒于仁的智商有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雒于仁并不是真心劝谏，完全是以邀直名，显露出了此人的虚伪。

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群臣来到宫中行贺礼，此时一名太监神色凝重的过来，让内阁诸臣进入内宫，看那宦官严肃的表情，阁臣们似乎感到又有人捅了篓子。进入宫内，皇帝半躺在卧榻上有气无力，神宗将雒于仁的奏疏丢给申时行看。

半晌，神宗问道：“先生怎么看？”

“这只是无知小臣轻信谣言的狂率举动，圣上没必要为此动了肝火。”申时行回答道。

“他说朕饮酒，试问谁人不饮酒？他说朕好色，朕只宠郑贵妃，这难道也叫好色。说到朕贪财，这更是可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天下都是朕的，朕难道还要贪财吗？说朕贪张鲸之财才启用他，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说到气，俗话说‘少时戒色，壮时戒斗’，朕岂能不知，但是谁人不曾生气呢？先生们家里有童仆，难道平日里就不责治吗？何况宫里有有的宫女、太监是自己病死的，怎么都说

成是杖责而死呢？先生将这本奏疏那去拟票重处。”万历对申时行说道。

皇帝说完，申时行还是想替雒于仁求情，还没说完，神宗便打断他的话：“他还是想出位沽名。”

听皇帝这么说，申时行顿时便有了主意，他说道：“如果重处反倒成全了他，而且还有损皇上的圣名。”

说完，申时行将奏疏还给了万历，万历觉得申时行的话有道理，但这口气还是咽不下来，他又将奏疏丢给了申时行，让申时行好好看看。申时行老眼昏花，戴上了爱逮又细细看了一遍。实际上为了防止皇上将奏疏淹了，明代大臣在上疏前都留有底稿，而且通常在上奏前会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这本奏疏的内容申时行大体都知道。

眼看万历依然不依不饶，老谋深算的申时行又说道：“这必竟是涉及到宫闱的事，我看此份奏疏不能公开，最好只止于内阁范围内。”

这摆明了不想拟票处置雒于仁。此时的大明朝已经不是张居正那个时代了，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感受到了一种紧箍的感觉，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一不小心就会莫名其妙的成为群臣的对立面，时事的艰难正在于此，所有的人都在苟且，而再也不敢像前几任首辅那样勇于担当。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大理寺以雒于仁有病上报，申时行票拟将雒于仁革职了事。万历朝的“酒、色、财、气”事件是万历一朝君臣关系的分水岭，它直接使文官在皇帝心目中丧失了被尊重的权力。

13 充满理想的太监

本节将讲到大明朝三个极富理性化的太监：王振、汪直、刘瑾。

明代的划分如果按照时间段来说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正统年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进入了中期，万历三大征的结束基本标志着明王朝驶入了它的晚期，这是从时间段来划分；如果从君臣关系来划分，明王朝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到永乐是文臣被压制的时期，仁宣两朝是君臣融洽的时期，从正统年间开始一直到明王朝灭亡这大段时间都是君臣斗争的时期。

正统初年的一切虽然都按照仁宣两朝的惯性往前走，但我们的王朝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也许多年后人们仍在思索造成这种偏差的原由究竟是什么？是皇帝的教育问题，还是三杨的无能，或者是小皇帝的天性，或许这些都不是主因，宣德朝以后文官行为方式的变化才是主因。

正统年是帝国的转折点，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在此后全面爆发，三杨在世的时候尚能维持一种平衡，三杨一死局面再无挽回的可能。

我们的宣德朝在它的表面平静下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吏治腐败、军队退化的战斗力、周边民族的虎视眈眈、土地兼并、流民四起，这些问题在宣德末年已经出现，我们的宣德皇帝虽然也曾整治过此类问题，但他更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诸如此类问题，而且我们的这位宣德皇帝似乎对宫廷生活关注更多。通过这些读者可以感受到仁宣两朝的平静是暂时的，洪武、永乐两任皇帝过份压制的问题在后世宽松的环境下必然又将出现，而这也清楚地表明宣德朝以后的政治走向似乎又将重回洪武与永乐的政治脉络。

面对吏治腐败、军事危机、土地兼并、流民问题三杨自然无能为力，无论是杨士奇，还是杨荣、杨溥，他们只能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辅以润滑的作用，到了政治出现拐弯的时候他们却手足无措。有才干的一代文臣皆在靖难之役中死去，永乐时代留下的皆是一帮平庸之辈，而三杨以后的文官又皆是矫揉造作、文过饰非之人，可以说当朱棣带着他的队伍进入南京城的时候就标志着一个精英已死的时代。

三杨既然无能为力，后辈又是自以为是之人，这个重任落在了两个愤青身上，他们是大愤青王振和小愤青朱祁镇。

王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佼佼者。王振是山西人，在当地大约是一个县治下的教谕，朱棣在位的时候为了给宫女授课说服了一批儒生尽身入宫，王振便是其一。王振的身上集中了一些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甚至影响到了小皇帝朱祁镇，最终使得我们帝国的脉搏居然也随同跳动。

王振来源于底层，体会了底层民众的艰苦，他对这个世道有了更多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愤世嫉俗。他不喜欢文人政治，他更推崇洪武、永乐的那种武人政治，他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吏治要严、刑法要苛，对于明朝势力从安南撤退更是他所不能认同的。虽然王振怀揣着伟大的理想抱负，但只作为一个教谕的他却不具备实现这些理想的条件，为了实现这些抱负，他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入宫后，他抓住了一个能实现此等理想抱负的救命稻草，那就是皇太子朱祁镇，王振负担起了小皇子的教育问题，他便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着他的思想与理论。

明代有“经筵”一说，“经筵”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担当皇子的教育，这既是帝国的一件大事，更是儒生的一件大事。天朝的儒生们挖空心思也要把这一工作控制在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皇位的继承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而使得他们在成年后跟

他们保持一致。很不幸，朱祁镇的教育问题文人没有控制住，反而被宦官王振抓住了，从这一刻起明王朝的政治轨道开始偏离文人政治的方向，无论后世之人如何辱骂三杨，我们的帝国都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偏差。

小小的朱祁镇对三杨的讲课丝毫不感兴趣，他更喜欢王振给他讲外面的世界，讲民间的生活，他更喜欢王振带着他骑马射箭，而我们的王振同志也若隐若无的告诉皇帝，你要掌握住兵马，文官并不可信。而掌握兵马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狩猎、经常出巡、经常巡阅军队，乃至亲征。

朱祁镇登基后，王振看到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这一天到来了，他要凭一己之力扭转仁宣两朝的政治走向，他要用他的辣手重新还给大明王朝一个朗朗乾坤，无论这种朗朗乾坤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这个王朝的，我们这位宦官的确这样做了。

太皇太后和英国公张辅对于政事撒手不管，三杨对于政事又是消极应付，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了王振的头上，从正统元年起这位宦官似乎就开始在帝国扮演重要角色。

王振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我们知道宣德皇帝是个好玩的皇帝，他曾让宫中太监前往各地搜集珍奇的玩意儿，也为此杖毙了一些为非作歹的太监，而英宗登基后，王振开始禁止宫内太监从事这些采购，成功的将宣德朝的这一弊病消于无形之中。

面对权力出现了真空，王振开始主导官吏的任用。针对三杨即将退去的情况，王振也有考虑，王振曾征询过三杨谁能接替他们的位置，三杨举荐了陈循、高谷、苗衷三人，王振对此也欣然接受，但这三人也皆是平庸之辈，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显赫政绩。王振对于干

练的官吏也多赏识、提用，对于出现问题的官吏处罚起来也毫不留情面，可以说正统初年在王振的主政下政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我们的王朝毕竟出现了宦官干政的局面，这跟我们的礼法不容。

王振既是宦官，又有文化，这是他的双重优势，在英宗很小的时候，宣德皇帝就派王振入东宫担当起小皇子的教育问题，王振对英宗要求很苛刻，他不允许其他太监跟英宗过份玩耍，也一再告诫英宗应以学业为主，而英宗对王振却颇为忌惮，他不敢在王振面前公开玩耍，当他玩耍被王振发现时他会低下头表示认错。

我们的英宗皇帝非常单纯、非常善良，他没有洪武、永乐的那种手腕，也没有建文、洪熙、宣德的那种心思，他废除了殉葬制度，也正因为他是那么单纯，所以显得信心不足，他能依靠的只有王振，如果没有王振，我们的这位小皇帝真不知道会怎么过。

不仅如此，王振还让小皇帝告诉太皇太后不要经常去佛堂，最好将佛像供奉在宫里面。王振对于阁臣也是极为尊敬，每次去内阁都是让别人叫了几遍才进去，进去后也是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三杨的建议王振也大多能接受。无论是太皇太后还是三杨似乎对王振都能接受，他们也需要王振充当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除此之外，王振还是一个好战分子。

明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辽东、云南、贵州纳入中华版图，且设省，虽然这三省在元代已经进入中华版图，但那只是一种松散的控制，有明一代才算是真正控制起来。这其中最后进入版图的是云南，而云南最后平定的是麓川这个地方，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麓川平定后，朱元璋在这个地方设置宣慰使司，实行土司自治的制度。

明廷对西南土司实行的策略一直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将大土司辖地分给几个小土司治理，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被夺去领土的大土司当然不愿意，所以土司之间互相攻伐也是常有之事件，而地方官员和将军急于建立军功，所以很多情况下由于一些偶然小事件引发的冲突事件在整个明王朝是时常发生的，为此中央政府耗费巨大财力、人力、物力，同时也给西南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虽然朱元璋在麓川设立宣慰使司，但到了建文年间，麓川土司任氏家族大部分封地皆被剥夺转而分给其他土司，从宣德三年开始任氏家族就开始试图通过战争收复失地，到了正统年间麓川宣慰使任思发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明政府的忍耐力，一场大战似乎不可避免。

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命定西伯蒋贵挂平南将军印，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调京营、湖广、四川、两广共计十五万兵马。大军强渡怒江、破象阵，会师腾冲，接着一举攻下麓川王城，思任发父子进入缅甸，官军得胜而归。

逃入缅甸的思任发、思机法父子很快死灰复燃，正统八年英宗第二次派蒋贵、王骥征麓川，此次将麓川宣慰使又一分为三。

正统十三年战事又起，这次是思任发的儿子和孙子在边境上惹事，英宗第三次派蒋贵、王骥统率十三万大军入滇，而此时距土木堡之变仅一年。

可以说明廷三次用兵除第一次有效果外，其他两次皆毫无意义，我们也可以看出朝廷的方略一直是以战为主，那么在帝国面临天灾和起义情况下为何还要如此，这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英宗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发挥主导作用的是王振，王振企图恢复以武立国的传统，当然对征伐这种事情感兴趣。另

外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朝廷担忧云南出现跟安南一样的局面，此种担忧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毕竟我们的着眼点要从今代拉回那个时代。

从云南地方部队陷入战斗起，这场发端于滇西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十年，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也使云南地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明王朝好不容易在宣德朝从过去那种负担中摆脱出来，正统年间一切似乎回到起点，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正当人们对正统年所有的一切手忙脚乱的时候，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悄悄爆发。

当永乐皇帝在北征蒙古途中死去的时候就标志着我们这个帝国放弃了它的干涉主义，但仅仅过了十年，漠北形势就是风起云涌。

国初蒙古部落一分为三，从东到西是兀良哈、鞑靼、瓦剌。挨着喜峰口的兀良哈三卫内附大明朝，另外就是东面的鞑靼部和西面的瓦剌部，鞑靼部继承了铁木真的黄金家族血脉，仍旧以游牧为主，保持着蒙古人的传统习俗，西面的瓦剌属于山地森林蒙古族，以渔猎为主。大明建国后仍是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作为打击的对象，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黄金家族重新统一蒙古，所以黄金家族一直是明王朝打击的目标，到了宣德年间，奄奄一息的黄金家族再也承担不起振兴蒙古的责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明王朝对黄金部落持续不断打击下，瓦剌部却在积蓄力量。从宣德年间起瓦剌部的杰出领袖脱欢就逐渐蚕食瓦剌各部，接着又将手伸向了鞑靼部，而宣德年已放弃了永乐时代的那种对外扩张政策，明廷对于脱欢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过强的干涉性，脱欢是最终想统一蒙古各部重建铁木真的辉煌。但蒙古人只承认黄金家族，在他们眼里铁木真只有一个，黄金家族只有一个，在此种形势下脱欢必须找一个人，一个能号召全局的人，他找到了脱脱不花。

脱脱不花是大草原上黄金家族的继承人，脱欢依靠他重新号令整个漠北高原，不仅控制了鞑靼与瓦剌，更控制了兀良哈三卫和东北女

真各部，以松散的方式建立了一个东达朝鲜，西抵青海的大帝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竟也不亚于明王朝，并在甘肃设置行省。大元王朝似乎依然存在，的确，它依然存在，在新一代的领袖人物脱欢的领导下它竟然一步步强大起来。

我们必须清楚一点，纵使脱欢重新控制了蒙古各部，但这依然是一种松散的联盟，跟铁木真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脱欢更多的情况下是依靠一种强大的经过整合后的力量向明王朝施压，以换取贸易上的平等化。

蒙古部落作为典型的游牧部落是以肉食为主，过多的食用肉食积累的脂肪在体内无法消化，这就需要用茶叶加以分解，而茶叶只产于关内，另外，食盐和铁器也是蒙古人需要的东西，这些本土也没有。除此之外，蒙古贵族也需要丝绸和瓷器，这些都导致蒙古部落需要依靠关内的物资来生存。而明王朝为了抑制蒙古人势力过大，故而对此类物资控制严格，蒙古人的需求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往往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以我们纵观整个明朝时代，可以清晰的看见关内关外贸易正常化或活跃情况下，鲜有战事，而一旦双方贸易陷入梗塞，则多会引起战火。

而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事件就是发端于双方的贸易问题。

明廷跟蒙古的贸易以三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通贡，蒙古方面派使团来朝，带来马、牛羊、兽皮等物，换取丝绸、布匹、药材、瓷器、茶叶或金银，明廷回馈物品的价值一般高于贡使朝贡物品的价值，历史教科书中对此称作“朝贡贸易”，教科书的解释是“朝贡贸易”，此种厚彼薄此的朝贡贸易既满足异邦对中原王朝物资需求，又能满足天朝的心态。但天朝又对朝贡贸易的次数和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如果不进行严格的限制，通常是此批使者未回，下批使者又来。而我们将要论述的土木堡事件就是由朝贡贸易引发的。

此种通贡贸易更多的是满足蒙古统治者的需求，更多蒙古牧民的需求还是要通过互市和私市满足。明王朝对互市也是严格限定的，每年只能开那么几次，互市是以官方贸易为主，明廷通常委派宦官监督。易货的物资是茶马，因为高大的骏马通常都产于高寒之地，关内是养不出好的战马。在通常情况下，一匹马只能换100斤茶叶，蒙古人辛辛苦苦养大的马匹只能换那么一百来斤茶叶，而且是又黑又苦又涩的茶砖，这显然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政府对于边市也是时关时开，坚固的长城和沿长城一线部署的百万大军似乎还不如给蒙古人点茶叶和粮食。

正统四年，西历1439年，北元丞相脱欢死去，其子也先继位，也先雄心则有，但才具不足，缺乏其父统驭全局的能力，也先称太师，自封淮王，其在主政期间跟明廷在通贡问题上摩擦越来越大。

从正统元年起，也先麾下的蒙古部落来明朝朝贡的人数和规模、频率越来越高，从最终的几人发展到上千人，从最初的一年一二次发展到最后的一月一次，这边使团还没有走，那边使团又来了，这些人来到关内从礼部到地方都要热情接待，因为涉及到外交问题，无人敢怠慢他们。但这些人来到关内时常滋事，而且夹带私货跟边境的军队做生意，通过马匹、兽皮换取硬弓和刀剑，这些都被王振侦知，王振心理自然有数。

到了如今，蒙古人的朝贡问题已经成了帝国一大令人头痛的难题，蒙古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每次朝贡规模越来越大，逗留时间越来越长，甚至秋天来，第二年春天才离去。朝贡已明显给明王朝带来了负担，朝贡也成了帝国继天灾、起义、滇乱之后的第四大问题，但也先在关外始终是大兵压境保持着咄咄逼人的态势，而明英宗和王振都是忍了，他们宁愿多花些钱省去兵灾，毕竟这个时候帝国还没有从南面的问题中腾出手来。但正统十三年到来使得这一切都明朗化。

明朝与蒙古之间通贡还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蒙古人虚报朝贡人数，以骗取更多的赐品，对于这些问题户部官员并没有认真核实，王振得知后于正统六年对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瑄进行了责罚。到了正统十三年年的时候，北方的灾情有些减缓、南方的义军虽然没有彻底剿灭但已无大碍，云南麓川战役已近尾声，此时的明英宗和王振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蒙古朝贡问题。

在蒙古朝贡这个问题上英宗与王振隐忍了十几年，终于到了要爆发的时刻。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最大一次朝贡到来，此次也先报了3598人，王振突然让负责接待的会同馆核查人数，结果查出实际人数为2524名，虚报人数1074人，王振立即以此为借口削减马价。也先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明白王振为什么突然要如此，本来我也先来朝贡虚报点人数，你天朝多给点东西，大家都相安无事，为何你王振突然要如此？也先的心中明白这对于蒙古来说是个可怕的开始，一旦王振的这一行为没有被抵制住，那么明朝方面将会产生连锁反应，比如限制使团规模，乃至取消朝贡，关闭边境集市，这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些一旦发生那么对于蒙古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战争即将开始，我们的王振难道不害怕吗？他当然不害怕，他巴不得的呢。

也先的叩关似乎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但它还是迟来了半年时间，因为也先需要积蓄力量。

从正统十四年元月开始一直到七月，史书上再也没有也先使团来朝贡的纪录，停留在内地的使团也陆续被打发回去，我们的太师也先的心已经凉到了底，他望着那道高耸的城墙，大约那堵墙再也不会为他打开，昔日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的族人浩浩荡荡开进大明吃喝玩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些都怨那个该死的太监王振，我要打他，打到他疼为止。

从七月份开始，也先四路大军开始叩关。一路由也先率领进逼大同，蒙古汗王脱脱不花率军进逼辽东，知院阿剌率兵进逼宣府，还有一路大军进逼甘肃张掖，四路大军形成威逼之势，也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王振就范，但此时的王振兴奋异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开始朝他设计的轨道上运转，王振感到属于他的巅峰时代终于来临。

王振作为一个底层人物放弃儒生身份净身入宫就是为了实现他的以武治国的梦想，他希望年轻的英宗皇帝也能像他的祖辈们亲自带兵巡视关外，甚至是亲自带兵出征，至此正统之治终于拉开了全貌，那就是王振企图带着英宗像洪武皇帝那样跟整个历史惯性作对抗。王振企图将帝国拉回洪武、永乐时代，但他不知道历史滑行到今天已经不是洪武与永乐时代的土壤，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毁了全盘计划。

面对也先在关外叫骂，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吴浩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猫儿庄，出塞明军全部战死。消息传来，英宗命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大同总兵朱冕、左参将石亨各领万人在长城边沿的阳和口抵御瓦剌骑兵，阳和口是瓦剌人进入关内的必经之路，皇帝与王振试图以此四万人的兵力暂时挡住瓦剌人的进入。

实际上也先的军队主要是在关外形成威逼之势，其目的还是逼迫明廷同意朝贡而已，只要明军严守边塞，也先的军队是进不来的，何况京城还有十几万的京营。只要严令各要塞城堡严守不许出击，事情就解决了，但王振显然不希望这样，他想做的就是带着皇帝出塞巡视，重新恢复以武治国的传统。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么十几年来王振一直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找个恰当的时机亲征，其主要目的还是对文官而来。正统年间文官已经渐渐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在高层还不是太明显，在民间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朱元璋所建立的那种自耕农社会已经渐渐滑入士绅手中，对于我们的帝国在未来会由文官与士绅掌控这一趋势王振已经

表现出了担忧，而1449年的也先犯边给王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皇帝带着大军出塞巡视，吓退也先，这一行动会增加皇帝跟军队接触的机会，会重塑君主的权威，会进一步增强武将和贵族在帝国的地位，其政治意义明显大于军事意义。

但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跟儒家礼法不符，因为皇帝亲自带兵是那么的明显将文官撇开，这会让帝国的文官们情何以堪，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其手，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无论是皇帝统兵，还是重用宦官此类跟文官无关的事情他们都是激烈反对，甚至皇室内部的家务事他们也要干涉其中。

我们的英宗皇帝在朝堂上抛出了他要带兵亲征的想法理所当然的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经常带兵出塞是他们所不赞同的，他们认为皇帝就应该呆在宫里，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不要到处跑，既不能亲近百姓，更不能亲近武将。永乐皇帝和宣德皇帝是他们所控制不了的，但到了英宗这一代是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走老路。对于王振的跋扈文官们忍住了，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再也不能后退了。

吏部尚书王直领衔群臣上奏曰：“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按说文官们说的在情在理，尤其是“天气炎热，水草不丰，水源不足”这几条说到了点子上，但英宗和王振显然不会理会这些。英宗说道：“朕明白众卿之言皆是忠君爱国的意思，但虏寇逆天悖恩，犯边杀掠军民，朕不得以才要亲率大军剿之。”

朱祁镇这番话说得其实并不令人信服，如果强调“朕冲年即位毫无建树，趁此机会重塑先祖的雄风”等诸如此类说辞似乎更堂而皇之一些。皇帝与群臣之间空对空，没有任何意义。

此次皇帝的出征实际上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皇帝只不过是出塞巡游一下而已，没有人意识到会出问题，这跟正德年间皇帝要出塞文官的那种疯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王振调动了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共十七万军队，加上河北守军三万人一共是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每人赐银一两，胖袄裤一件，鞋两双，一个月的炒米，三人配一头驴，二十万人共分了八十万件兵器。这些皆是仓促配备，一个月的干粮更像是出去巡游而不是打仗，兵士对于新配发的兵器更是无法熟练使用。

出征的队伍是豪华的，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十二位有爵位的贵族，加上其他军事和文职官员共计三十二名有名有姓高级官员，帝国精英全体出动，当然这其中更是少不了王振。大军出征之前将回来庆功的赏赐都准备好了，这不像出征，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出塞巡视，在所有人眼里它的确是巡视。因为太宗皇帝最后三次的巡视，蒙古人都是避其锋芒，宣德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也是避其锋芒，这次正统皇帝的出塞巡视，蒙古人实际上还是避其锋芒，但一些偶然因素的发生使得这次的巡视行动发生了质的改变。

它不仅终结了这位宦官的理想，更是几乎终结了大明帝国皇帝统兵的传统。

成化年间天象屡屡示警，时常有流星长时间划破天空，而且拖着长长的尾巴，或有小流星相伴，帝国的南北皆见，天空中的各星位皆被冲撞。这似乎不是好兆头，古人通常将此种天象跟皇帝失德联系起来，我们的见深同志也面临着压力。

每次星相之变都能在帝国掀起政治风波，皇帝下罪己诏，文官们相互弹劾，有人上位，有人下位，为非作歹之人收敛，淫靡之人素寡度日，整个帝国一片哀悼，一切娱乐活动停止。

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朱见深率领文武群臣前往京城郊外祭祀，天地间突刮大风，沙尘遮蔽了天空，烛火被吹灭，气温骤降，当场有人冻死。据说这是后来的江南才子祝枝山祖父亲眼所见，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按古时说法有妖人做怪。实际上据《实录》记载昨日夜间就起了大风，这应该是天气不好的原因，或者是北方固有的沙尘天气原因，而当场冻死人则有可能是祝枝山的祖父夸大其词，但在祭祀的时候突发此等事件无疑给众人心头上笼罩上一层阴霾。

此事刚过了几个月，京城中又传言有黑色的动物夜间出来伤人，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人们皆白天睡觉，夜里劳作。后来此物竟然跑到宫中，虽经几番捉捕，终是无获。此时的成化王朝已步入多事之秋，外有边患、内有流民、君臣离心、宦官佞人横行，每次出现异相都能令朱见深惴惴不安。如今京城出现怪兽，朱见深一面派人去土地公公那里祷告，一方面又下罪己诏，这样过了几月事情竟也渐渐平息下来。那么这个黑色怪兽究竟是什么动物，笔者认为外籍人士带到京城的某犬类动物可能性为大。

这件事情没过去多久，京城又盛传有狐狸精出入。京城人赵灵安在出城经商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美女，据说模样美不胜收，所以不得不戴了个面纱。后来这个女人被赵灵安带进了府里，第二天府里的人全部死个精光，就连府里的狗、鱼都没有一条活着。所有死去的人和动物都没有伤痕，而那个美女却没了踪影，所以京城里就开始流传是狐狸精做怪。接着，人们到了夜晚不断看见一个小美女在外间游荡，后来又死了人。“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就这样流传开来，据说当时还有一份关于这个案子的档案，现在被保存在故宫，但是没有展出。

怪兽事件刚刚过去，现在又冒出了狐狸精，皇帝急了，便命人彻查，妖狐没查出来，倒真查出来一件事。山西有个妖人名叫侯得权，化名李子龙，自称有不世出秘法，侯得权与宫中宦官取得联系，由宦官引入宫中。侯得权本身没有入宫中传奉官名册，只是被宦官私匿，此事被侦知后，皇帝怀疑是侯得权在搞鬼，便将侯得权和庇护他的宦官杀了。

京城和宫中连发怪事，已经闹的是人心惶惶，可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皇宫中每到夜间都传出金甲撞击、兵器相搏的声音，还伴有呐喊声，就好像有人在搏斗，这种声音朱见深亲耳所听，想来既令人心烦，更令人毛骨悚然。宫里的江湖术士捉不出来鬼，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在搞鬼，以骗取自己对灵异事件的信任，朱见深感觉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所有人都不可靠了。宦官不可靠，锦衣卫不可靠，东厂也不可靠，就连自己信任的江湖术士也不可靠，他们的法术实灵实不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想到了一个人，他叫汪直。

汪直本是瑶族人，是韩雍在成化三年大藤峡之战中被俘的小孩，后被阉割进宫当了太监，侍奉万贵妃。汪直聪明伶俐，很讨宪宗喜欢。成化年不仅文官与皇帝之间不信任，就是皇帝与宦官之间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成化年间的知名宦官怀恩、尚铭不一定都买皇帝的账，有些旨意没到内阁在司礼监就被驳了回来，皇帝想到了汪直，他曾经命汪直外出刺探隐私，汪直跟皇帝都是单线联系，在整个帝国皇帝已经无法找到这样的人了。但汪直职务卑微，皇帝无法让他统领东厂，所以只能采取权宜之计。

皇帝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由于该机构在皇宫以西，并以宫中的旧灰厂为治所，便名曰西厂，由汪直挑选了一百多人的锦衣卫校尉负责，西厂建立后汪直的能力很快体现出来了。

三杨中杨荣的孙子和曾孙在福建家乡闹出人命案，被人告到刑部，刑部打算严惩此事，谁知杨家人进京活动，就在此案要被压下去的时候，汪直知道了，汪直深挖此事，将杨氏父子处死，跟此案有关联的官员也受到了牵连。杨氏一案使得汪直和他的西厂名声大噪，这件案件办的令任何人无话可说，它保护了民众的权益。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汪直不仅监视文官，他也监视宦官。

历史走到成化年，社会风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官场贪腐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宦官到文官无不靠倒腾食盐、物资赚些外快，人们对于这些事情都是习以为常，偏偏汪直较起真来。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是个位高权重的人，他在回京途中搞了近百船食盐沿着京杭运河招摇过市。船队行驶到了山东武城县的时候，武城县的典史要拦截船队检查，覃力朋一耳光打过去，打掉典史的两颗牙齿，又将典史身边的一随从射死。此事很快被西厂侦知，汪直汇报给了朱见深，见深本就对司礼监不满，正要将此事当作对付司礼监的典型。一番恶斗后，覃力朋终究是被司礼监保了下来，但覃力朋从此也退出了宦官的舞台。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如今汪直和他的西厂已经不是跟东厂的矛盾了，而是跟整个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小小的汪直已经得罪了整个帝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帝国的威力。

接下来有更多的人因为走私、受贿、通奸、妖书此类事情而被抓，或被西厂讯问，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官员都胆战心惊，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身边是否有西厂的特务，终于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也就是西厂刚成立四个月的时间里由内阁首辅商辂联合内阁万安、刘珝、刘吉上书要求废除西厂。对于文官的这种举动，朱见深早在意料之中，帝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阻力是不可能的，但此次上书司礼监和内阁产生了联动机制，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和内阁首辅商辂不惜一切也要扳倒汪直，商辂更是暗示群臣会废黜见深的帝位来威

胁，面对这种形势，宪宗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废黜了西厂，贬黜了汪直。

从内阁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汪直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内阁在弹劾汪直的奏书中说道：“由于皇帝重用汪直导致‘人心汹汹，各怀疑畏’，文武重臣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虽然这些词语未免有夸大之嫌，但汪直和西厂的作用可以时见一斑。

朱见深正是希望汪直和他的西厂如此行事，如今岂能就此罢手。仅仅过了一个月，一名南京的御史上书替汪直鸣冤，要求重开西厂。这是一件举朝皆惊的事件，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这个御史受到了皇帝的暗示，不管上书的御史有没有受到皇帝的暗示，聪明的人都知道汪直倒台的日子远远没有到来。

西厂很快复设，汪直官复原职，汪直开始向攻击他的官员反攻倒算，内阁首辅商辂被迫致仕，受牵连的还有兵部、户部、刑部尚书，各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共计几十人。从此，汪直面前再无障碍。

俗话说“趁热打铁”，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火候，一旦过了那个火候再做就不会那么顺利。虽然西厂复设，但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光景了，官僚集团对西厂的打击是巨大的，复设后的西厂失去了往日的冲劲，汪直也对侦缉、办案失去了兴趣，他将目光转移到了帝国的边疆，那里有更雄壮的舞台等待着他。

成化初年，建州女真在杰出领袖董山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加上辽东地区长期对建州女真的欺压、不公平贸易、索贿等因素，终于导致明廷跟建州女真的第一次大的冲突。对于建州女真问题，一是为了防止潜在威胁，二是边将为了邀功，所以明廷制定了严厉打击的策略。

成化二年明廷将董山以及一百多名女真部落首领诳骗到京城处死，接着开始命大军征讨女真各部。成化三年九月朱见深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赵辅率大军纠集朝鲜军队从抚顺出边征讨建州女真。十月份邸报传来，女真人被杀1700余人，少壮皆被处死，老幼被俘，房屋被焚毁，家畜等财产被洗劫一空，余者逃至深山中才得以存活。经过这一役，建州女真遭到了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为了防止女真人报复，明廷又修筑了边墙，将女真各部与汉人居住区隔离起来，从此民族的隔阂更加拉大。

明朝与建州之间的摩擦并没有因为成化三年的屠杀而结束，反而在以后的十年中摩擦不断，而边将为了邀功不仅杀良冒功，更是对边事夸大其词，以怂恿朝廷派军进剿，而辽东巡抚陈铨就是这样的人。

成化十五年，受陈铨的怂恿，汪直和陈铨率领大军向建州女真部进发，这是成化年间明廷对建州的第二次征讨，此时的女真各部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厄运中恢复过来，灾难又一次降临。女真各部的年轻人只好向深山中逃窜，留下老弱妇孺被明军斩杀，此役杀人七百，俘虏五百。虽然此战纯粹是没事找事，欺负弱小，但皇帝还是给了汪直封赏，其他人也跟着汪直沾光。

欺负弱小的女真汪直觉得没意思，他觉得应该找蒙古人打打。成化年朝廷跟蒙古的战争也持续不断，尤其是在河套这个地方大小仗打了几十次，而恰巧此时镇守西北挂兵部尚书衔的王越上奏诈称蒙古人入侵了甘肃靖远县，并劝汪直来西北转转，此事正合皇帝和汪直的心意。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朝廷命保国公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任监军，调动京城、宣府、大同的驻军赴西北进攻蒙古。

王越从情报上得知潜入河套的蒙古人驻扎在威宁海子后，便和汪直率轻骑直向威宁子海扑去，蒙古人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明军斩杀四

百多人。塘报传来，宪宗大喜，王越被封为威宁伯，其他人俱各封赏。

此时汪直荣耀到了极点，一个小小的太监竟然成了大明王朝的宠儿，整个天下都在为他喝彩。而此时的汪直也不回京了，便在边关镇守下来。

汪直驻守边关，那内地的肃贪问题怎么办？各位读者不用担心，因为内地有个假汪直。有个江西人叫杨福，在崇王府里当过内使，他在南京遇见一个熟人，熟人说他长的像汪直，接着又吹嘘汪直如何神勇，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干脆让杨福假扮汪直试验一番。两人打着“钦差总督西厂官校办事太监”的招牌开始南下，两人从安徽到南直隶，接着从南直隶到浙江、福建，就这样沿途巡视下来，一路上的府、州、县皆是风声鹤唳，众官员如迎天神。跟各级官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途百姓皆欢呼雀跃，诉状纷沓涌来，而这位假汪直竟然就地处理诉状，当场宣判，一些倒霉的地方官吏和士绅们被处理。到了福建，这位假汪直竟然检阅士兵、盘查当地的粮库起来，看来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汪直。两人好景不长，很快被福州的镇守太监识破，就地抓了起来。

虽然帝国闹了一场假汪直的丑闻，但他使人们都看明白汪直的威力究竟如何，一个假的汪直都能搅动整个东南，那么真的汪直岂不更厉害。朝中大臣开始酝酿除掉汪直，这件事情仍是由内阁和司礼监联手进行，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这两个平日里势同水火的中枢机构竟然因为要对付共同的目标携起手来。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此次便不能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而应采取更隐晦的方式。

皇帝经常在宫内听戏，不仅有一般的戏曲，还有小品，有个叫阿丑的民间艺人善于演小品。一天，朱见深照例兴致勃勃地在底下看戏，阿丑扮成一个醉鬼躺在地上耍酒风不起来，旁边配戏的一个人喊

道：“皇上来了”，阿丑不起来，那人又喊道：“汪直来了”，阿丑连忙站了起来。那人又问道：“为什么喊皇上你不起来，喊汪直你却起来了？”阿丑答：“世人只知汪直不知皇上矣。”

台下人皆笑，皇上也是尴尬的笑了笑，这个节目虽然很敏感，但是对于君主来说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皇帝知道这些人想栽赃汪直。但接下来的表演却触中要害了。

接下来的节目中阿丑打扮成汪直模样，一手拿了一只钺上得舞台来舞动，钺是古代一种斧状兵器。旁边配戏的又问道：“你拿两只钺干什么？”

“我带兵就靠这两钺。”阿丑答。

“哪两钺？”配戏的人又问。

“陈钺、王越。”阿丑答。

底下观戏的人又是哄堂大笑，但皇帝的脸色此刻却慢慢阴沉起来。

阿丑的回答终是触动了朱见深敏感的神经。陈钺和王越皆是文官，由于纯粹的武将统兵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欺压军户、克扣军饷、军纪涣散，但将文官参杂进去则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渐渐的让各地的巡抚提调监督军务。汪直作为一名宦官他跟朝廷到地方的一些文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些文官都支持汪直，其中陈钺与王越更是跟汪直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陈钺的升职和王越的封伯都是拜汪直所赐。但宦官结交文官对皇帝来说是很忌讳的事情，皇帝本来寄托宦官制衡文官，如今宦官却结交起文臣来，而且还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曹吉祥的教训仍是历历在目，如今的汪直跟曹吉祥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有什

么想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皇帝认为演戏的受人指使栽赃汪直，他也认为他们说的有理。

成化十八年，敏锐的士大夫们已经捕捉到皇帝对汪直失去了信任，内阁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书请罢西厂，万安的奏书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西厂被废。成化十九年汪直被贬到南京任御马监太监，汪直和他的西厂荣耀了六年，此后就像流星一样从帝国消失。

在明代的宦官群体中，汪直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宦官，他主政西厂的时候大概只有二十岁，属于刚成人的年纪，但他却敢清查官员、整顿吏治、带兵出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汪直不仅敢对利益群体开刀，而且还敢去触碰一般人不敢得罪的宦官群体，他靠的大约便是年轻人的那种冲劲，那种不懂一切，却敢干一切的精神。但汪直毕竟昧于人情世故，在政治斗争中他还显得很稚嫩，他只知道一股脑往前冲，却没有捉摸帝王心术，西厂复设后他却一直在边疆，跟朝廷、跟皇帝之间渐行渐远，当有人设计陷害他的时候，他却失去申辩的机会。汪直在成化年间的确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小小年纪竟然能令整个官僚集团抬不起头来，如果能给他一个更稳健的平台，如果他 not 是一名宦官，他也许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出来。

无论如何，汪直和他的西厂，以及此种行事风格都不会长久，它只能短期性的为帝王提供一种服务，令皇帝更加安稳而已。

正德皇帝在与文官的第一次交锋中败下阵来，他意识到要采取措施压制这股势力，他需要能够制衡文官的力量，在这种局面下，刘瑾走上了历史舞台。

刘瑾是朱厚照在东宫时的旧人，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带着朱厚照玩乐，更为重要的是在朱厚照登基后刘瑾在理财方面颇有心得，他会出一些主意让皇帝创收，他更是偷偷告诉皇帝国库收入减少

是因为文官们管理不善或贪污所致，要求对文官进行彻查。皇帝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刘瑾，刘瑾还有七个帮手，他们是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这七个人也是围绕在朱厚照身边的人。皇帝的确是孤立的，不仅在外廷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内廷也是如此，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跟前朝的怀恩一样跟他的主子对着干。皇帝逐渐依靠身边的这八名宦官建立自己的班底，盐引之事已经让皇帝决定跟官僚集团彻底决裂，但内廷和外廷已然联成一体，朱厚照只能暂时拿清查国库帐目一事打击官员，并让刘瑾掌握京师军队，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局。

刘瑾和他的七名助手对文官的清查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旦在皇帝那里落下什么口实，皇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他们进行打击。正德元年的十月份，盐引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紫禁城的气氛便剑拔弩张，文官们坐不住了，开始提前出手，而文官们的提前出手也使得正德年间的政治冲突全面爆发。

1506年10月27日内阁和司礼监上书要求武宗处死八虎，此时朝臣已经给刘瑾等八人取了个外号，名曰“八虎”，皇帝接到朝臣和司礼监的上书彻底绝望，他让人去央求内阁与司礼监，要求将这八人发配南京了事，内阁态度极其强硬，声明只将这八人处死，不做其他议题，而且要在二十八日的早朝上逼迫皇帝做此决议，大明朝到了这个时候已是倒了个个，不是皇帝对官员发议题，而是官员对文官发议题。到了晌午，朱厚照将此事压了下来，愣是不批。

下午，内阁和司礼监共同商量了一个议题，那就是到了夜晚在宫中密杀这八名宦官。物极必反，文官们的跋扈终于在文官内部招致不满。吏部尚书焦芳本就跟内阁三人有嫌隙，他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八虎，这场战斗刚刚打响，文官内部就已现分裂，焦芳的叛变导致文官们的计划功亏一篑，正德年的政治形势发生惊天逆转。焦芳不是一个

个案，嘉靖年还有张骢，从焦芳和张骢我们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文官在跟皇帝的斗争中还略显稚嫩，二是此时的文官还未上轨道，后世跟皇帝合作的严嵩和张居正的惨烈结局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帝国是士大夫的帝国，如果有谁敢跟天下的文官作对，严嵩、张居正就是榜样。

八虎得知了朝臣要对自己动手的消息，集体跪在了朱厚照面前痛哭，朱厚照此刻终于意识到形势是何等严峻，自己已经是退无可退，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自己不合格，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是否也会被动摇。虽然朱厚照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他仍是一筹莫展，这时候狡猾的刘瑾有了主意。

如果文官们不是要把这八虎赶尽杀绝，刘瑾等人也许就会乖乖去了南京，此后朱厚照就会失去最后的依靠，但皇帝在局势缓和后将这些人重新召回来也不是没可能，总之，一切还都是变数，但如今刘瑾等人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了。刘瑾告诉正德其实局势很好化解，先抓捕司礼监掌印王岳，将内廷控制在手里，然后将外朝的文官分化，如此这个僵局自然会破解。

朱厚照发觉如果顺着刘瑾这个思路做下去，的确有胜算的可能，文官都是纸老虎，真动起手来他们能坚持多久还是个未知数，自己必须要反攻了，为了祖宗成法，为了自己不成为一个傀儡皇帝，也为了后世子孙，必须要这么做了，我朱厚照不在乎后世对我的评价。

当天夜里，朱厚照指挥宫内禁军抓捕司礼监掌印王岳，随即让刘瑾执掌司礼监，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协助分管京营。这一切都在10月27日的夜里秘密进行，天还没亮，这位年轻的皇帝就已经牢牢掌控住了大内和京师禁军，他开始稳稳当当的坐在乾清宫内等待大臣们的早朝。

当鱼贯而入的文官们进入朝堂的时候，他们发现站立在皇帝身旁的不是王岳，而是刘瑾的时候，就觉得事情已经起了变化。刘瑾宣读了皇帝的告示，王岳被发配南京，皇帝驳回了处决八虎的奏书。

内阁三巨头当堂表示辞职，皇帝干净利落的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职，但却将李东阳的辞职驳了回来。皇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展现出了他的超强政治手腕，这件事情李东阳不是主谋，另外，如果将三人全部赶走，内阁没有挑大梁的，所以他留下了李东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皇帝还不想让内廷力量太强大，还也需要让内阁来牵制刘瑾等人，他还要对双方的力量进行对比，以便日后再微调，帝王的心术在这里又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此同时，朱厚照将那个告密者焦芳调入内阁，用于制衡李东阳，又让张永、谷大用、丘聚制衡刘瑾，朱厚照在短时间内就建立了一种精妙稳准的政治结构，正德年间的这场风波就如此悄无声息的被平息了，但它带来的政治地震远没有结束。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命群臣跪于金水桥上宣读奸党名单，宦官王岳在去南京的路上被刘瑾派来的杀手诛杀，回到原籍的刘健、谢迁随即被削职为民，户部尚书韩文因管理国库渎职而被罚俸1500石，本就经济不宽裕的户部尚书竟然一发窘迫起来。从正德元年开始一批反对刘瑾的官员被免职或被廷杖，刘瑾已经开始发威了，而朱厚照明显还想让他继续发威一段时间，一旦他触到朱厚照的底线，朱厚照就会收拾他。

正德元年的这场政治风波表面上看并无大的波动，也不见流血之事件，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称其为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不为过，这场政变的直接受益人是皇帝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内侍。弘治十八年正德登基后，官僚们便发现这位新主子不好对付，为了控制住皇上，避免皇上被他人干扰，官员们才想出处死八虎的主意，文官们的这一行为

是对皇权的严重蔑视，虽然皇帝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却改写不了皇权已经衰落的现实，而这场政治冲突的背后是厂卫政治重新崛起的事实，从文官们的表现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士大夫们的陈旧思想已经跟这个时代不合拍了，我们的帝国已经无法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中求取政治上的平衡。

经历了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波后，我们的皇帝开始躲藏在幕后，让宦官刘瑾在前冲了。

刘瑾是陕西人，本姓谈，后来给一刘姓宦官做干儿子，改姓刘，刘瑾熬到了55岁才出头。跟王振、汪直、魏忠贤一样，这位刘宦官在肃贪、打击权贵、清查账目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而后世文人大多将这种行为解释成清除异己、树立权威，即便是利国利民也不在考虑之列，究其原因乃是宦官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礼法不符。

从1506年11月份开始一直到1510年8月份结束，这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是刘瑾主政的时期，被冠以刘瑾时代，从“时代”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知晓刘瑾在这个时期总揽帝国的一切军政大权，而且还有一些新思维、新的变法措施，这些变法主要集中在吏部、户部、兵部，刘瑾的变法手段主要是清查账目，清查的范围极广，遍布帝国的方方面面，从更宏观角度来讲刘瑾的改革是想将宦官提高到与文官平等的位置上，让宦官也成为帝国官僚中的一员。刘瑾此举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属于前人没有尝试的领域，如果能够成功，的确是对中国二千年来政治体制的一种冲击，其结论是震撼的，它会使中国这种正在上轨道的文官政治嘎然而止，而这种双头政治将会使中国的政治结构更加稳定，或许它能够破解明代的政治迷局，但刘瑾开创的这种行政结构会给中国的伦理道德带来多大的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刘瑾掌权后首先将各地的镇守太监提到跟巡抚同级别位置，各地镇守太监可以监管地方的军、政、司法一切要务，等于说是在各省实

现双头管理，各地送往内阁、部院的文书必须要从司礼监过一道；刘瑾恢复了洪武时代那种严厉治贪的刑法，不过与洪武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贪腐的官员不再是以体刑的方式来处罚，而是代之以经济手段来处罚，毕竟时代已经进步了；刘瑾还有许多变法体现了公平性和人性化，针对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多的情况，刘瑾限制南方人的录取比例，增加中西部举子的录取比例，刘瑾还命令寡妇再嫁，家有死人不葬者政府将强行火化。南方富庶省份的官吏不仅不能由本省人担任，就是邻省人也不行，帝国的官员开始南北大对调，任职漕运总督的官员也不能跟运河沿岸的省份发生任何联系；刘瑾派人清理天下田亩，将隐瞒的田亩分给自耕农耕种，限制士绅和军官占田，他还从内廷和户部、兵部派出大量的官吏去清查各地的军屯、军库、皇庄、粮仓、漕粮、两淮的盐政，还有国库下拨的资金。

一方面打击贪污、瞒报，另一方面刘瑾千方百计增加国库收入，除了罚款以外，刘瑾增加各地银矿的摊派，并增加各地军屯上交的税收，此举是最要命的，一方面对军屯进行清查，另一方面又对其掠夺，这些直接导致了后面的兵变，也成为刘瑾覆灭的一个诱因。

刘瑾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紧一收，开支缩紧加上税收增加，如此一来既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能为皇帝和自己增加收入，对宣德年以来的弊政也有很大的纠正作用。刘瑾的治贪不仅对准天下官吏，对于自己的亲信和内廷宦官也在所不惜，宦官杨镇因为在南京受贿被刘瑾亲自交给南京三法司会审，亲信刘宇因为所辖地耗损颇多也受到责罚。此时的刘瑾早已走上汪直的道路，跟汪直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跟汪直一样跟全天下的人作对，这里面不仅有官僚，而且还有皇室、宦官，更有军人，就连八虎中的其他七虎也对刘瑾心生不满。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帝国的人战战兢兢，官员稍微出现一点差错就会被处罚，出现纰漏的官员不等刘瑾来查便已自杀而死，还有的官员因

为畏惧刘瑾竟然将家人、亲戚、朋友也检举出来，而刘瑾也鼓励互相诋毁，我们的帝国似乎又重回洪武时代。

敏锐的人知道刘瑾这座大厦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从中枢到地方，从内廷到外廷，从政府到军队都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一种骚动的气息，帝国仿佛又重现景泰、天顺年间的情景。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的一天，内廷宦官将一份匿名弹劾刘瑾的奏折故意扔到早朝的御道上，奏折被一御史拾到，这份奏章被送到了朱厚照面前，奏折上罗列了刘瑾的几大罪状。此时的刘瑾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这份罪状又没有署名，朱厚照自然将这视作阴私之事，朱厚照命所有大臣跪在殿外，让群臣自招。

慌里慌张赶来的刘瑾看自己还没动手，皇上已经叫众人跪在那里了，他在那里破口大骂，刘瑾在那里折腾了一整天也没查出来什么，到了夜里便把三百名官员带到了镇抚司盘问，也是毫无结果。第二天才清楚乃是一宦官所为，这事就这样告一段落。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个对刘瑾不满的宦官所为，但何尝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想法，虽然刘瑾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这次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刘瑾对天下臣僚们的跋扈已经得罪了所有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该完蛋的时候大约便是你会完蛋的时候，此时已经有部分人开始酝酿倒刘。

安化王朱寔鐭是封在陕西庆阳县的一个王，通常人们知道正德朝有宁王叛乱，却不知道还有个安化王先于宁王起事。人们不解的是正德年间的宗室叛乱为何如此多，也同时不解一个封在西北的小王为何也敢叛乱，其实这既跟刘瑾有关，也跟朱厚照有关。

刘瑾清理屯田，让军户纳粮，西北就是重点，陕西当地的驻军早就怨声载道，而安化王朱寔鐭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利用军士的不满乘机发难。无论是安化王朱寔鐭，还是后来的宁王朱宸濠，我们都

觉得非常奇怪，这些毫无胜算的藩王为何要如此？或许唯一的解释还是《皇明祖训》在起作用，大概这些藩王真的以为自己干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抑或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也不得而知。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的一天，安化王朱寔鐸将当地镇守太监、总兵等人请到王府饮宴，席间安化王将一干地方官员杀死，接着又带着他的兵将朝廷派在庆阳的巡抚都御史杀掉，然后写檄文传至四方的军队指挥官。檄文中打的旗号是清除刘瑾，所遵循的依然是《皇明祖训》，朱元璋苦心创造的祖训不仅没能保证明王朝的安定，反而成了后世子孙的桎梏。

朱寔鐸打的算盘非常好，他发现各地的军官都对刘瑾牢骚满腹，以为如此一来众人会纷纷响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没有一处响应。朱厚照接到朱寔鐸造反的奏报后，便命杨一清率兵平叛，八虎之一的张永监军。杨一清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重臣，曾三次任三边总制，最高官至内阁首辅，成化年间，蒙古人移居河套，陕西北部的防务突兀起来，为了协调应对，弘治年间委派重臣总督甘肃、延绥、宁夏三镇防务，是为三边总制。杨一清和张永的平叛兵马走在半路上就传来消息，前方叛乱已经被一名游击将军平了，朱寔鐸本人也被擒获。

眼见叛乱已平，杨一清和张永便调转马头往回走，在路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这番谈话直接决定了刘瑾的命运。杨一清向张永分析了当今的时局，明确指出此次叛乱是由刘瑾专权引起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叛乱或许是帝国今后面临的经常选项。杨一清想让张永出面搞掉刘瑾，但张永对于这个议题并不感兴趣，张永说道刘瑾对于他本人的威胁甚小，刘瑾擅权与否对于他来说似乎并不关痛痒。杨一清随后又说道如果刘瑾被废黜，张永或许能取代刘瑾的位置，获取更多的好处，并指出皇帝也对刘瑾不满。

实际上张永最担心的还是皇帝的态度，一旦打刘不成，反受其咬，正德三年的例子已经摆在那里，令张永最终下定倒刘决心的是张永相信了杨一清对陛下态度的判断，他也感到刘瑾倒台的时候到了。

1510年8月张永带着安化王回到北京，举行了献俘仪式，仪式结束后，张永乘刘瑾不在，向朱厚照说道刘瑾要谋反，请求朱厚照诛灭刘瑾。听完张永的话，朱厚照不语，仍在犹豫，张永又向朱厚照递上安化王谋反的檄文，并指出安化王谋反的原因就是因为刘瑾，这时候，八虎中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朱厚照终于下令拘捕刘瑾。一个权势熏天，被称为“立皇帝”的人物就因为内廷宦官的几句话就覆灭了，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刘瑾多么强大，他只是皇帝的一颗棋子，一旦不需要这颗棋子的时候，轻轻一推即可。

虽然刘瑾被逮捕了，但必须给他安一个罪名，最好的罪名就是谋反，一旦定了此罪，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当年对胡惟庸、蓝玉的处理就是如此。想到此处，文官和宦官们便在刘瑾府上放置甲冑、兵器，据传还有玉玺，然后让朱厚照前来观看，当朱厚照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大概心理也明白这是倒刘的官员们做的手脚，但他也没说什么，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刘瑾被凌迟处死，连割三天，一代权阉就这样莫名其妙而又迅速的从历史舞台消失。

关于刘瑾的一切似乎都是迷雾，史书上已经难以找到答案，我们或许只有依靠推测才能得出合理的历史真相。

刘瑾的改革是庞大的，涉及官僚系统的一切，刘瑾将自己的变法条款编在一本书上，名唤《见行事例》，涉及吏部的有24款，户部的有30款，兵部的有18款，工部的有13款，内容都是针对天下的弊端，但刘瑾死后，关于《见行事例》的一切都被文官们烧毁，人们已

经无法知道《见行事例》里面究竟记载着什么内容，只能从其他史书中抠得一些细微枝叶。

刘瑾初掌大权后，跟内阁与部院的关系非常好，他对内阁首辅李东阳非常尊重，李东阳的建议他从来不违背，李东阳也尊重刘瑾。刘瑾自己学识有限，便找了一个文人张文冕，所以刘瑾主政的时候天下的奏章实际上就是由这个张文冕批红。不仅如此，刘瑾注重选拔清廉的干吏，所以从内阁到部院大多数人皆出自其门下，此时内廷与外廷已经联成一体。

跟文官的融洽关系形成对比的是刘瑾跟内廷宦官关系非常紧张，八虎中的另外七虎都极其厌恶刘瑾，张永曾经当着朱厚照的面与刘瑾互殴，虽然刘瑾令人们畏惧，但内廷宦官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他最终还是载到了这批本应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人手里。正德三年的匿名奏书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刘瑾与内廷的矛盾，在奏书风波后，他甚至成立内厂来对付东西二厂。

除了与宦官产生矛盾，因为变法，刘瑾跟地方官吏、军队、宗室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安化王叛乱之前，辽东已经发生一起小规模军队骚乱。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地是朱厚照处死刘瑾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正德元年文官的疯狂使继位不久的朱厚照地位岌岌可危，后来依靠刘瑾，形势顿时急转而下，朱厚照从一个毫无地位的皇帝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仅仅过了几年的功夫他就对刘瑾不满意了，这其中的原因说白了还是刘瑾过于专制，使得朱厚照也感到此人很棘手。但朱厚照为何要将他凌迟处死，说来仍是令人不解。

刘瑾这个人物说来还是由于明王朝政治运行中出现了偏差而上了位，他和王振一样力图仿造洪武皇帝重塑这个帝国，他们都是理想化的人，就是洪武皇帝那种具备超强能力的人仍然受制于生命的长度，更可况王振、刘瑾乎？刘瑾的一系列措施过急、过猛、打击面太大，

虽然求治心切，但终是功亏一篑，在历史的惯性面前人的力量何其渺小，虽然如此，但刘瑾时代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是应该关注的。由于刘瑾是一名宦官，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不容于封建礼法，他死后，他的所有变法措施立即被废除，史书上也鲜有提及，他的变法效果我们也无从得知，关于他的一切对于帝国的士大夫们来说都是不愿意触及的话题，但在此之后，进入嘉靖年帝国的弊端却日益严重起来，终是积重难返。

1510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刘瑾死去；1566年也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嘉靖皇帝逝世，随后拉起了持续16年的隆万大改革，无论史书对于“隆万改革”如何粉饰，它终是沿着刘瑾的道路前进；1582年也同样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在这一年帝国的改革家张居正逝世，在他死后他同刘瑾一样遭到清算，从此，我们的帝国终是进入不可挽回的命运。

无论如何，刘瑾时代对于某些士大夫来说或者对于朱厚照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

第三篇 经济：汹涌的明代资本主义浪潮

1 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东林党

虽然在万历二十一年，在次辅王锡爵的争取下，皇帝让长子出阁读书，虽然也在万历二十九年，在全体臣僚以及勋贵的要求下，皇帝最终册立长子为太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皇帝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杜绝跟臣僚的一切交流，既不赞扬他们，也不惩罚他们，空缺的职位也不弥补，他想让所有的官僚绝望，这自然是因为皇帝绝望而产生的一种报复。

从万历的第二个十年起，帝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高层官僚和底层官僚对立起来，因为他们认为高层官僚妨碍到了他们的利益，具体来说就是畅所欲言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所有的人，包括皇帝和内阁大学士都应该虚心接受他们的批评，遵照他们的行为规范和理念，在此过程中如果有任何异议，即不是道德君子。在中国16世纪的晚期，在在朝、在野的低级官僚中由于共同的利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东林党，而这一切都要从1593年的那场京察开始。

1593年照例六年一度的京察又开始了，在这一年春天朝廷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皇帝抛出三王并封的议题，而新进内阁次辅王锡爵对此持暧昧态度，众人纷纷将矛头对准王锡爵，直至跟内阁发生全面冲突，而1593年的京察给这一切提供了条件。

1593年的京察主要是低级官吏借此机会整治王锡爵，而幕后的操纵者就是吏部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顾宪成是个控制欲很强的，而且又自认为懂政治，事实证明，顾宪成在万历面前完全是个小学生，他那点小伎俩别人都看的清清楚楚。

虽然这次京察是由顾宪成在背后鼓捣，但实际负责的却是吏部尚书孙鑮、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孙鑮上来就将自己的外甥吕允昌干掉，而赵南星上来也将自己的亲家王三余干掉，虽然这看起来他们是不循私情，但明显做的有些矫情，其用意就是给政敌释放出来一种强烈的信号。

果然，内阁次辅赵志皋的弟弟被免职，首辅王锡爵控制的几个言路官员也没通过考察。这场京察于二月份结束，三月科道言官刘道隆以拾遗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杨于廷、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而吏部建议留用虞淳熙，刘道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虞淳熙本身是吏部的人，而且是孙鑮的同乡。万历二十一年一场由吏部引发的针对内阁的暴动就此引发。

顾宪成等人似乎中了圈套，他们对于政治想的过于简单，此次拾遗明显就是针对负责京察的吏部而来，孙鑮不仅没能保住虞淳熙，反而给自己的团队带来麻烦。很快，刘道隆弹劾孙鑮结党，皇帝也令孙鑮做出解释，顾宪成给孙鑮代笔上疏抗辩。孙鑮的抗辩没起到任何作用，皇帝对孙鑮罚俸二个月，将赵南星连降三级，贬谪外地，至此由吏部仓促发动的这场京察已经面临难以收尾的结局。

赵南星被调离吏部可以说是打到了对方的命根子上，孙鑮以辞职相要挟，各部堂官纷纷力保赵南星，皇帝第一次感到朝廷的政治走向已经出现了微妙，有一股力量在左右舆论的走向，往往一件小事情就可以将这些人钓出来，皇帝明确的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一旦退缩，其后的波涛凶险没人能够预料。

众人对赵南星的求情没有得到皇帝的理会，接着，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干亨、礼部郎中于孔兼、陈泰来、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严、助教薛敷教轮流替赵南星喊冤，说王锡爵为了庇护私人从而处罚赵南星。官员们的锲而不舍只能助长皇帝的斗志，而且针对人事任命问题这么多人口径一致，明显是结成朋党，万历就以朋党罪将陈泰来发配边疆，将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贾严、薛敷教降三级，贬谪外地。

紧接着，负责此次京察的左都御史李世达又上疏抗辩，皇帝干脆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全部削职为民。至此，1593年的这场京察暂时以吏部的失败而告终，但这绝不是意味着这场政治攻击的结束，事实上，斗争的双方都在寻找可以重新点燃战火的引线，所有人都坐在了火山口，随时会莫名其妙的丢掉官位。

到了八月份，曾与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订亲的太仓人吴之颜的儿子吴镇状告赵用贤“论财逐婿，蔑法弃伦”，这种罪名按说是很重的，明王朝早已到了因为小事情而引发政治大动荡时刻，这种由小事件引发的大动荡绝不意味着小事情本身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而是因为大的政治事件往往都经过长期的发酵。

这件涉及婚姻诉讼的普通官司引起了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的关注，只因为这是一件涉及吏部的案子，杨应宿、郑材开始就这件事弹劾赵用贤，而李世达又上疏为赵用贤抗辩，并指责杨、郑二人诬陷，而杨、郑二人又上疏索性连李世达一块打了。而此时吏部文选司又会推以前被万历免职的言官，神宗大怒将文选司官员全司免职，这时候，李世达又上疏乞休，皇帝便批准了李世达的申请。行人司行人高攀龙坐不住了，他蹦出来弹劾内阁指使杨应宿打击吏部和都察院，而皇帝对内阁唯唯诺诺。实际上，高攀龙是正话反说，他知道内阁是奉

了皇帝的旨意，但又不好在这个事情上对皇帝发难，只好采取这种指桑骂槐的办法。

杨应宿立即针锋相对，他指责高攀龙上疏是顾宪成在背后挑唆，吏部这帮人专以跟内阁作对为时尚，并指责吏部诸位大员贪赃。皇帝对杨应宿的弹劾十分感兴趣，杨应宿的话涉及两个话题，一是1592年的这场政治攻击，顾宪成是幕后操作者，二是吏部官员贪赃，一旦贪赃落实，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他们，二来通过抄家也可以缓解宫中开支紧蹙的局面。

万历皇帝亲自批示道：近来小臣不修本职业，喜爱搬弄是非，该部院会同该科从实询问杨应宿，何以吏部贪赃，何以高攀龙为顾宪成指使；又问高攀龙，何以朕一事不管，亲批亲点，俱出辅臣之意，明白回话，不许徇私党护。

皇帝前面的批示表面上看是斥责杨应宿不修本职，实际上是鼓动杨应宿继续发挥能量，而后面对高攀龙的斥责明显是为王锡爵开脱。结果，高攀龙没解释出来个所以然，杨应宿也没有吏部官员贪污的证据，这样，皇帝将杨应宿和高攀龙两人俱贬到了外地。随后，吏部尚书孙鑰和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也被王锡爵票拟回家。

接着，又有一些官员弹劾王锡爵，神宗无一例外的进行了处罚，此时，王锡爵已经累了，他已经帮皇帝搞掉了一大批官员，因为皇帝要罢免哪位官员必须经过内阁票拟，所谓的官员们恨王锡爵正是基于此。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出山，到万历二十二年王锡爵再次致仕，他任首辅有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锡爵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逼迫皇帝让皇长子出阁读书，第二件是帮皇帝搞掉一批找事的低级官员，完成这件事情后，他便向皇帝提出致仕。万历自然舍不得王锡爵走，但锡爵去意坚决，皇帝也只好作罢。

整个万历四十八年时间里，对帝国做出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位王锡爵，可是多年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没人再记起他，或者仍然记起，但是却不愿意提及。没有人知道万历二十一年时事的艰难，首辅为了国本问题所形成的正确解决思路。

当王锡爵离职回家后，赵志皋再次成为首辅，帝国似乎又重回申时行时代，一个在君主和低级官僚之间跳舞的时代。赵南星、顾宪成已经离开朝堂，高攀龙被贬到地方做小官，也没有什么意思，很快三个人将无锡县东郊的东林书院修正一下重开已经被张居正禁止的书院讲学。

事实表明，东林书院就是失败者的乐园，精神沮丧者的疗养地，大批在万历朝被斥退的官员来到那里，他们整日发表空议来获得精神上的寄托，从地方骂到朝廷，从朝廷骂到地方，不仅如此，还有一批在朝的低级官僚也跟他们遥想呼应，多年以后这批以低级官僚为主，为低级官僚争取民主权力的党派被冠名以东林党，其发生的原因是整个明王朝参政议政群体的扩大和舆论权力下移的结果，这一切都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东林书院的建立，以及参加这个组织人员的扩大，东林书院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团体，它的参与者所秉承的意志与理念也可以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纲领。

面对东林党的结社，其他人士也纷纷结党自保，赵志皋之后的首辅沈一贯拉拢在朝的浙江籍人士组成浙党，在朝的湖广籍人士组成楚党，山东籍人士组成齐党。12年后，1605年的京察又如期展开，在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的主持下，东林党再次遭到了打击，但以沈一贯为首的内阁派也受到很大创伤，在两年后，当有御史再次弹劾他的时候，他便被迫致仕。

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运作，一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政治运作的效益并不高，而且还很拙劣，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其关键问题是没有核心人物能够进入决策圈。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位叫做李三才的人进入到顾宪成的视野。

李三才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因为弹劾张四维和申时行而遭到贬官，李三才跟顾宪成秉性相同，好发表议论、结交朋友，活动能力强。当三才担任凤阳巡抚又总督漕运的时候，三才成了反对税使官员中最猛烈的一个，而且他还唆使地方势力杀税使，这又使得三才在缙绅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当沈一贯离去的时候，皇帝对内阁次辅沈鲤十分憎恨，因为沈鲤在一些事情上跟万历作对，皇帝便命沈鲤跟沈一贯一同致仕。此时内阁还留下了朱赓，朱赓跟王锡爵、沈一贯一样，在大事上跟皇帝保持一致，经过吏部的会推，皇帝又将李廷机、叶向高补进内阁，但皇帝仍将首辅的位置空在那里，他想将王锡爵召回内阁来担任首辅。

帝国的内阁大学士拥有密揭专奏的权力，此种密揭不需要通过通政司，可以直接上达天听，也就意味着不必公开。

万历三十五年，王锡爵给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密揭上是这么说的：

臣窃见近来邸报，奸邪结党，倾害忠良，朋比行私，要名讪上。甚者称倾朝为叔李，目皇上为庸主，揣摩逞臆，颐指捏诬，不能悉举。且以近日参政姜士昌之疏言之，其事虽公，其心实私。渠等布满南北，眈眈虎视，无可谁何。更暗伺朝廷动静，以资唇吻，肆毒善类。古云，主辱臣死；又云，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皇上受小臣之侮极矣，奸党之无礼极矣。

王锡爵的这道密揭摆名了就是讨皇帝的好，将东林党比作奸党，将自己比作替皇帝逐鸟雀的鹰鹫，意思是自己愿意回到内阁，王锡爵这道密揭等于是吹响向东林党全面进攻的号角。在东林党遍布帝国南北的情报网络覆盖下，这份密揭很快落入李三才手中，李三才将这份密揭原稿抄了下来，这样在这份密揭还没有抵达天听的情况下已经在低级官僚中传阅了。

很快东林党运作弹劾王锡爵，这次出头的是曾经做过常熟知县的段然，他指责王锡爵乱用密揭，进朋党之说，行人事之害。实际上，东林党的反驳是无力的，他们确是结党营私，对君上无礼，这也是在此次密揭事件后东林党的反攻不是那么热烈的原因，实际上，如果皇帝具备斗争的手腕的话，完全可以根据王锡爵在密揭中拟定的罪名刮起一股大的政治风暴。但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皇帝，一个患得患失的皇帝只会将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

从低级官僚斗争的诉求来看，他们需要一种舆论权，这表明到了17世纪中国，密室政治已经跟这个蓬勃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李三才捅破了密揭事件给东林党立下一大功，完成高度评价三才，说他立下社稷第一功，并称三才“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阿谀到了极点。

密揭事件的公开使得王锡爵再回内阁已经不可能，不久，朱赆死掉，李廷机由于受言路攻击闭门不出，这样内阁就只剩下叶向高一人，吏部会推阁臣已经是箭在弦上，而东林党力推李三才已经是箭在弦上。由于此时的叶向高就是东林系的成员，如果李三才再入阁，就会出现东林党把持内阁的局面。

围绕一个李三才入阁问题，双方较上了劲，帝国进入了山雨即来之势。反东林一派的官员邵辅忠，列举李三才贪、险、假、横，说李

三才矫且伪，“贪”是指李三才派人去各地索要贿赂；“险”是指李三才将各地进贡给皇帝的东西偷为己有；“假”是指李三才经常毫无廉耻的骂人，自己却目无法纪的结党营私；“横”是指李三才借着漕运总督的职位贪污公款，过着奢侈的生活。

邵辅忠对李三才的抨击可以说是去皮见骨，它引起了顾宪成的恐慌，他先后给首辅叶向高写了一封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写了两封信替李三才辩解，但宣大巡抚吴亮抄录了这三份书信，将邸抄送到了各个衙门，既然已无密室政治可言，那么各党派的来往书信必须公开，这已经是帝国的共识。

顾宪成的书信在朝野掀起大波，一个被削职的草民竟然遥控政治，干涉帝国的用人权。中国有句话，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顾宪成此举只能是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脚。

就这样，双方隔空开火，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双方引经据典、挖心刻骨，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此事，越来越多的事浮出水面。御史徐兆瑞认为东林书院干预朝政，将这一派官僚命名为东林党，并指出东林党在江南私设税卡，以修书的名义胁迫地方官吏送银子给书院，东林书院动耶到各地讲学，地方政府全以公款招待，东林书院刊印的书强迫各地购买，诸如此类不法事件，最终，徐兆瑞得出的结论是天下只知有东林书院，而不知道有皇帝陛下了。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李三才入阁事件再无可能，他也没脸面再继续在朝堂上呆下去了，最后在万历三十九辞去职务，之后，回到家乡北京通州去了。

虽然李三才没能入阁，还使东林党凭空损失一员大将，但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南北京察中，由于东林党系的叶向高担任内阁首辅，主其事者也为东林人士，北方京察中大批浙、楚、齐党的人

被斥退，而在南京的京察中，把持南方京察的浙、楚、齐党又纷纷将东林党人斥退，在帝国的版图上，南北同时上演政治对攻的局面。但当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致仕，浙党人士方从哲接任首辅后形势便逆转而下，大批东林党人被斥退一空。至此，东林党便结束了万历朝的纷纷扰扰，他们的复出便是下一个朝代的事情。

我们对东林党很难做出一个评价。它以低级官僚为主，反映了低级官僚要求言论的自由，但同时他们对于反对的言论同样也持压制态度，所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通过剥夺别人说话的权力来换取自己说话的权力。

崇祯年间，常熟县民张汉儒就曾控诉东林骨干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奸且操之。”此论虽然偏激，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问题。

的确，东林党成员大多出身士绅阶层，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干预朝政、把持公论、奔竞请托、包揽词讼、隐漏钱粮，异己者虽清必驱，附己者虽秽必纳。所以，清朝初年开始严禁士人结社。

但无论如何，在那个熙熙攘攘的万历王朝，东林党能够坚守儒家伦理道德，在国本之争中仗义执言，最终迫使万历皇帝做出让步，他们的功劳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万历年间随着商业发展，参政议政群体开始扩大，舆论也开始民间化，士大夫们开始提出“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乃共治基础”，这些都反映了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积极的追求民主权利，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赖于这个蓬勃发展的商业时代。

在那个经济日益发展的17世纪，东林党人更是提出了，“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而是万民之天下”，这样具备民主思想的观点，这在明王朝，在17初叶的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骄傲。

但对于我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来说，言论自由和民主只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而在万历朝高层与中层的矿税斗争中，东林党又表现出激烈的反对态度，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体系的利益，既希望压制君主，又希望剥削底层民众，既无国家观念，更无民族观念，不仅如此，从他们身上，儒家思想的本质目标，终于得到露骨的体现。

对于这样一个政党，我们需要的是高层加以辅导，将它们纳入正常轨道，力争将其危害减小到最轻，是为帝国之福。

2 矿税斗争与资产阶级的柔性革命

整个明王朝研究的重心集中在它的税赋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明初进行各项建设和军事行动都不成问题，而明末组织一场大的军事行动都显得费劲。现在我们知道明朝的灭亡跟元朝一样都是亡于财政破产，也就是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由于皇帝失去话语权，导致征税日益困难，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历代封建王朝大多如此。

洪武朝天下拟定的纳税田亩数为八百万亩，田赋为2700万担，之后基本上将此作为纳税的标准确定下来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军屯被破坏，政府雇员增加，人口的增长，这些都使得开支变得巨大，而税赋却由于洪武成制而无大的增长，加上天下积习已久，抵制变革的力量强大，明王朝只有晃荡着前行。

但到了16世纪，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人口转成商业人口，商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开始上升，而大明王朝的官僚也大多出身于商人或者士绅。由于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抑或者文官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商业税率却无法提高，千分之三的税率几乎等于没有，征税的关卡也只限于运河和北京的崇文门，所以从嘉靖朝以后，大的商帮动辄动用超过百万两资金的现象已经成为平常。官绅一体、官商一体，只能将负担压在小民头上。

大约从正德年间开始，随着宫女和宦官人数增长，明王朝宫廷开支出现了困难，正德皇帝常常感到手头紧蹙，他时常向户部讨要银两，而且在一些大的开支上拒绝动用宫里的钱。到了万历年间，虽然有张居正留下的几百万两国库存银，但在后来的万历三大征中耗费将尽，而且皇帝还从宫里拿出不少钱贴补军费，最重要的是他还要面对

两宫三殿在火灾之后的修复工作，这些都缺乏财政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只好另辟财源。

万历二十七年，神宗在跟首辅沈一贯讨论矿监税使的时候，神宗说道：“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匱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皇帝的想法是绕过户部，直接派宦官去各地开矿，将收取的矿税直接入宫中的内承运库，这样既解决了宫中的开支，余者还可以补贴国库，两难自解。

帝国实行的一直是禁矿的策略，因为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在利润的刺激下，大量的人口会蜂拥至这个行业，而且官营的开矿还会刺激民营开矿的兴起，聚集在一起的矿工将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成化年间的叶宗留造反就是例证。从洪武矿禁以后，直到成化年间，因为财政困难才复而开矿，很快又禁，到了嘉靖年间，又因财政困难，复而又开，再开再禁，所以，当万历皇帝提出开矿后，自然遭到了文官们的激烈反对。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皇帝派出了第一拨采矿的太监，御马监的鲁坤带着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杨金吾前往河南开矿，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前往北直隶的真定、保定、蓟州、永平开矿，从此皇帝从皇宫大内陆续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

昌平有王忠，保定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江苏有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陕西有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窠，云南有杨荣。

从万历二十五年开始，各地的矿监便陆续给大内进贡银子，或几百两、或几千两，这些往往能解燃眉之急，所以无论多少都能令神宗满意，但由于地方官吏一意阻挠，开矿的收益并不大，征税的目标从矿藏转向商业已成了必然。很快，在派出矿监的同时，皇帝又向各地派出税监，而且是一人身兼两职。皇帝是个明白人，在“安忍加派小民”的思维下，他终于懂得向蓬勃发展的商业出手了。

此举自然引起帝国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我们知道文人们没有一定的物质做后盾是无法从科举中拼出来的，自小的教育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还有家族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这些从科举中胜出来的士大夫们大多出身于商人或缙绅家庭，他们进入仕途后也往往依附于原先的阶层，无论从利益上还是情感上都会做出有利于本阶层的决策。

从张家湾、卢沟桥到京杭运河，以及长江沿线布满了面对商人征收商业税的税使，商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像这般尴尬。很快，帝国的官僚们摇动了笔杆子，他们极尽一切之能事来妖魔化征收商业税，围绕着征税问题，在17世纪前后的中国，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式爆发。

高攀龙在《上罢商税揭》中说道：“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高攀龙的话完全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其辩解也是无力的，按照他的说法，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征收商业税，让商人都将钱赚走，政府也压根就不应该征税，只要节约钱便来了。如果政府没有充足的财源，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谁来抵御？面对滔滔黄河水，谁来治理？面对天下灾民，谁来赈济？难道要靠商人出钱吗？

而李三才的上疏更加措辞激烈，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上的《请停矿税疏》中说道：“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

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帑。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李三才极尽夸大之能事，将一个区区商业税说的有如天崩地裂一般，其实质问题仍是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高攀龙祖上世居无锡，从他的高祖起家中就有田三百亩，而其祖父高材则是亦官亦商，其父高梦龙则经营放贷行业。

而另一名上疏的李三才，其家族本就是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商人，而此次增加商业税收，张家湾本就是重点，加上李三才总督漕运，一旦由宦官在运河沿岸收税，那么由其漕运衙门征收的税额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所以，此次万历派出税使征税还涉及一个中央和地方利益关系问题。

田口宏二郎在《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一文中指出：

“明初以来，在全国府州县城、镇市里设有税课局，经过这些地点的客商们，必须得缴纳商税才能获准通过。然后，从16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宝钞的贬值，各地陆续关闭了许多税课局，不久，折银交纳商税，牙行承包征税的现象逐渐普及起来。随着上述趋势的盛行，商税在州县等地方机关里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各个牙行承包征收商税业务以后，各地争先恐后滥立牙行。地方官们付给他们牙帖，以他们所交纳的商税来填充地方政府的经费。并且，16世纪开始折银交纳商税的现象普及以后，地方官们又都把这项收入编入了定额条鞭，这更加减少了这项税目的伸缩性。”

田口的这篇论文解释了两个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商业税收从16世纪开始便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二是地方政府征收的商业税收是

定额，一旦皇帝派宦官加征的话，势必减少他们所征收的额度。

除此之外，李三才在朝中向来是以擅长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来博取美名而闻名，其本人平日里生活奢侈无度，缺乏检点。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他也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用人不必择贤者，有才即可”，一次顾宪成路过凤阳的时候去拜访他，头一日饭食简便，第二日饭食豪华，宪成不解，他笑道：“今日从漕运上收了点小钱”。

正是三才平日里豪放不羁，不注意言行，才导致不断有御史抓住三才把柄对他进行弹劾。大明宫室里所用的皇木大都取自贵州，沿沅江流入长江，然后再沿京杭运河运到京里来，而皇木卸下来的终点就是北京通州的张家湾，而李三才身为漕运总督，其家又在张家湾，这都给他偷盗皇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御史刘光复劾李三才偷盗皇木，用于营建私宅，而工部侍郎林如楚也指出皇木的确有丢失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便派林如楚会同科道官员前往三才位于张家湾的家中查看。查看结果令人结舌，三才家中瑰丽神奇、崔巍广大、势甚铺张，有一座花园，前后半里，乃是当年皇厂的地基，而大门与二门之间又为原来户部仓库地基，三才不仅侵占皇产，而且侵占官产。我们知道通州乃是运河的终点，从南方运来的木材和粮食都在这里卸载，所以这里通常都建有皇厂和粮库。不仅如此，三才家中所用木材都是南方杉木，而且“出卖无主，报税无票”，工部官员既然查勘属实，三才自然难逃罪责。

此时，三才已于万历三十九年辞去职务，闲居家中，所以，神宗最终也是给三才免去“士”的身份，削为民了事。

既然李三才身上有这么些不检点之处，那么其奏疏的份量就可想而知。面对群臣反对商业税的奏疏，皇帝一概留中，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便煽动市民暴动。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二十四日，山东省临清三四千脚夫包围了临清税使马堂的衙门，从衙门里冲出来的兵丁将外面带头的抓了几个进去，这时候外面有人带头高呼：“里面杀人了！”在此人的吆喝下，外面的人一起冲了进去，将税厂焚烧，殴打、踩踏死了四十几人。

同年七月，御马监太监陈奉在湖广荆州遭到数千市民投掷石块，随后陈奉在沙市、黄州又遭到市民驱逐。不久，武昌、汉阳万余人包围了陈奉的税厂，众人向里面扔石、放火，好在巡抚带兵火速驱赶了这些围攻的市民。

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弹劾陈奉九大罪状，神宗接到奏疏革去冯应京官职，接着，湖广的一些地方官也上疏弹劾陈奉，皇帝将这些上疏的官员全部免职。当锦衣卫抵达武昌宣布冯应京等人罪状的时候，武昌数万市民发动暴动，再次包围了税厂，陈奉逃到楚王府里一个月不敢露面，市民们焚烧了税厂，并将税厂里的六名办公人员打死投入长江。

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正月的云南民变则使反抗矿税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当月，地方卫所的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率领市民万余人冲进税厂，将税监杨荣打死投入火中，并打死杨荣随从二百多人，消息传来，神宗几天吃不下饭。而凤阳的李三才更是匪夷所思，他买通牢狱里的死囚，这些死囚纷纷将山东税监陈增的爪牙们咬为幕后主使，结果，三才将陈增的爪牙一一捕杀。

从上述一系列因为征税而引发的民变中可以窥见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17世纪的中国所产生的一些裂变。

首先，皇帝征收商业税引发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官集团集体反弹；其次，由于商业税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来源，故而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一意阻挠，乃至阳奉阴违，而税监为了完成任务，会跟他们发生冲突，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动乱将会成为帝国必然的选项；第三，从这几例事件来看，如此大规模的暴动集中爆发，一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而这些民乱无疑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纵容，乃至煽动；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发生于17世纪初叶市民阶层反抗税监的这场运动充分表明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纺与耕的分离，一个新兴的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有了独立的财源来对抗统治阶级，而其背后是在君主权威被矮化情况下，整个万历朝非君浪潮的兴起。而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发生于苏州的纺织工人暴动，因为暴动的主体是雇佣工人，而非前面的商民，所以这次民变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工人运动正式在帝国发端。

当帝国即将结束16世纪的时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就是财政问题，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没有资格从全局考虑问题，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一些潜在的隐患似乎无人顾及，他们更多考虑的只是眼前。

社会的经济结构早已发生改变，洪武时代的那种农村模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从业人口都向商业转移，但相应的商业税并没有跟上来。皇帝是个明白人，他知道通过文官系统增加商业税是不可能的，他便绕开了文官系统，启动了帝国的另一条系统——宦官系统，但这条系统从嘉靖以后已经衰退。虽然是一种好政策，但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由于地方官员指挥不动，所以，派到各地的宦官只有收养一些地痞无赖充当打手。另外，在税收的设计上没有针对

性，派往各地的税监几乎将一切商民作为收税的对象，结果不仅收上来的税额少的可怜，而且还搞的全国舆论大哗。

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各地税监送往宫中的银两总共才是五百多万两，这些还不如一个大的盐商、海商家庭的资产总额，而且这些税银还有部分贴补到万历三大征之中去。所以，无论是农业税也好，还是商业税也好，税收的设计都没有针对性，小民仍然是纳税的主体，真正应该承担纳税任务的却并没有波及到。

关于以上观点，田口宏二郎认为：“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性，都强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进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身的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具体运作的问题。”

田口宏二郎的话已经很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于一项政策不应该从它的本身去考虑，而应该从政策的源头去考虑，如果不去考虑它的因果，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政策，甚至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另外，我们还需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征收矿税的过程中，内阁首辅赵志皋、沈一贯、方从哲皆采取了默认态度，这更加剧了以商人为主体的东林党与内阁的矛盾。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因为商业税的原因，帝国正式发端了市民运动，这是中枢与地方的博弈、君主与臣僚的博弈、农业与商业的博弈，它表明资产阶级柔性革命在帝国已经成功。在苏州的那场民变中，更是产生了近代无产阶级工人运动，这明确的表明着，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

3 工业革命与明朝的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运动从来就是跟资本主义相伴随而产生的，的确是这样，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天起，就诞生了埋葬它的阶级——无产阶级。大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商人开始投资生产规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帝国出现。而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私营手工业开始成压倒性态势，而所有这一切又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勺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以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提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纺与织分离，甚至是织与耕分离。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扩大；宁静在农业文明在衰退，喧嚣的工业文明在兴起。社会的生产

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分工与协作越来越取代零散与个体，所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工业革命的特点。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将黄册压在那里，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鬟行业有丫鬟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

《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原来这件事情讲的是北京西山煤矿的矿工在天安门前散步的事情，因为万历二十六年，皇帝派了一个叫王朝的宦官前往西山收税，此次矿工游行就是因为征税事件引起的，矿主为了少交税，将矿工工资压低，又将矛头往矿监身上扯，并煽动工人游行以向当局施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前后的这场反对矿税的斗争，不光是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参与进来，而且是具备雇用身份的无产阶级工人也参

与进来，从而使得这场斗争彰显出了一种大的社会变革。而万历二十九年那场苏州民变无疑将这一切推向了顶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说，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闭门户以示抗议，这样导致苏州城内一万余名的织工、纱工、染工失业，失去生计的这些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在封建体制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展情况下，在大型手工工场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到普遍与尖锐的程度，或许他们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的世袭体制，无论这种方式是柔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都能够反映17世纪明王朝所产生的那种悄悄裂变。

六月初六，机工徐元、顾云、钱大、陆满带领二千人推昆山机工葛成为领袖，众人在玄妙观宣誓，城内机工听说后纷纷向玄妙观云集，短时间内就汇集了一万余人。为了扩大声势，葛成将这一万人分成六队，众人身穿白色短打，手持木棍从苏州城不同的方向向税厂走去。为了行动的针对性，葛成严明纪律，禁止众人抢劫市民财物，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丁元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严格禁止机工夺人财物，有乘火打劫的机工也被人乱棍毆死。

《税官谣》对这场运动的描述是：“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苏州城内的打税热潮可以说是如火

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农耕文明的蜕变终于到来，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雀跃吧！

第二天、第三天，运动仍在继续。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六月七号，众人又奔向税官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孙顾等人的家中，将其欧毙，在将这些外围据点清除以后，众人开始转向孙隆盘踞的苏州税厂。

孙隆找到苏州知府朱燮元，让他调派兵马镇压，朱燮元说：“国家的兵是用来御敌的，我不能调派兵马去镇压民众，而且众怒难犯，此时调兵无异于抱薪救火。”眼看机工拿着棍棒向自己税厂走来，孙隆赶紧翻墙潜出城去，躲到了杭州，从此再也没有来苏州。

这次事件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方当局、资产阶级、小市民为了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自私性，他们没有丝毫为国为民思考的意愿，既然如此，国家也没有能力再保护它的臣民，当几十年后，清兵的铁蹄踏破这块地方，肆意烧杀淫掠的时候，这些人只有自吞苦果。这次事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旨在以征税为目的的任何旨意必须要通过官僚集团，任何企图绕过这个集团而付诸实施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帝国归于失败。

既然地方军队调不动，朝廷从太仓调动了不受地方节制的帝国军队前来镇压，当太仓兵备使邹墀带着军队赶到苏州的时候，葛成自动自首，愿意以一己之死承担罪责。面对汹涌而来的机工暴动，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将为首的八个机工首领抓获，另外，将税监孙隆召了回来。

葛成既已进入牢狱，每日前来探望的苏州市民络绎不绝，送来的饭食葛成消受不了，便分给其他的囚犯，因为葛成领导的机工暴动保

护了商人们的利益，各处的商人也捐献钱财给葛成，葛成却坚决不受。朝廷将葛成等八名机工领袖判死，但苏州地方官府就是不敢执行，朝廷也只好默之，一直到十三年后才将葛成释放出狱。

这场运动由于参与者全是工人，所以它成了中华帝国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但这次运动却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矛头没有指向它应该灭亡的阶级，反而指向了封建统治者。

虽然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和科学的进步主张，但是它却体现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牺牲性，这些正是手工业工人在大作坊中集体劳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所形成的优质习惯和团队精神，这些也无疑都具备工人运动的特点，所以，万历二十九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却都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当17世纪的中国明王朝爆发工人运动的时候，欧洲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之中。

李玲玲认为：“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充分地显示了三百多年前我国工人非凡勇气和革命坚定性。它预示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母体内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可以说，葛成领导的反税监斗争，推动了全国市民运动的更加蓬勃发展，为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开辟了一定的道路。因此，这次斗争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进步意义。”????

4 开读之变

当一场政治斗争结束后，获胜者必定要以某种书面形式对前阶段的斗争进行总结，以获取舆论上的高度。嘉靖七年修《明伦大典》正是基于此。

经过天启五年的政治清洗，东林党的嚣张劲头暂时被打压下去了，一直让天启如鲠在喉的三案问题此刻到了必须定性的时候。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便指派内阁首辅顾秉谦、内阁阁臣冯铨担任《三朝要典》的编纂总裁。这部《三朝要典》历史五个月完成，全书共分二十四卷，其中主要是介绍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所谓的晚明三案即由此而来。在这部书中罗列了政治事件，群臣的奏书和皇帝的批示，还有评语，《三朝要典》完全从君主的角度对三案进行重新定义，得出了跟文官完全截然相反的观点。

《三朝要典》从万历十四年的国本之争开始，本着正本清源之目的，对东林党人狠扒，着重指出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势力集团几十年来喋喋不休的借助一些琐事损毁君主的名声以达到他们的险恶政治目的。

《三朝要典》认为，皇祖正值壮年之际，册立东宫稍迟，即遭到群臣的诽谤，这样陷皇祖于尴尬境地，反而使局势难以回旋。等到外廷争论平静下来后，皇祖自然册立先帝为太子，皇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让事情出自己断。如果皇祖真想谋害先帝，在宫禁严密的情况下，自然可以采取其他办法，有必要让一个疯子持木棍去东宫打人吗？那张差经过审讯早就认定是疯癫之人，可是刑部主事王之寀居心险恶，故意指使张差往别处攀扯，幸亏皇祖在慈宁宫召见群臣才揭露事实真相。

关于红丸案，皇上早就说明先帝身体向来虚弱，皇祖死后，先帝哀伤过度，加上日理万机，导致旧疾发作。而当时竟有人说先帝之疾是由于御女太多导致，这岂是臣子应该说的话吗？事情过去几年了，邪党成员孙慎行突然发难，诬蔑先帝是被红丸鸩杀，而首辅方从哲就是主谋，还试图让皇上处死首辅，幸亏皇上声明“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才杜绝了邪党罗织罪名。

至于移宫一案，先帝在临终之前反复交待两件事，一是让阁臣辅助皇上，二是在皇上登基之前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由于李选侍侍奉先帝，自然得居乾清宫，先帝驾崩后，李选侍自当移居别宫，但也应等皇上封妃后才是。当时从首辅到其他文臣皆以万岁称呼皇上，为何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以万岁称呼皇上，反而要以拥戴之功自居，皇上继位乃天经地义，何须别人拥戴。杨涟、左光斗又勾结内侍王安散播流言，说李选侍欲封皇后，行垂帘听政之举。加上王安从中阻挠，使得选侍封妃一事遇阻，幸亏皇上遵先帝遗命封李选侍为康妃，并治王安之罪。

以上就是《三朝要典》对“三案”的定性，《三朝要典》对“三案”已经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皇帝跟东林党们关于“三案”扯皮的事情我们没必要去纠结，“三案”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也没必要去澄清。但有一点我们需明白，那就是斗争的双方围绕着“三案”喋喋不休，实际上就是为了获取舆论权，最终还是权力之争，无论是万历、泰昌，还是天启，他们都要维护皇家的声誉，但正像《三朝要典》说的那样，东林党围绕着“三案”的确显得有些无事生非、上纲上线，而在《三朝要典》的结尾处编纂者也流露出对东林党将来反扑的担忧。

《三朝要典》的编纂人冯铨称赞《三朝要典》是：“《春秋》之绝笔，《孝经》之微言，读此使乱臣贼子惧，忠臣孝子感。”天启年间的这场政治斗争似乎跟嘉靖年间的那场政治斗争有相似之处，嘉靖的皇

位是依照中国宗法制伦序而继，这点在帝国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正德的母亲在数年以前就开始运作此事，硬说嘉靖是杨廷和扶上皇位则有些牵强。至于天启更是在万历时期就确立了他的皇储身份，若说杨涟有拥戴之功，则更是天方夜谭。除此之外，杨廷和和杨涟在新皇帝继位后，又不断提醒皇帝自己的拥戴之功，这自然招致帝王的反感。

天启六年元月份开始修《三朝要典》，阉党的文官们绘声绘色的向天启描述三案的前前后后，天启越听越明白，越想越明白，很多以前皇帝不知道的事情现在都知道了，很多以前皇帝想说但说不出口的事情现在全都被文官表述出来了，天启越想越恨，遂于二月份派东厂去南方抓捕周宗建、繆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黄尊素七人。上回派锦衣卫去抓杨涟、左光斗的时候就遭到家乡民众的抗议，只是人们认为杨涟等人会被放回来，才没有酿成民变，如今厂卫又来捕人，一场大的市民运动已经不可避免。

三月十五日，北京来的厂卫抵达苏州，吴县县令前往周顺昌家中传达此事。周顺昌被关押吴县县衙期间，当地百姓自发的围聚在县衙门前不愿散去。十八日，周顺昌被从县衙押到西察院，一路上百姓夹道执香、哭声震天，巡抚、巡按、知府、县令的轿子被挤得不能通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察院，百姓立刻将院子团团围了起来，很多人都站在墙头上、屋脊上，墙上墙外遥相呼应、呐喊。

看此情形，应天巡抚毛一鹭让人将大门打开，放百姓们进来。几位本地秀才领着众人当头走来，秀才质问毛一鹭：“今日人情如此，明公难道不为自己的千秋声誉着想吗？何不据实奏闻，请皇上开恩，周顺昌不必解往北京，由抚、按勘治。”

毛一鹭时阴时阳的，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只是随声附和。此时围观的百姓群情激昂的喊道：“周爷若死，民亦不愿生。”

厂卫们看到毛一鹭被几个秀才缠住说个没完没了，不耐烦道：“今日之事，干秀才何干？囚犯何在？”

群众的怒火正在火山口上，苏州市民颜佩韦站了出来，劈手夺过一名厂卫手里的棍子，接着，市民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也跳了出来，众人开始围殴从京里来的厂卫，两名厂卫被打死，剩下的翻墙逃走。

到了夜晚，苏州城内有人开始大呼小叫，原来前往浙江抓捕黄尊素的官船正停靠在苏州胥关，不知被何人侦知，便有人跑到城内喊人。众人听说有逮人官船停靠在胥关，便纷纷出动，市民们拥到城外将厂卫痛打，并扔进水中，众人接着放火焚烧了官船，连带朝廷的驾帖、信牌也被烧毁。

为了缓和局势，毛一鹭将带头闹事的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抓捕，颜佩韦是商人，马杰是卖苦力的，沈扬是市场上的经纪人，杨念如是卖服装的，周文元是轿夫，五人都是典型的市民身份。

毛一鹭将五人判死，行刑那天，五人意气扬扬、谈笑生死，引颈就戮，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荣耀，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骄傲。事后有人出五十金买下五人头颅，将五人全尸合葬在苏州城外虎丘山上。崇祯元年（1628年），复社领袖张溥写了纪念五人的碑文，名叫《五人墓碑记》。

张溥写道：“时值阉党惑乱天下，天下缙绅能够保持独立操守的能有几人，而这五个人身份低微，没受过圣人教诲，却能如此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他们的英勇行为令那些身份高贵之人何其羞愧。他们五人死的其所，正是他们的死使得阉党有所顾忌，最终保护了苏州百

姓。”天启六年的第二场苏州市民运动由于厂卫开读圣旨后开始动手，所以也被称作“开读之变”。

天启命令抓捕的那七人除了高攀龙在家自缢外，其他六人分别由厂卫或者地方官押送进京，在狱中折磨致死。天启五年死的那六个人被称为“六子”，天启六年死的东林党这七人被后人称为“七子”。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六年，经过天启的血腥清洗，并毁禁天下书院，帝国正式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东林时代，历史进入小东林时代，也就是复社时代，并且在下一个朝代继续影响着政局。

5 应社与复社

现在看来“东林党”的确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出身士绅阶层，提倡减税，具备广泛的结社特点，好以清议来约束君主的权力，具备这些行为的人都可以归结为东林党。天启、崇祯两朝都不是东林人的黄金时代，或许他们的舞台只在民间，经过天启一朝的严厉打击，东林党的精英损失殆尽，到了崇祯朝，这些人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那就是结社。

复社最初的形式是应社，它于天启四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后成立，它是以文学社的形式存在，但私下里干的仍是政治勾当。

杨彝是江苏常熟县唐市镇人，为当地知名的士绅代表，常常召集文人在家中举办类似文学社的活动，另外，当时江南的文化名流顾梦麟客居在杨彝家中。还有江苏太仓人张溥、张采也是杨家的常客。天启五年，杨彝、顾梦麟、张溥、张采在杨彝家中的应亭召开应社大会，江南名士数百人到会，盛集一时。在文化崩裂的晚明王朝，应社的参与者们重举“尊经复古”的大旗，力图重塑儒家文明。

天启五年东林六君子被杀，天启六年东林七君子被杀，在苏州那场反抗缉缇的市民暴动中，应社无疑是重要的参与者与领导者，历史走到了这个时候，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政党政治终于在帝国出现，当历史学家将视角注焦在此点时，我们却又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

天启六年苏州市民和生员反对阉党的那场斗争被称为“开读之变”，正是“开读之变”将那些有着相同政治抱负的文人连结在一起，并推动应社这种文学社组织从文学结社向政治结社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并最终将应社与东林党连结在一起，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崇祯

结社年代，并在清末民国时期达到了一种历史的高峰，最终影响了中国政治的走向。

应社的复古之说主要是反对程朱理学盛行以来的八股文之说，他们主张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相对于并无明确政治纲领的东林党，应社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而且要求入社会员必须遵从这些纲领。

应社主张在家要遵从孝道，在官则要守官节，而且特别注重横向的朋友关系，力图以一种牢固的朋友关系作为建社的基础。应社最初创建者是11人，但很快在江南江北其它省份的分社机构开始建立起来，成员数也在不断增大。

天启七年，随着朱由校的逝世和朱由检的继位，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东林人士纷纷回归内阁，民间的党社运动自然迎来一个春天。随着潮流的涌动以及应社社员纷纷通过科举进入政界，民间的士子开始纷纷结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章社、阳社、簪社、朋社、匡社、书社、大社、端社、邑社、超社、庄社、质社、隐社、金社如雨后春笋吧拔地而起，这些众多的社团的一些观点不尽相同，它们甚至不停的相互攻击，而且还攻击的十分激烈。

譬如经营章社的临川艾南英和应社的张溥等人就“尊经复古”的方法问题产生了分歧，艾南英认为应该沿着宋代文人，譬如欧阳修、韩愈的思路来进行，通过宋代的文章来改造今天的文章。而张溥等人则主张直接从秦汉时代汲取营养。对于这点，艾南英攻击应社的人，说应社研究秦汉只是研究秦汉的民俗、器物、官职、山川、地理这些形骸的东西，而不是秦汉的精髓。艾南英进一步指出张溥等人尊经只是像朱熹一样对经典进行随意解释，就像剽窃古人文章的盗贼一般。

艾南英的话似乎揭示了应社的一些表象化的东西，这自然引来张溥等人的不满，他甚至写信给已经成为江西临川知县的张采，要求对

艾南英采取措施。无论应社的人如何威逼，艾南英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最终导致章社跟应社的决裂，并使得张溥将章社从社团名单上除名。

崇祯元年的秋天，艾南英听说应社的头头脑脑们齐聚已故王世贞在苏州的弇园，他便也赶到弇园跟这些文人展开了辩论。双方围绕的是否要复古，如何对待八股文进行激烈辩论，艾南英以一种人师的态度对提倡复古的前七子李梦阳等人进行谩骂，几社的领导人陈子龙上前去将艾南英刮了一巴掌，接着，应社的夏允彝与张溥等人也纷纷上前群起攻之。弇园的辩论并没有结束，其后双方以书信往来的方式进行辩论。夏允彝曾写信给艾南英，劝他暂时熄火，但艾南英毫不买账，他接着攻击陈子龙所膜拜的《昭明文选》是“疽之含粪，以为香美耳”，进而又说陈子龙不知“古文”二字为何意，陈子龙读古人书潦草，为文浮荡，意卑语涩，没有法度，应该闭户十年再来跟自己辩论。

为了避免各社之间的分裂与攻击，增强社团的凝聚力，将所有社团合并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崇祯二年无疑是明末党社运动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吴江知县熊开元邀请张溥来吴江讲学，各地文人七百多人闻风而来，张溥遂在吴江召开尹山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张溥将所有的会社合并为复社。这的确是一个盛大的日子，各地赶来赴会的士子们乘坐的船只出现在吴江城外的水河上，这些船连成一片，长达六七里，全城的百姓，包括老人妇女孩童都出来围观，人们欢呼、吆喝，这的确是令所有人激动的时刻。

继崇祯二年的尹山大会后，崇祯三年对复社人来说又是一个欢喜之年，在这一年复社的一些重要人物都在当年的乡试中大获全胜，譬如杨廷枢、张溥、吴伟业、陈子龙、吴昌时。这些参加科考的生员们既有着考完后的轻松又有着中榜后的喜悦，他们在秦淮河上荡舟，笙

箫乐曲、佳人欢笑、才子吟诗全都徜徉其中，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年代。

崇祯三年的金陵大会使得复社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此种社团不可避免的跟政治挂钩，而且在政治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崇祯三年科考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复社社员的信心，他们将这种喜信带回了各自的家乡，增强了复社的影响力。

继崇祯三年乡试中的崭露头角，在崇祯四年的京城会试中，复社再一次一举夺魁，张溥、吴伟业进入翰林院。两次科举大盛使得士子们纷纷加入复社，各地的社员急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复社的领袖张溥已经酝酿有必要重新举行一次大的集会，以对新入会的社员重新登记注册，并刊刻社稿。崇祯六年苏州的虎丘大会是复社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会，云者数千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纳，生公台、千人石都是鳞次栉比，往来如织，游人聚观，无不惊叹，家家户户都挂着“复社”的灯笼，连河中盗贼也挂着“复社”的灯笼从而逃避官府的追查。虎丘大会被誉为大明开国三百年来从未有过之盛况。

复社浩大的声势、科举中的胜出、社稿的畅销都预示着这个社团强大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号召力，无论中枢如何静默，到了此时已经不能对它等闲视之。中枢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团体自然不会有好感，以温体仁为代表的新生派官僚开始对复社采取打压状态，而复社此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中来。

复社在崇祯四年的会试中夺魁不是偶然的，它是因为身为会试主考的内阁首辅周延儒为了拉拢士绅名流所做的倾斜，而温体仁纠住这一点发动御史弹劾。崇祯四年的周温斗法既是周温较量的开始，也是复社介入政局的开端。

从崇祯四年到崇祯六年，温体仁先后迫使复社的张溥、吴伟业离开庙堂，当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后开始正式向复社开炮。体仁向复社开炮不是没有原因的，复社的社员科举录取率高也不是偶然的，大量的士子竞相投奔复社更不是毫无缘由。这一切都是因为复社操纵了科举，只有加入复社才能够获取科举成功的可能，不入复社则很难实现这个目标。

当张溥离开庙堂之后，他很快成为另外一个顾宪成，他不可避免的干涉朝廷的用人和科举，这是一种惯性，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下来。

复社举荐人才分为三种，一种是公荐，一种是转荐，一种是独荐。公荐就是由张溥写信给朝中要员公开举荐；转荐就是让别的官僚出面推荐；独荐就是张溥给主管科考的大臣私下里写信，通过科场舞弊的方式将被推荐人列入上榜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考试权已经纳入张溥手中，很多主管各级科考的官员都是复社成员，在考试还没有举行的情况下，往往考生的名次就已经排出来了，而在这种过程中，入榜考生花钱也是不可避免的，若想获取生员资格120两白银必不可少，而在乡试、会试中考生所花的钱则更多。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文人周同谷在《霜猿集》中说道：

娄东月旦品时贤，社谱门生有七千。天子徒劳分座主，两闾名姓已成编。

崇祯七年的会试张溥仍旧是加紧活动，张溥找到担任会考官的文震孟、项煜，要求给陈际泰、杨廷庶排个座次，会考结束后，温体仁立刻拿着复社刊印的《国表》来跟中榜名单进行对照，《国表》上有

全部复社成员的名单。据井上进测算，崇祯七年的会试，复社占中榜名单的比例高达35%，不久后，礼部侍郎文震孟被温体仁从内阁中斥退出来。

崇祯七年的确是复社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的甲戌科考中复社的政治野心暴露无疑，从这一年起对复社的打击也接连不断。先是体仁的弟弟育仁指使宜兴吴炳作戏曲《绿牡丹传奇》来讥讽复社，并让梨园四处宣演，戏曲中尽显复社丑态。复社人也竞相还击，他们命令地方官销毁《绿牡丹传奇》的刻本，并将温育仁的家人逮捕下狱。

接着又发生苏州推官周之夔借张采的《军储说》攻击复社张溥、张采事件，周之夔是崇祯四年进士，本来也是复社成员，与二张交好，但其人比较清高，加上看不惯张溥、张采的专横霸道，于是与复社产生分裂。由于江南的商品化经济，很多地方种植了棉花，这导致大米的价格腾贵，为了减轻太仓本地百姓的负担，张采写了《军储说》，建议将太仓要运往北方的漕粮改为直接支付给本地的驻军，加上张溥也为《军储说》写了跋语，所以，周之夔以此弹劾复社“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接着，张溥便指使应天巡抚将周之夔免职，周之夔去职之前刊印《复社或问》怒骂复社。

周之夔事件还没结束时，又发生陆文声弹劾复社事件。陆文声也是太仓人，任临西县知县，因为曾被张采鞭笞，陆文声便上疏弹劾复社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接到奏疏后的崇祯命江南学政倪元珙调查此事，眼看风声鹤唳，复社方面马上让陆文声的儿子陆茂贞对其父施加压力，陆茂贞说道：“复社之党占天下之半，迎其锋刃，恐对子孙不利。”与此同时，复社也对调查此事倪元珙施加压力，最终倪元珙只将此事草率了结。

若说这三件事弹劾复社还不是很激烈，那么崇祯九年托名徐怀丹的佚名檄文更是对着复社猛烈开火，这篇文章列举复社十大罪状。

一曰张溥僭拟天王。张溥有何权力敢自称天王？

二曰妄称圣人之名。张溥、张采自称西南两圣人，仿孔子学派，以弟子赵自新等为四配，以吕云孚、吴伟业等称十哲，所到之处，拥弟子三千，虽口诵诗书，实多行无赖。

三曰煽聚朋党。他们在各地劝诱朋党，要求盟约。一开大会，人们不远千里来集，舟船号近万艘。推荐官僚名册满箱，用邮传递的推荐信，比军事信件还快。僧、道、优、倡只要入社，身价骤高。即使清流人望的君子，如果组党，也会给国家造成莫大的危害，如此之辈的朋党，只能使国家陷于丧乱。

四曰妨碍贤者的登用。赏罚之权，当由君主执掌。然后，还没有考试，合格的顺位就已经决定，如非张溥一党，就不会合格，考试官被无视，采否由党人决定，黜陟出于私门，恩威不出主上。

五曰召集非人。集于他们之下的有“名豪权贵之家”或“财虏雄势之子”，廉耻扫地，怀金挟刺。

六曰败坏风俗。他们群中，或士子而插盟当道，或缙绅而奴隶衣冠。成富贵则父逐其子，得名势则弟倾其兄。五伦之中，长幼、朋友、兄弟已失，只有父子和夫妇。其父子也是父不爱子，子不知父。夫妇也重离合。

七曰诽谤中伤官僚。他们党横议政治得失。政治得失，只有有言责者和职守者当议论，而党人不被采用，则以为是君主之恶，左迁党人，则是宰相之恶。总之，只有复社的社友才是好的，非党者都被排除。

八曰使士人品性堕落。复社的社友聚在一起，游博马吊之戏，谈话则专说女人和商人。

九曰窃取官位，丧失功业。由于复社专以党派的利益为优先，堂堂天朝，几无持廉颇、李牧之策者，至于持管仲、乐毅之略者，就更不用说。使得天子只能叹息，由于科举中得不到人才，天子只得把政治委托给宦官，由于文臣中得不到人才，天子不得不把军事委托给武弁。

十曰招来灾害。现在党社占据政界，覆盖朝野，主司都是社友，府县皆为朋徒。杯酒的庸才、贿赂的极恶都被登用，真正的人才在野感叹无聊。

如此十大罪状可以说将复社搅的个天翻地覆，但此时复社也正值当年，加上针对复社的主要打手温体仁正在打击钱谦益，对于复社则是力有不逮，而随后温体仁在钱谦益一案中败北，这标志着从崇祯七年开始到崇祯十年为止，反对派对复社的打压告一段落。

6 温室里的资本主义陷阱

从唯心的角度来说，世上没有不灭亡的东西，同样王朝也是这样，兴周八百年，旺汉四百年，盛唐、两宋三百年，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三百年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大限。但任何事物的消亡自然有它的规律，我们不能一股脑都推到唯心上，如果能够通过探讨王朝的兴衰得失，对于指导我们的人生，减少不必要的偏差是不是有作用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明王朝跟历史上的所有王朝一样，它亡于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原因好理解，无非是收的太少，另外，开支过大。

实际上明朝的灭亡在朱元璋时代就已经种下了，那种僵硬的低税率刚好够洪武时代的那种开支，因为那个时期运河还没有疏通，军屯又发展的很扎实，徭役是无偿的，当全国的田赋达到2700万担的时候，洪武皇帝就将它作为定额固定下来，从此，帝国的税赋就按这个数额收取，无论是新开垦的土地，还是增加的粮食产量都不作为新的田赋起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的税额已经无法再满足帝国的开支。

从正统年间起军屯制就开始慢慢遭到破坏，中央财政不得不每年贴补各地的军需，而且这种补贴的金额到了后期越来越大；从永乐年间起，随着帝国的首都北移，大量的人员也移到了北方，这就需要每年都要将大批的粮食沿京杭运河运到北方，而这些每年都是巨大的花费；不断增多的太监、宫女、官僚、宗室亲王同样是巨大的开支；当一条鞭法的改革实施之后，对于力役的征用也要用白银支付；到了帝国的晚期，在极端气候以及僵硬的民族政策下，帝国的维稳费用也开始令人咂舌。

朱元璋既定下2700万担的定额税赋再想增加则十分困难，因为我们的帝国奉行的是儒家体制和洪武宪法，任何的增税都会遭到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文官政治下，离开了官僚们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是其一；其二是那种强大的惯性横亘其中，就是那种阻碍变革的惯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你习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习惯一种体制的时候，任何的变革都会让你产生不适应的感觉，你就会奋起阻碍之，话说回来，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帝国选择什么样的体制都是经过正反两个方面长期的对比，一切自然有它的道理，轻易去变更或者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在增税的困难性方面除了这两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事实上，从明代中期开始，帝国的经济结构和从业人口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上升，商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日益上升，在稍稍晚些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这些都说明财富正从农业向商业转移，政府的征税目标也应该转向商业领域。但正像杜车别所描述的那样，士绅阶层出身的官员跟商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领域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的禁脔，对农业增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商业增税则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点在万历朝那种惊心动魄的矿税斗争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表现。

后世的历史学家提到明朝，除了那种激情澎湃的儒家文化外，还有那种成熟的文官政治，帝国的一切事物不再是依靠君主决断，而是依靠文牍，官僚们无须见面，只需要通过文字就可以解决帝国的一切。这种强大的文官政治依靠的不再是君主或者权臣，而是程序，一种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制度。当君主的权力被这种程序削弱的时候，帝国的决策不再是从全局考虑，而是从局部考虑，任何的决策都要符合儒家的最大利益，符合少数人的利益。

当一个泱泱大国镇压农民暴动还需要向勋贵借钱的时候，那么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自然都到少数人手里去了，国家没钱，底层民众没钱，国家既没有资源平叛，也没有资源应付外敌入侵和赈济，民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也要揭竿而起。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一下，晚明的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两头小，中间大，高层和底层干瘪，中层膨胀。实际上每个王朝初建的时候都是通过暴力革命将膨胀的中层革除掉，这个时候高层和底层是健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积习或者一些惯性导致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这种日益膨胀的中层既推倒了高层也压垮了底层，人民群众又将揭竿而起，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洗牌，周而复始，如此而已。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的确，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一切都只有在循且中度过。

文官政治、儒家体制、洪武成宪这些都阻碍了晚明增税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粮食的减产也在敲打着这个儒教帝国。

虽然气候作为粮食减产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但商品经济的过度发展也是一个本质原因。

当商业所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农业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商业转移，而一条鞭法的实施却使得商业化进程大大加速了。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为了控制下游的生产成本，士绅也会加大对土地的兼并力度。当大面积灾荒来临的时候，人们有钱买宅、买田，却买不来粮食。

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

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而这些都冲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根本。

明人林希元在《林次崖先生文集》中写道：“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另外，明代的《苏州府志》也记载：“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除此之外，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农民受到的剥削比以前更重了，过去实物税的时候，农户将打好的粮食交到指定地点就可以了，现在还要拿到市场上卖掉再交税，而卖粮的时点都一样，粮商乘机压价，这样农户受的盘剥更大，如果所缴纳的银两成色不好，官府还要让他们拿回去重新熔铸，而这又要交一笔费用。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而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更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一切都商品化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正在逐步吸干底层的农业资源，人们对于这种物化的产品产生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经营实体的人赚不到钱，经营货币的人大发其财，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资本狂欢的年代。

李宪堂认为：“正是白银，使统治者加大了对下层民众剥夺的强度，助长了聚敛和腐败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着社会成长的机能。白银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阶级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空前加剧，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遂使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区因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万明也认为：“白银给各阶层创造了改变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条件，由此，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晚明社会几乎各个阶层都投入到了市场交换之中，无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都不可避免，整个社会呈现出白银时代的显著特性，即对货币财富的倾力追求。

白银成为货币基本形态，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社会由主要是农耕的比较单一的形态向多元形态发展变化，反映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是向经济关系的转变，确切地说，是由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变。这正是从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中，统治者不得不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做出制度调整，而当人们普遍进入货币为主导的社会关系时，人伦关系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增添了新的色彩；乡村失去了旧日平静的秩序，滋生出多样的行为类型；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兴盛，而喧嚣了起来。白银货币化推动了整个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传统农耕社会迥然不同的新的社会图景开始凸显了出来。”

从李宪堂和万明的叙述中我们发现，到了晚明，当白银成为唯一流通的货币之后，社会的财富也变得以白银来衡量，所有人开始追求白银，在这个过程中，富人能更轻松的获取这种财物，而穷人却要发挥比过去更多的心血来获取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越到产业链的

上游赚钱越快，越到产业链的下游赚钱越难，整个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到了明代晚期，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粮价猛涨，作为基础商品的粮食一旦上涨，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加上私铸钱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度的商品化所带来的。

当帝国实行文官政治后，它使得一切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可能性变为乌有，当农耕帝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脆弱或者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实行过度的商业化只能是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却由于商业经济的过度发展，最终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搞垮了这个帝国。

参考资料：

[1] 《剑桥中国明代史》 Frederick W. Mote , Denis Twitchett[2] 《中国通史》 白寿彝[3]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4] 《明季党社考》 小野和子

[5] 《成化皇帝大传》 方志远

[6] 《正德皇帝大传》 李洵

[7] 《嘉靖皇帝大传》 林乾

[8] 《万历传》 樊树志

[9] 《明朝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杜车别

[10]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谢国桢[11] 《大中国志》 曾昭德

[12] 《利玛窦札记》 利玛窦，金尼阁

[13]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

[14]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林仁川

[15] 《江浙残明梦》 郭进良

[16] 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 田口宏
二郎[17] 西方：你的启蒙老师叫中华 翰啸书生[18]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 万明

[19]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发生的双重效应 李宪堂[20] 《明实录》

[21] 《菽园杂记》 陆容

[22] 《礼记》 戴德

[23] 《明儒学案》 黄宗羲

[24] 《三朝要典》 顾秉谦，冯铨

[25] 《国榷》 谈迁

[26] 《霜猿集》 周同谷

[27] 《明季北略》 计六奇